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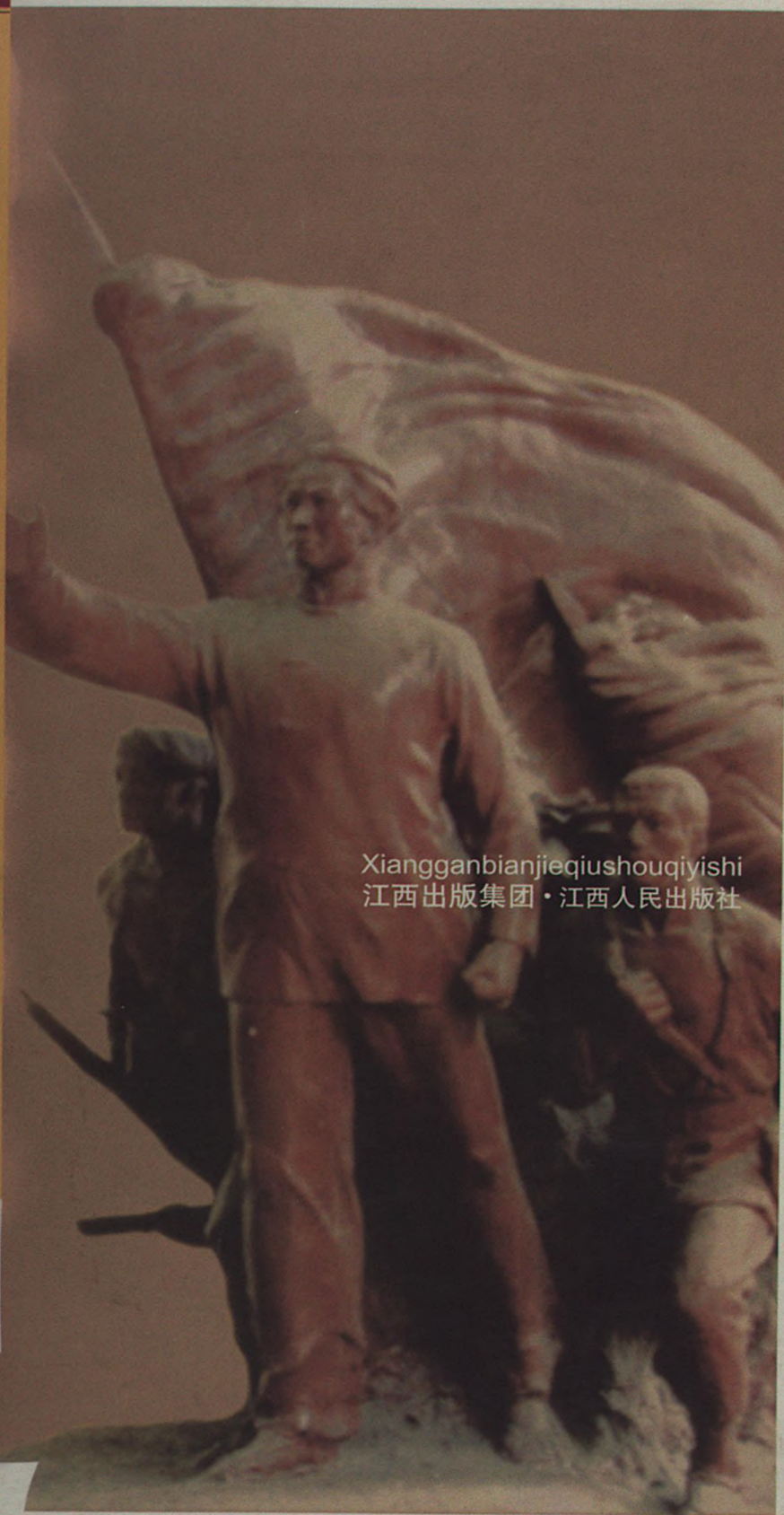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革命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八七会议为契机，酝酿、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公开打出了自己的第一面军旗，并顺势转兵井冈山，闯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著
萍乡矿业集团公司

Xiangganbianjieqiushouqiyishi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史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编撰委员会

顾问 马玉卿（全国著名党史专家、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原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顾问）
李吉人（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原萍乡市政协主席）

主任 晏德文（中共萍乡市委副书记）

副主任 吴伏生（中共萍乡市委常委、萍乡市常务副市长）

黄芝乡（中共萍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朱信萍（萍乡市副市长）

孙炎林（中共萍乡矿业集团公司委员会副书记、萍乡矿业集团公司工会主席）

成员 杨桂香（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原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邵沪权（中共萍乡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晏资明（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萍乡市史志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谭庚炳（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谢晓国（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

彭云秋（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文博副研究员）

刘善文（本书主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

主编 刘善文 杨桂香 黄爱国

副主编 孙炎林 邵沪权 晏资明 谭庚炳 彭云秋 谢晓国

照片提供 张波

编务 黄洋 文中友 漆明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著·····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Xiangganbianjieqiushouqiyishi

萍乡矿业集团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 /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210-03668-5

I. 湘… II. 萍… III. 秋收起义(1927)—历史 IV. K2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425 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著
萍乡矿业集团公司

江西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梦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8

字数:250千 印数:1-4000册

ISBN 978-7-210-03668-5 定价:25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1927 年在武汉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
卢德铭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
余贲民



1937年5月毛泽东(左三)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的合影



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安源会议旧址(张家湾)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修水县商会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旧址——铜鼓县城肖家祠



湘贛边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地舊址——瀏陽縣文家市里仁學校

西江月

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 毛泽东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雕塑)

江泽民同志为萍乡市秋收起义广场纪念碑题写的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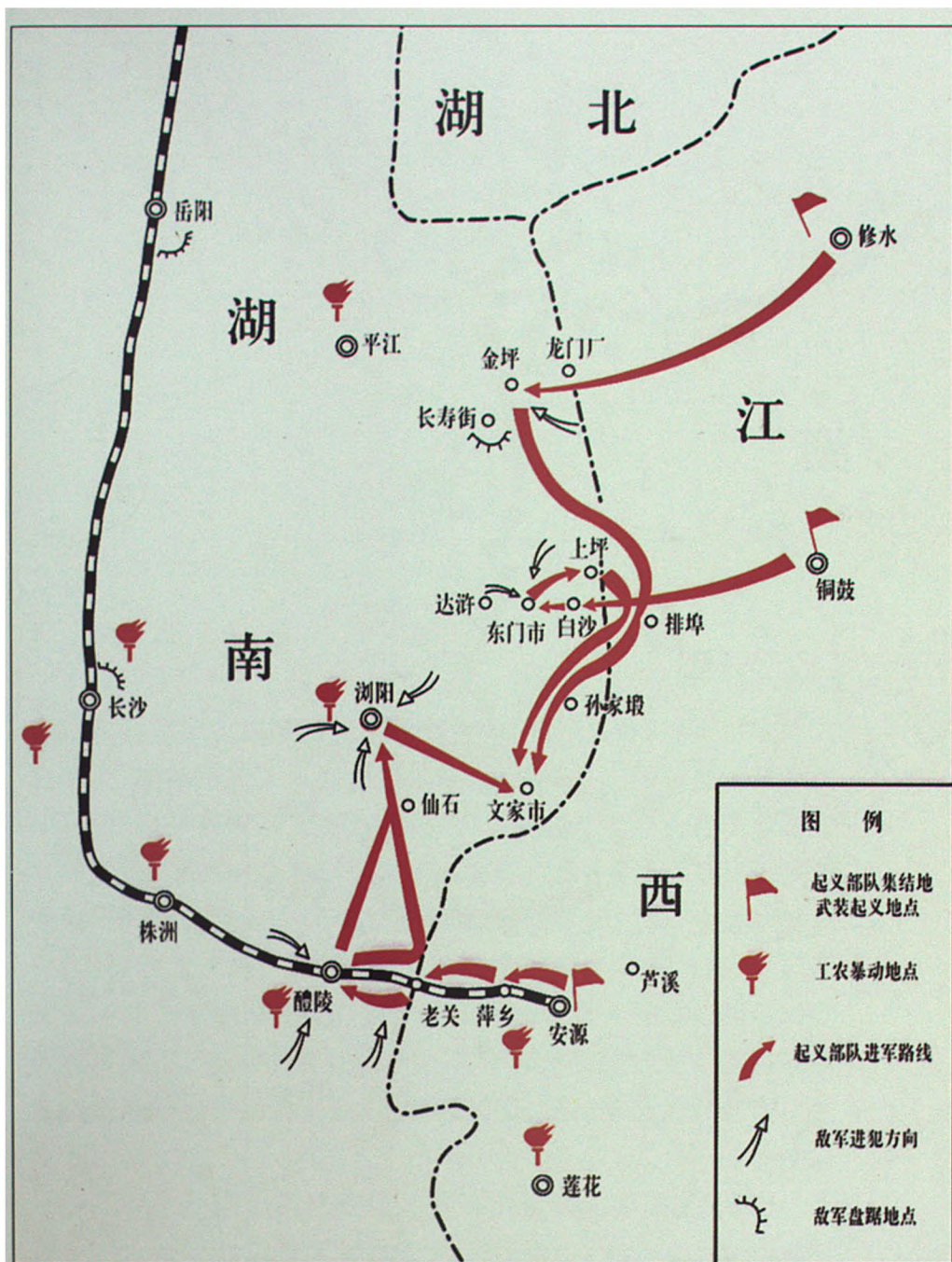
秋
收
起
义
纪
念
碑

江
泽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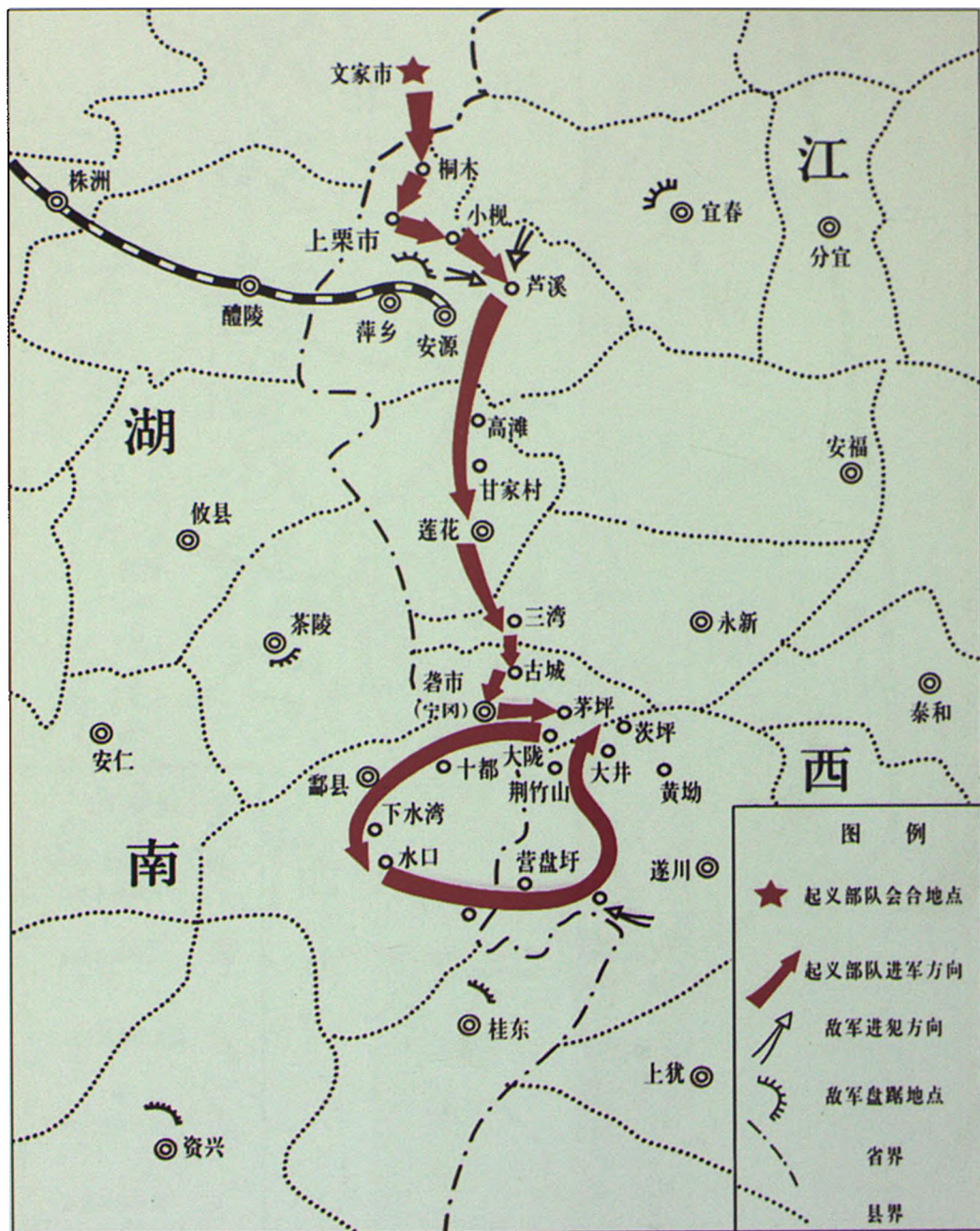
一九九九年
九月九日



秋收起义纪念碑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与进军方向略图(1927年9月)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路线略图(1927年9月—10月)

序

谢尔森

在隆重纪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0 周年之际，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组织编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一书。这是中共党史界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1927 年发生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进入创造红军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温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我们倍感亲切和自豪，更加体会到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

安源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之一。在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决定来到安源，在张家湾主持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

军事会议,决定将驻修水、安源、铜鼓的革命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并确定了各县暴动计划和部队进军路线以及暴动日期。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敌人发动进攻。长沙近郊及湘赣边界各县一齐暴动。以安源工人为主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在秋收起义中英勇作战,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中共中央在1927年12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各路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了向农村退却的决策,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萍乡、莲花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一书,是迄今所见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的专著,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该书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秋收起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挖掘了一批新史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譬如对秋收起义决策的经过、起义中打什么旗帜的问题的认识,对安源会议的认识和评价、行动委员会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和贡献等问题都有新的见解。该书的出版,是对秋收起义80周年的最好纪念,也为党史研究、宣传教育 and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我们要时刻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要注重学习和弘扬革命先辈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心锲

而不舍的坚定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满怀信心地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弘扬秋收起义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共萍乡市委书记)

目 录

导言/1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决定/8

- 一、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必要，
是人民所需要的方向/11
- 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结论/22
- 三、中共中央的决定，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和否定/30
- 四、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回湘改组省委，
执行中央秋暴政策/37

第二章 酝酿 策划 准备/44

- 一、倾听群众心声，制订暴动纲领和政策/46
- 二、计算各方面力量，确定暴动区域/61
- 三、完成计划，准备暴动/68

第三章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条件的历史准备/80

- 一、独特的环境和传统/81
- 二、确立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牢固基础/86
- 三、“模范工会”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成功地训练了万余产业工人/93
- 四、大革命高潮为秋收起义做了三个方面准备/102

第四章 各路武装队伍云集湘赣边界/113

- 一、“招兵买马”，湘东赣西和衡山工农武装齐集安源/115
- 二、警卫团从武汉辗转修水/126
- 三、平江、鄂南农军到修水与警卫团会合，浏阳农军开赴铜鼓休整待命/135

第五章 安源会议/149

- 一、潘心元到安源报告军队情形，湖南省委布置秋收暴动/150
- 二、毛泽东布置株洲暴动/154
- 三、毛泽东主持召开安源会议/157

第六章 完成军队的组建，发布军事命令和起义命令/168

- 一、安源率先组建一个团，首举工农革命军旗帜/169
- 二、毛泽东在安源发布军事命令，赴铜鼓组建军队途中遇险/173
- 三、完成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78
- 四、湖南省委发布起义命令/184

第七章 起义开始，截断敌人交通，各地民众暴动/188

- 一、破坏铁路和电讯，切断敌人交通/189
- 二、长沙城区及其近郊民众暴动/195
- 三、醴陵暴动/200
- 四、湘潭暴动/204
- 五、平江、浏阳暴动/207
- 六、岳州暴动/211

第八章 工农革命军向平、浏直进/216

- 一、师部和第一团向平江县城进发，在金坪遭叛军袭击/217
- 二、第二团连攻三座县城，在浏阳损伤惨重/223
- 三、第三团向浏阳进发，两战皆捷，在东门市受挫/234

第九章 会师文家市/239

- 一、上坪会议，各路部队到达文家市/240
- 二、前委会议决定转兵/250
- 三、会师大会，退往湘南/256

第十章 退往萍乡,进军井冈山/263

一、向萍乡进发,在芦溪失利/263

二、攻取莲花县城/269

三、三湾改编/274

四、古城会议,茅坪安营/282

结束语/285

援引书目/299

后记/303

导 言

1927年9月,在以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萍乡煤矿的习惯合称)为中心的湘赣两省边境,爆发了震动全国、影响深远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次起义,是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共同领导的。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并是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和常务委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①。中共湖北、江西两省党组织根据中央四省秋收暴动的部署,从起义的准备到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都给予了支持和协助,对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湘鄂赣粤等省其他各地当时的秋收暴动,事实上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巨大帮助。

这次起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所作艰苦努力的一部分。它是为执行党的八七紧急会议所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这一方针,按照此前不久中央制定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来组织和发动的。所以,当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和党的其他相关文件都称它为“湖

^①中共中央1927年11月14日《政治纪律决议案》,载1927年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南秋收暴动”^①。以后，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有关的中共党史著述和一般的回忆文章，都称其为“秋收起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学界才将它定名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②。这是因为其他一些省也在八七会议方针指引下按照四省秋暴大纲发动了许多起武装起义，而湖南秋收暴动发生的地点主要是湘赣边界一些县。本书为研究这次起义的历史而作，关于起义的名称，自然遵从中共党史学界的这一定论。只是为着叙述方便，在一些不致引发歧义之处，仍简称“秋收起义”或“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和当年八一南昌暴动一样，“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并曾要求“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认为这样做，“土地革命的胜利是有大大的希望的”^③。湖南秋收暴动的纲领和计划显示，这次暴动的意向是：用共产党的名义鼓动农民普遍地起来暴动，同时组织军队作为暴动的主力，使民众暴动和军队作战这两者相互配合，在各地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进而攻取省会长沙，夺得全省政权，保障土地革命胜利发展。

起义的纲领、计划和指挥机构，是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决定的；省委的起义命令是在长沙发布的。长沙是这次起义最初的策划地。省委的策划结果付诸实施，军队的组织和军事行动便成了起义的主体，而起义的军事部署则是当年9月初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确定的。这次会议在萍乡煤矿矿区安源举行，史称“安源会议”。起义的主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这次会议决定组建的；党指挥军队的机关——中共

①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下简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4、49等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所引书目，第一次出现时标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重现者则不再标明。

②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③中共中央1927年8月5日致湖南省委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4—45页。

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是在这次会上成立的；前委书记和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师长毛泽东的进军命令，也是在安源发布的。这些都表明，安源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和军事中心。

这次起义以当年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和电讯、截断敌人交通为起点，以10月初前委在江西省宁冈县古城开会，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确定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重点，历时近1个月。

起义的始发地是株萍、粤汉两铁路及其沿线萍乡、醴陵、湘潭、长沙、岳州等县的若干地方和起义军的3个驻地：江西省的安源矿区、铜鼓县城和修水县城。起义军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经过的地方有湖南的醴陵、浏阳、平江等三县。起义军放弃攻取长沙的计划转移到井冈山地区，经过的地方有湖南的浏阳和江西的萍乡、莲花、永新、宁冈四县，起义期间的民众暴动，也都是发生在上述各地。总之，这次起义发生的地区，主要的是湘赣边界12个县。这样一来，省委计划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便变成了湘赣边界暴动。

参加起义的民众，有破坏铁路和电讯以截断敌人交通，攻打车站和拦截火车，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攻打乡村反动政权据点和解除地主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共有四五百人。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是来自湘鄂赣三省的原国民革命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和起义前夕参军的湘赣边界各地工人农民。这些武装力量在起义前分别集结在安源、铜鼓和修水三地，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共5000余人。总计，参加起义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约1万人。另外，当年8月底或9月初，余洒度等收编原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数百人。该团在起义刚开始即背叛，袭击工农革命军，给起义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和损失。

起义爆发前夕，湖南省国民党反动政府探得共产党将举行暴动的消息，即出动军警到处搜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秘密机关,逮捕杀害革命者。起义爆发后,除各地清乡队、团防局、挨户团之类的地主武装分头对付起义者之外,湖南省军阀有6个团派兵开赴起义地区进行血腥镇压。江西、湖北两省军阀应湖南省当局的请求,共派6个团向起义地区进发,与湖南反革命军队相策应。面对凶残强敌,起义军英勇奋战,共经大小战斗15次,攻克县城3座,重要乡镇5处,并在醴陵县城一度建立县级政权。参加暴动的民众,在大约300公里的铁路线上,破坏铁路和电讯线路三四十处,拦截火车3次,从车上缴获步枪二三十支,参加攻打县城3座,攻打重要乡镇和团防局等10余处,缴获枪近百支。由于本书正文将要说到的种种原因,起义的民众和军队都遭到惨重的损失。起义前夕,长沙及附近各地秘密机关多处被破坏,载有上万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名册被搜去,随之被捕被杀者达数百人。参加暴动的民众,在战斗中牺牲数十人,被捕者数以百计。起义军战死者数百人,大批官兵因患病而在战斗中和行军中失散。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起义时有5000余人,到9月19日在文家市会师时只剩下1500余人,而10月初部队到达古城之前只剩下700余人。毛泽东在讲到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时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①事实上,这些起义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都对中国的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更有它突出的历史贡献和特殊的历史意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反抗的又一伟大壮举。毛泽东曾经指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使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特点

①《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②《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和优点,它对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在于:它创造性地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结合起来,使起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对挽救中国革命和发展革命起了指引作用;它是中国第一次打出共产党旗帜的起义,提出并正确地回答了挽救中国革命和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问题——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标示了完全意义上的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真正开始;它以军队为主力,由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在起义中建立了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提出后第一次全面实践,是“工农武装割据”的萌芽;它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产业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以农村为战场的武装起义^①,最初显示了中国近代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这次起义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被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的军队,湘赣边界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祥地之一;这次起义的另一伟大成果和它的直接继续,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因而标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新阶段,开始走上了它制胜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道路,因而这次起义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战略大转移——全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的实际开端;这次起义是毛泽东本人革命生涯的伟大转折——由民众运动的领袖、全党统战工作的中坚转为革命军队统帅的开始,从此,他一直在农村率领军队战斗,直到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生动过程,是这种结合的早期的突出典型,是这种结合发展到全新阶段的里程碑,亦即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①在这同一地区,1906年12月爆发的以进攻长沙、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也是由产业工人、农民、倾向革命的兵士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以农村为战场的起义。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农兵学联合起义。但是那时还没有共产党,那次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同盟会领导的。

由上所述不难明白,研究秋收起义的历史,无论是对于深入理解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战争史、民众运动史,还是对于深入了解毛泽东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理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秋收起义史的研究和宣传,历来受到各方面重视。不少亲历者早就写出了回忆文章。曾任人民共和国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战功彪炳史册的老将军萧克,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共同主编了《秋收起义》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界一直将这一历史事件列为重要研究课题,在相关的历史著述和人物传记中被列为重要内容或章节。相关的历史文物展览也一直将它放在重要而显著的位置上陈列和解说。文学艺术界对此也很关注,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小说、纪实文学、戏剧、美术、电影、电视等方面的作品应有尽有。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秋收起义史的研究和宣传更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继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史料专集《秋收起义》之后,湖南省又编辑出版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各种报刊发表的相关论著数以百计。文学艺术界以此为题材创作的新作品也为数不少。这些出版物和文艺作品,对秋收起义史的认识,多数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些疑问逐步得到澄清。例如,过去很长时间认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当年8月下旬余洒度等人在修水开会组建的,说他们组建的那个师,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对内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因为这个师的师部在修水,所以认定修水是秋收起义的中心。后来从历史文献中发现,毛泽东9月初在安源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研究确定了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有的人却认为安源会议只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并没有组建军队,起义中的军队还是在修水组建的。不过,后者认为安源会议很重要,安源应被视为起义的一个中心。由此,有的人更明确提出:秋收

起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修水，一是安源。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这个问题终于被弄清楚了。历史文献记载确凿无疑地显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安源会议决定组建的，安源是秋收起义的军事策源地和军事中心。这一史实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确认后，萍乡市在安源区建造了秋收起义纪念广场，在广场上竖起了“秋收起义纪念碑”，并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题写了碑名。此外，对于决定和策划起义的过程，起义军的兵员来源和组织，民众暴动和军队作战的经过，起义军放弃进攻长沙转而向井冈山进军的原因和经过等等，也都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不过，在本书笔者看来，仍有不足。最突出的是至今没有看到一本学术性的专著，对这次起义的历史本身、起义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以及毛泽东在领导起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情形，作深入系统的探讨。此外，对一些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若干分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责任写出一本信史。本书根据确凿的史料，吸收迄今所见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秋收起义做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而又较为准确的叙述，借以纪念伟大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80 周年，向革命先辈表达崇高的敬意。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决定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谁都晓得，这是毛泽东 1927 年春写的一首词，题为《菩萨蛮·黄鹤楼》。1958 年 12 月，作者对词中的“心潮”自注道：“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 月 7 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①这首词，加上作者自注，道出了毛泽东本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4 个月当中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中央作出武装反击这一决定的艰难过程。

毛泽东词的自注中所说“大革命”，就是发生在 1924—1927

^①《毛泽东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13 页。

年、当时被称为“国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这次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之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进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革命。它席卷全国,轰轰烈烈,其广度,其深度,其规模之宏伟,其对国内外震动之强烈,其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空前的。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成立。1924—1925年,经过几次战役,基本上统一了作为全国唯一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全省。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遣部队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党在广州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以此为标志,大革命进入它的最高阶段。10月,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先后占领长沙、武汉、南昌等城市和湘、鄂、赣等省广大地区。这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迅猛发展,空前高涨,震动中外。在城市,中国人民第一次收回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在农村,革命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撼动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墙脚。

接着,北伐军迅速平定东南五省。英雄的上海工人取得了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控制了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北伐军随之进驻上海,占领南京。北伐战争进行不到9个月,北伐军就横扫半个中国,把北洋军阀的三个集团打垮了两个。

正当大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27年3月在南昌开始与帝国主义勾搭,动手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4月12日,蒋介石秉承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的旨意,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大屠杀。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实行反革命政变,同样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面对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等一味退让,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继上海、广州

反革命政变之后,5月,夏斗寅在武汉、许克祥在长沙、朱培德在南昌相继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被视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等人身上。但是,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恶性发展。此时,中共党内工作陷入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怀疑和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领导。7月12日,中共中央终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摒弃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新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兼常务委员会开始酝酿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标志着大革命全面失败。这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会决定举行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新方针,并起草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又根据这个决议草案拟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1日,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会委员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中共中央将四省农民秋暴大纲下达给湘鄂粤赣四省省委。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研究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会议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批准了四省农民秋暴大纲,确定把发动秋收暴动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等三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了工作。会议作出了《对于湘省的工作决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批准的《湘南工作计划》,夺取湘南,帮助全省农民暴动。同时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回湘传达八七会议决议;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领导湖南秋收暴动;并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任新省委书记。

会后,毛泽东和彭公达即离汉回湘,执行中央决定,与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一道,发动和领导了湖南秋收暴动。

一、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必要, 是人民所需要的方向

中共中央作出武装反击和秋收暴动这一决定之前,一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已经用武装反抗来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据统计,从1927年5月底湖南十万农军进攻长沙至1928年7月初中共六大前的一年零两个月内,全国各地共发生这样的起义即达273起;其中八七会议后3个月爆发的秋收起义共22起^①。这一时期,武装起义在全国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绝非偶然。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人民必然激起的反抗;其背景,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要求因遭到腐朽制度的暴力压制而愈益强烈。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大陆革命经验时深刻地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②恩格斯揭示的社会革命发生发展的这一根本规律,已经被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生动地印证,也为我们探索秋收起义的深层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

近代中国的社会要求,简单地说,就是解放社会生产力,走向近代化;或者说,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强盛。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的腐朽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这种腐朽制度的体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帝国主

^①《中国革命武装起义全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共录1922年6月至1950年11月革命起义810余起。

^②《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义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近代中国，“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①。到大革命发生的年代，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是站在不同派系军阀背后的英、美、日、法、意等多个国家，被称为“列强”。而与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就是本国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他们的首领，就是北洋军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压迫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抗；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是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纲领。这个革命目标和纲领的最通俗最简练的提法，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

蒋介石、汪精卫们当初参加了这场大革命，并且有过不同程度的积极表现，在革命阵营内身居高位。但是，到了大革命后期，他们背叛了这个革命的目标和纲领，改变了自己的方向：从“打倒列强”改变为与列强相勾结以压迫人民，从“除军阀”改变为自己成了与北洋军阀在本质上毫无二致的国民党新军阀。一句话，他们从腐朽制度的反对者变成了这种制度的维护者、体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腐朽制度的辩护士们曾经有一种论调：要不是共产党捣乱，蒋介石早就把近代化搞成了。这种论调的要害就在于故意掩盖了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显然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新代理人、新走狗、新工具和国民党新军阀的蒋介石、汪精卫们，绝对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而只能接着走北洋军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阻碍近代化的实现。不倒倒他们，社会要求就不能得到满足，社会就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便不能复兴，国家便不可能强盛。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蒋介石一伙变成腐朽制度的代表者和执行者的过程，是一个以逐步走向军事独裁、变成国民党新军阀为主轴的过程。为实现军事独裁，必须并且首先就要投靠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以压迫人民，是他们变成腐朽制度的代表者和执行者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标志。这种勾结，是在大革命后期开始的。

大革命初期，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办黄埔军校，在统一广东的几次战役中有积极的表现，由此积累起他走向军事独裁的最初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实力。那时候，他一方面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常在各种场合唱反帝反军阀的高调，俨然一个十足的左派；另一方面，其反俄反共反农工的倾向时有表露，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既赞成又怀疑和动摇的矛盾态度。周恩来认为，那一时期，蒋介石“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①。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蒋介石逐渐从“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和国民党新右派首领。其显著标志，是1926年3月20日他在广州一手制造的反共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之后，他一跃而成了国民党的首领，为他实现军事独裁做了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把蒋介石等列为国民党新右派代表^②，但仍然支持他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仍然表现为国民党新右派首领。关于他这段时间的表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在1926年10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蒋介石自离鄂入赣，见得自己军事上的弱点，很想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安源，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

^①《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抄下来的。这都可看出他很想从政治上取得地位。”^①这就是说，直到当年10月下旬，共产党人还没有发现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线、准备很快与共产党公开决裂的迹象。

仅仅过了10多天，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部进了南昌城，他的公开面孔便开始急剧大变：由国民党新右派开始变成国民党反革命派。

他一到南昌便迈开了军事独裁的步伐。他凭借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他造成的政治声望和庞大军事实力，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对抗，造成南昌与武汉两个中心的公开对立。他离开南昌于3月23日在安庆制造了反革命事件后，其手下暴徒沿街狂呼“新军阀神圣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②，表明他在南昌期间已经成了国民党新军阀首领。

蒋介石一迈出军事独裁步伐，便急忙向国内外寻求支持，特别是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1926年年底，他便开始与日本多方接触，向日本承诺尊重不平等条约^③，表示要“与共产党分手”，准备攻下南京、上海以后即行“清党”，等等。日本政府和军部摸清了蒋的态度以后，确定了促蒋反共以镇压中国革命的方针^④。蒋介石又派人与美国联系，向美方表明了他反苏反共的立场。美国政府了解到蒋的真实意图后，对蒋的地位表示了承认和支持的态度^⑤。

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与老右派联手反共，开始与国民党

①《湘区书记报告》（192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

②③张宪文、方庆秋：《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09页。

④摘自日本外务省和英国外交部档案。转引自王宗华、马菊英著《中国大革命史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3页。

⑤根据《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载《美国国务院档案》译文。转引自《中国大革命史纲》第403页。

内的封建势力相融合。北伐过程中,用军长、师长等头衔收编了大批旧军阀的军队,与拥有武力的地主阶级集团相勾结^①。到南昌后,他开始与北洋军阀和各地方军阀联成一气反共。他在南昌出面责难湖南农民运动^②,与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的攻击相呼应。他在南昌和从南昌赴上海途中一路制造反革命事件时,在各地捣毁农民协会,杀害农会干部。所有这些,表明蒋介石逐渐成了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早年和蒋介石有过交往的上海买办、江浙财团头目虞洽卿,在蒋到南昌后,即亲自到南昌与蒋密谋,双方一拍即合:虞洽卿答应以巨款等给蒋“暗中助力”,条件是蒋必须反共;蒋欣然答应,承诺以后一定做到“保商惠工”各项^③。虞回到上海后,即联合金融界和工商界等60多个团体,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为扶持蒋上台效力。蒋介石此时开始成了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靠山和政治代表。

蒋介石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秘密勾结的血腥交易,由他本人在南昌的两次演说给予了清晰的印证。1927年2月21日和3月7日,蒋介石两次在南昌总部纪念周会上发表了反苏反共演说。这是他彻底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信号,意在公开宣示自己在上述秘密交易中的承诺,以取信于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在2月21日的演说中,他颠倒是非,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并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④。他自称不仅是国民党的领袖,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

①苏联学者萨坡什尼科夫《中国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文注: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归顺国民革命的56名将领中,有51名是拥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

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点名批驳了蒋介石责难湖南农民运动的言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③上海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④《革命文献》第16辑,第14—1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出版。转引自《蒋介石全传》第108页。

的行为,我有制裁的权力!”^①在3月7日的演说中,他一面表示要与苏联决裂,一面向列强示意,无论哪一国,只要支持他蒋介石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他都可以与之联合。

蒋介石的演讲发表后,“京沪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电通社、路透社、顺天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而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说:‘蒋介石已经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同时孙传芳、张宗昌的上海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江南晚报也都大作其社论,对于蒋介石的演说大字登出,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②

蒋介石果然很快就实践他对帝国主义的承诺,动刀子“制裁”共产党员。他杀害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就是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6日,他制造了赣州惨案,杀害了陈赞贤之后,又在吉安、抚州等10多个县制造了血腥的反革命事件,杀害了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多人。他离开南昌赴上海途中,到九江、安庆等地大量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谓走一路、杀一路,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脚下血迹斑斑,于1927年3月26日进了上海。

一场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伙共同精心设计的反革命大屠杀就在这时开始酝酿。

蒋介石赴沪途中,南京城发生了劫掠外国领事署和袭击外国侨民的事件。列强利用南京事件,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南京惨案:英、美两国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3月24日下午突然猛烈炮轰南京城,造成了中国军民重大伤亡。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这一事件,加速了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的步伐,催发了“四一二”反革命

①彭述之:《读了蒋介石2月21日的讲演以后》,《向导》周报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②彭述之:《读了蒋介石2月21日的讲演以后》,《向导》周报第192期(1927年3月18日)。

政变。

列强炮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到达芜湖。他连夜派人到日本驻芜湖领事馆联系,希望日本出面调停。之后,他派亲信分头与日本驻南京、上海领事馆联系,他本人并接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又由他的心腹黄郛多次与矢田密商,同时与其他列强秘密交涉。在频繁交涉过程中,蒋对列强炮轰南京这一罪行未表丝毫谴责,却在南京事件上向列强一味谄媚求助。他编造谎言,向日方说南京事件是北伐军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共同策划制造的。这一谎言,通过日本传达给英、美等列强,成了蒋介石和列强合谋反共的口实。

日本外相币原接过蒋介石的谎言,给矢田发了一个《训令》,编造了一个更加离奇的谎言:“南京暴行”是共产党分子、党代表和军官事先策划的排外行动,其目的在于搞垮蒋介石;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在策划这种阴谋。《训令》责备蒋介石对共产党“管束”乏力,要蒋介石不失时机地下决心收拾时局。矢田奉命将《训令》的内容分别告知英、美等国和蒋介石,意在使列强和蒋介石按《训令》的设计达成共识,一起镇压中国人民革命。

黄郛听了矢田传达币原《训令》,当即表示:蒋决意照日本的意愿办,建议“西方的正式抗议宜向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最好以半数军舰秘密集结于汉口,施以某种压力),而实际处理则由蒋负责”^①。

英、美等国获知币原《训令》的内容,取得共识,不再坚持一味武力威胁,改变为软硬兼施拉蒋介石供他们驱使。于是,先由英、美、日三国拟出《宁案通牒》草案,提出道歉、赔偿、严惩责任者和保证不发生同类事件4项条件。然后又经过反复秘密磋商,于4月11日由英、美、日、法、意五国分别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递交了《宁案通牒》;同

^①转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矢田致币原》(1927年4月2日,上海),见《中国大革命史纲》第411页。

时明白指使和鼓动蒋介石反苏反共,实行反共反人民大屠杀。

五国通牒分别送达后,陈友仁严正表示,断不接受五国的无理要求。而蒋介石立即作出响应:五国《宁案通牒》发出后不到10个小时,他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次反革命政变,经过列强和蒋介石共同精心设计、精心策划后,在列强紧密配合和直接参与下于1927年4月12日凌晨开始。

蒋介石3月26日乘舰到达上海,登码头上岸,法国租界政事处长吉文斯即按事先与青帮大头目杜月笙的约定,当面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告知:他随时可以带卫队进出租界。蒋介石当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英国在华报纸《字林西报》1927年4月2日)^①

根据上海总工会1927年题为《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之情形》的报告^②(以下简称“上海总工会报告”)记载,在政变中指挥军队行动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信得过的白崇禧。白当时是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即3月26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就载文指出:“国民党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任命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部司令官^③,让他全权指挥反革命政变中的军事行动。

除军队外,执行政变行动的还有两支重要队伍:一是假工会,一是青帮杀手队伍。这两支队伍的組織都直接或间接与列强相关。假工会在报纸上刊登的成立启事显示,它是白崇禧按照帝

①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载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70页。

②这个报告发表在1927年武汉出版的《蒋逆铁蹄下之东南》一书上,应是当年七一五武汉反革命政变之前写的。载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2页。

③《戒严司令部严禁罢工之布告》,见《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21页。

国主义和蒋介石共同精心设计的方案，专为政变中对付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而挂这个牌子的。关于青帮队伍的组织，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费信惇事先约见杜月笙密谈组织青帮打手队伍时，杜向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法国当局要提供 5000 支步枪和足够的弹药；二是允许他的军用车辆在公共租界通行。工部局批准了过去任何中国军队都不曾获得的这两项特权^①。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按照法国当局的要求，拿着法国给的枪杆，组织了一支 500 人的流氓打手队伍，与国民党军队相配合，专门对付工人。上海总工会报告写道，这支 500 人的队伍，是蒋介石“出款 60 万”组织起来的。该报告写道：蒋介石“一到上海，即与上海流氓首领黄金荣、张啸林等连结，出款 60 万，组织长江一带流氓，由帝国主义者及中外反动资本家，共同资助金钱枪械，专门捣毁工会及一切革命机关，暗杀革命分子”^②。这 60 万是虞洽卿给蒋介石资助的巨款之一部分。蒋介石到达上海后，虞洽卿即按在南昌与蒋的约定，勾结帝国主义，筹措资金 1000 万元，分两次交给蒋介石^③。这 1000 万元，除了用于组织青帮杀手队伍，还包括组织假工会，支付镇压工人的军队所需费用。

帝国主义列强还出动军队，甚至出动飞机，直接参与和配合蒋介石的大屠杀行动。4 月 12 日凌晨 4 时，蒋介石发出反革命屠杀令，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当天晚上，“帝国主义侵略军捕捉共产党员群众千余人，押交龙华蒋军总司令部”^④。上海总工会报告写道：当蒋军“正向纠察队缴械时，帝国主义的飞机复翱翔空中示威”^⑤。此外，帝国主义列强所办“外国厂家大批开

① 见张瑛著《蒋介石“清党”内幕》，载《帮会奇观》，中华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8 页。

②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 16 页。

③ [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 14—15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转引自《蒋介石全传》第 115 页。

④ 《蒋介石全传》第 119 页。

⑤ 《上海闸北市民大会通电》，《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 27 页。

除历次参加革命运动的活动工人分子”^①。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帝国主义列强如愿以偿。上海总工会的报告写道：“自此次事变发生以后，帝国主义的报纸一致赞颂蒋介石、白崇禧处置适当，日本《朝日新闻》论蒋介石此次举动‘可造成更稳之空气而中止上海仇外骚扰’。《日日新闻》更明显的说：‘上海方面之行使非常手段，一面表示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决裂固不待言；同时亦表示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点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由此观之，则此际孙军之进攻，似非可赞赏之行动。’”该报告写到这里，评论道：“很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他们现时最好的走狗，用来压迫中国革命，比孙传芳还更有用，所以他们宁弃孙而用蒋了。”^②

接着，帝国主义列强命令蒋介石这条“最好的走狗”，把汪精卫一伙拉过去，也充当他们的走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一伙便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南京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把“消灭武汉的共产党”提到了日程上。他在5月的一次会上说：“武汉的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的阴谋就天天可以来动摇我们的内部，使得我们的各种计划不能实现。”^③于是蒋介石与列强勾结起来，同豪绅买办一起，把汪精卫一伙拉去反共。

继英、美、日等国在万县、九江、汉口、南京等地制造惨案之后，4月初，日本在武汉制造了“四三”惨案；接着，从各地增调军舰到武汉地区，对武汉政府直接进行武装挑衅和威慑。同时，列强在武汉关闭银行、工厂和商店。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串通一气，切断武汉的水陆交通线，策动资本家关厂、闭店和抽资，对武汉

①《上海总工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呈文》（1927年4月15日），《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41页。

②《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38页。

③袁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259页；《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转引自《蒋介石全传》第127页。

实行经济封锁,使武汉地区物价上涨,工人失业,人心浮动,武汉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社会基础动摇。

蒋介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东南、南方和西南各省,拉拢阎锡山和冯玉祥,使武汉处于反动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当武汉政府北伐时,蒋乘其后方空虚,一面指使西南各省军阀进攻武汉,一面策动武汉政府控制的军队叛乱,以便里应外合推翻武汉政府。武汉周边地区的革命势力因此被打了下去。武汉政府内部一部分原本是旧军阀的掌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如谭延闿、唐生智、朱培德等,看到武汉政府处境日趋险恶,反共反工农的面目便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左派只剩下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少数几个人。至于汪精卫本人,原本是反共的,反蒋只是与蒋争国民党“正统”,高喊反帝反军阀只不过是谋取国民党内高位的手段。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压力,武汉政府处境日益艰难,革命势力遭到孤立,备受摧残,他便一步步地走向反动。在他主持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1927年4月下旬起陆续发布一系列反动命令,限制和摧残革命运动,并纵容军队叛乱。7月15日,汪精卫等召开反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公开决裂,同蒋介石一伙一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后来讲到这段历史时说:“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加上我们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①毛泽东在这里点出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之所以必然失败,就在于他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

^①《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78页。

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以压迫人民，使中华民族继续任由列强宰割，国家继续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中共中央决定武装反抗和秋收暴动，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之必要，是人民所需要的方向。

二、中共中央的决定，是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结论

蒋介石、汪精卫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实行如前所述疯狂的反共反人民大屠杀，使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回答的两个带根本性的急迫问题。中共中央作出武装反抗和举行秋收暴动这一决定，是拯救国家和民族、挽救中国革命所急需，更是共产党自己免遭消灭的迫切之举。这个决定，是成千上万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结论。正如毛泽东所说：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参与创建党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那种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准备打仗”。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为造反而创建共产党的“秀才”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打仗的问题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24年1月国共合作成立不久，广东的革命战争便爆发了。不过，当时国共合作进行革命战争，共产党只是处于帮助的地

^①《同智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7—378页。

位。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战争,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才被提到日程上、八七会议才确定的。从“没有准备打仗”到开始准备打仗,是一个进步;从帮助国民党打仗到独立自主地领导打仗,更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进步和飞跃,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而为确定独立自主地领导打仗,付出的代价更高。

由没有准备打仗到准备打仗,最直接的血的教训就是二七惨案。二七惨案之前,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杀害,已经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震动。二七惨案进一步用血的事实说明,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一不能单枪匹马,二不能赤手空拳。于是,有了国共合作举行革命战争。组织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去黄埔军校学习,派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到国民革命军去做政治工作,以及组织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军,等等,是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打仗所做的努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提出要有组织地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并决定设立中央军委,表明党吸取五卅惨案等血的教训,对武装斗争的认识逐步有所提高,但这些都没有离开帮助国民党打仗这一立场。

党内最早进行军事工作实践的是周恩来。1924年10月,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任内,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次东征回师途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①1925年10月,蒋介石要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排挤共产党员,周恩来由此意识到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军队的必要。于是,他不顾陈独秀的反对,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共产

^①周恩来:《军队的性质和组织》(1925年6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周恩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是从直接的血的教训中得来的，是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亲身经历中得来的。在理论方面，最早对武装斗争作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是瞿秋白。在五卅运动后期，瞿秋白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内早期专门论述武装斗争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做革命战争的准备。文章表明，他的这些认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东战争等血的教训中获得的^①。不过，周恩来和瞿秋白的认识和实践同样没有脱离帮助国民党打仗这一范畴。

组织工人纠察队最突出的地方要算武汉和上海。武汉和上海工人纠察队的产生和壮大，毫无疑问地与二七惨案、五卅惨案等等血的教训直接相关。在农民中建立武装，以彭湃和毛泽东贡献最突出。他们对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的认识，也都直接来源于农民受武力摧残的血的教训。不过，无论是工人纠察队或农民自卫军，都属于工农群众自卫武装，还谈不上真正的革命武装。

促使共产党人把武装自卫转变为武装反抗，把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战争提到日程上来的重大推动力，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大屠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正在上海。全国各地报纸对政变情形连日多有报道。上海总工会很快根据工人的亲身经历编写了长篇报告并公开发表，看了这份报告的全国各地共产党人感同身受。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促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想到要奋起武装反抗。

上海总工会的报告写道，4月11日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00页。

汪寿华被青帮头目杜月笙秘密杀害。12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分头收缴工人的枪械。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者和新军阀杀害工友、收缴工人枪械等罪行。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当游行队伍“行及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即有二十六军二师兵士由各里弄内奔出,向群众开枪,将群众冲散,旋复用机关枪扫射,死者流血街道,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纷乱,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但见兵士在街上横冲直撞,如发疯狂,逢人即打,党旗国旗工会旗均被撕毁。当场受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数计,所谓革命军演此大惨祸后,即实行清街,禁绝行人,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藏,每车堆装十余人;尚有重伤不及死者,亦被兵士横拖倒曳放置车上,送入土窟”^①。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①《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之情形》(1927年),《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33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从上海回到广州,按蒋介石的布置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7天之内即逮捕革命者10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100余人惨遭秘密杀害。

对于蒋介石一伙反共反人民大屠杀的血腥罪行,中共中央4月20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4月22日先后发表宣言,宣布蒋为人民公敌,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其党籍,加以法办。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仅此而已。这和武汉国民党中央颁布指称蒋罪恶昭彰,决定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的命令,没有什么区别,对蒋介石丝毫无损。态度最坚决并且真正可以惩罚到蒋介石的,是周恩来等提出的办法。当时,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建议出兵打蒋介石。可惜他们提出的方案没有实行,事实上也不可能实行。其原因不仅在于当时中共中央的右倾退让,而且在于意见书本身仍将出师讨蒋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这个意见书表明,周恩来等人已经开始考虑以武力对武力,不再停留在抗议、声讨和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之类。不过,还是没有跨出“帮助国民党打仗”这个门槛。

之后,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和朱培德叛变,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乘机勾结反动军队到处杀害农民的严重流血事件。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与四川军阀杨森相配合,向武汉进攻。夏斗寅部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所部击溃后,流窜湖北各地,勾结土豪劣绅,残酷杀害农会干部和农民,奸淫妇女,烧毁房屋,无恶不作。1927年6月13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毛泽东等签署的《全国农协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之训令》揭露道:夏斗寅的军队“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卅余人,咸宁武昌均杀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

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千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圻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剖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驱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而荆门松滋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训令》又写道:在湖北一些县的土豪劣绅还勾结土匪和会党惨杀农民。“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①

5月21日晚,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特使余湘三策划下,第三十六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和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及第三十六军留守处的陈其祥等率兵1000多人,分途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农运讲习所、省特别法庭、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党校,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近30人,史称“马日事变”^②。之后,湖南反动军队在常德、溆浦、衡阳、邵阳、零陵、武冈、祁阳、黔阳、南县等地与土豪劣绅相勾结,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短短20多天内,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即杀害了1万多人,其中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

^①载1927年6月15、17日汉口《民国日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三册,第559、560页。

^②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21日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骨干达 500 余人。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被捕后，受尽酷刑，腿被打断，最后和他身怀有孕的妻子陈章甫一起被杀害。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被割去耳和鼻子，又被砍断四肢，最后被剖腹用煤油烧死。青年团干部、14 岁的少女朱近之也惨遭杀害。反动军队勾结土豪劣绅在攸县杀害革命者 723 人，逮捕 2300 余人^①，在醴陵杀害 1000 余人^②。在萍乡县城和安源，湖南反动军队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将县党部、安源市党部及工会、农民协会、女联合会等团体捣毁一空。杀死革命同志 40 余人，逮捕 100 余人”^③。萍乡县县长、共产党员罗运磷和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安源市总工会委员长周怀德等被杀害。

马日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继上海等地的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两湖成千上万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告诉人们，再也不能对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抱任何幻想，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群众把武装自卫变为武装反抗。

首先这样行动起来实现这一伟大转变的，是湖南的共产党人。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即 5 月 23 日，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发出电报，号召各县工农武装即日会攻长沙，以平定许克祥叛乱。经过与林蔚、彭公达、丁则鸣等共同努力，到 30 日即调集长沙附近各县农军约十万人，向长沙推进。浏阳农军于 31 日上午攻至长沙城东小吴门，持续数小时；萍乡、安源、醴陵的工农军前锋已达长沙城南之易家湾与敌军激战。这次进攻长沙的战斗虽因中共中央对此事变采取和平调解的方针而中止，但它标志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武装自卫到武装反抗的伟大转折。

①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公室：《株洲人民革命斗争史略》，1991 年内部版，第 45、46 页。

②湖南各县请愿团向武汉国民政府递交的《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三次报告大纲》（1927 年 6 月 3 日），转引自《株洲人民革命斗争史略》第 45 页。

③《土劣横行萍乡》，载 1927 年 6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邓启沛、刘善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册，第 1243 页。

紧接着,湖北的共产党人把问题提得更明确。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6月初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等策略,并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①。

6月中旬至7月初,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纷纷提出了实行武装反抗的种种主张。毛泽东6月中旬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到武汉请愿的近200人开会,听取了马日事变详情的汇报,即不再赞成中共中央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方针,号召大家回去组织群众,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回湘任省委书记后,他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变的继续。要求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准备以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从长沙返回武汉后,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工农武装应“上山”。他说:“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7月上旬,毛泽东和蔡和森商谈后,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②。蔡和森和李立三大约在6月上旬提出了“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提议由叶挺所部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③。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周恩来提出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未能实行。为此,周恩来气得同共产国际代表“大闹一场”^④。6月中旬,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东征、北伐、南伐3种主张争论不休时,蔡和森着急地说:“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⑤他的这些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直接来源于两湖农民被残杀的血淋淋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7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205页。

③④⑤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111、118、116页。

的事实。他说：“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四十三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三千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①

这样，从5月底6月初，到7月上旬，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从血的事实中认识到，再也不能对国民党右派和所谓“左派”抱任何希望，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开国民党，奋起武装反抗，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只有少数身心远离工农群众的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神经已经麻木，仍然不顾工农群众流血的事实，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不同意实行武装反抗。7月12日，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坚决主张武装反抗的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等组成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发动群众实行武装起义终于成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不过，在八七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脱离“帮助国民党打仗”这个影子，所以还发生了秋收暴动要不要打国民党旗子之争。这个问题，最后是由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的实践中正确解决的。这是后话。

三、中共中央的决定，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和否定

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如前所述，是从成千上万革命者惨遭屠杀的血的教训中得来的；而中共中央作出武装反抗和秋收暴动这一决定，则是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蔡和森1927年9月所作《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在讲到当时右倾机会主义使党的上层面对工农群众被残杀却处于麻木状态的情形时说：

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16页。

同志及工农群众，此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对于久相往来的大人物领袖之驯顺恭谨的感觉却异常灵敏，所以此时下层群众所感觉奇怪的正是“共产党何以此时不反抗许、朱、冯等的屠杀、压迫，及国民政府的纵容？”而上层同志所感觉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为什么此时我们可反抗国民政府，及汪、谭、朱、冯、唐……等？”^①

报告所说阶级感觉和仇恨都麻木了的中共党内“上层同志”，在这段话的前面点名，是彭述之、谭平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而他们对之驯顺恭谨的“大人物领袖”，就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和西北军阀冯玉祥。

机会主义是何怪物，何以能使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上层同志”如此麻木？

当时，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②，“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③。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妥协退让。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说：“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个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④对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的进攻乃至帝国

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19页。

②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③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主义的武力威胁,一味妥协退让;对反革命屠杀,不反抗,一再忍让,以至麻木不仁,是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政策的最突出最恶劣的表现。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源于他的“二次革命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党对于如何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的一些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依照他的论述,无产阶级首先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无产阶级再起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论点,后来便被称为“二次革命论”。这些论述,是党在理论上远未成熟的表现,本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当这种论述付诸实践,发生右倾错误的时候,陈独秀等党的“上层同志”不是用实践来检验、纠正理论的偏差,而是相反,把理论朝错误的方向愈益推进。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对蒋介石 1926 年制造的反共阴谋三二〇事件所作让步,已经造成了严重恶果之后,同年 7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仍然按照“二次革命论”批评党内的正确主张,说:“以为共产党已经能独立地领导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①这个“远景”,按照陈独秀同年 9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解释,就是国民革命成功之后的建设时期,“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②。按照这种理论,陈独秀等人把革命领导权主动地让给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极力帮助唐生智发展军事实力,反对共产党员参与掌握政权,反对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武装,等等。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的其他文件将右倾错误观点集中起来系统化,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

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6 年)》第 119 页。

②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 172 期。1926 年 9 月 25 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 252 页。

命领导权。这次会议产生的文件,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发展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以及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的错误认识有关。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有过正确的指导和巨大帮助。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罗易等给中国革命出过好主意,同样有过重要贡献。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就是始终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身上,对这些代表人物处处迁就。他们寄予希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首先是蒋介石;在蒋介石日趋反动的情况下,寄希望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合作和互相牵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则始终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身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妥协退让缘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缺乏深入而正确的了解,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估计过高,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觉悟则估计过低。鲍罗廷等人的妥协退让,则与他们的“西北学说”有直接关系。

“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①。鲍罗廷等人认为,广东靠近香港,在英国炮口之下,不能做革命根据地。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太大,去那边的不是失败就是投降,也不宜做革命根据地。武汉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又被蒋介石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同样不能做革命根据地。只有西北,帝国主义势力薄弱,靠近苏联,最适宜做革命根据地。北伐到达武汉后,鲍罗廷反对东征,主张北伐,认为只要武汉国民政府同冯玉祥联合北伐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1927年6月打下郑州后,北伐因冯玉祥与汪精卫等密谋反共而停止,鲍罗廷反过

^①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63页。

来又主张东征,认为东征才能使武汉国民政府跳出危机。蔡和森认为,“西北学说”实际上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着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惧,是一种以军阀制军阀的老政策,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无论是主张北伐,还是主张东征,帮助汪精卫维持和稳定武汉始终是鲍罗廷考虑问题的中心。为此,他制定了向帝国主义退让的政策,企图利用两湖外商反对他们本国政府武力干涉。他极力回避土地革命:主张北伐时,说打到北京以后再实行土地革命;主张东征时又说打到南京以后再说。他处处向汪精卫退让,与陈独秀机会主义正相吻合。

1926年冬和次年初,农民将千百年来积压在心底的土地要求强烈地向全社会提了出来。湖南农民运动最发达的一些县,农民自动地从减租到丈田,进而插标分田,势不可挡地把土地革命向前推进。地主阶级和以地主阶级为统治的社会基础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和生存威胁,于是,从攻击农民运动“搞糟了”,是“痞子运动”,进而向农民动刀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和夏斗寅的武装叛乱,朱培德的驱逐共产党人,湘鄂赣农村的土豪劣绅以百倍的疯狂残杀农民,都是由此而产生。国共两党成立土地委员会,中共五大和共产国际指示都把土地问题作为重要议题,都表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主题。可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拒绝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对土豪劣绅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一再退让,以至麻木不仁。他们反对党内关于武装工农群众、实行武装反抗的正确主张。于是,土地革命的问题,武装反抗的问题,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问题,便成了凸显在共产党人面前亟须解决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斯大林和陈独秀都给予了错误的回答。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斯大林等人仍然认为“武汉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国问题的决定,并就此给鲍罗廷等发

出电报,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其中,要求坚决进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两湖五万名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可靠军队,组织军事法庭惩办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在理论上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事实上斯大林等人仍然寄希望于汪精卫能同共产党合作来执行这个指示,继续把解决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领导权交给已经走向反动的汪精卫。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鲍罗廷等人把右倾机会主义推向了极致,竭力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农群众起来实行武装反抗。7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这个议决案被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之“集大成”。这个议决案,竟然把正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屠杀工农的国民党说成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农民的土地要求遭到国民党及地主豪绅血腥镇压的情况下,竟然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本来,联共五月指示是要求组织“自己的”军队,而十一条议决案却要“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和训练。武汉现在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①。事实上,在通过十一条议决案之前,6月28日已自动将武汉工人纠察队解散,以示向汪精卫彻底退让。总之,在领导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这三个主要问题上,陈独秀都实行了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在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共青团比较坚决,他当时提出一个决议案,批评党的政策,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但被陈独秀拿来撕碎掷在地下用脚乱踏。共青团代表要求发言解释,他严厉不准许,以致大家不敢发言,而集机会主义大成的十

^①十一条议决案的内容,转引自《八七会议》第27页。

五(一)条也就通过了”^①。这个时候,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然而,工农群众被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不允许那些与工农群众身心相连的共产党人不起来对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②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中央于7月12日实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开始酝酿新政策,并由八七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正确地回答了当时共产党人面临要不要坚持革命和如何坚持革命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起来实行武装反抗,推动土地革命。

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曾经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说:毛泽东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毛泽东的选择,毛泽东的道路破坏了陈独秀的选择和道路,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方向^③。这显然是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搞错了。陈独秀的道路就是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退让,就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他的选择就是“二次革命论”,即帮助蒋介石夺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的道路是领导工农大众拿起几支烂枪,上山打游击。说毛泽东的选择和道路,破坏了陈独秀的选择和道路,一点都不错。不过,不是个人对个人,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用自己的正确选择和道路,破坏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内“上层同志”的选择和道路;这一群“上层同志”,面对工农群众被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原有的“阶级感觉和仇恨都麻木了”;他们的选择和道路之错误,是可想而知的。历史已经证明,破坏他们这种错误的选择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57页。

②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见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8页。

③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四、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彭公达 回湘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了紧急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批准了原中央常委会所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事实上是将执行这一计划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



八七会址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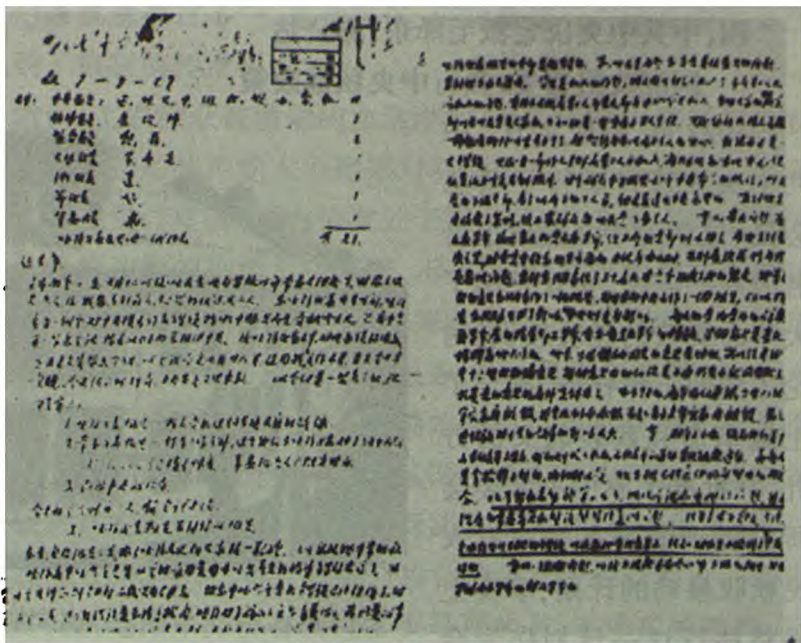
毛泽东是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①。他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发言,除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军事问题,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对土地革命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对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彭公达是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的^②。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是中央委员,本应参加这次会议,但因共产国际代表到湖南要他反陈独秀时,他表现动摇,便改由彭公达为代表^③。彭公达,湖南湘潭县(现属韶山市)人。1903年3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湘潭县中学读书时,即接触进步思

①见《八七会议》所载会议记录首页照片。

②这次会议,只有湖南、湖北两个省的代表出席。

③《八七会议》附录:《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6年2月),据李维汉回忆。



八七会议记录

想,后转到长沙的长郡公学学习,认识郭亮、夏明翰,由他们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奉调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毛泽东接办广州农讲所后,聘请他为农讲所职员,任全所专职中共支部书记。同年7月,北伐军入湘,他回到湘潭,任中共湘潭地委委员,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春,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顾问,驻会指导工作。马日事变后,与林蔚等在长沙组织省委临时委员会,任委员,旋即赴湘潭参加柳直荀主持的军事会议,参与组织工农武装进攻长沙。同年6月,毛泽东回湘任党的省委书记时,他被选为省委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任命他为省委书记。秋收起义以后,受到中共中央错误批评,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改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兼常德县委书记,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7月,他到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安源联络工作,不幸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8月7日被惨杀于

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年仅25岁^①。

主持八七会议的李维汉回忆说,会议讨论临时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参加政治局”^②。原任中央常委的蔡和森“始终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他说:“候选人名单中,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同志(彭是马日事变后提议号召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单内有地位”,他表示不能同意^③。会议记录表明,在讨论临时政治局委员名单时,蔡和森提议“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因要吸收新的分子”,即去掉张国焘的名字,加入毛泽东、陆沉、彭公达的名字^④。李维汉、蔡和森的提议和毛泽东的意见看起来都被会议采纳,毛泽东、彭公达两人都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一结束,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即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而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到湖南工作时,毛泽东对共产国际长沙巡视员马也尔和湖南省委所提“由湘南组织一个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批评意见,决定湖南省委仍执行毛泽东8月初提出的、经原中央常委批准的《湘南工作计划》。这一计划,仍由原定组织的湘南特别委员会负责执行,毛泽东、任卓宣、郭亮仍为该委员会委员,夏曦因故不能到职,改由“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参加,并仍以毛泽

①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1442页。另据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所藏湖南国民党反动政府档案资料。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1986年4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③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41页。

④《八七会议》附录:《关于八七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6年2月),见《八七会议》第197页。

东为书记^①。

会议讨论了湖南全省秋收暴动的布置，对秋收暴动的目的和意义、暴动的纲领和计划、暴动的指挥机关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等等，有一个大略的讨论。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出，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他并提议派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②。关于改组湖南省委的原因，这次会议《关于湘省工作的决议》指出：“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③据彭公达 1927 年 10 月 8 日报告所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省委书记易礼容的两个主张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彭公达的报告写道：

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关于各地的工作，曾有一个大略的讨论。对湖南省委因有下列两个原因：

（一）国际对中国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辩护中国党错误虽然有，但国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二）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

新的中央政治局认为以上两个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于是决定改组湖南省委。重要的意义是要征取一些群众斗争中出来的人，领导湖南的党，坚决地执行党的中央的新政策。^④

彭公达报告所说，第一点似有点令人费解，第二点与事实稍有出入。据易礼容、罗章龙二人回忆，大约在 8 月 4 日或 5 日，湖南省委在苏俄驻长沙领事馆开会，罗章龙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

①见《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 年 8 月 9 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47 页；又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0 页。

②《毛泽东年谱》第 209 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48 页。

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95 页。

加了会议。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要打倒陈独秀,易礼容、罗章龙都表示不能同意。他们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罪陈独秀一个人,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都有责任。会议讨论到没收土地问题时,易礼容反对没收中小地主土地(怕树敌太多),只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或从政治上没收^①。易礼容不同意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一人,并没有错;他的主张与中央主张相冲突之处在于此时仍不同意撤销陈独秀的职务。至于没收土地的问题,当时中央的政策是没收大中地主及祠堂庙宇的土地,没有提没收小地主土地。彭公达报告所说易礼容不同意没收小地主土地这一点,并不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相冲突之处是易礼容只赞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且只能是政治的没收,如没收大地主和革命分子的土地。由于易礼容这两方面主张与中央政策相冲突,加上中央想通过改组吸收一些工农分子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于是,改组省委对于执行中央秋暴政策便是必要的了。在这一问题上,中央所作决定有以下三条:

1. 指定彭公达同志为书记。

2. 新省委九人,三人是工农分子,三人是工农的领袖,三人要是真能争斗的人。

3. 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②

会议并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

由毛泽东赴湘主持改组省委,无论从职务来说,还是从他在湖南党内的声望来说,都最为恰当;而由他到湖南执行中央新政策,领导秋收暴动,则既符合他本人的长久以来的愿望,又适合当时湖南的实际需要和湖南省委的迫切要求,并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

^①参看易礼容、罗章龙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8、141—142页。

^②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5—96页。

1927年7月中旬，中央紧急疏散，曾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即请求仍回湖南。之后，他便奉命一直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开始筹划湖南秋收暴动。当时，湖南省委曾向中央请求派毛泽东回湘任省委书记，并按中央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毛泽东报告湖南军事情形。8月初，毛泽东奉命起草并向中央递交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常委批准了这个大纲，并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赴湘南执行这个大纲。

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中，湖南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当时中央认为全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广大发展“主要的在湖南”^①。毛泽东则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从这方面来说，在湖南组织农民暴动更为有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早就对毛泽东的理论见解和工作能力赞赏有加，而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认为湖南需要“派一得力同志去”时，也认为派毛泽东去最为合适。于是，派毛泽东去湖南工作便顺理成章了。

从对湖南革命运动的了解，从在湖南党内和工人、农民中的威望来看，毛泽东更是派赴湖南领导秋收暴动的不二人选。毛泽东是湖南党的创始人和长期的主要领导人，对湖南党组织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他是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主要领导者，他在湖南工人农民中的威望无人可及。在中共全党，领导农民运动最为卓著者，只有彭湃与毛泽东二人，而毛泽东则被瞿秋白赞为“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是建立湖南数十万农军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他在农讲所也建立过学生武装，对工农群众武装有相当的了解。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同时担任过国共两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农民的土地要求有深切的理解，对解决土地问题已经有相当的研究。秋收暴动，是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

^①《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见《八七会议》第38页。

地革命,而毛泽东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土地问题等方面的贡献、经验、智慧和认识,在全党都位于前列。能够担当领导湖南秋暴这一历史重任的,唯有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暴动,是历史的必然。年轻的彭公达作为湖南秋收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暴的主要助手,没有辜负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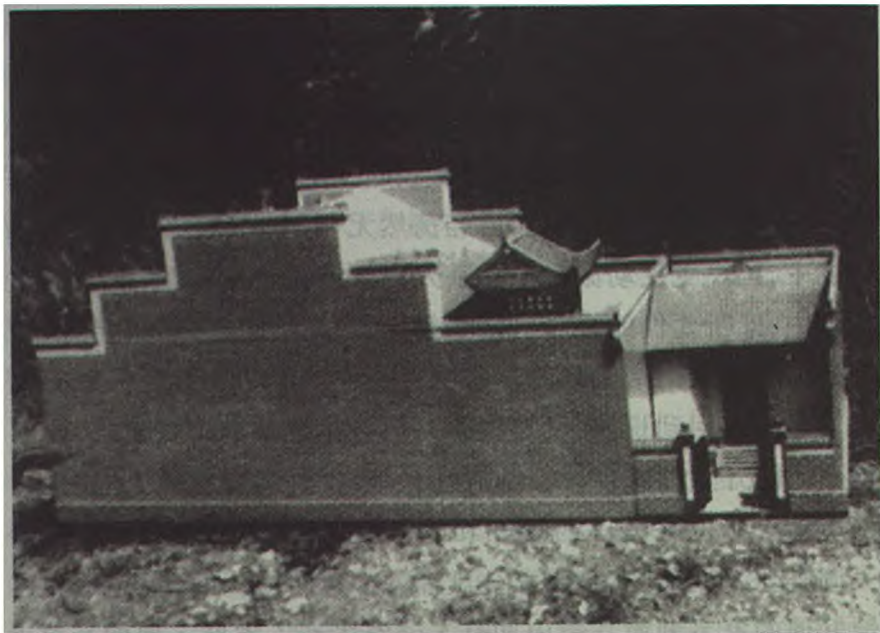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酝酿 策划 准备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新政策。制订四省秋收暴动大纲的时候,一直奉命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的毛泽东即遵照中央指示,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暴动。7月底8月初,他拟订并向中央递交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①。这个大纲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后,成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初行动方案。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继续执行中央所订《湘南工作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一起回湘,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策划和准备秋收暴动。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执行中央秋暴政策和共产国际新训令,准备了提交省委会议讨论的意见。彭公达于8月16日主持召开了改组省委的会议,选举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9人为省委委员^②。8月18日,新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省委常委委员会委员,彭公达任书记^③。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7—58页。

^{②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员会:《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旧址沈家大屋(模型)

传达了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有关决定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新训令,就毛泽东提出的有关暴动纲领、政策和计划问题,接连进行了两天讨论。会后,省委将讨论的结果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省委和中央的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在策划和准备暴动的过程中,省委曾多次开会讨论,向中央书面报告,并派人赴汉向中央作口头汇报,请示办法。中央则多次开会讨论湖南和两湖秋收暴动的布置,给省委以书面和口头的指示。在制订暴动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同时,省委和各县、市委积极地进行暴动的思想政治的、组织的和军事的准备。按照中央的决定,暴动本应在8月底开始。但由于客观环境太过恶劣,各方面准备工作进展艰难,暴动日期只得推延。到8月底,省委得知,来自武汉的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已经开到湘赣边界待命,即于8月30日举行常委会议,作出暴动的各项决定,并向中央报告。9月5日,常委会最后全面确定暴动的布置,并确定暴动日期。至此,暴动的酝酿、策划、

准备工作结束。

一、倾听群众心声，制订暴动纲领和政策

毛泽东、彭公达回湘策划秋收起义的时候，湖南同全国一样，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全省继续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县杀人仍未停止。这时候，深入工农群众中，倾听他们的心声，据此制定出足以振奋群众革命热情和有效地把群众团结起来的革命纲领，成了成功地组织暴动的关键。毛泽东回到长沙，仅与省委书记易礼容做了简要交谈，便到他夫人杨开慧的家乡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调查农民土地问题。他邀请了6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教师，在杨开慧家里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回到长沙城内，恰好他的家乡湘潭县韶山冲有5位农民到了省城，他便与这5位乡亲会商解决土地的办法。他还从多方接触中了解到唐生智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因镇压革命、残杀人民的种种恶行，已经在群众中臭名昭著。几天的调查研究，为他思考暴动的纲领、政策和行动计划提供了可贵的实际材料。这时，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向省委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新训令。毛泽东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执行中央的秋暴政策和共产国际新训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拟定了方案提交省委讨论。经过8月18日和19日两天讨论，暴动的纲领和计划都有了初步结论；其中有些重要问题，省委对中央的有关决定和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19日和20日，省委分两次将讨论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问题的结论以及省委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写成报告，派常委何资深携往武汉向中央请示。

土地问题是制定暴动纲领的中心议题。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的土地要求有深切的了解。他从1927年4月初起，同时担任国共两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一直参与解决土

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讨论。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秋收暴动中,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中央已经作了规定,毛泽东也已有考虑。中央制定的秋暴大纲规定:对于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其所耕之地,应向农协会交田税^①。《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对上述规定稍有变更:没收大地主土地及一切公有土地。小地主土地不没收,只实行减租^②。八七会议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建议五十亩以上均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不没收小地主土地不行,“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但没收小地主土地,则对小地主的安置应有一定办法,方可安民;3.对自耕农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一个方向;4.对会党土匪应当定出政策,应当视他们为自己的弟兄,而“不应看作客人”。但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不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用不着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③。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这不能解决问题。再说中央的决议案只规定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公共土地分配给农民,究竟如何没收和分配,由谁来没收和分配,只字未提。这些问题,都需要与农民群众商量,在实践中找出正确的办法。因此,他一到长沙,便把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作为第一要务。

毛泽东是以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为实践基础,从有利于发展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考虑秋暴的土地纲领的。他的着眼点在“全部抓着农民”,即把全体农民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在毛泽东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通过板仓村调查及与韶山农民会商,他“知道湖南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3—44页。

②《八七会议》第39页。

③《毛泽东年谱》第209页。

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事实表明,按中央规定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和祠堂庙宇土地,必定不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而要没收全部地主的土地,便有一个地主家庭人口生活出路的问题,不得不加以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提交省委讨论。在8月19日省委讨论土地纲领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了4点重要意见:

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提出),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①

毛泽东的这4点意见,比他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进了一大步。他的发言获得贺尔康、毛福轩等多数委员赞同。易礼容和夏明翰两人发言,也赞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意毛泽东关于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协和革命委员会宣布执行等项意见,但在没收对象问题上与毛泽东存在原则分歧:易礼容反对没收小地主土地,主张只没收大地主土地,并且认为只能是政治的没收,如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夏明翰则主张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②。以当时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和需要的实际情况来看,易礼容的意见偏于保守,而夏明翰的意见则

^①见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6—97页。

^②见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7页。

不合国情。只有毛泽东的意见显得既坚决彻底而又稳妥。最后，毛泽东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获得会议通过。其大要是：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平均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往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地主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①

8月20日，毛泽东以省委名义将省委会议讨论后通过的《土地纲领草案》抄报中央。8月19日和20日，省委的两个报告由何资深送到中央。中央常委讨论后，于8月23日就省委报告的各项问题作了答复。其中，对省委提交的《土地纲领草案》批评道：

土地问题，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我们更不要提“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一旦(进入)地主阶级消灭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只是一种法令问题而已。对地主家属则以能耕者给田，不能耕者则没收为原则。土地没收后由革命政府宣布简单的田税税率法(累进的田税，至多不超过收百分之三十)，每乡区提出救济贫民的基金(包括地主的老弱家属)。^②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对中央的批评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认为

①《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1页。

②《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6页。

中央指出的“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革命”，“不要提‘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口号”，都是正确的。但是，不同意中央关于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等项指示。省委在确认时应该“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同时，决定从《土地纲领草案》中删除“没收自耕农土地”的内容，把自耕农（中农、富农）确定为土地革命中贫农“领导”和“拿住”的对象，从而第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省委讨论的最后结论是：

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①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最后确定的土地纲领仍未获得中央批准。9月5日，中央听了彭公达的工作报告后，在给省委的信中严厉地批评道：“关于……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②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定的全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土地纲领，是对中共全党的一个开创性贡献。它比八七会议所提土地革命的主张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对如何实行土地革命提出了中央不曾提出的具体办法，为以后制定土地纲领和土地法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材料。

秋收暴动开始的土地革命，是由暴动中产生的政权来推动和执行的。政权问题，是秋暴纲领的根本问题。在政权问题上，除了确定政权的形式和性质以及政权产生的方式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这个政权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

^①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0页。

^②《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1页。

来源于1927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以及7月13日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作同一内容的决定。按照这一决定,南昌起义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同年8月4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更明确地说: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成为反革命政府的条件下,共产党“进行独立的工作。旗子仍用国民党”^①。所以,秋收暴动中产生的政权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首先是这个政权要不要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子,由此连带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组织要不要与国民党彻底脱离关系。

毛泽东、彭公达回湘策划秋暴之前,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作出《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决议》对政权问题的规定是:暴动中先以乡村的农会和城市的革命委员会构成的暴动指挥机关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然后是“民选革命政府”,其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产生的方式: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暴动指挥机关,由共产党组织指派党员和少数国民党左派分子组成;民选革命政府,由暴动成功后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参加的选举会议选举产生。当时中央主张仍用国共合作的形式领导暴动,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约在8月中旬,共产国际来了一个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苏维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被采用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由无产阶级政党单独领导,打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这同中共中央的主张相距甚远,所以国际的这一训令未被中央接受。同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以下简称“中央八月议决案”)决定:“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议决案对工农暴动应举左派国民党旗帜作了明确的规定,并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议

^①《八七会议》第109页。

决案写道：“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其理由有3条：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三、便于“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议决案指出：我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①。

毛泽东回湘后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央关于不实行苏维埃，要实行“民选革命政府”，以及举左派国民党旗帜等项决定，都是群众不能接受的。他得出了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结论。他的结论获得湖南省委完全赞同。事关暴动成败，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央直率地陈述自己的主张。8月19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写道，秋收暴动要“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②。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以下简称“毛泽东信”）更是对国际训令表示热烈拥护。他在信中写道：

某同志^③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从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④

彭公达报告在写到在政权问题上“省委和中央不同的意见”时，就为什么“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的问题提出

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八七会议》第132页。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8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9页。

③《毛泽东年谱》第211页，注：“某同志，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④《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0页。

了3条理由。报告写道：

(乙)政权问题

根据以上不要国民党的一般原则，对于政权有下列意见：

(一)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二)在我们的暴动力量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

(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就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①

这3条理由，绝非凭空想象，而是听取群众心声后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信中所说“1917年”和“1905年”，彭公达报告所说“1917年10月”，是指俄国两次性质不同、领导力量不一样的革命。联系到毛泽东信的下一段“因国际这个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他们所说“早已到了1917年”，显然是就革命的领导力量而言，不是就革命的性质而言。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应当像十月革命那样由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来领导，过去总以为中国革命既然像俄国1905年革命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当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领导，“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毛泽东接着写道：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闫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9—100页。

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①

毛泽东这段话,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央八月议决案关于应当打左派国民党旗帜的规定及其3条理由来说的,是对这个规定及其理由的全面彻底否定。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帜,是关系到秋收暴动能否发动起来,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用血的事实提请中央注意,中央八月议决案在这方面的规定绝对是行不通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政权问题上的主张的要点是:一、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不要“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二、这个政权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应当高高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即公开由共产党实行独立的领导;三、“不要国民党了”或者说“取消国民党”。

这3点纲领都没有获得中央批准。8月22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省委19日和20日两个报告,23日给省委复信说:“政权形式……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②。直到9月5日,中央给省委的信仍说省委在政权问题上与在土地问题上一样,“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

①《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0—51页。

②《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5—56页。

误的”^①。不过,这时候暴动即将开始,已经没有时间往返讨论请示了。结果,实际执行的仍是省委自己制订的纲领。“旗号镰刀斧头”,没有打国民党的旗子,而是打共产党的红旗。关于政权形式,省委的计划和起义命令都是提“革命委员会”,没有用“苏维埃”这一名称。但省委制定的口号中,有意不提“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不是民选产生的农协和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政权,只是字面上不同而已。后来形势的发展终于使中央改变了认识,9月19日,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月决议案的决定,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并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②。

关于纲领中的暴动问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曾多次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同样与中央发生了争执,同样显示出毛泽东的见解更为妥当,更加高明。

暴动的力量和组织有两个方面:一是军事力量和军队的组织,二是民众(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和组织。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问题;二是军事运动与夺取政权的关系问题;三是暴动中组成的军队的战略方向问题。

中共中央当年7月下旬8月初就曾委托毛泽东研究湖南的军事形势。8月5日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命作一军事计划。八七会议第二天,中央致信前委,命分兵一二个团由郭亮率往湘南,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指挥。毛泽东奉命回湘发动秋收暴动时,中央即交给毛泽东介绍信,从南昌起义部队调两个团到湖南参加暴动。这些都表明中央对军事问题是重视的。但当涉及军队的组织、军队在暴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实际问题时,中央有的领导人便显出了书生气。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讲到军事问题时,说:

①《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1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312—313页。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这段话，从制订秋收暴动纲领的角度来看，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两者要相互结合，军事是支柱；二、军事与夺取政权的关系：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关于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毛泽东在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且提出了军队的战略方向的问题。他不同意湖南省委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个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个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并强调：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②。

这里清楚地指出了军队应当在农村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已经隐含着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萌芽，并且继前此已经提出的“上山”，指出了军队的战略方向：在农村平地待不住就“上山”。中共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湘南组织的一个师不去广东留在湖南的意见，对他所提“上山”的意见没有注意，未置可否。

在8月18日省委会上关于“暴动问题”的发言，进一步发挥了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以及枪杆子由政权取得的思想。他的意见获得易礼容赞同。彭公达的报告把他们两人的意见写在一起：

(二)暴动问题

^①《八七会议》第58页。

^②转引自《毛泽东传》第140页。

甲、泽东和礼容的意见：一、湖南和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①

这段话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了。第一，军队是暴动的支柱，要以主要精力抓军事。第二、政权不仅靠枪杆子去夺取，而且靠枪杆子拥卫和建设。

毛泽东所说单靠农民的力量终将归于失败，是由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残酷事实证明了、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没有严密组织和未经严格军事训练的并且多由原始武器装备的农民武装队伍，人数再多，也敌不过武器精良的正规的反动军队。湖南农军，是毛泽东指导和鼓励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最盛时全省有数十万之众，并有几千支枪。可是，马日事变一来，仅20多天，就被一两个团的敌军勾结土豪劣绅杀了一万多人，工会农会全部被捣毁，工农武装只剩下分散地隐藏在各地的两三千人。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毛泽东策划秋收起义也有很大的影响。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原株萍铁路沿线时回忆说：“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涉及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的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他说，这是阶级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7页。

斗争给他的“人生第一课”。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萍浏醴起义对后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秋收起义都有很大的影响。”^①毛泽东策划秋收暴动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和湖南农军的失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万、几十万手持原始武器的农民，不到一个月，便被手持新式武器、只有一两千人的正规军队打败，反动统治者杀人像割稻子一样！毛泽东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处处抓住事物的实质，善于记取前人的教训。他从萍浏醴起义和湖南农军失败这类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中看清了，要暴动，就“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而且，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还只是“可起来”，并不能保证起义者长久地站住脚。事实上，“起来”以后，暴动队伍的方向只有三个：要么在原地挨打，要么打进城市里去以卵击石；而要想生存下去以图发展，只有上山。所以，他7月上旬就提出农军可“上山”，以后又多次提出这一主张。这决非心血来潮，偶然想到的，而是经过对前人流血的教训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

湖南省委接受毛泽东和易礼容的提议，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举行全省暴动时，“决调陈烈、李隆光两个团做暴动的发火药”^②。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提出的计划后，8月22日召开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会上，有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③，因此省委的暴动计划未获批准。8月23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严厉批评说，省委的暴动计划“偏重

^①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8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9页。

^③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毛泽东传》第144页。

于军力,好象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同时告诉省委,陈烈、李隆光两个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①。这就是说,还是要“单靠农民的力量”举行暴动。8月30日,省委致信中央,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②。9月5日,中央给省委回信,仍不同意湖南省委的主张,作出决议:“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③

幸好8月30日省委致信中央的时候得知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已经开到修水、铜鼓待命,即开会研究决定,由毛泽东赴安源组织军队,并按中央8月23日给省委信中的规定,把即将组建的军队定名为工农革命军,将警卫团和各地工农武装编为1个师。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订的秋暴纲领,关于暴动和军事问题的要点是:一、把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结合起来,以军事力量为支柱,并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二、组建工农革命军,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拥卫和建设政权;三、做好上山的准备。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军事纲领,除“工农革命军”这一名称是由中央决定的以外,整个计划并未获得中央批准。

毛泽东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在回忆到秋收起义这段历史时说:“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

①陈烈、李隆光两个团都属程潜所部第六军。陈烈是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团长,李隆光是第十九师的团长,当时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宁汉合流后,程潜为蒋介石所忌,被关押数月之久,第六军便因此散掉,陈烈所在第十七师被编入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李隆光所在第十九师,部队也散掉,所以这两个团不能为秋收起义所用。陈烈后来投靠了蒋介石,为陈诚所重用,1940年39岁时在军长任上病死。李隆光后来赴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参加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师长,是红七军智勇双全的战将之一。1931年率部赴中央苏区,途经广东乳源县时,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

②《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7页。

③《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1页。

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以下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接着讲了工农革命军的组成之后,又说:“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①由于辗转翻译和其他原因,第一段话译文有的意思不够明确,有的与原意不符。第三点,应是没收大、中、小地主的“土地”,而不是“财产”。第四点,有的译本是:“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政权。”^②似乎更接近原意,即暴动中产生的政权,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是打出共产党的红旗。所说共产国际反对建立苏维埃,译文显然有误:如前所述,实行苏维埃,恰恰是共产国际训令的重要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五点纲领都是正确的。此外,在制订纲领时,还制订了若干重大政策,如对被没收土地后的地主家庭人员给生活出路的政策,对会党土匪(即“绿林好汉”)的政策,等等。这五点纲领和随之制订的政策,有效地指导了秋收起义和随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传》在叙述完毛泽东制订暴动纲领和计划后,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不妨全文照抄于此: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5、126页。

②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的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讲：“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①

二、计算各方面力量，确定暴动区域

制订暴动计划，是筹划暴动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其中，暴动区域的确定，因事关暴动成败，又涉及暴动条件的计算而意见不一，颇费周折。既然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武装暴动，那就至少要对暴动区域内三方面力量进行一番计算：党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武装的力量。此外，省委本身人力是否够分配，经济力能否支持，也不得不加以计算。在毛泽东看来，对武装力量的计算，是决定暴动成败的关键。他说得很清楚：“有一两个团兵力，这个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但是，中央却一直要求省委“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毫不许犹疑”。由此，在确定暴动区域这个问题上，省委内部、省委和中央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由于意见不一，又由于客观情势的变动和对各方面力量的计算，暴动区域的确定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个阶段的方案：8月初至8月17日执行“湘南计划”——以湘南暴动为先锋队，实行全省暴动。

7月底毛泽东奉命拟订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如下：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①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以上见《毛泽东传》第144页。

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①

湘南和湘中、湘北是湖南全省革命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党和农民的力量，历来湘中居于首位，湘南次之；但军事力量则当时湘南优于湘中和湘北。6月间，郴县、宜章、桂东、永兴、资兴等县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和广东东江地区农军300人先后撤至汝城，会合汝城农军，共约4000人，在汝城一带继续从事农民运动^②。到7月下旬，由于交通不灵便，省委对当地农军详情不明，却知广东农军仍在汝城。因汝城靠近广东、江西边界，可从已经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调兵，于是，毛泽东拟订湘南运动大纲时，关于军事力量有如下计算：

(二)军事方面

1、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2、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

3、江西革命军(即南昌起义部队——引者注)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③

中央常委批准了这个大纲，于8月3日向湖南省委寄送四省秋暴大纲时告知：中央准备计划一湘南政府，并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赴湘南进行此项工作^④。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7—58页。

②《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29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8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4页。

随即,中央将湘南运动大纲定为《湘南工作计划》寄给湖南省委,告知:“此计划系由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者。”指出:“全湘农民暴动的指导、计划、分派工作人员的责任仍归省委。”^①这样,便形成了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初方案:以湘南暴动为先锋队,实行全省暴动。8月8日,中央为落实这个方案,致信南昌起义部队的前敌委员会,告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即将前往湘南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希望前委分兵一团或二团,由郭亮带往湘南,帮助湘南特委工作^②。

这时,湖南省委和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南昌起义部队由闽转粤时,由湘南组织一个师开往广东,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夺取广东^③。这一建议,恰与中央所定《湘南工作计划》背道而驰,为毛泽东所反对。毛泽东在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

组织一个师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于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

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④

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继续执行《湘南计划》。为此,会议《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案》重申:

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

①《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8—59页。

②《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1927年8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6页。

③《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7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209页。又见《毛泽东传》第140页。

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①

就在这时，湘南的情况发生了变化。8月7日，驻汝城的广东农军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袭击，损失惨重，其余部不得不退回广东。平江、浏阳两县农军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部队，正在返回湘赣边界途中，尚未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绕道闽边南下，湖南省委与他们难以取得联系，此两处调兵均告落空。又由于许克祥对唐生智的背叛，唐军南下攻许部，因而湘南与长沙被隔绝。8月18日改组后的省委第一次会议之前，湘南计划并未实施，也已经不可能实现。

第二阶段的方案，是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中、湘南、湘西等同时暴动，夺取全省。

在湘南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从党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武装的力量情况来看，只有在湘中地区暴动才有胜算。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是全省革命的发祥地，也一直是全省革命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当时，党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最有基础。党员人数，见于文献记载的，萍乡（含安源）约700人，醴陵约500人，平江700多人^②。这3个县即共有党员1900人以上，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约5000人的近40%。并且，党的组织都保存完好，继续进行正常活动。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而湖南农民运动的中心事实上在湘中。湖南全省工人运动也是从湘中开始，一直以湘中为最盛。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工会农会多被打散，但党在工人农民中的影响仍在，并且安源的工会仍然公开存在，醴陵等县农民的组织仍有相当的基础。当时全省的军事力量，省委7月

①《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7—48页。

②依次见安源报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41页）、醴陵报告和平江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3、116页）。

23日报告说：“有三处最为显著。第一，浏、平、岳一带；第二，宁、益、潭一带；第三，萍、安一带。”这三处，除益阳外，都属湘中。至7月下旬，平江、浏阳农军已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岳阳、宁乡、益阳、湘潭等县农军以及长沙近郊的农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散掉了，但仍有收集和恢复的可能。特别是在安源矿山，保存了工人纠察队和党所掌握的矿警队^①，加上聚集在矿山的醴陵等县工农武装，共有一千余人。就军事力量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沒有正规军队。萍矿矿警队虽然在早些时候受程潜收编，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但一则仅有四五百人，二则从未打过正规的仗，完全称不上正规军队，不足以担当暴动的军事责任。

8月18日的省委会议对以上情况过于乐观，认为：“湖南的秋收暴动在现在客观环境，确实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于湘南已与长沙隔绝，省委决定“另组织了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不过，这时湘南暴动的中心，已经不是汝城，而是衡阳。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有一两团兵力帮助暴动的意见，省委决定：“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②然而，省委的这个过于乐观的计划，在中央看来，却是过于保守。中央审议了省委的计划后，于8月23日给省委复函说：“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却有两个错误”，一是偏重于军事，好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二是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其他各地的秋暴工作，特别是不该放弃湘南计划。中央除告诉省委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之外，要求省委应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

^①以上均见《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3—36页。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8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9页。

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整个的湖南暴动要能与湖北相呼应,尤其是湘北、鄂南发生直接的联络。”^①这样一来,湘南、湘中、湘北、湘西、湘西南都要动起来,等于全省同时发动。

继从多处调兵不成之后,陈烈、李隆光两团又已不能用,这就不仅使中央所想的全省发动无法实现,就是省委计划的以湘中为主,湘南、湘西同时发动也过于冒险。于是,毛泽东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举行暴动。为此,省委积极准备湘中暴动,制定了《湘中暴动计划》,并报中央。这时安源市委派人向省委报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已到修水、铜鼓待命。毛泽东和省委早就盼望有一两个团的正规军队,终于有了着落。于是,决定将《湘中暴动计划》付诸实施。

第三阶段的方案:8月23日以后即准备湘中暴动,8月30日省委正式决定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这一计划未获中央批准。省委9月5日仍决定实施《湘中暴动计划》。实施的结果,变成了湘赣边界暴动。

彭公达报告写道:“在决定第一次长沙暴动经中央批准之后,随即准备湘中的暴动。”“当在决定湘中暴动的区域的时候是8月30日。”^②这就是说,8月23日中央复信批准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之后,即集中力量准备湘中暴动。当得知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已到修、铜的消息,即8月30日举行常委会,最后确定实施《湘中暴动计划》。关于缩小暴动范围的讨论经过,彭公达报告有较为具体的叙述。他写道:

暴动的区域: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暴动势力的发展,实行党的土地政策及夺取政权。暴动区域的划分为:一、湘中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

①《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4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页。

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点。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

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①

省委最后制订的上述方案,没有获得中央批准。中央审议了省委于8月30日所订暴动计划后,9月5日复信,在否定前述省委“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的主张的同时,也否定了省委关于缩小暴动地区范围的决定,仍然说省委放弃湘南暴动是一大错误,要求省委“把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分区准备全省的总暴动”^②。随即在《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明确规定:“湖南暴动可以分为三大区……(实行)全省范围的暴动。”^③在省委内部,坚持主张全省各地同时暴动的,最后只有彭公达一人。其实,彭公达只是始终遵从中央决定而已。所以上述3个方案的变动,实质上是中央一直主张全省暴动,而省委则在湘南计划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便主张缩小暴动范围,态度最坚决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央意见之不同,关键在于对各方面力量的计算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计算的看法不同。彭公达在报告中,只讲到对党的精力、人力和经济力的计算,恰恰不提毛泽东最重视的对军事力量的计算,这正反映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其实,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之间不平

①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0—101页。

②《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0页。

③《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2页。

衡,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各地区之间不平衡,都是必然的。这就必然使暴动的条件在一些地方好一些,另一些地方差一些,有的地方则完全不具备暴动的条件。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硬要全省各地同时暴动,必然力不从心,导致失败。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而且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客观地说,湘中的暴动条件,只是相对于全省其他地方稍好一些,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设想,差距是很明显的。就军事的准备而言,毛泽东和省委希望能有一两个团的正规军队作发火药。在名义上,安源的矿警队被改编为程潜部队的警卫团,浏阳农军被改编为贺龙的第二十军的独立团,人数都很多,但并未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也没有参加过正规的战争,显然,都不能算正规军队。警卫团,在名义上是正规军队,但三个营当中有两个营是新兵或由一些地方工农会干部组成,整个团组建起来才一个多月;论军事素质,它与正规军队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由此可见,对于第一次组织军队指挥战争的毛泽东来说,领导这样一次起义,是异常艰难的。

8月30日省委所订方案虽然未获中央批准,但时间紧迫,来不及再讨论,也不可能按中央所定方案执行。9月5日中央给省委复信时,毛泽东已在安源组织了前委,决定了军队的组建。省委在当天即开会作出最后的决定,按省委既定方案开始暴动。

实践证明,省委所定方案是正确的。省委此时确定的“湘中暴动”,事实上已经包括了湘赣边界的几个主要地方(安源路矿、醴陵、浏阳、平江)。“湘中暴动计划”实施的结果,军事暴动的起点和中心由计划中的长沙转移到了安源,暴动的主要地区由湘中转移到了湘赣边界,湖南秋收暴动变成了湘赣边界暴动。

三、完成计划 准备暴动

除暴动区域外,暴动计划的其他内容,如暴动的日期、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暴动的口号、暴动中的宣传以及暴动指挥

机关和指挥系统的设定,等等,湖南省委也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暴动纲领和规定的规定,逐一进行研究落实。这些内容的确定,同暴动区域的确定一样,也都有湖南自己的特点,并且显示出独特的创造性。由于客观环境过于恶劣和受到暴动条件的限制,计划直到暴动快要开始时才得以完成。

暴动的日期,中央8月22日致湖南省委信曾告知:中央决定湖南“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①。这是在毛泽东、彭公达回湘后中央还未见他们“只字报告”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决定自然缺乏客观的依据。第二天,中央收到省委的第一次报告,当日复信,未见提暴动日期。当时暴动的纲领、政策和计划,省委才开始讨论,仅提出初步意见,暴动的准备也刚开始,显然月底已经不可能开始暴动。到月底,省委得知湘赣边界军队集结情形以后,才于8月30日举行常委会议,将原来的全省同时发动的计划缩小为湘中暴动计划,并决定了暴动指挥机关的设置和负责人名单。这时候确定暴动日期才有了事实依据。经彭公达向中央报告后,中央于9月5日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确定:“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②彭公达回省后即于9月5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暴动日期。当日,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同时写信告知,安源会议约定暴动11日发动,18日进攻长沙。彭公达按照中央决定,提议10日各县发动,13日长沙暴动,即13日军队进攻长沙。讨论约一小时,最后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发动,15日长沙暴动^③。9月8日,省委发布的夺取长沙的命令,对会攻长沙的时间略加变动: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安源的军队和各县民众暴动一齐发动,16日会攻长沙^④。省委将中央所定暴动“开始于9月10日”,分解为各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3页。

②《中共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2页。根据中央9月5日致湖南省委信记载(见同书第60页),此决议案应是9月5日作出的。

③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页。

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4—65页。

方面人员发动的不同时间,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又便于各方面人员行动,无疑是正确的。暴动正是按此规定的日期行动的,只是会攻长沙未能实现。

“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是湖南省委制订暴动计划时创造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就是将“农民暴动”的内涵作一个全面的界定。中央明确提出过,秋收暴动是发动农民暴动,建设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对于暴动应做的工作,也有一些规定,如破坏交通、抗租抗税、杀土豪劣绅等等,但没有对暴动中应做的事件作全面系统的规定,也没有提出“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这个概念。湖南省委认为,秋收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在省委看来,军事的工作内容很明确,就是与敌军作战;而农民暴动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怎么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才便于暴动的全体参加者有所遵循,知所趋赴。彭公达报告中“湖南暴动计划”一节写道:

(三)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

省委认为在暴动开始之前及暴动发展之后,我们必须鼓动农民一致下决心,做下列的各事件及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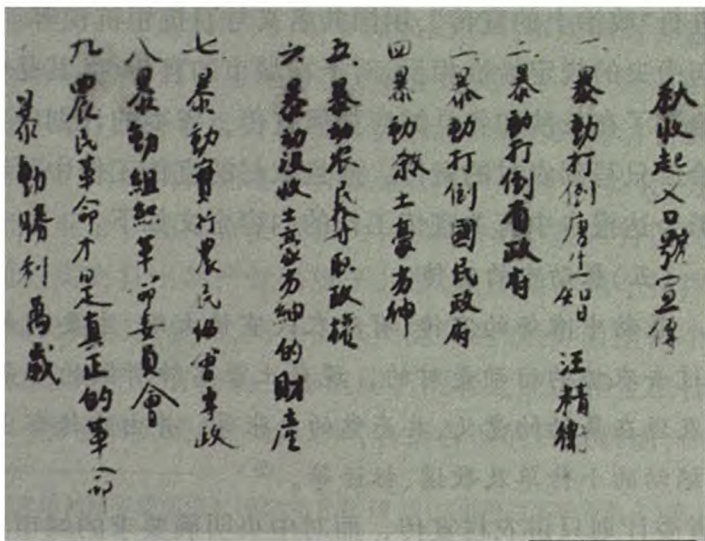
- 1、平分土地;
- 2、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
- 3、杀土豪劣绅、反动派;
- 4、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及大地主的财产;
- 5、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
- 6、抗租及不缴租,已缴者收回来公分之;
- 7、抗税,摧毁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
- 8、组织革命委员会;
- 9、毁坏交通机关。^①

大体上说来,这九件事在计划中排列的次序,与实行的先后

^①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102页。

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先是毁坏交通机关,宣告暴动开始;恢复了农民协会以后,由农协会执行土地革命,没收和平分土地。土地革命是农民暴动的目标和中心内容,所以摆在第一位,使暴动的农民一目了然。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激怒,在这些所要做的工作中,不免有些过激,如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之类,不利于暴动的发展,这是需要在实践中纠正的。本节后面还会说到,列出“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与指挥机关的设定有直接的关系。

暴动的口号,中央提出过两次:8月23日复函共提了11条,9月5日的决议案提了16条。第二次提出的16条口号下达时,省委的暴动计划已经完成,暴动即将开始,所以省委计划中的口号是依据中央第一次所定11条并结合湖南的实际来制定的。省委所定计划中共列口号10条^①。其中5条的内容(杀土豪劣绅,农民夺取土地,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实行农协专政,组织革命委员会)已经列入“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除“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外,都是中央提出的口号的内容。省委与中央不同的



秋收暴动口号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2页。

口号主要是两条：中央提“打倒武汉政府”，而湖南提“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因为湖南省委认为国民党的旗帜已经臭了，必须抛弃掉，中央提出的“实行民选的革命的省政府”这条口号，湖南省委有意不提，因为省委认为民选政府的口号已经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自己是民选。此外，省委用“农民夺取土地”代替了中央所提“没收地主土地”，而没有把“耕者有其田”这一条不够鲜明的口号列入。总起来看，省委所提 10 条口号，更鲜明、更精炼，更易于农民接受，无疑更有利于振奋农民的革命激情。

暴动中的宣传，中央主要是讲了城市的宣传：“在暴动中心的城市中，尤其是长沙，在政治宣传方面，应将上列口号引用具体的事实煽动全体革命民众，其方法可用：发短小传单、日刊、宣传、壁报、壁画、歌谣……”“对于各县的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应有经常的实际的宣传，最好办一小小日报，虽油印亦可。”“对于兵士的工作，须特别分出一部分积极力量去做，宣传他们，组织革命的兵士参加暴动的工作。”^①中央没有单独讲农村的宣传，只是在讲农村的准备时顺便而简单地提到“要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进行“政治上的宣传”，用国共名义号召抗租抗税等。省委的计划与中央的规定恰恰相反。对于在城市的宣传，尤其是中央已经明确讲了在长沙和各县城应如何宣传，省委的计划中只字未提，恰恰只写到农村的宣传，而且农村的宣传工作中写得很简单。彭公达报告中有关宣传工作的内容全文如下：

（五）暴动中的宣传

暴动中准备的宣传，有对农民宣传大纲，主要的是说明过去农协的行动是对的，现在土豪劣绅所做的都是不对及现在暴动的意义，共产党的主张等。并由宣传部出每日煽动的小传单及歌谣、标语等。^②

省委计划只讲农村宣传，而对中央明确要求的城市宣传却

^①《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5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2页。

只字不提,是出于何种考虑,无从揣测。不过,从当时敌报关于军警发现革命标语传单即大肆搜捕之类的报道来看,中央所要求的那些宣传办法,在城市是完全做不到的。

暴动指挥机关和指挥系统的设定,在彭公达报告的“暴动计划”部分未列为一项,只是顺便提到。不过,这应该是暴动计划的重要内容,而且在这方面也有湖南的特点和创造。中央规定的暴动指挥机关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①革命委员会“用国共名义来号召”,仍然用国民党的旗帜^②。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中,也提出“组织革命委员会”,省委和省行委9月8日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也明确提出,“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③。但是,湖南所说革命委员会,不是暴动的指挥机关,而是暴动中诞生的工农兵苏维埃式的政权,举的是共产党的旗帜,而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前已说到,湖南省委认定“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湖南的暴动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因此,指挥暴动的机关不应是一个,而应是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指挥军事;另一个是行动委员会,指挥农民的暴动^④,即领导前述“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及诸工作”;两个委员会,分头指挥,又相互配合。湖南省委又认为,秋收暴动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所以,湖南的两个指挥机关不邀请国民党左派参加,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并且这两个委员会本身就是共产党省委的工作机构,两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是由省委统一领导来实现的。省以下,各县各区的民众暴动,在省委

①《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47页。

②《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4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4页。

④分别参见《彭公达报告》和《潘心元报告》中转引毛泽东在安源会议上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119页。

行委统一领导下,由各县委、区委、特支等党组织直接指挥。在岳阳和安源这两个地方,省委分设行动委员会:岳阳与鄂南相连,岳阳行动委员会除指挥岳阳暴动外,还要与鄂南指挥委员会协调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安源是军事中心,安源行动委员会协调工农革命军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行动与农民暴动^①。湖南省委关于暴动指挥机关和指挥系统的设定,把暴动纲领中有关国民党问题、军事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规定落到了实处,使这些规定获得了组织的物质保证,对暴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体制提供了最初的成功经验。

在制订暴动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同时,省委及其所属有关的县、市委等各级党组织,尽力进行了暴动的实际准备。中央8月23日复省委函,要求在暴动的地区“有充分的准备(民众的和军事的),同时,在长沙城应有充分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组织的准备”。又说,在暴动之前,“我们要有组织的全党动员到工农群众中去准备”,这种准备,包括“政治上的宣传、军事上的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等”^②。省委8月30日给中央的信回答:“各地已有相当准备”,“暴动的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③不过,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暴动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8月上旬起,省政府为着防范南昌起义军的“散兵逃入湘边”,命令军警在湘东、赣西边境、株萍路一带“严防稽查”。到8月下旬,当局得知共产党即将暴动的消息,防范更加严密。在长沙城内,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组织挨户团,“会同分区检查旅馆,并逐户检查,严缉共产(党)”。省政府军事厅则派人“赴邮局督同

①参看《中共湖南省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4—65页。《彭公达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4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7页。

检查员检查,凡邮件非经检查,不准投送”^①。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宣传,显然绝无可能,秘密的宣传也很危险。在岳阳,挨户团拾得几张署名“岳阳县革命委员会、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的传单标语,即与驻军一道秘密跟踪侦探,结果在县城南门外一所学校查出印制传单标语的机关,搜去油印机、大量纸张和成捆的传单标语,捕去多人,并连带破坏多处革命机关^②。

工农群众的普遍发动和组织,同样非常困难。在暴动的准备期间,即发生多起革命机关被破坏的事件。8月下旬,长沙城内一旅馆内的秘密机关被敌侦知,被搜去载有3000多名党员、团员的名册。敌人依此名册捕去100余人,又在一店铺搜去梭镖340余把。之后,党组织发给长沙各支部有关暴动事项的两纸命令也被敌人搜去^③。论小环境,安源在当时湘赣两省是最好的:工会公开存在,附近一些县的工农武装可以秘密聚集其间,但大环境不允许张扬,暴动前一般的政治宣传和煽动同样不能进行。安源市委在事后的一个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事实上已经是发动者……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发展,但是党在暴动前对群众的一般政治宣传和煽动,未能注意。群众完全不了解暴动的意义和党的政治主张。”甚至有些党员事先都不知道暴动这件事,以至他们“在暴动后怨恨,说没有告诉他们暴动的消息”^④。这个报告有些话不免过分夸张和自相矛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公开宣传暴动之不可能。安源尚且如此,长沙城内外宣传发动之难便可想而知了。

在农村,一般群众的发动和组织更加困难。革命已经转入低潮,不可能像革命高潮时期那样,登高一呼即万众云从。公开号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25日、27日报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74—175页。

②上海《申报》报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75—176页。

③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75—176页。

④《中共安源市委工作报告》(1928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64、661页。

召,已绝无可能;秘密串联,在居住分散的农村,绝非短期内所能做好。彭公达事后的报告写道:“省会近郊农民的组织的基础,比各县均好……此次长沙暴动的开始,近郊农民被鼓动能来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但是,暴动一开始,便因为攻打九峰团防局失败,“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①。可见当时组织农民之难。中央对于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农民的准备非常不满意,在9月5日复省委信中严厉批评道:“你们所谓湘中计划,至今中央没有看见,再三询问这次来中央的某同志^②,亦只能说派出百几十个人,说农委有一报告,详细情形,一点也说不出,而所报告的又只是一些军事情形。某同志为省委负责人,尚且说不出农民中实际准备情形,中央如何能相信省委没有忽视农民的准备,没有犯着偏重于军事的毛病呢?”事实上,湘中农民的准备,做了不少工作:长沙近郊动员了上万人参加暴动,醴陵的暴动准备也颇具成绩。只是通信联络困难和其他原因,彭公达未能及时了解到,以致这方面实际情形他“一点也说不出”。但从总体来看,农民的准备,确实远远不能适应暴动的需要。这并非省委“忽视农民的准备”和“偏于军事”所致,而是客观情势使然。

关于军事的准备,中央并非轻视,它一再指责湖南省委“军事冒险”“军事投机”“偏于军事”,是由于对正规军队在暴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足够的理解,但是,暴动终究不能没有相当的武力,调正规军队既已无望,便只能指望工农群众的武装了。8月23日中央给省委的复函,在指责省委“军事冒险”并告知陈烈、李隆光两团“已经不能为我们用”之后,就工农武装问题作了指示,复函第一次明确地将工农“自卫军”改称“革命军”,并把这支即将组建的军队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复函写道:

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
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4页。

②某同志,是指彭公达。

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①

9月5日中央《关于两湘暴动计划决议案》,进一步对工农军的组织和名称作了具体规定,并第一次将工农革命军分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和地方性质的工军与农军两种。决议案规定:

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成功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②

中央这种设计,当然是很好的,也是很正确的。不过,这里所说“军事”,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所说调一两团兵力的“军事”,已经是两回事。中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所说“军事”,很清楚地表明是组建工农民众的武装,并希望从中形成正规的革命军队。在调一两团兵力已经无望的情况下,这种军事准备便成了湖南秋暴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

上述中央决议案还规定,对于土匪,应当进行革命的宣传,把他们组织在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对于反唐的杂色军队,应争取他们对于暴动取中立态度;“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的宣传,鼓励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③,吸引兵士参加暴动,等等。这也是军事准备的重要内容。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55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2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议案》(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2—63页。

湖南秋收暴动的军事准备,以长沙和安源两地为重点。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会上曾经说到:“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①长沙的准备主要有两项:一是确定组织6个团1个营,二是准备破坏铁路电讯等设施。省委确定以长沙工人和近郊农民为主力,包括湘潭等县农民,组织中央所规定的工农革命军。其组织和名称及指挥者的职务,与中央的规定稍有不同。暴动之前即不分工军、农军,而是统称“湖南工农革命军”。军队不是按地区组织,指挥者也不称“总司令”,而是长沙和附近各县工农军统一组织6个团和1个特务营,指挥者称“团长”和“营长”,均为省委直辖部队,由省行动委员会指挥。长沙城内拟编为特务营的武工队的二三十名队员化装到岳麓山练习手枪射击。破坏交通方面,在省行动委员会之下,组织一破坏铁路委员会,组织若干队派往长岳、株萍两路,分别进行破坏铁路桥梁水塔电线等工作。当时在湖南协助省委工作的中央委员罗章龙专程到安源搞到了一批炸药,制造了一些土手榴弹,运到长沙。对反革命军队,早已秘密派人进去工作。长沙某乡农协委员长苏毅潜入第二师教导团补充第三营,当了连长^②。

安源的军事准备动手得早。7月间,省委即派委员夏明翰到安源传达省委的指示:安源应以灰色掩护,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图到时一用。安源特区委(八七会议后改组为“市委”)认真执行这一策略方针:整顿和扩充工人纠察队,将矿警队控制在党的手里;妥善安置撤到安源的醴陵、衡山两县的工农军;招集安福等地的工农武装到安源待命。到暴动之前,安源已聚集千余支枪的队伍。

各县的军事准备以醴陵为最好。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所写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关于暴动的准备,写的完全是军事方面的

^①转引自潘心元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9页。

^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77—178页。

准备,包括3个方面:一是召集区、乡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布置任务;二是搜集武器,组织暴动队伍,制定暴动计划;三是了解敌情。这个报告显示,暴动的准备,是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向各县布置的。

其他各县,如湘潭、浏阳、平江,也做了一些准备。

到8月下旬,湖南秋收暴动的两方面准备,已如前述,调一两团兵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工农民众的武装队伍的组织,长沙的6个团1个营仍停在计划上,并未形成队伍;各个县,以醴陵为例,武装队伍也还分散在各地,形成了队伍的只有安源一千多人枪。这时,暴动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直到8月底,得知平江、浏阳农军和武汉来的警卫团开到了湘赣边界待命,省委才最后决定暴动计划。之后,毛泽东到安源开会,确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织、军事行动和各县民众暴动的计划;安源会议后,毛泽东赴铜鼓,完成军队的组建工作。至此,暴动的军事和民众暴动这两方面的准备完成。所以,暴动的整个准备工作,实际上是9月9日暴动开始的第二天即9月10日才算完成。并且,起义的准备工作时间很短,又因客观环境很恶劣而不可能做得充分,可以说起义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匆忙发动的。

第三章 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条件的历史准备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井冈山斗争的先导和前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直接继续和伟大成果。那么,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和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恰恰在四省的结合部湘赣边界首先发生呢?

毛泽东在论到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时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①这些组织和斗争,为秋收起义和以南昌起义为开端的红军战争以及红色政权的产生,“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经过一次革命的民众。”^②湘赣边界正是湘鄂粤赣四省中工农兵士群众大大地起来过、工农的组织 and 斗争有过广阔发展的“许多

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地方”之一,而且曾是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以,秋收暴动的三方面准备,也就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

上述三方面准备,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全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背景下,与湘赣两省革命密切相关,尤其是与湘北、湘中到湘南这个被称为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这一地带的革命密切相关。

上述三方面准备的历史过程,还应当追溯到党的创立和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①。如果说,1926—1927两年大革命高潮为秋收起义准备好了三方面条件,那么,1919—1925年那一时期民众的组织和斗争便为秋收起义三项准备创造了前提条件。

秋收起义三项准备的全部历史过程,是共产党人出色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运用到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这一特殊环境的过程。这次起义的三项条件,是共产党在这一地带领导革命斗争的长期而深厚的积累。这一地带的革命运动,在赣西边境一侧,除萍乡和安源路矿外,由江西省中共党组织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开辟和领导;其主体,从党的创立时期起,一直由中共湖南党组织(首先是支部,后相继为区委和省委)开辟和领导;而湖南革命运动的开拓者和主要领导者,不是别人,正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本人。

一、独特的环境和传统

湘赣边界和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作为革命运动的独特整

^①《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体,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文件明确地提到了的。1928年5月,湖南省委在致毛泽东、朱德信中转述中央的决议说:

根据中央决议,现在湘鄂赣三省暴动的发展形势,是沿着湘粤大道与赣边发展,一直到鄂南,成为一个区域,并与广东的东北江汇合。这个区域,包括湘南、湘东、赣南、赣西、鄂南以及铜鼓、修水、平江在内。这几个区域,是党与群众力量最大的地方,而且是置三省军阀死命的区域。^①

同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和前委的信把这一地带称为湘赣粤三省暴动发展的枢纽,并明确地把“湘赣边界”的重点定在“粤汉、株萍沿线”。该信写道:

在最近几个月来三省暴动的发展的形势是湘粤的大道,赣西南,湘东北,如此在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以及粤汉、株萍沿线的湘赣边界,已经成为三省暴动发展的枢纽……

其实,在这之前,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早已连成一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最早发生的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事件就是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这次武装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大演习。前已说到,这次起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尤其是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作为一个地区整体,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与它本身的构成及所处客观环境相关。

湘粤大道本是从北京经武汉、湖南至广东的古代主干驿道在湖南境内的一段。后来这条大道逐渐商业化和近代化:水上开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该书所载,文字有些错漏。此处根据同书第440页所载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藏史料补正。

始行驶轮船,陆路筑建了铁路。它经过的湘北、湘中、湘南一带便被作为一个地区称为湘粤大道;它与湘赣边界之间的独特联系,缘于江西萍乡煤矿的开办和运销。萍乡在罗霄山脉北段,处于分水岭地带。县城东南6公里处的安源所产煤焦,只能走水路向西运往湘江沿岸乃至武汉销售,由此逐渐形成了由安源经醴陵、株洲、长沙、岳阳到武汉的商路。19世纪末,这条商路开始近代化。接办汉阳铁厂的清朝官僚盛宣怀在安源开办了萍乡煤矿,筑建了株萍铁路(安源—株洲);不久,这条铁路与粤汉铁路接轨,水陆并进向武汉运送煤焦。以后,这条商路因运销安源的煤焦而顺长江延伸至上海。这样,湘赣边界与湘粤大道及武汉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广泛。湘粤大道作为一个地区,由以上水陆交通线与湘赣边界连成一体,在中国内地处于独特位置:它连接湘鄂赣粤四省,与华中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武汉直接相连。这个地区,南面和东面是帝国主义最早侵入的地方和主要侵略据点,经济发达;西面较为闭塞和落后;北面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这个地区和它联结着的四省,由于处在南北冲突、东西对撞的中心,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集中而尖锐,因而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舞台。这样的外部环境,不能不对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革命运动发生重大影响。

然而,客观环境对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影响,主要是内部环境。湖南内部环境的特点是,它“较为偏处内地,南隔五岭,北阻洞庭,经济较为闭塞落后。自湘军崛起后,湖南以守旧排外闻名中外”^①。但是,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冲,闭塞终究逐渐被打破;守旧,终究挡不住社会发展潮流的冲击;排外,抵挡不了帝国主义的入侵。闭塞和开放、守旧和革新、排外和外国势力入侵之间的冲突,使湖南处于剧烈震荡和变动之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湘粤

^①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大道和以安源路矿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由此成了冲突变动最激烈的地区。由于这种冲突和变动,这个地区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近代工业和近代城市迅速兴起,这一地带成了全省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最发达的地带,特别是安源路矿的开办使这一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全国的影响大为增强。安源当时被誉为江南煤都,煤产量仅次于抚顺和开滦而居全国第三位。萍乡煤矿和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厂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和唯一的煤钢铁联合企业。萍乡煤矿是这个公司的燃料基地,所产煤焦除经过湘粤大道运往汉阳铁厂,还远销于湘江沿岸和长江中下游直到上海的十几个城市,并曾远销日本、美国。自湘军崛起,这一地带在军事上处于重要的地位,民国初年起更成为军阀频繁争夺之地。

第二,在湖南这个农业大省,农民所受压迫特别沉重。湘军崛起以后,地主阶级更有本省地方军阀作为支柱,农民所受压迫更甚。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新兴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新的阶级矛盾出现并逐渐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帝国主义势力终于直接侵入了曾被洋教士讥为“铁门之城”的湖南,首先是侵入了湘粤大道。列强在这一地带开商埠,夺得筑路权,控制内河内湖航运和邮政,攫取矿产资源,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直接控制汉冶萍公司。这样,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这一区便显得非常典型。

第三,产业工人人数虽不多,但非常集中。五四运动时期,全省产业工人约四万二千人^①,加上当时安源路矿工人的一万六七千人,共五万六七千人,仅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2%多一点。这些工人多数集中在长沙、水口山和安源。在安源这个小集镇,路矿工人加上挑运煤焦的工人共有两万余人。这种集中程度在全国是少有的。而且,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集居

^①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第289页。

一处,休戚与共,各有所长。铁路工人接触面广,文化水平较高,而煤矿工人则在艰险繁重的生产劳动条件下养成了非凡的吃苦耐劳、不畏生死的奋斗精神;铁路便于工人联络,矿山给工人提供了比城市工人更有利的活动空间,矿山的机器和原材料(如炸药和钢铁)则给工人制造武器之便。两部分工人团聚一处,无疑更加有利于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正如刘少奇和朱少连著文所写:安源“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①。

第四,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在人文方面也融为一体。这突出表现在安源工人和湘粤大道农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1920年4月,长沙《大公报》记者调查发现:萍矿“管理机器的工人多半是浙江、广东的;矿工却湖南人居多,湘潭、长沙、醴陵等县约占大半,本地也不太少”^②。192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湖南清乡公报》载文指出:“安源工人除萍乡土著外,大都来自醴陵、浏阳、湘潭、长沙、衡阳、湘乡、吉安、莲花各县,湖北人居少数。”除上述各县外,攸县、衡山、资兴、郴州、常德、岳阳等县也都有农民在安源做工。安源工人和农民之间血肉相连,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极易结成亲密的联盟。

自湘军崛起,由于以上内外条件相互影响和作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在湖南相继兴起,其中不少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出在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前仆后继地探索和斗争,在湖南,特别是在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的领头人物中,形成了既重学理又重实践的风格,其突出代表就是黄兴。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黄兴(字克强)策划的甲辰长沙起义时,

^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16页。

^②《萍矿最近调查记》,载1920年4月21日长沙《大公报》,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59页。

极力赞扬黄兴的革命务实精神,他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依靠下层群众实行革命的,黄兴是第一人。他一开始策划起义,便寄希望于萍浏醴一带的工人农民。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本来的阶级面目发动和依靠这些群众,而只是把他们当做会党力量加以利用,但这足以显示湖南革命党人可贵的务实传统。毛泽东赞扬黄兴的这种务实风格,表明这种风格对他本人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二,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不只是谋求本身的生存权利,而是常常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1904年的甲辰长沙起义和1906年萍浏醴起义都明确地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黄兴等人成功地把哥老会的“反清复明”引导到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的目标上。这一传统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显然也有很大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哥老会的“反清复明”目标已经丧失。共产党成功地将工农群众仍然存在的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传统引导到实现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上来,对于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和以后的组织与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湖南的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把安源纳入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地区范围,而安源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也总是与附近各县农民的组织 and 斗争结合起来。这一传统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就把安源作为工作重点地区。在他的领导下,安源工人的斗争与附近各县农民的斗争相互联系更加紧密。毛泽东所说萍浏醴起义对安源大罢工、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的影响,正是这种传统力量作用的表现。

二、确立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牢固基础

秋收起义三项条件的历史准备,是从准备党和工人的力量

^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实证明之》,原载1920年9月6—7日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页。

开始的；而这个开始的地点，是长沙、萍乡和安源路矿。

毛泽东 1920 年秋天受陈独秀委托，筹建湖南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即在长沙和株萍铁路等处工人中开展工作。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帮助组织湖南劳工会，并向其领袖黄爱、庞人铨等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时，毛泽东组织长沙的工人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等政治斗争，并“在铜元局、铅炼厂、第一纱厂、长株和株萍铁路……工人中进行过工作”^①。通过这些工作，初步地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毛泽东 1936 年在与斯诺谈话时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②

1920 年 11 月，正在紧张地进行建党建团工作的毛泽东到株萍铁路沿线进行社会考察。在萍乡，他结合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社会改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他 11 月 25 日和 26 日在萍乡写的 9 篇文章以及从萍乡回到长沙次日写给蔡和森等的长信表明，这次在萍乡的社会考察和理论研究使他对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正是这次在萍乡的大约一星期内完成的。11 月底从萍乡回到长沙后，12 月 1 日给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等写信，对蔡和森提出的走俄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认为肖子升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等等，“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而“不表同意”。这封信标志着毛泽东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完成。这一转变的完成，加速了党的创建工作。他从萍乡回到长沙不久，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即于 12 月上旬成立。长沙社会主义

①肖三：《回忆赴法勤俭学和旅欧支部》（1957 年 4 月），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37 页。

②吴黎平：《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 页。

青年团组织也很快就举行了成立会。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有三个显著特点和优点：第一，对建党理论有充分的讨论。蔡和森 1920 年 8 月 13 日和 9 月 16 日两次法国来信，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和次年 1 月 21 日两次复蔡和森信，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著名的建党通信。毛泽东在萍乡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的 9 篇文字和蔡、毛建党通信，是中共建党史上最早探讨建党思想的文献。这些文献和毛泽东等在新民学会 1921 年新年会议上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问题的发言，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关于建党问题的最初的系统阐述。第二，一开始就把党和团组织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之上。1920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在工人中进行工作^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则是 1921 年 1 月才开始。湖南在 1920 年秋天便开始引导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第三，在组织上，注意“找真同志”^②，并强调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因而富于严密的组织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党的“一大”以后，湖南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支部和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湖南分部。这些组织遵照党的“一大”决议和同年 11 月中央局通告，以主要的精力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产业工会。当时，在湖南支部开展工作的地区，产业工人集中在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的三个点两条线上。三点：安源、长沙、水口山；两线：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沿线。这三点两线便成了党成立后中共湖南支部（后为区委）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地方。其中，安源路矿这一点一线，是湖南工运

①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著名文学家茅盾回忆说：1920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在工人中进行工作的时候，“在萍乡、安源，可能已有工人运动的工作了”。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内部版，第 7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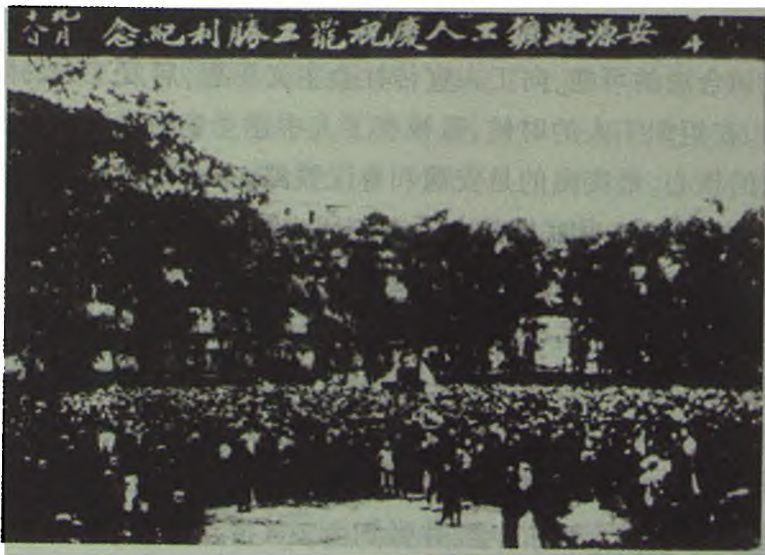
②一师附小文书张文亮的日记两次提到，毛泽东告诉他，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毛泽东传》第 75 页。

最初的两个重点之一^①。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即到安源调查研究,开展工作。随后分别派李立三、郭亮、刘少奇到安源和粤汉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毛泽东并亲自指导长沙的工人运动。安源罢工胜利后,湘区委即派安源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交际股长谢怀德等去水口山帮助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展罢工斗争。

中共湖南支部(区委)开展工人运动时,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调查研究社会状况,倾听工人呼声,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制定工作方针。在这个基础上,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在组织工人的时候,重视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团结工人的核心。最突出的是安源和粤汉铁路。李立三1921年12月中旬到安源,12月底即建立了青年团支部,次年约2月便成立了中共支部。粤汉铁路于1922年8月在新河车站建立了党支部。同年11月在水口山建立了党支部。在手工业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有的并建立了支部。1923年1月,铜官陶业工人中的党支部成立,同年底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长沙手工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了组织比较严密的工会,并做到由工人养活工会,进而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将工人组织起来以后,领导工人进行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为工人群众争得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通过斗争,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1922年9月至次年2月初,中共湘区委共领导罢工10次,胜利和半胜利9次,失败1次;参加罢工的工人共24000余人,全部发生在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的三点两线产业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共13000余人,占湘区罢工工人总数一半多。协助李立三领导这次罢工的刘少奇、朱少连著文评论道:安源罢工“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

^①李维汉回忆说:湘区“工运的重点在长沙和安源两地区”。《回忆与研究》上册第40页。

绝无而仅有的事”^①。最为壮烈而艰苦的罢工斗争，要算同年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为了粉碎路局强行开车以破坏罢工的图谋，罢工的领导者郭亮在岳阳带领工人毅然卧轨阻车。这次罢工坚持19天，取得了大部分胜利。在长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的手工业工人也分行业举行了罢工斗争，并取得了大部分胜利和半胜利。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很奇特的。这些罢工斗争，显示了中共湘区委的杰出领导才能和工人的坚强斗争精神。



安源路矿工人庆祝罢工胜利

通过这些斗争，党、团、工会组织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安源工人俱乐部部员由罢工前夕的700余人猛增到罢工胜利后的12000余人。粤汉铁路总工会会员由成立时的1900余人增加到2500余人。青年团组织由于一开始就注意“找真同志”，采取了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方针，避免了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团组织曾因忽视质量而不得不宣布解散这段弯路，而且在以后的斗争中因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而获得很大发展。1921年1月成立时只有团员16人，到1923年4月，青年团湘区辖有7个地方团，共有团员700余人。其中，长沙地方团人数最多，约280人；安源

^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29页。

地方团已由 1921 年的 8 人增加到约 120 人^①。党员人数,1921 年 10 月成立支部时约 10 人,1922 年 5 月间增加到 30 人,成立了党的湘区委员会。安源的党员人数,1922 年 2 月左右共 6 人,9 月罢工前 10 余人,罢工胜利后年底达 20 余人,并成立了地方执行委员会。党的湘区报告载,1924 年 5 月党员人数,长沙 89 人,安源 60 人,不明行止(水口山失败后之一部分)及与党无甚关者约 20 人^②。

在工人的组织获得发展的形势下,中共湘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努力推动工团的地区联合、产业联合和全国联合。1922 年冬,中央提出的工团联合计划是组织矿山、铁路、海员三个全国总工会,形成三角同盟,以此为中坚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按照这个计划,湘区委首先领导了本省的工团联合。11 月 1 日,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同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共有 9 个工会,3 万余会员。株萍铁路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列为全省工团联的下属工会,会员人数占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员总数约 40%。之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等前往武汉,主持筹建了汉冶萍总工会,共 5 个工会 3 万余会员,安源工会会员数约占其中 40%。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促成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安源工人俱乐部又以株萍铁路工会的名义派代表和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一起赴北京参与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全国矿山总工会的组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酝酿,便发生了“二七”惨案,中共中央所定工团联合计划至此中断执行。这个计划执行至此的结果,仅组成两个地方工团联合和两个产业工团联合。两个地方工团联合是湖南、湖北两个全省工团联合会,两个产业工团联合是汉冶萍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湖南除率先实现了本省工团联合外,通过安源工会促成了汉冶萍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通过株萍铁路工会和粤汉铁路总工会促成了全国铁路工会的联合。可

①(晓云致国昌信)(1923 年 4 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 61 页。

②(湘区报告)(1924 年 5 月 14 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第 232 页。

以说,当时对全国工会联合贡献最大的是湖南,而湖南工运的主体是在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

中共湖南支部(区委)开创和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是党引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创造社会主义意识,党组织把这种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调查研究、思想教育、组织工人、领导工人斗争这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的。调查研究,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理论的准备。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人、武装工人是中心环节。按照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则组织工人是使社会主义思想获得组织的物质保证。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工人斗争,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出发点和归宿,又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强大杠杆。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四个基本环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全过程。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特有的客观条件和优越的主观条件,使这个结合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结合的四个基本环节,都富于湖南特色且卓有成效。这个结合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由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共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青年团为党助手的、以工会为组织形式、与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与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支队伍,以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的三点两线产业工团联合为牢固的支柱,为迎接1924—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理论的和组织的准备。湖南的工人运动的光辉成就,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的工作时指出:“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①

^①《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见《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三、“模范工会”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成功地训练了万余产业工人

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在它的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上，根据误传消息，发表了毛泽东病逝于福建前线的讣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其中写道：

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的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①

这篇概述了毛泽东此前全部生平事迹的误发讣告，全文译成汉语才900余字，却用了一个40余字的长句，来记述安源工会。可见，在共产国际看来，建立安源工会在毛泽东生平事迹中占有非同寻常的位置，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安源工会实际是中共全党早期培养训练人才的大学校。它的组织和斗争，为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成功地训练了万余产业工人，为准备革命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共产国际误发讣告所说的“模范工会”，就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于1922年5月1日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个工会，在同年9月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后，即享誉全国。但是，它被视为全国工会的“模范”，主要是缘于“二七”惨案后持续两年多卓有成效的组织和斗争。当时，安源工会“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因而被视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照耀黑暗社会”的“明星”。正是那时候，安源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②。正是那一时期的组织和斗争，奠定了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基础^③。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运转入了为期一年多的低潮。除广东、湖南外，各地工会都遭军阀封禁。到了这年

①《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22年3月20日第三期，第30—31页。

②刘少奇：《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9年5月）：“‘二七’后的安源工会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小莫斯科之称。”

③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井冈山前委的信：“安源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21页。

11月,湖南革命运动也遭军阀赵恒惕镇压。水口山工人运动、岳北农工会相继失败,自修大学也被封禁。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由于所处客观环境有利于工人坚持斗争,又由于安源的党和工人的力量充足和斗争坚决,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为安源的党和工会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采取“弯弓待发”之势由进攻转为积极退守^①,所以能够在逆境中“巍然独存”,成为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仅存“硕果”^②。

作为党的策略中由进攻向退守转变的一部分,为了保存实力、有利工作和培养训练干部,党将各地遭到敌人追捕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如党的“一大”代表、武昌地委书记陈潭秋,武汉青年团主要领导人李求实,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贺昌等调到安源工作。奉调到安源工作的各地干部,仅工人俱乐部公开的名册上记载的即不下30人,如两湖的林育英、黄五一、向五九、徐全直、何葆贞、易足三、唐绍予、盛得亲、柳季刚、陈清河、刘士奇,安徽的龚逸情、曹谷芸,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肖劲光、任岳、胡士廉等。他们同原已在安源工作的刘少奇、毛泽民等共同努力,对安源工运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自己也在其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团、军队的栋梁。这一时期,党、团中央和湘区委的领导成员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李维汉、高君宇等曾到安源巡视并指导工作。大批革命活动家和优秀干部,通过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党、团、工会组织的建设和活动,训练出了数以千计的有阶级觉悟和组织能力的工人领袖,使安源路矿工人的整个阶级得到了锻炼。

在全国工运低潮中,安源工人执行“弯弓待发”的策略方针,为保卫工人俱乐部和第一次大罢工胜利成果,进行了多次激烈

^①参看李立三1963年6月回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904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年6月)以“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为题,辟专节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安源工会。他写道:“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见《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09页。

的斗争,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或半胜利。全国工运开始复兴以后,安源工人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在此前后,工人的斗争逐步从企业内部向外部发展,帮助附近一些地方的工人组织起来,支援了全国各地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并对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作出了重大贡献。按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了国民革命运动,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期间,开始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与水口山工人一起在衡山白果地方组织了湖南全省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岳北农工会。在株洲附近的八迭乡建立了湖南农村最早的两个党支部之一,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安源工作的毛福轩、毛新梅等回到家乡韶山参与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农运工作。

在这一时期,党把训练工人作为工人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大力开展工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7所,同期在校学生最多时达一千六七百人;办起工人读书处10多处,同期学习的工人不少于1500人。工人学校自编教材,自办师范班,培养初级师资,并办有妇女职业部。创办工人图书



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教职员合影

馆一所,在各工作处共设阅报室和阅报板数十处。创办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报告和《安源旬刊》。经常性的宣传工作,有重大节日和纪念日的集会游行,动辄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参加;撒传单、贴标语、讲演,举办辩论会、时事讨论会、问题研究会等等,形式活泼多样。作为教育工人、帮助工人培养情操,抵制黑暗社会的腐蚀侵袭的重要措施,工人游艺活动形式多样,体育项目应有尽有。

这一时期的工会组织建设,可以说是未来政权建设的最初演习。工会以俄罗斯苏维埃政权为模型,按照“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和“民主的集权制”两条原则^①,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设置了完备的工作机构。经过几年改进,组织和制度日臻完善。工会所办事业,除前述教育文化外,经济事业和经济工作成绩斐然。俱乐部按照由工人自己养活工会这一原则,形成了筹集工会基金的制度,逐渐积累起来雄厚的工会基金,安源因而成为中共全党活动基金的两个主要储备点之一^②。在经济事业方面,安源工会作了多项开创性的贡献: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和当时唯一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合作社举办了全国最早的工人储蓄,发行了最早的股票和纸币,还创办了劳动介绍所和故工抚恤会,为工人自己的劳动管理和社会保险做了最早的可贵尝试。

这一时期党、团组织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25年8月,安源的团员人数为360人,占当时全国团员总数约十分之一。团中央常委恽代英在巡视安源后给团中央的报告中,称安源的团为全国“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③。1923年4月团的二

①刘少奇、李求实:《俱乐部组织概况》(1923年8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139页。

②罗章龙回忆说:“1923年的三大以后,我担任党中央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060页。

③恽代英1924年8月巡视安源后的报告,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第253页。

大时,安源地方团被指定派3名代表出席,其中李求实被选为4名中央候补执委之一。1925年1月团的三大曾计划在安源举行,后改在上海召开,安源派团地委书记贺昌、地委农工部长涂正楚为代表出席,两人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贺昌并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党的“三大”前夕,安源有党员30多人。地委书记朱少连作为安源的代表出席,在会上被选为9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任中央驻湘委员。他和王荷波、项英是中共最早的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1924年底,安源的党员人数增加到约20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约五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地方一级组织,也是全国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组织。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安源派朱锦棠为代表出席,被选为5名中央候补执委之一,任中央驻安源委员。当时只有安源和唐山两个工业区派驻中央委员。在训练党、团员方面,1924年冬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地方党校(兼团校)。同年8月和次年9月两次选送赴苏留学人员共六七人,其中有党的地委书记宁迪卿、地委委员林育英、支部书记刘昌炎、团的地委委员胡子厚等。

继“二七”惨案前一年多卓有成效的组织和斗争之后,经过两年多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思想理论的教育和革命文化的熏陶,以及党、团、工会组织活动的训练,安源路矿工人阶级的整体面貌发生革命性的巨大变化,从中涌现了一大批工人领袖。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湖南清乡公报》一篇文章从反面提供了这样的真实写照:

安源共党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确实是过去共党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过去六七年前的安源工人,都是土头土脑,不知道怎样是叫做开会,也无人能在开会的场中说一篇话,演一篇讲,更无人知道什么叫做团体的组织。迨自共魁李隆邛等,前往安源组织工人俱乐部后,把那些组织团体的常识,都输入了。从前不会说话的人,公然能在大会场中说起话、演起讲来!并且这些人都

无形的受李隆邛指挥,做了工人的领袖,能领导工人一致行动。^①

安源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的人数,按照1924年8月工人俱乐部工作报告所载,大致在1500—1700人之间,约占路矿工人总数的11%—13%。这些工人领袖,最著名的是前已提到的工人俱乐部路局主任、党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驻湘委员朱少连,还有曾任党的安源地委书记的刘昌炎,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南昌市委书记朱昌炎,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有在安源工运中、在湖南农运中、在秋收起义和以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的谢怀德、周怀德、石作珍、杨士杰、程昌仁、胡子厚、赵国城、胡德成、袁德喜等。安源工人运动向路矿周边各县发展,在这些县也造就了一批领袖人物。萍乡县大革命时期任县长的罗运磷,曾任中共安源市委委员的邓贞谦,后来成为红军高级干部的肖保璜、董师固、高自立、刘型、陈铁铮(即孔原)等。莲花县的陈竞进、张子铭,醴陵县的刘绍基、易足三,湘潭县的汪先宗等,都对自己所在县的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源工会使安源路矿工人整个阶级革命化。1925年9月,汉冶萍公司买办资本家在日本指使下,勾结湘赣两省军阀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不仅未能摧垮安源的革命势力,反而使安源的革命火种撒向湘鄂赣粤广阔原野。正如萍矿总工会1926年12月向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报告所说:九月惨案后,安源工友之革命精神仍未稍减,“于是投入革命军者有人,在各地领导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者有人,革命种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矣”^②。

①石:《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1928年9月5日),载1928年《湖南清乡公报》第十一期,《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367页。

②《萍矿总工会报告》(1926年1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598页。

九月惨案后,安源路矿失业工人达 11000 人,其中被当局武力押解出境三四千人^①,因在安源实在无法谋生而自动回家乡的有两三千人。当时,党、团湘区委组织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派人在株洲等地调查登记离安工人,组织他们或去广东参军,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也有少数人被派往各地从事工人运动或其他革命工作。

关于安源工人分赴各地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从事农民运动的情形,朱少连在 1926 年 5 月向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的报告这样说:

安源失败后,“各工友中除一部分自找工作去谋生活者外,往各省从事工会运动者有之,往广东投革命军者有之,其余大部分是散居自己的乡村。最近湖南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安源路矿工人。湖南农民运动,在两个月之期间,已有高速度的发展(已有组织者二十九县,人数二十余万多)。”^②

青年团湖南省委 1928 年 2 月 14 日给团中央的报告说到安源工人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重大贡献时写道:



《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记载,湖南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与帮助者,完全是安源路矿工人

^①汉冶萍公司日本顾问 1925 年 11 月 11 日关于萍矿情形报告书:萍矿“解雇工人约六千名,将外地工人送回原籍,用火车每天早晚送走约三百名,约花了一个星期”。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 1340 页。

^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 574 页。

安源工人在湖南革命斗争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工人阶级本身来说，就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也是安源工人做起来的，远的岳北农民暴动，近农村斗争，最发展的醴陵与挨近的萍乡，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里的影响。^①

1928年11月《湖南清乡公报》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这篇文章还从反面对安源工人阶级的全面革命化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安源的共党既能以巧妙的手段训惑一般工人，所以安源能成为共党的小“莫斯科”。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去年的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完全实行了共党所谓“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大暴动”……所以共党这种成功，确是他在过去工人中的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有效的结果。^②

这一时期去湘赣边界和湖南全省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安源工人总数有一两千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总人数在两千以上，其中从安源去广东参军的在一千人以上，北伐军在湖南境内作战过程中陆续参军的不少于一千人。秋收起义中，在安源参加起义的共一千二三百人。在卢德铭所部警卫团，至少有安源工人四百人。

安源工人运动不仅使工人本身普遍地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而且使工人的家属和他们的下一代受到了革命的熏陶。

工人家属中的英雄人物和工人全家革命的代表是王瑞秋、王毅姐妹和她们的一家。这一家原籍湘潭县，父亲王福田因参加1922年9月罢工斗争，遭到工头毒打重伤，含恨去世。大姐王瑞秋（1897—1928.8），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被选为安源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马日事变后，她被派往中共湖北省

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59页。

②石：《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367页。

委担任秘密交通工作。多次被捕,均未暴露真实身份。后被判处徒刑三年,受尽折磨,坚贞不屈。1928年2月重病获释。因在武汉找不到党组织,便拖着被打伤的腿,一路乞讨回到安源,找到党的组织,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8月不幸被捕,被杀害于醴陵状元洲,临刑仍高呼革命口号。王瑞秋的弟弟王金安(1905—1928),在安源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在湘潭参加年关暴动,不幸被捕,壮烈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妹妹王毅(1908—1933),1924年在安源加入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被选为青年团地委委员,安源女界联合会委员长。1927年1月,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同年9月,和哥哥王金安一起参加秋收起义,后辗转长沙找到党的组织,被派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由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在赴湘鄂西途经武汉时不幸被捕,被押解到长沙,次年被折磨死于狱中。母亲和小妹妹王健,不屈不挠,1930年随安源工人纠察队辗转湘赣苏区中心永新,进苏维埃政府所办被服厂工作。全家革命,矢志不移!

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青年工人,受到革命教育和熏陶的工人子弟,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秋收起义以后,有数百工人陆续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930年,红军三次到安源扩军筹款,先后参加红军的有三四千人。曾任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吴烈,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幸元林,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等十几位将军,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他们多是1925年9月以前工人俱乐部工人子弟学校的小学生,参加红军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1930年5月,黄公略、陈毅率领红六军(不久改称红三军)到安源,参军的工人有一千多人。1930年6月下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之一部到安源,参加红军的约1500人。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之一部到安源,参军的有一千多人。安源工人发挥自己的特长,对红军的建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1930年9月,参军的安

源工人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个工兵连。一部分技术工人带着电话器材参军,组建了红三军团第一个通信兵连。

安源工运使矿局职员子弟也受到革命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父亲是矿局的中等职员。他本人七八岁进工人俱乐部所办学校读书,深受工人革命斗争影响。14岁那年因萍矿濒临破产而随父母离开安源,回湖北大冶老家,后在那里做工。1938年只身一人到安源,找到共产党,投奔了新四军。

作为一个工业区域,安源为革命军队提供的兵员之多,在全国是仅见的。安源成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军事中心,绝非偶然。而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在安源建立的模范工会直接相关。

四、大革命高潮为秋收起义做了三个方面准备

1926年5月,当安源工人赴粤参军和回乡从事农运,以准备迎接北伐并初有成绩的时候,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7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以此为标志,大革命进入高潮。这个高潮,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首先出现在湖南境内的湘粤大道和粤湘赣鄂四省边境,由南而北直到大革命中期全国革命中心武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革命战争高潮和民众运动高潮。北伐军先遣部队5月进入湖南境内后,沿着湘粤大道和四省边界,依次举行了涿田、醴陵、平江、临湘、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直抵武昌城下。9月初,当两湖战场胜利已成定局时,兵分三路开进江西:南边一路,从粤北的南雄和湘南的汝城进入赣南的大余和赣州;中间一路,从湘东的茶陵进入赣西的莲花、安福,从醴陵进入萍乡、安源、宜春;北边一路,从鄂南的通城进入修水、铜鼓。在这些地方,北伐军一路驱歼北洋军阀的军队,沿途工农群众大举帮助北伐军作战,军民合力,所向披靡,形成了革命战争的高潮。革命战争胜利推进,促进了民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工人运动高潮;并且这一地

带的工农运动一直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主体。正是这一地区的大革命高潮，为一年以后的秋收起义和红色政权的诞生以及由南昌起义开始的红军战争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也准备好了经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会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①。在此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和1925年11月由湘区委改称的中共湖南区委员会，为迎接北伐战争做了初步的准备。1925年冬和次年春，把第五届农讲所结业回湘的学员分派到各地农村开展工作，组织分布在各地的安源失业工人帮助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到1926年4月，在29个县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共有会员20多万人。其中醴陵、平江等县农民协会并于4月中旬公开活动。4月底，长沙县农民协会成立，在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前代行省农协职权。全省工团联合会努力恢复被赵恒惕封闭的工会，秘密地组织锡矿山工会、湖南海员总工会、株萍铁路总工会和萍矿总工会等。领导民众开展反英讨吴（佩孚）驱赵（恒惕）斗争，成功地争取了赵恒惕所属唐生智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支援北伐的思想动员。这些组织工作和斗争，使党的组织获得了发展。1926年4月，全省党员人数由上年10月的702人增加到1402人，在29个县和工矿区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为迎接北伐战争做了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和支援前线的物质上的准备。

北伐军5月底在安仁县开始向北洋军阀开战，沿途工农群众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大举参战助战：帮助北伐军运输物资，配合接收城市。场面最为壮观的要算衡阳、长沙两地。6月间，叶挺独立团进入衡阳时，衡阳码头工会组织“千根扁担运输队”，为独立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第27页。

团运送粮食弹药。湖南海员工会派“道平号”为指挥船，组织几十艘火轮，在衡阳、衡山一带运送北伐军^①。北伐军进入长沙时，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三



在安源工人的配合和支援下，北伐军进入地道攻打武昌城

四千人三百多个运输队，为北伐军运输军需弹药。7月初，溃逃的北洋军队想劫走长沙的汽车时，长沙人力车工会发动工人一千余人，把汽车站团团围住，坚持一昼夜，将十余辆汽车保护下来交给北伐军^②。北洋军队逃离长沙城时，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一千余工人分守城门要道，防范和镇压溃兵抢劫，收缴溃兵枪支近千支^③。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载文指出：“长沙此次未经北军蹂躏，安全渡过，则全赖长沙工人之力。”^④7月16日长沙200多团体数万人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等在大会上讲话，感谢三湘人民援助，说：“此次七、八两军军队，攻击敌人，以五分之一的兵力，而消灭敌人如此之多……实是民众帮助，人民与革命军队合作”的结果^⑤。

①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档案馆：《湖南工运史料汇编》，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卷第二册，第593页。

②《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第594页。

③《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第593页。

④协夫：《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些事实》，《战士》周报第19期。

⑤长沙《大公报》1926年7月17日。

参战助战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卓著的，要算醴陵、安源路矿、平江等处工人农民。北伐军进攻醴陵之前，中共醴陵地委领导成立了以工人、学生为主的平民救国团。他们与农民协会合作，组织了运输队、侦察队、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铁道通讯破坏队，筹措军需物资，准备支前参战。党的地委并布置各乡农民武装紧急集合待命，准备协同北伐军作战。派代表赴攸县境内迎接北伐军，将醴陵地形、交通、北军分布等情况绘制成图送给北伐军。醴陵之役7月10日凌晨开始，至当日下午，由于县城周围之北军已被肃清，城内之敌乱作一团。叶挺指挥独立团乘敌慌乱，渡河攻城。这时，工人、农民、学生数千人协同作战。城内守敌在北伐军和平民救国团等民众夹击下，弃城逃跑。下午4时，独立团即占领醴陵县城。在醴陵民众庆祝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的大会上，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团长叶挺等对醴陵民众踊跃支前参战给予高度评价。为了表彰醴陵民众的贡献，第四军军部赠送锦旗一面，奖金一千元。株萍铁路总工会与醴陵县平民救国敢死团一致行动，在北伐军进攻醴陵县城前数日，即将湘赣边界的湘东铁桥炸断、掘断铁道数处，以阻止敌军运输，同时组织侦察队、破坏队等大举助战。破坏队分成四队，分段负责破坏从姚家坝至株洲渌江口之间的铁轨电讯，以阻断敌军交通。萍矿工人组织20余人的谍查队，随同革命军作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工作人员致信《向导》周报报道这些情况后赞道：“此次醴陵之役，我军之战斗能力固强，而能数小时之内把万余敌军冲散者，得株萍铁道工人之帮助，诚不小也。”^①

平江之役是1926年8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战役开始之前，平江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暗探队、向导队和运输队，准备配合北伐军作战。他们为北伐军提供详细的军事情报，并将敌军工事、驻军及地势等绘制成简明图纸交给北伐军，

^①叔坚：《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向导》第177期，1926年11月4日。

使北伐军对敌情了如指掌,得以长驱直入。战斗打响后,工农参加运输队、交通队者有几千。第四军渡汨水时,缺乏船只,农民交通队“皆以门板、禾桶等件作船筏,渡革命军于白湖口,致使敌军不及退却而被缴械”。“运输队员为革命军担运粮食子弹时,均煦煦不稍露倦容。有运送至数日者,有至数十里者,有自请运输毫不索取报酬者。”^①

特别难得的是,北伐军进入平江之前,农民协会早已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北伐军进攻白石岭时,“农民大举帮助围剿……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敌军大乱,当夺枪械无算,毙敌甚多。”三阳坪农会会员用梭镖、锄头击毙敌兵2名。农民敢死队用梭镖、镰刀和土炮,夺取敌军手里的枪杆和大炮。张家碑农民夺取枪支10多支,杀死北兵8人。在平江战役中,农民武装和群众共杀毙北兵200余人,农民亦牺牲200余人。《向导》周报载文盛赞平江农民对北伐战争的贡献:“此次国民革命军克服平江,得农民实际参战之力甚大。”^②北伐军总参谋次长白崇禧也称赞道:“敌在汨罗经营工事甚久,此次我军进攻,能进敌阵地击破,皆民众协助之功。”^③

对于湖南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中的贡献,时任湖南省省长、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作过这样高度的评价:“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④1926年12月,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宣传纲要写道:“此次北伐军兴,平江、浏阳、宁乡、安源等处农工徒手参战等,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中,实占最光荣的一页。”

1926年9月初,北伐军分头在赣西边境作战,从修水、铜鼓直到莲花、永新一带,工农群众同样积极参战助战。当北伐军从

①《湖南民报》1926年8月29日报道。

②叔坚:《从广州所闻北伐军之胜利与民众》,《向导》周报第177期。

③《北伐中之农民的实际行动》,1926年《国民新闻出版》。

④《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

醴陵向萍乡挺进时，中共安源地委和青年团地委组织萍乡县各界代表前往萍醴边界、萍攸边界与北伐军取得联系，送去情报和慰问品，充当向导，同时在县城内外贴标语，散传单，扰乱敌人后方；又由安源工人组成五个破坏队助战，分头破坏安源至袁州、莲花等处电话、电报设施。第一、二队在株萍铁路工人刘启云率领下，潜入赣西镇守使署后院纵火施放炸弹，吓得镇守使唐福山仓皇率军逃跑。萍乡县城“非独市面未遭搜扰，即所存子弹军需亦完全未动。这次截得子弹数百箱，地雷两个，军需无算，已由工人刘启云等缴交第二军查收”^①。革命军攻占袁州、莲花、新余、南昌等地时，先后有 1000 多安源工人用土车为革命军运送军需品。安源矿工 100 多人曾前往武昌帮助北伐军挖坑道攻城。株萍铁路工人还曾组织队伍去临湘破坏铁路，配合北伐军攻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大举英勇参战的事迹后赞道：“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勇气与能力了。我们可以说一句一点不夸情的话：只有工人肯干革命，只有工人能领导革命！”^②

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下，如此热烈、勇敢地参战助战，生动地显示出觉悟了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崇高的革命牺牲精神以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的组织性。这表明，共产党在群众的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非常成功。

工农民众支援了北伐，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反过来帮助了工农民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北伐军攻占长沙及其附近各地后，工人运动进一步复兴和发展。1926 年 8 月，长沙、衡阳、岳阳、常德等 20 个县已经成立总工会，还有 19 个县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处，全省有产业工人和职业工会共 76 处，会员达 11 万人^③。9 月 1 日，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在中共

①②霍然：《近数月来湖南的工人运动》，1926 年 11 月 14 日《战士》周刊第 24 期。

③《湖南全省总工会成立之通告》，1926 年 8 月 30 日长沙《大公报》。

湖南区委领导下,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逐渐走向高潮。万县惨案发生后,省城 230 余团体万余人举行反英大示威,并向英领事馆递交通牒。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对英经济绝交和各种打击英帝国主义的活动。从长沙到衡阳、宝庆、常德、湘潭、安乡等县的英货经理处、行栈,差不多都被封闭,英货或被查封,或被焚烧。10月,宝庆举行 3 万人反英示威,当场烧毁缴获的鸦片 2 箱。游行队伍到达英商一个油库时,将两万多桶煤油(约 400 吨)全部烧毁。另一路游行队伍将装满两栋屋的日货煤油连屋一起烧掉。1927 年 1 月 16 日,湘潭十余万人举行示威大会,将英商油池之 178 桶煤油全部烧毁。22 日,湘潭码头工人、划拔工人等万余人将英商油池烧毁。3 月,安乡县总工会查封英商煤油公司,烧毁煤油 480 桶。4 月,将大金码头日本人的所有财产没收用作六一惨案死难者抚恤费。省总工会纠察队将盗租大金码头给日本人的两名要犯押往码头处死。4 月间将杀害黄爱、庞人铨的要犯李佑文和工贼李为章枪毙,对其他一些工贼也进行清算斗争。在经济斗争方面,株萍铁路、粤汉铁路工会支持路局整理收入,逐渐发清对工人的欠饷。锡矿山工会,长沙各行业工会,平江纸业,烛业工会,宝庆水泥、醴陵瓷业等地工会也都在省总工会指导下,进行了改善工人待遇的经济斗争。

这期间,促进萍乡煤矿开工,是湘鄂赣三省工会经济斗争的一项共同内容。萍矿在 1925 年 9 月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后,生产停顿,工人生活痛苦不堪,铁路和武汉地区发生煤荒,对赣西和湖南社会经济以及武汉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甚大。经过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湖北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等共同努力,由路矿两工会参加管理矿山生产运销,使矿山生产逐渐恢复,这对于改善工人生活,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缓解铁路煤荒和武汉政府财政困难,起了程度不同的作用。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管理企业的最早尝试。

农民运动从1926年10月起达到了高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个高潮做了最为精彩的描述。毛泽东考察以后,农民运动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全省农会会员人数由1927年1月的200万,四、五月间猛增到600万^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斗争浪潮更加汹涌澎湃。特别重要的是,发展到了实行土地革命这一新的阶段。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4月17日发表《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正确地指出,湖南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这时,一些地方开展了减租斗争,有些地方开始清丈田亩,准备秋后分田,长沙县霞凝乡和浏阳县第三区以人口为标准,丈量田亩,插标分田。醴陵、湘潭、益阳、衡阳、湘乡、汝城一些地方也开始分田^②。土地革命的开始实行,和工会管理企业生产的实现,是湖南革命史上两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对此,青年团湖南省委1928年2月给团中央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湖南是土地革命首先发展的地方。工人自己的工会管理生产,亦是在湖南省委指导之下的安源市第一次实现,阶级斗争在湖南实在早已发展到最高形式。”^③

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就是北伐战争最初进入高潮的湘粤大道和湘东边境各县。1926年11月,全省成立了农民协会的56个县中,会员人数最多的(10万以上)4个县,全部在湘中;会员人数10万以下5万以上的6个县中的5个县,会员人数5万以下1万以上的12个县中的9个县,都在湘粤大道和湘东边境^④。这个地区,实际上也是湖南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党、团组织力量最大的地区,因而也是秋收起义三项条件准备得

①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湖南党史大事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②《湖南党史大事表》第46页。

③《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58页。

④参看《1926年11月份湖南全省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战士》周报第38期(1927年3月27日)。

最好的地区。

这一地区的工农运动,与江西萍乡县的民众运动融为一体。当时萍乡县农民运动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一部分^①。萍乡、醴陵两县的重大斗争,往往共同进行,相互支持。如公审枪毙萍乡的大土豪劣绅叶紫屏和醴陵县大恶霸彭志藩,都是两县一起进行的。萍、醴两县以及两县与湘中各县民众运动的密切联系,直接延续到稍后参加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和秋收起义,有利于秋收起义三项准备。

同湘东边境相比,共产党在赣西边境的工作起步较晚,但在大革命初期,在修水、铜鼓、莲花、安福、永新、宁冈等县已经陆续开始建立党、团组织,在工人、农民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准备迎接北伐。北伐军进入江西境内时,这一地带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给予北伐军大力支援。之后,工农运动在这一地带获得相当的发展。

修水和铜鼓是赣西北革命运动最早兴起的两个县。这两县与湖南的平江、浏阳两县相邻,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较密切,所以四县革命运动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修水,1924年上半年建立了青年团支部,1926年7月建立了中共支部。大革命高潮中比较突出的重大事件,就是1927年4月的农民大暴动。在《中国革命武装起义全录》一书中被称为“修水四月起义”。1927年4月初,中共平江县委派两名党员到修水县的西隐乡帮助组织了农民协会。不久,农协委员长陈瑞仁即被当地大恶霸陈醉六杀害。数千愤怒的农民将陈醉六抓住处死,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农民。这是在湘鄂赣边境发生的第一次农民大暴动,影响很大。在铜鼓,1925年12月建立了中共支部。1926年冬,党、团员发展到40多人,成立中心支部,全县十个区多数成立了支部。1927

^①《1926年11月份湖南全省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中“株萍路”一栏,就是萍乡县。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萍乡农民代表袁德生的名字也是列在“株萍路”栏下。

年初成立了县委。这个县和浏阳县制纸业很兴盛。1926年春夏，浏阳和铜鼓两县制纸工人联合成立了吴楚纸工会，举行了一个多月的罢工，迫使纸槽主答应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等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极大地推动了铜鼓县的革命斗争，修、铜两县和湖南平、浏两县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和发展，对秋收起义及其以后湘赣边界革命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在赣西，萍乡县以南几个县的革命运动是由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开辟的。1926年5月，中共吉安特别支部成立（当时中共江西地委仅辖南昌、九江、吉安3个特别支部），先后在莲花（7月）、永新（7月）、泰和（7月）、安福（8月）等县建立了党的小组。1926年9月，北伐军一部从茶陵进入莲花。党的莲花小组于1927年3月发展为支部，在全县8个区136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和县保安队，由北伐军留下的军官梅绍仁任保安队队长，两队有枪60支。在安福，1926年11月由党的小组发展为支部，全县工农运动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北伐军留下的营长王新亚帮助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在永新，1926年8月党的小组发展为支部，次年初成立了中共县委，王怀和贺敏学先后任书记。在开展工农民众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有300多人，200多支枪。

在永新以南的宁冈县，中共党组织是江西地委于1926年7月派龙超清建立的。1926年11月底成立支部，次年1月发展为区委，均由龙超清任书记。龙吸收了井冈山马刀队首领袁文才入党，将袁文才、王佐的绿林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由于袁文才与贺敏学是中学的同学，宁冈和永新的革命运动连带安福、莲花两县的革命运动逐渐发生密切联系。赣西边境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秋收起义的发生和起义部队落脚井冈山准备了有利条件。

革命战争高潮和民众运动高潮使一部分国民革命军接受了民主的政治训练、革命战争的锻炼和工农革命的影响，因而其中

一部分官兵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分化出来加入红军。特别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经过大革命高潮中的战斗锻炼、教育和训练,被誉为“铁军”,成长和扩充为一个师、三个团(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七十三、七十五团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成了红军最初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革命战争高潮和民众运动高潮中,湖南全省 30 多个县总工会组织了工人纠察队,人数多的有 600 人,少的有数十人,总数为三四千人枪。近 50 个县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共有 6000 人枪。另有梭镖队数十万。在赣西边界的工农武装,除萍乡和安源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几百支枪。这几十万工农武装,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溃散,却为秋收起义和后来的工农暴动准备了暴动的力量,为后来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兵源。

在很短的期间内,能把广大的民众动员起来投入革命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之雄厚和领导之坚强。湖南党组织在马日事变前已经发展到 60 多个县,党员人数达到两万多,是全国党员最多、党组织分布最广的省。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虽然遭到很大的破坏,但党的潜在势力仍然雄厚,尤其在湘东赣西,党的力量基本上保存完好。据文献记载,醴陵、平江和萍乡三县即有党员 1900 人以上,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 5000 余人的约 40%。

湘粤大道和湘赣边界为秋收起义和后来的红军战争所作的三方面准备是比较充分的。

第四章 各路武装队伍云集湘赣边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秋收起义及其以后的红军战争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准备好了经过一次革命的民众,也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在秋收起义前,作为红军种子的湘赣边界各路工农武装纷纷奔向便于迂回隐蔽的赣西边境,引起了外界注意。1927年9月14日,反动的上海《新闻报》报道:“湘省反共运动以后,农工义勇队与共产党主干人物多窜赣西,以安源为逋逃藪。迨贺(龙)、叶(挺)叛变,溃兵一部,又窜赣西,意欲取道湘东回归湘西老巢,以故赣边铜鼓、修水、万载、安源、萍乡、莲花、永(新)、(安)福共十余县,均为共产党溃部及农、工军所盘踞,赣湘边、平江、浏阳、醴陵、茶陵,警耗时传。”^①这篇报道除了将卢德铭所部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这件事误认为是参加南昌起义的贺龙部队“意欲取道湘东回归湘西”以外,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马日事变后湘赣边境工农武装集结的情形。

驻扎在赣西边境的工农武装,首先进入中共湖南省委视野、后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是萍乡煤矿工人纠

^①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244页。

察队、萍乡煤矿矿警队和萍乡、醴陵、浏阳、平江四县的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萍、浏、醴三县的工农武装分别被合编为工农义勇队参加了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撤退时，醴陵工农军与萍矿的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一起退到了安源。萍乡县农军退往莲花县，与莲花、安福、永新、宁冈各县农军合编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约在7月下旬或8月上旬，中共安源特区委（八七会议后改称市委）派人往莲花、安福召回萍乡农军时，莲花、安福农军同萍乡农军一起到了安源。起义爆发前不久，衡山县白果区的农军因在本地处境危险，为找出路而自动到了安源。以上7支队伍，在当年9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安源会议上被确定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后改称第二团）。

平江、浏阳农军在当年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湘南暴动计划中即被拟定调往湘南参加暴动。夏斗寅叛变后，平江农军奉命在本县边境堵截夏斗寅叛军，并与之激战。7月中旬，平江农军与从长沙战斗撤回的浏阳农军奉命开赴南昌，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赶到南昌附近时，方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绕道闽边南下。在折回湘赣边境途中，他们与同样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来自武汉的卢德铭所部警卫团相遇于武宁。于是，3支队伍相约开赴修水、铜鼓待命，由浏阳农军领导人、县委书记潘心元赴安源找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办法。这样，警卫团便和平、浏农军一起，与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3支队伍到达修、铜后，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下，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灰色掩护在那里待命。这时，正在寻找出路的鄂南崇阳、通城两县的农军闻讯赶到修水，加入该师。在9月初的安源会议上，以上4支队伍被确定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两个团。安源会议后赶到铜鼓的毛泽东将这两个团命名为第一团和第三团。另外，余洒渡在起义前夕还收编了黔军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

一、“招兵买马”，湘东赣西和衡山工农武装齐集安源

湘东赣西和衡山工农武装能够在安源集结，首先是因为马日事变后参加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使醴陵、萍乡两县工农军汇合在一起，后来醴陵工农军与安源工人一起撤退到安源。接着，安源工人成功地实行武装保卫和据守安源，使安源这个湘东赣西革命堡垒继续公开存在，成为如敌报所说“共党主干人物”的“逋逃藪”，衡山农军等即因此而到了安源。然后，安源的党组织成功地执行了“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图到时一用”的策略方针，把萍乡、莲花、安福的农军从永新县招到安源。



上世纪 20 年代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的安源

1927 年 5 月 23 日，柳直荀等以湘潭县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农民众团体的名义发出电报，号召各县工农武装进攻长沙，以平定许克祥等人的武装叛乱。电报到达后，萍乡即成立以中共安

源地委书记刘昌炎^①为主任的萍乡人民军事委员会,加紧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进攻长沙。当时,萍乡可供组织的武装队伍有3支:萍乡农军和县保安队、萍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萍乡煤矿矿警队。

萍乡农民自卫军是大革命高潮中由萍乡县农民协会组建的,成立于1926年冬或次年初,有几十人枪。保安队是当时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掌握的县政府建立的,有100余人枪。农军和保安队都由保安大队长蔡苏民^②率领。这时,萍乡县革命运动的领导关系存在一种特殊情形。以前安源路矿连同萍乡全县的革命运动完全由中共湖南省委下属的安源地委领导。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萍乡以后,安源和萍乡县的革命运动仍由安源党组织领导,但国民党县党部却隶属江西省党部。萍乡县的工农运动既是湖南省工农运动的一部分,又是江西省工农运动的一部分。所以,萍乡县农军和县保安队也在中共安源地委领导下参加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

萍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前身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团。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时组织工人监察队,1923年扩充为纠察团,下辖两个纠察队,队员最多时有500人。另外还组织了秘密的工人侦探队。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被武力封闭时,纠察团和侦探队都随之被解散。1926年9月北伐军到萍乡以后,萍矿总工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工人纠察队也随之恢复。因为当时复工的工人只有两千至四千人,所以工人纠察队也只有数十人。参加进攻长沙的战斗时也不过一二百人,武器仅限于刀棍之类和工人自己用炸药制成的土手榴弹(工人戏称为“洋葛古”)。

①刘昌炎(1894—1927),号琛璞,湖南醴陵人,安源工人。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窿内支部书记。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河南焦作地委书记。1926年初回安源,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同年10月,当选为中共湘区委委员。1927年6月被地主武装杀害于萍乡。

②蔡苏民是萍乡上栗市人,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任萍乡县保安大队长、萍乡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的委员。

萍乡煤矿局的矿警队是煤矿开办后为维护矿区秩序由矿局创办的，分为巡警和武装警察两部分：巡警分驻东西南北四个区，武装警察分为两个大队，四区两队矿警人数曾多达八九百人（两队武装警察共二三百人）。1925年9月，工人俱乐部被武力解散后，绝大多数工人被解雇，矿警人数也有所减少。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安源后，矿警因平日欺压工人而遭到工人殴打驱逐，大多数逃离矿山。中共安源地委便趁机派了一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矿警队当兵。秋收起义时担任过起义军连长的共产党员杨士杰^①、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唐延杰中将（在安源时是青年团员）、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刘先胜中将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入矿警队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派廖树林、胡承焯两人到矿警队分别任正、副大队长。从这个时候起，矿警队实际上已由中共安源地委掌控。所以，由萍矿总工会出面调矿警队参加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矿局也不敢说“不”字。

除了这3支武装队伍之外，准备进攻长沙时，还由县农协、县总工会和萍矿总工会出面，分头发动了大批工人农民参加。据国民党反动派1928年11月的《湖南清乡公报》追述，这次进攻长沙的战斗，萍乡和安源总共出动了“几千”人。该文写道：马日事变后，安源共产党“不旬日间，便鼓动几千工友拿着梭镖，并纠合萍醴共党，压迫农民，浩浩荡荡，来攻长沙”^②。同以往萍乡、醴陵两县重大革命活动总是联合举行一样，这次武装进攻长沙，两县工农军不仅一致行动，而且奉命合编成一支战斗大军。

醴陵县工农武装是在大革命高潮中产生的。1926年11月，在中共醴陵地委领导下，逮捕了全县的大恶霸、团防局长彭志藩，缴获团防局40多支步枪和两挺机关枪，稍后又收缴一个回

^①杨士杰（1893—1928），江西萍乡人。1925年在安源加入共产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第五连连长。后在醴陵、萍乡等地坚持游击战争。1928年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安源。

^②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365页。

乡团长的私枪 20 支,子弹千余发。此外,从多方面继续收缴到一些枪支弹药。由此形成了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县农协农民自卫军。1927 年 2 月,醴陵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正式成立,称“湖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第六区队”,辖 3 个中队,共有队员 100 多人,枪 60 余支。同年 3 月,县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辖两个中队,共有 260 多人枪。在这期间,全县各区各乡普遍建立了人数不等的农民自卫队或自卫军,所用武器多为鸟铳、梭镖、大刀之类。5 月 23 日,柳直荀等在湘潭所发电报到达后,中共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即领导县总工会和县农协积极进行攻打长沙的准备。除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外,全县 14 个区,每区组织 1 个大队;323 个乡,每乡组织 1 个小队,总人数在 1 万以上。5 月 28 日,罗学瓚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县长潘疆爪一起去株洲参加柳直荀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醴陵县工农武装和萍乡、安源的工农武装合编为“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5 月 31 日与长沙周围各县工农军合攻长沙。会后,罗、潘二人回到醴陵,与刘昌炎等会商,决定两县进攻长沙的行动由罗学瓚全权负责组织,刘昌炎等协助。任命潘疆爪为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总司令,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李味农为政治部主任,醴陵县总工会委员长易足三为参谋长,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朱少连等为前敌总指挥,随即按约定时间向长沙进发。参加这次战斗的萍、醴两县工农军共 2 万余人,作为主力的两县工农武装共 1400 余人,有步枪 500 余支,机关枪 2 挺,其余均使用鸟铳、梭镖、大刀、棍棒之类武器。萍醴农军到达株洲后,与攸县、茶陵、株洲、湘潭东区的农军取得联系,分三路向长沙进发,在长沙以南的易家湾与敌军激战。关于这次战斗,同年 6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曾这样报道:马日事变后,“萍乡工人农民为自卫起见,曾组织工农义勇队三万余人,联合浏醴等县,与许逆军队血战三昼夜,直追大托铺,几将长沙城包围”^①。

^①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第 1243 页。

5月31日,易家湾激战正酣时,传来了停止攻击、撤回原地、静候国民政府处理的命令。萍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工人即全部撤回安源。萍乡县农军和保安队在蔡苏民带领下撤往安福,与莲花、安福、永新农军取得联系,直到八七会议后才奉命回安源参加起义。参加这次战斗的醴陵农民全部回到乡下,党的地委和县属各团体负责人以及工农武装队伍共200多人分为两批:一批由易足三带领到安源安营扎寨待命,一批由罗学瓚带领暂住萍醴交界处的老关火车站附近,就近观察醴陵动静,指挥县境内工作。约在6月中旬,暂住老关的大部分人在罗学瓚带领下到达安源,与在安源的易足三等会合一处。后来又有一些干部和群众在本县不能立足,继续逃到安源暂住。这样,醴陵县的工农军和干部有二三百人集结在安源。1927年6月下旬,地委领导人出席了毛泽东在株洲召开的湘潭、醴陵、安源、衡山等地党的负责人会议。7月上旬,罗学瓚在安源灯盏窝召开了醴陵地委委员会议,传达了株洲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措施。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将中共醴陵地委改为县委,仍由罗学瓚任书记。8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调罗学瓚往湘潭任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一职由邓乾元接替。邓乾元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要求加紧搜集枪支弹药,组织好革命武装队伍。为了就近指挥本县工作,决定将县委机关从安源迁回县内。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等武装队伍仍留安源,直到9月初安源会议后,留在安源的醴陵工农武装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从6月初到中旬,撤出长沙战斗回到矿山的安源工人进行了连续约半个月的武装保卫安源的战斗。之后,他们坚持武装据守安源,直到秋收起义前夕。

当时,夏斗寅在湖北、许克祥在湖南、朱培德在江西到处杀害、驱逐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湘东赣西革命也处在危急之中。萍、醴工农军撤离易家湾,敌军随即反扑,在株洲、醴陵大肆屠杀

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6月4日,湖南反动军队尾随后撤的萍安工农义勇队由老关窜入萍乡,5日下午到达萍乡县城,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制造了六五反革命事变。在这一事变中,萍乡县县长、共产党员罗运磷^①率领一支队伍往安源转移时,在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6月6日,湖南反动军队进犯安源,中共安源地委组织工人武装有的登山,有的下矿井,与敌周旋。地委书记刘昌炎、委员周怀德^②等率领萍、安、醴一批干部经矿井出紫家冲,向芦溪山区转移。途中,刘昌炎、周怀德等因遭地主武装伏击而牺牲。坚守安源的工人打死打伤敌军士兵数人。早已对安源工人心怀畏惧的敌军仅呆数小时即仓皇撤走。在这之后,萍乡土豪劣绅组织反革命武装,并以“萍乡的煤要由萍乡人来挖”“赶走湖南人”为口号,欺骗、煽动和胁迫农民上万人,武力围攻安源,同时断绝交通,阻止运送粮食菜蔬进矿区,企图用饿困办法迫使工人屈服。安源党组织领导工人继续实行武装保卫安源。对地主武装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而对被骗参加围攻的农民则朝天放枪示警,并通过喊话,揭穿土豪劣绅的骗局,优待俘虏,进行分化瓦解。斗争坚持十多天,最后,在醴陵县工农武装帮助下,内外夹攻,将剩下不多的地主反动武装打跑,取得了安源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醴陵在安源的干部和武装力量,而且使安源作为湘东赣西的革命堡垒继续公开存在。因此,在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的安源工人袁德生、朱昌炎、张明生等以及马日事变后疏散到外地的萍乡、安源的革命骨干分子陆续回到了安源。

①罗运磷(1896—1927),号松岩,江西萍乡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北大毕业后回萍乡从事教育工作,积极参加工农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被推选为萍乡县县长。同年6月壮烈牺牲。

②周怀德(1884—1927),湖南湘潭人。安源矿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历任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团团长、总平巷甲段工人总代表、安源青年团地委委员、俱乐部交际股股长、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安源市总工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6月,湖南反动军队进犯安源时,在带领部分人员撤离安源途中,牺牲于萍乡芦溪。

湖南衡山县白果区农民自卫军，也在此时由原安源工人赵国城^①等率领下，于1927年8月间来到安源。衡山白果是1923年安源工人谢怀德^②和水口山工人刘东轩组建的湖南最早的农民团体——岳北农工会的地方。北伐军到达湖南后，谢怀德、刘东轩^③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和安源工人俱乐部电机处工人总代表赵国城等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成立了白果区农民协会，赵国城任委员长，谢怀德任副委员长，并组织了一支拥有200多支枪的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白果区农运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刘东轩、赵国城同区农协副委员长彭桂峰^④等率领的农协干部和农民自卫军100多人，携枪晓宿夜行，长途跋涉，在秋收起义前夕到了安源，后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

安源工人实行武装保卫安源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工作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陈独秀、鲍罗廷等人不顾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的反对，继续顽固地执行右倾错误政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一再退让，使党的基层组织不知如何是好。在湖南，毛泽东6月24日回湘任省委书记，向柳直荀等明确指出必须以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他要求把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起来，不要分散，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这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形

①赵国城(1883—1928)，又名拜八。湖南衡山白果乡人。安源煤矿工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电机处总代表、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共安源第二支部书记等职。1925年秋回衡山白果开展农民运动，被选为衡山岳北农工会委员长。后在安源参加秋收起义，在第二团团部管理军械。在浏阳二团被打散后，他潜回安源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8月在安源被捕牺牲。

②谢怀德(1887—1928)，又名谢祥七，湖南衡山白果人。安源矿工，1922年9月参加安源工人大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家乡开展农运，任岳北农工会副委员长。1925年2月以湖南省农运特派员身份到郴州开展农运。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在安源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1月在萍乡上栗市暴动中牺牲。

③刘东轩(1889—1928)，化名金雨农、钟得贵。湖南衡山白果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1922年任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岳北农工会委员长。岳北农工会被破坏后，奉命到衡阳等地从事农民运动。曾任中共衡阳本江特委书记。1928年8月间遭敌惨杀。

④彭桂峰(1905—1931)，又名李桂峰，湖南衡山岳北贯塘颜家冲人。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岳北二区农协副委员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历任中共延福区委、安福县委、新余县委书记。1931年11月在江西被错杀。

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是对农军进攻长沙这一举动的肯定和赞赏。毛泽东在湖南的正确做法遭到陈独秀的反对，当了十天省委书记便被调回武汉。中共湖南省委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于7月中旬拟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其中提出工农自卫军在不能公开的情况下，设法在3种形式下保存武装：或改编为挨户团，或上山，或把枪分散埋于土中^①。安源的情况却不同，工会和工人武装仍然公开存在，共产党的“势力较马变以前还大”^②。以上3条办法都不适用。可是，萍矿总工会委员长刘义却只看到有利的一面，顶着国民党政府整顿汉冶萍委员会委员的牌子，过分张扬，既充任矿局五委员之一，又任矿局事务处处长兼由矿警局改成的保安科科长，经济武装拿在一手，以致引起第三十五军突然开两个连军队进驻安源，造成“全市和矿局人员均起恐慌”^③。湖南省委闻此情形，急派省委委员夏明翰到安源，转达和执行省委的政策。针对安源的特殊情况，省委为中共安源特区委（7月由地委改组而成）制定的政策是：“我们表面虽极端灰色，内部则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安源可造炸弹和机关枪），以图到时一用。”^④这就是说，既不必采用前述3条办法安置武装，也不能张扬，更不能像刘义那样大吹大擂，而应以灰色掩护，内部则积极扩充实力，收集和制造武器，等待时机。

根据省委所定这一正确策略方针，刘义辞去各要职，以图保存工会和武装。同时，暗中搜集枪支弹药，利用矿山的炸药等原材料和机械，修理和制造武器。增派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工人到矿警队去当兵。这时矿警队有400多人，200多条枪。为了用灰色掩护，矿警队接受程潜部队收编，改称“国民革命

①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0页。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1927年7月23日），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4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④《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信》（1927年7月23日），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35页。

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工人纠察队大为扩充,并组织了一支60多人的炸弹队(又名爆破队),还有梭镖队等。到起义时,工人纠察队员约有500人,加上临时参加的,安源工人参加起义的共一千二三百人。任弼时1927年10月4日报告说:安源“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炸弹队、梭镖队、看护、宣传等队,内均系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①。

执行“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图到时一用”方针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不仅把萍乡农军和保安队从安福招回,而且把王新亚率领的安福、莲花的农军也招到了安源,还由王新亚带来了有关永新贺敏学、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率领的农军重要消息以及井冈山地区等各方面情况,这对于起义军后来决定进军井冈山起了重要作用。事情是这样的:6月初,蔡苏民带领萍乡农军和保安队从进攻长沙的战斗中撤回后,因在萍乡不能立足,便径直向萍乡的邻县安福山区转移。7月下旬,中共安源特区委和八七会议后由特区委改组成的安源市委根据省委“招兵买马”的指示,多次派人到安福去找萍乡农军,要他们回安源待命。找到蔡苏民等人以后,才知道他们撤到安福以后,先是同安福的农军合在一处,接着与莲花、永新、宁冈的农军也发生了联系。

安福的农军是北伐军到达后,在工农运动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北伐军留下一位军官叫王新亚,帮助组织和领导这支队伍。王新亚是湖南浏阳人,当时20多岁,北伐时他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在他的帮助和带领下,安福农军发展到300多人,有200支枪。安福与莲花边界相连,并且中共党组织都是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建立的,到1927年7月,两县党组织一直受吉安地委领导,所以关系比较密切,两县农军往往在斗争中联合行动,并都由王新亚指挥。莲花与永新边界相连,永新党组织也是由吉安特支建立的,到1927年7月也一直受吉安地委领导,所以永新和莲花、安福的革命运动关系也较密切。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有300多人,

^①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200多支枪，由贺敏学任总指挥。贺敏学同宁冈县的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袁文才是中学同学，很要好的朋友。袁的队伍原叫“马刀队”，后由中共宁冈支部书记龙超清做工作，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本人加入了共产党。之后，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佐领导的绿林队伍也改为农民自卫军。这两支农军共有二三百人，100多支枪。马日事变后，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暴动，农民自卫军被打散，农军总指挥贺敏学等被反动派逮捕关押。于是永新县党组织派人分头与袁文才、王佐、王新亚等联络，集合各路农军于1927年7月下旬攻打永新县城，取得了胜利，救出被关押的贺敏学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随后，成立了以贺敏学为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为副主席的永新县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工会、农会和各项革命工作。同时成立了以王新亚为总指挥，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的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永新、宁冈、安福、莲花、萍乡等县的农军，与敌周旋。不久，因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进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实力，农军决定分头转移。贺敏学回忆说：“我和王新亚、王佐、袁文才四人指挥在永新打了一仗。不久，我们分手了。我带一路上井冈山，王新亚带一路到湖南。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在安源发动秋收起义。我当时的想法是，兵分两路，以免遭覆灭。如果我的队伍失败了，就去湖南找王新亚；王新亚的队伍失败了，他就上井冈山找我。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为什么最后上了井冈山？肯定是王新亚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①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细节。贺在回忆中还讲到：王新亚临走时，留下一百银元，要他转交给他的妹妹贺子珍，说一个女同志这样辗转征战很不容易，困难一定很多，留下这点钱帮她维持生活。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到这件事时仍很感动。这些情况表明王新亚对井冈山的情况很熟悉，这段斗争给他的印象也很深。就在这时，安源党组织派人通知蔡苏民所部萍乡工农义勇队回安源待

^①引自1983年8月19日访问贺敏学记录，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命。曾经奉命三进安福调农军的安源工人金洪喜回忆说：安源党组织第一次“派我和李林生送密信到安福，将信交给了撤到安福的萍乡工农武装负责人蔡苏民同志……我在安福住了两天后，带了蔡苏民的信回到安源。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总工会又派我和张德存去安福送信，这次蔡苏民要我留下来，但因我要回去汇报，两天后又回到安源。不久，工会又第三次派我去安福，通知那里的萍乡农军去安源整编”^①。当时在莲花农军当兵的王庆生回忆说：“1927年上半年，我们攻打了县保安队，缴了五十余支枪。后来接到指示，要我们去宁冈编队，于是留下二十几支枪给陈竞进管理，我们带了七十余支枪到宁冈，参加编队的有永新、宁冈、安福、莲花四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分编成四个连，莲花县的农民自卫军由杨良善任连长。编队后部队经过永新、安福到安源去会合，走到安福时，遇上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第四连叛乱，开枪打我们，我们因而没能进安福县城，就从武功山到新店里，再到萍乡，经山口岩时还和当地挨户团打了一仗，然后去了安源。到了安源后，部队又进行了整编。参加整编的还有安源工人，我们编为第四连（注：即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二团第四连），王新亚任团长，杨良善任连长。我们这一连都是莲花人，有八九十支枪。”^②

综上所述，以到达安源时间为序，秋收起义前安源武装的人数是：萍矿工人纠察队约500人，萍矿矿警队约500人，醴陵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二三百人，衡山的农民自卫军七八十人，萍乡县农民自卫军和保安队100余人，莲花和安福农民自卫军100多人。以上7支武装队伍加上临时参加的工人，在安源参加起义的共2000余人。武器方面，共有步枪1000余支，轻重机关枪各1挺，土手榴弹、鸟铳、梭镖、大刀等无数。

^①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等：《秋收起义在江西》，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金洪喜，江西萍乡人，安源工人。当时是共青团员，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第二团三营七连三排任班长。

^②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58页。

二、警卫团从武汉辗转修水

以卢德铭为团长的警卫团，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这个团，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27年6月在武汉组建的。它名义上是国民党所属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军队。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的原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叶挺随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帮助张发奎的总指挥部组建警卫团。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接受这一建议，授意军委参谋长聂荣臻办理此事。经聂荣臻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推荐，由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原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卢德铭任警卫团团团长。卢德铭赴任前，聂荣臻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警卫团遂于1927年6月下旬正式成立。团部及全团干部战士随总指挥部住武昌国民政府院内，即武昌长街旧督军府院内(现解放路上的武汉造船厂)。

警卫团的团、营级主要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士兵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也不少。团长卢德铭，字邦鼎，号又新，又名继雄，四川省宜宾县(现为自贡市)双石铺狮子湾人，生于1905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黄埔军校毕业留校。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等职。1927年6月任警卫团团团长。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工农革命军总指挥。指导员辛焕文，湖北安陆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师大毕业，他熟悉英文、德文，研究过《资本论》，曾在北伐军中总政治部任党务秘书，第二期北伐时任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韩浚，1893年生，湖北黄冈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①。另外还有两名团副，一个

^①韩浚，1927年9月初与卢德铭、辛焕文一起从武汉返回警卫团途中失散，从此脱离警卫团。后投入蒋介石军队，任过旅长、师长、军长等职。率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947年2月被解放军俘获。1961年获特赦，定居武汉，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

是余洒度^①，湖南平江人，1898年生，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1925年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奉命潜入武汉发动士兵暴动，任暴动队队长。1927年6月，任警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另一个是范树德，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共产党员，任警卫团团副兼辎重队长，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军需处处长。团部设有指导员办公室，办公室有主任一人，干事一人，负责政治工作。团部还配有参谋、书记、司书等人员。该团初建时只有两个营，8月2日离汉前增加一个新兵营。营、连、排干部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且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警卫团的组建和扩充，与湖北省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团最初的兵员有不少湖北省的工会、农会干部和进步学生。当时，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开始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反动，湖北各地一些在本地不能立足的工、农会干部和革命分子纷纷投奔武汉的中共党组织。周恩来指示以招兵的名义把他们送到警卫团。秋收起义部队和后来红军中的一些重要干部，如宛希先、何挺颖、陈毅安、谭希林、刘炎、欧阳建人、胡炳田、沈顾雄、郑重、杨梅生等，都是这样到警卫团的。他们到该团后，最初被编入干部连。

7月初，中共湖北省委所办团校（对外称湖北青年军事训练班）停办。根据卢德铭的要求，团校的100多名男生被编入警卫团第二营第五连。任过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何长工、曾任工程兵司令员和中央军委顾问的陈士榘上将、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熊寿祺以及杨岳彬等就是这样加入警卫团并在第二营第五连当兵的。

警卫团与湖南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的革命运动以及安源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卫团与安源工运

^①余洒度，1927年8月任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9月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1年叛变革命后，任复兴社重要成员。1933年任国民党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1934年利用职务走私贩卖鸦片，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的历史渊源由叶挺独立团而来。叶挺独立团是在周恩来指导下，于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以大元帅府铁军车队为基础组建的。安源工人俱乐部1925年9月被武力封闭后，一部分安源工人去广东参军，有些人就被分配到独立团当兵。当时在独立团当兵的安源工人、解放军中将韩伟回忆说：“当时有不少安源工人到广州参加了叶挺独立团教导队。我现在记得名字的有三个人，刘春生、刘茂生、朱昌炎。”^①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作战后，官兵牺牲不少。1926年6月间即在攸县成立1个补充连。以后，这个团在湖南境内作战过程中，有很多分散在湖南各地的安源工人陆续参加了叶挺独立团。1926年9月至10月初，北伐军攻打武昌城，久攻不下，中共湖南省委应革命军的请求，组织了约100名安源矿工到武昌城下，与革命军工兵营一起挖坑道攻城并参战。当时参与指挥作战的叶挺独立团参谋长、解放军上将周士第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安源工人此次挖坑道，同独立团并肩作战的情形，说攻克武昌后，“有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加了独立团”^②。宁谟·韦尔斯所著《续西行漫记》根据访问红军将领所得，说叶挺部队有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安源的矿工。她在该书第四章“中国红军发展史”一节中写道：“我们必须注意最初红军的无产阶级成份。叶挺所率领的‘铁军’第二十四师，是叶氏1925年一手组成的，最初不过是一团广东的农民，他在湖南把自己的队伍扩充到五个团，每团二千人，汉冶萍和安阳（源）的矿工们，以及一些铁路工人，先后加入。有一个时候，叶挺一师全部都是汉冶萍的矿工，其中有许多在1926年进攻武昌时被打死了……这些矿工受过有名的共产党员李立三的训练，都是非常勇敢的革命工人。”^③卢德

①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第274页。韩伟（1906—1992），湖北黄陂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排长、副连长。后在红军和解放军历任团长、师长、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③宁谟·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57—358页。

铭所部警卫团是由叶挺独立团改编的第七十三团分出1个营扩建而成的。

其次,警卫团从组建时起,就陆续有湖南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和安源工人参加。1927年3月间,韩伟所说参加叶挺独立团的安源工人刘春生到安源招收130余名工人参军。这些人到武昌后被编入第四军新兵营,后来转入卢德铭所部警卫团。1927年7月,在萍乡县总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高自立“率200余安源矿工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后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高任连党代表。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高自立到井冈山后,曾先后任第四军和第十二师第三十一团的连党代表^①。同年8月1日,警卫团从武汉出发前夕,第二十四师一个新兵营被调入这个团。当时,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黄琪翔电令警卫团迅速开往九江,又命令他们在出发前将第二十四师的新兵营编入警卫团。接电报后,第二十四师新兵营全营开赴警卫团,编为第三营,立即同全团一起乘船出发。这个新兵营,营长是陈浩,兵士主要是湖南、湖北的一些工会农会干部,其中至少有100名安源工人。后来成为红军重要干部的伍中豪、黄璜和解放军大将谭政、上将张宗逊、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等就是在这个新兵营后被编入警卫团第三营的。安源工人出身的韩伟中将1925年底参军就在叶挺独立团,这次也随新兵营到了警卫团。杨立三原是湖南一个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共产党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湖南区委介绍他到武汉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他回忆说:“我初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命我随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同志的部队

^①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122页。高自立(1900—1950),江西萍乡人,原名省烦,化名周和生。原在萍乡县城当店员,1925年在萍乡县总工会工作。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曾任红军师政委、军政委,总兵站部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土地部长等职,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冀察热辽分局副书记等职。1950年1月病逝于沈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工作。到了武汉黄土坡(岭)二十四师留守处,我又被派去湖南任新兵招募委员,随即带由安源一百多工人组成的一个新兵连回武汉。党就决定我任这个新兵连(当时称第九连)排长。这个新兵连的共产党员大约占二分之一左右,加上湖北天门十多个青年学生,又都是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党的领导力量很强,我们二十四师补充(警卫)团首先组织了一个营(除我们连外,其余几个连都是湖南、湖北两省来的农民及若干做过工农运动的同志)。”^①关于这个新兵营的来历,当时负责训练新兵的陈树华回忆说:“1927年6月,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师)后方留守处工作。当时在武昌黄土岭成立了新兵训练处,叫我写一个快速训练新兵的计划,即以两周时间将新兵训练到能作战,计划训练两个快速师。具体计划我送张云逸核定实施。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只收了一个营的新兵,由营长陈浩、连长黄贇、伍中豪等进行训练。其成员主要是湖南、湖北的一些工会农会干部,他们因‘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严重,在当地站不住脚而来武汉找党的组织。8月初,接到南昌来电,叫立即去南昌集中,当即内部戒严,全营开到警卫团,编为第三营,乘船东下。”^②

1927年8月,警卫团开到修水县城,在那里招收了一批当地工人农民参军。赖毅^③就是在修水参加警卫团的,参军后到谭希林、罗荣桓所在的师部特务连当班长。何长工回忆说:“部队到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0页。杨立三(1900—1954),湖南长沙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在第一团当兵,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官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勤部部长兼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等职。

②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4页。陈树华,原名陈明义,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③赖毅(1903—1989),湖南平江县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班长、排长及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总金库主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修水后还招了二百多名新兵。修水县法警队由于党做了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二十多人参加了起义部队。新兵招募站就设在过浮桥后进城不远的孔庙里。”^①

这样,到秋收起义爆发前,警卫团共有3个营,大约两千人。陈士榘回忆说:警卫团“全团共有两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江西安源煤矿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以及湘鄂两省农民运动的干部和积极分子”^②。警卫团的组建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警卫团团长沙德铭等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这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对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创建而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支军队,是湘鄂赣三省革命运动的产物,而包括安源工运在内的湘赣边界和湘粤大道的革命运动对这支军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支军队从武汉辗转到修水,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因而成为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之一。

1927年8月1日深夜,卢德铭先后接到两份电报:一份是贺龙所部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③从南昌发来的,告知南昌起义已经开始,令他立即率部赶赴南昌;另一份是张发奎部的副总指挥黄琪翔从九江发来的,令警卫团迅速出发,到九江待命。卢德铭接到两份电报后,决定不回张发奎的电报,却利用张的调兵命令,以开往九江为掩护,把部队带往南昌,与南昌起义军会合。8月2日傍晚,卢德铭把范树德调到招商局轮船“德兴号”。警卫团全体官兵开到汉阳门,在黄鹤楼边长江水面登上“德兴号”东下,向九江方向疾驰。船行至黄石港附近时,卢德铭派人找

①何长工回忆:《秋收起义在修水》,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2页。

②陈士榘:《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71页。

③周逸群(1896—1931),祖籍湖北,生于贵州同仁,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在北伐战争中,历任左翼军宣传队队长、独立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委委员和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1928年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湘西北特委书记、湘西特委书记、湘鄂西联军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1年5月在湖南岳阳作战时英勇牺牲。

了一只小汽艇，去九江方向探听情况，侦知九江方向确有张发奎部布防，已成戒备状态，于是在船上召集会议，研究决定改行陆路。8月3日早上，警卫团在黄颡口上游3里多处的江边登岸，徒步前进。8月4日，至鄂南的阳新，在阳新筹集了一些款子，征集到船只。5日，在阳新富川门上船逆水前往排市。次日晨，由排市上岸步行，经燕厦、龙港，翻幕阜山，向江西武宁进发。8月7日，警卫团快要到达武宁县县城时，走在队伍前面的陈树华等两名便衣侦探侦得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正在包围武宁县城，久攻不下。这时，平江农军听说有一支部队正向县城开来，以为是国民党反动军队来救援城内的敌军。为了避免损失，旋即撤退。城内国民党守军疑余部撤退是诱兵之计，也不敢轻举妄动。陈树华等二人即分头行动，一人在东门外茶馆，监视城内守敌，一人回部队报告，建议部队从东门攻城。事有凑巧，警卫团在行进中，遇到了国民党武宁县党部主任委员。他在余贲民部围城时，逃到乡下家里，看到警卫团服装整齐，误认为这是国民党派到武宁来的救兵，连忙主动出来迎接，表示欢迎队伍进城，并写了一封信，命令武宁城内守兵开城门迎接。于是警卫团顺利地进了武宁县城。部队进城后立即派人去请余贲民部进城来。由此两部取得了联系。部队安顿后，陈树华在察看周围情形时，无意间发现了县政府藏在后院小山草丛中的一箱钞票。陈树华回忆说，他在县政府大堂后面的小山上“发现草丛中间有一片草向四周倒开，我很奇怪，特地钻进草丛中去看个究竟，原来有一口大皮箱把草压向四周。我打开一看，最上面是十多粒子弹，其余都是钞票，我把子弹收了，仍把箱子盖上，回团部来问：‘我们要不要钱用？’军需处陈毅安^①说：‘真是一个钱也没有了，我们走时仓促，根本没有领

^①陈毅安(1904—1930)，湖南湘阴县人。1924年春加入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即任国民革命军连长、警卫团辎重队长。1927年8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以后历任营长、参谋。1930年5月任红三军团第一纵队司令员，同年8月5日在攻打长沙战斗中不幸牺牲。

着钱。’我说：‘我倒有点钱可以贡献出来。’到底有多少钱，我也冒弄清，只知道后来经过一个地方时，派人把钞票换现洋或铜板（怕钞票垮价），估计挑现洋和铜元的纵队，有全团行军队伍两倍那么长。”^①除了这一箱钞票，县政府还筹集了300多元给部队。在武宁得到这两笔钱以后，团部决定雇用民伕，每天到了宿营地即发当天的工资。当地零工工资一般是八百钱一天，警卫团雇的挑伕发一千钱一天。沿途老百姓便争着要来当挑伕，于是行军顺利。

警卫团与平江农军在武宁相遇时，余贲民告知卢德铭，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往广东方向转移。卢德铭决定改变原来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取道靖安开往奉新，继续南下追赶南昌起义部队。8月9日，警卫团到达靖安县城，遇到了与警卫团同时从武汉出发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学生王良、徐彦刚、陈伯钧、曾士峨四人^②。原来他们从武汉出发后，一直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九江，被张发奎部队缴械。王良等四人逃出九江，直奔南昌。途中得知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他们告诉卢德铭，张发奎占领南昌后，派了两个团沿江截击警卫团。于是，卢德铭决定改向靖安、奉新、高安方向前进，以便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但是由于张发奎的部队严密窥视与阻碍，这个计划亦不能实现。部队即拟从樟树渡过赣江，继续追赶计划。又侦得樟树方向朱培德正在集结部队，准备架设浮桥渡江袭击警卫团。卢德铭等只得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经奉新转向湘、鄂、赣三省边界“三不管”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落脚。

部队8月10日拂晓从靖安出发。在从靖安赴奉新途中，一个名叫史保亨的连长企图制造兵变，杀害卢德铭，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这一阴谋及时被团部发觉，团部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以召开军官会议为名，将史保亨扣押，及时妥善处置了兵变事件。8

①《陈树华老先生谈秋收起义历史》（1979年10月），原件存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②王良、徐彦刚、陈伯钧、曾士峨四人稍后转到高安，加入浏阳农军的队伍。

月10日傍晚到奉新后,把史保亨和参与兵变的一个排长枪毙在奉新的河滩上。

这时,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夏曦给卢德铭写来一封信,谓南昌起义部队缺少有作战经验的干部,要他和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离开警卫团去广东东江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于是卢德铭在奉新决定把部队交给团副兼第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让余带部队去湘赣边界的修水休整待命。卢德铭便和辛焕文、韩浚三人一道,化装离开部队,经长沙到武汉,原拟从武汉乘船经上海去广东汕头,后来他们在武汉见到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向警予^①。向警予向他们传达湖北省委指示,要他们仍回原部队。后来经过曲折艰难的长途跋涉,卢德铭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前夕才赶到修水渣津,担任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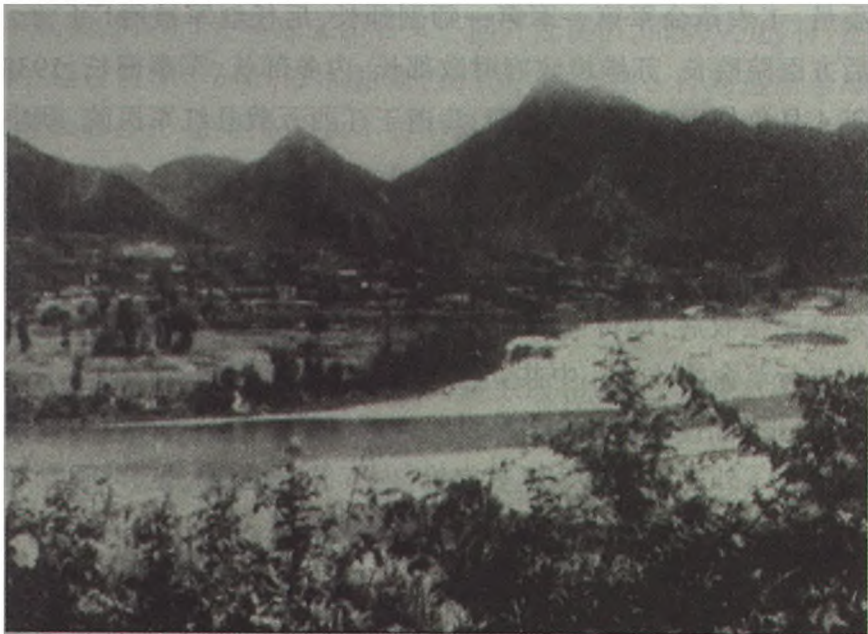
当卢德铭等三人在奉新离开部队的时候,警卫团与平江农军取得联系,相约赴湘赣边界的修水整理。其原由是,首先因为修水处于湘鄂赣三省边境,远离城市,便于藏身;再则修水与平江相邻,两县革命运动一直相互联系,两县中共党组织之间关系密切。另外,卢德铭等人已去武汉,让他们返回部队更方便,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余洒度1927年10月19日报告说:“卢团长德铭以南昌大队早已开赴不及追上,乃将军事交洒度指挥,他同其他几人潜行赴粤。度当时即将不愿留团官长及反动军官分别遣散枪毙,乃绕道至修水,适逢平江余贲民部(有枪约300支),即相约在修水整理。”^②平江农军即时派人告诉浏阳农军,他们正与警卫团相约赴修水休整。浏阳农军得知这一情况,即决定返回浏阳邻县江西铜鼓县待命,由县委书记潘心元从上高出发赴安源找省委报告三支部队的情形,请示办法。

卢德铭等三人离开警卫团以后,余洒度率领部队,经过奉新

^①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湖南淑浦县城关镇人。土家族。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员,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1927年7月负责武汉省委宣传部工作。1928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英勇牺牲。

^②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2页。

境内的罗坊,沿上富,翻过五梅山到达修水县城。



警卫团集结地修水县城

三、平江、鄂南农军到修水与警卫团会合， 浏阳农军开赴铜鼓休整待命

警卫团8月中旬开抵修水,平江农军即如约赶到。

平江工农义勇队是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平江后,由共产党员余贲民奉命接收县政府民团队,经过改造逐渐发展而成的。之前,平江县政府民团队有60多支枪,罗昌文当队长。北伐军到达平江,罗昌文即主动与北伐军联络,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当时,最适合担当这个接收任务的,只有余贲民。余贲民是湖南平江人,字金榜,号世英,别号楚龙,1888年12月生,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攻克武昌的战役中英勇负伤。五四运动后,在县城与李六如等积极开展反帝爱国斗争,被选为雪耻会会长。1922年6月在长沙由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马日事变后,任平江县工农义勇队大队长,1927年9月

领导平江县工农义勇队参加秋收起义，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后任红军被服厂厂长、后方医院院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军事部长。1933年4月负伤后又错误关押，病逝于江西万载县红军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6年8月，当罗昌文提出愿意接受改编时，余贲民由于参加过辛亥革命，声望很高，中共平江党组织即指派他去接收。余贲民接收后，即将民团队改为团防局，自任局长，逐步对团防队进行革命的改造。中共党组织陆续输送一些农运骨干进去当兵，又把政治讲习所80多名学员全部编进去。余贲民又设法陆续收缴了外来散兵的300多支枪（内有部分烂枪）。这样，逐渐扩充到拥有近500人、300多支枪的队伍。

夏斗寅叛变后，湖北的反革命逆流波及平江。1927年5月，中共平江县委将驻守南江防御夏斗寅叛军的团防局全部武装调回县城，以镇压县城的反革命活动，保护各革命团体。当晚，县长严洪辉见势不妙逃跑，由原县政府秘书曹修礼代理县长。余贲民率领部队回城立即将曹扣押，驱逐出境。随后，召开了革命团体联席会议，成立了“政务委员会”，推选陈蒹章等五人为委员，办理县政；建立临时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这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派来王紫剑任县长，派阎仲儒（人称阎王）率清乡队来平江，强令团防队交枪。余贲民为避免冲突与损失，挑选出了约80支破枪，派人送到县城应付。在此期间，余贲民经常带领队伍查禁鸦片，在不长的时间内烧了鸦片七八次，深受当地人民群众拥护。在此期间，余贲民奉命将团防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大队，并任大队长。

1927年7月中旬，平江工农义勇军与浏阳农军奉命去南昌参加起义。余贲民率部从平江的仙江（现三阳区浊水乡）出发，经虹桥、大平、浆市，到达平修边境龙门厂，与浏阳工农义勇队汇合。按照南昌起义部队前委指示，汇合后两支队伍应合编为贺龙

所部第二十军独立团,但由于由谁出任团长意见不能统一,合编未成功,仍以二十军独立团名义一同开赴南昌。部队从龙门厂出发,经过渣津、马坳、修水县城、武宁等地,8月5日到达涂家埠(现永修县),正准备乘火车去南昌,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已追赶不上,且前面又有张发奎部阻挡,无法通过,于是两支武装分开行动:浏阳工农义勇队仍以二十军独立团名义渡河向安义、奉新前进,打算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平江工农义勇军则折回,准备开往修水县城休整待命。

8月7日,平江农军在武宁与警卫团相遇,后与警卫团约定开到修水县城,同时派人将此情况告知浏阳农军,约在8月中旬平江工农义勇军在修水县城郊与警卫团再次会合。会合后的第一个重大共同行动,就是驱逐邱国轩团。邱国轩团是王天培残部。王天培原是黔军袁祖铭的部下,北伐战争中依附国民革命军,任第十军军长。1928年7月参加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之战,大败,蒋介石迁怒于王天培,将其处死于杭州,其部属溃散,邱国轩即由此溃逃到修水县一带。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到达修水的时候,邱国轩团正关着城门在修水县城里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百姓叫苦不迭。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即决定攻打邱部,结果大获全胜,收缴了四匹马和一些枪支和包裹,将邱团赶往赤江,处决了邱团一个营长,将其首级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拥护与赞扬。陈树华回忆说:“全城市民百姓拍手称快。我们部队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称我军队为再生父母,送了许多猪肉和酒,慰劳我军,并派人守在司令部门口,发现我们派人外出买菜,立即将菜筐抢去,送菜上门。我们为了不要他们送菜,只好假说有菜,天天用他们原来慰劳的猪肉当小菜,餐餐吃肉……如此坚持了一星期左右,我们只好和修水各界人共同协商,约法三章,我们公平买卖,按当地当时的价格买进……”^①平江与修水两县的革命运动本来就关系很密切,平江农军同警卫团打败邱国

^①陈树华 1979 年 10 月回忆录。原件存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轩团，在修水县民众中更受拥戴。当地群众欢欣鼓舞。三日以后，全城秩序恢复正常。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余洒度与余贲民商量，一方面招募新兵扩充队伍，另一方面加紧练兵。何长工回忆说，在修水招了200多名新兵。修水河州上便是练兵场。除操练队形和射击等项，还上政治课，讲述革命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还不时抽调人员下乡，帮助周边农民打土豪。在修水休整约1个月，部队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和支持，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在修水县休整训练的时候，浏阳县工农义勇军按照约定于8月20日开到了铜鼓县城，并很快与驻修水的两支队伍取得了联系。经过酝酿准备，三支队伍于8月下旬合编成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灰色掩护保存实力。

浏阳县工农义勇军是大革命高潮中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领导组建和发展起来的。潘心元，字国方，1903年出生，化名彭清泉，湖南浏阳县人。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并主持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工作。1927年初，创建浏阳工农义勇军，任党代表。同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因故未能按时到职，由徐麒代理）。1928年春，任中共湘东特委常委，同年冬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运部长。1929年底任中共中央巡视员。1930年2月出席“二七”陂头会议，当选为红四、五、六军前委常委，后历任红三军代理政委和红四军政委等职。1931年改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赴任时在浙江温州被捕牺牲。



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

1926年秋冬,潘心元领导浏阳各区农会、工会收缴县团防局和各区团防局的枪支,建立了农民自卫军。1927年春,将农民自卫军和县工人纠察队合编为湖南工农义勇军第一纵队第四团队,共计500人枪,以苏先俊^①为团长,徐麒为党代表,罗纳川为参谋长。团队以下设大队(相当营)、中队(相当连)、分队(相当排)。团队有直属特务连,连长为朱建胜。

马日事变后,潘心元率这支武装与上万农民参加了进攻长沙攻打许克祥叛军的战斗,奉命撤出战斗后,退回浏阳。7月中旬奉命与平江农军合编为贺龙所部第二十军独立团,一同赶往南昌参加起义。8月5日,部队抵达江西涂家埠(现永修县),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平江农军决定回师平修边界,浏阳工农义勇军则打算绕道安义仍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8月9日到了瑞州(即高安),方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绕道闽粤边界,无法赶上。这时,平江农军派人到高安,告诉他们,平江农军已与警卫团相约赴修水。于是,潘心元主持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部队开抵铜鼓休整待命,由潘心元带领李信、邓华松等去找湖南省委请求指示。这样,在高安休整了两天,部队8月11日离高安,经上高、宜丰,于8月20日到达铜鼓。

铜鼓县与浏阳县相邻,两县革命运动常有联系。中共铜鼓县委书记陈逸群早就与浏阳的领导人相熟,闻知浏阳农军已到,忙前往迎接。在铜鼓县中共党组织帮助下,浏阳农军同铜鼓县城的反动武装人民自卫队激战3个小时,缴获枪支20余支,并打开监狱救出刘志先、陈奉南、李名开等革命同志100多名。这时铜鼓县第七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李建康和袁德生等从胆坑赶到县

^①苏先俊(1904—1930),字太红,化名燮昌,湖南平江人。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带领浏阳农军参加十万农军进攻长沙的战斗,任第二总队总指挥。秋收起义中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长。同年10月,自动离开部队去找湖南省委。1928年1月,任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同年3月,在长沙被捕叛变革命,任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参议兼“铲共法院”处长。1930年8月,红军占领长沙后,被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判处死刑。

城与浏阳工农义勇军联络,帮助开展工作。浏阳农军在这里派出12路招募员四出招募新兵。这次参军的张朝盛回忆:“部队进驻铜鼓后,招募了很多新兵,招兵地点是柳林街李新芳纸行。那一次在铜鼓就招了160人。其中铜鼓人就有五六十个,其余都是外地人……当时我也去报名当兵,有一个干部问我:‘当伕子还是当兵?’我回答:‘当伕子,一担六十斤,我挑得起。’但还是让我当了兵。我们全部编入了新兵连。”^①同时抓紧军事训练,以提高战斗力。时为第三团学兵连指导员的王俊民回忆说:“在铜鼓休整期间,我在学兵连学习有关军事知识,当时学兵连连长是益阳人,姓易。我在学兵连改名左益生。抽去学兵连学习的都是一等兵上等兵,还有些班长,我是连指导员,所以也允许我去。在学兵连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训练射击、跑步、防哨、夜行军、拆枪等军事课,还有政治课。”^②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农会工会,全县各地在白色恐怖下转入地下活动的农、工会骨干分子向部队提供情报,充当侦探,军民协同打土豪除劣绅。

平、浏农军和警卫团分别从8月5日和8月7日,在涂家埠和武宁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以后,一直未能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中共江西省委也是在8月底甚至9月初才得到八七会议的消息。这段时间,三支队伍当时最焦急的是都在寻找适当的地方和适当的方式保存自己的实力。江西省委对这三支队伍的安危也很关心。为此,他们频繁往返联络。继卢德铭等8月10日或11日在奉新接到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夏曦指示信之后,平、浏两部也在8月20日前后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并且省委这次派赴视察、指导的人在修、铜工作时间较久,直到9月26日仍未回省委。省委1927年9月26日致中央信写道:“平浏农军在修水、铜鼓时,曾派人来此接洽,此间亦有人前去报告现在军政情况,并提议以后进行以及一切联络事宜,派去之人尚

^①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13页。

^②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08页。

未回来。”^①

8月中旬,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刚到修水的时候,省委派出的人在修水主持召开了警卫团和平江农军“两部负责同志会议”,传达省委关于三部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灰色掩护,保存实力的指示,并指定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会议还决定组织“师委会”为党的领导机关。会后余洒度即派警卫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吴会治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指示。关于这一改编经过,余洒度1927年10月17日在武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警卫团从奉新“绕道至修水,适逢平江之余贲民部(有枪约三百支),即相约在修水整理”。“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乃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俊(原驻铜鼓)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部)即分补两团。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当即派吴会治^②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③在修水召开的这次会议,浏阳农军的领导人苏先俊因为还在从高安到铜鼓的途中,没有参加,所以把三支原来互不隶属的队伍编为一个师这个任务并未完成。8月20日,苏先俊率领浏阳农军到达铜鼓以后,奉派来修、铜负责合编这个师的江西省委工作人员在修水与铜鼓两县城之间的山口镇(属修水县)再次召开由三支队伍负责人全部参加的会议,最后落实江西省委的决定。这就是多位起义亲历者回忆到的“山口会议”。山口会议是8月下旬在山口镇万寿宫福和铺内召开的,是警卫团和平、浏农军这三支队伍的整编会议。这次会议的结论大致是:将三支队伍合编为一个师,为灰色起见,采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称,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

①《1927年9月26日江西省委给中央信》,原件藏江西省档案馆。

②陈士榘回忆,到警卫团后,“我被分配到二营五连,连长叫吴会治”。《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71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2—113页。

为副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合编为第一团，以钟文璋为团长；浏阳农军为第三团，以苏先俊为团长，空着第二团以待天下好汉来归。原定平江农军分补两团，改为从原警卫团抽调第三营（营长伍中豪）编入第三团，将原警卫团的干部连的骨干分配到各连当连长或连党代表。为了从江西省政府和第五方面军取得合法地位，以灰色



山口会议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提供）

为掩护在修铜休整，同时获得给养，并便于用合法名义收税筹措资金，由师部参谋处长陈树华等日夜编造全师近 10000 名官兵花名册和经费预算书，并派师部秘书宛希先^①持花名册去南昌见朱培德，要求准予收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

依当时浏阳农军党支部组织委员张启龙的回忆，江西省委这次派来帮助合编部队的人，名字叫“全仁”（很可能是化名）。张启龙多次回忆都提到这个“全仁”。其中一次说到：“浏阳农军从高安到铜鼓的途中，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到莲花（即莲花县）去。但未等部队去莲花，江西省委又派余仁（‘全’错印为‘余’——引者注）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我们

^①宛希先（1906—1929），湖北黄梅县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任警卫团第五连连长，同年8月任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秘书，9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三湾改编后，历任前委委员、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第二届特委委员、常委、巡视员兼茶陵特别区委书记等职。1929年被错杀于永新大湾。

就开到铜鼓驻扎下来,使部队有了落脚的地方。”^①看起来,是仝仁在修水找到余洒度、余贲民等人开过会之后在返回南昌途中,遇到浏阳农军,向苏先俊、张启龙等传达了省委指示,然后随浏阳农军返回修、铜,主持召开了山口会议,把改编军队这件事办妥,他才回省委。

山口会议后不久,鄂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谋长刘基宋和党代表罗荣桓等到了修水,余洒度等大约这时才听刘基宋等讲到了八七会议的决定。余洒度的上述同一报告写道: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后“不久得通城刘xx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②。报告所写“刘xx”,即刘基宋。刘基宋是余洒度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他和罗荣桓等到修水,其实主要不是来通报消息,而是凭他与余洒度的同学关系来求助,希望余洒度能给鄂南农军调拨几位军事干部和一批枪弹。在这次联系以后不久,鄂南农军便来到修水,并人暂编第一师第一团。

鄂南农军是由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叶重开^③率领的崇阳农民自卫军合并而成的。罗荣桓是湖南衡山(今衡东县)人,1902年生。他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就参与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加入了共青团,曾写文章揭露臭名昭著的湖南国民党右派头目刘岳峙等人的罪恶,遭到土豪劣绅忌恨。1927年4月,他在农友保护下经长沙到了武汉,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读书,在校期间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他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党代表,后历任营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党代表兼政治委员、东北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6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3页。

③叶重开,湖北崇阳人。大革命时期任崇阳县团防局局长,后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第二大队大队长。1927年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连副连长。

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3年12月病逝于北京。

1927年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到达通城县时，县长王武扬^①接待了他。王在介绍情况时讲到，在县城，武装掌握在反动的团防局局长刘秀波手里，但在乡下大部分地区则是农民协会的天下。王武扬要罗荣桓作为农运特派员协助县农协主席汪玉堂^②组织农民自卫军。王要罗同县政府民政股长谭梓生一道下乡。谭梓生1925年在上海政法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被任命为该县县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立足，跑到武汉，与罗荣桓同时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通城工作^③。

到达通城县的第二天，罗荣桓、谭梓生一同下乡。正巧夏斗寅残部逃跑时在通城四乡扔下了不少枪。他们收集这些枪，很快就组织起拥有一千人左右、二三百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南昌起义消息传来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要求各地9月上旬以前开始暴动。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立即商议执行省委计划的办法。在商议中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这时崇阳农军来到通城。崇阳农军是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有100多人枪，由原崇阳团防局局长叶重开领导。他们当时因遭到国民党军队

①王武扬，安徽黟县人，中共党员，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公开身份是湖北省通城县县长、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后在崇阳麦市战斗中，部队被反动武装打散，王与队伍失去联系。1934年病逝于安徽安庆。

②汪玉堂，安徽黄梅县人，中共党员，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时任通城县农协主席，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秘书。

③谭梓生（1898—1930），安徽省旌德县人。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谭一度担任茶陵县县长。1930年，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同年9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第十三军追杀,被迫南撤到通城。叶重开率部到达通城城郊,即派人到通城县找汪玉堂接头,双方一拍即合。汪要叶立即率部隐蔽在通城县城西,随即与王武扬、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等研究智取通城办法。8月20日上午,叶重开身穿崭新的军服,腰扎武装皮带,脚蹬皮靴,骑着大洋马,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炊事员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也许是刘秀波已经听到什么风声,城门早已紧紧关闭。叶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刘秀波)。门卫见来人是当官的,显得有点派头,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局长头衔的名片,然后神气十足地说,我们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乖乖地把城门打开。叶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与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农军配合,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当天下午,王武扬在通城县衙门门口主持召开大会,宣布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并宣布由他自己担任自卫军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刘基宋^①任参谋长,在会上宣布将血债累累的刘秀波枪毙,没收他和其他几个土豪劣绅的财产。这些没收的财产,除一部分留作军用外,其他都分给贫苦群众。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自卫军缺少一个管账先生。大家一致认为罗荣桓是大学生,由他管财务最合适。罗荣桓本人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除了做好党代表,又兼管着自卫军全部家当——一只盛钱的小箱子。他小心谨慎走到哪就把这个小箱子提到哪,不料在行军途中被两个骗子把这小箱子骗走了。一次队伍在向修水转移途中,天气炎热,山路崎岖陡峭,罗荣桓提着沉重的钱箱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来了两个农军士兵模样的人,显出殷切、关心、诚恳

^①刘基宋,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当过营长,是黄埔第二期毕业生,懂军事,曾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谋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战士。

的样子，硬要帮助他提箱子。罗荣桓觉得他们有点面熟，似乎是自己的士兵，便让他们帮助提着。到了宿营地，他去找人时，这两个家伙早已经逃之夭夭。丢了这二三百块钱，他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有一次，他对他夫人林月琴提到这件事时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生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炼是不行的。”^①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对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②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刚合并成立的时候有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懂军事的干部，二是缺乏武器弹药。在黄埔军校与余洒度是同学关系的刘基宋建议，派人去修水请余洒度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帮助。于是由刘基宋、罗荣桓和谭梓生去修水联络。他们化装后，便风尘仆仆赶到修水。余洒度的秘书谭政^③接待了他们。谭政问明情况后，立即向余报告。余答应给他们派两名军事教官，拨给少量弹药，同时还告诉他们，如果在当地不能立足，就可以把部队开到修水来。罗荣桓一行刚刚返回通城，国民党第十三军便向通城进逼。于是，通城、崇阳农军便于8月底率部向修水转移。行至崇阳麦市宿营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勾结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队伍被打散，原来收编来的通城民团大部分跑了。第二天天亮后集合队伍时，发现1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0多人。罗、叶收拢队伍，率领100多人继续向修水前进。到达修水，入驻桃树港。鄂南农军到达桃树港以后，立即派人

①黄瑶：《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②《罗荣桓传》。

③谭政（1907—1988），湖南省湘乡县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与余洒度联系。余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并从警卫团抽调四五十名老兵充实进去做骨干,由警卫团的排长谭希林^①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特务连下辖2个排、6个班。秋收起义开始后,因谭希林调往第一团第一营工作,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调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共同指挥特务连。

8月底9月初,余洒度和师部参谋陈树华等商量,想把邱国轩部收编过来。于是由陈树华以师长余洒度的名义给邱国轩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接受暂编第一师收编,并派参谋彭楷、副官余浩二人与邱部接洽。

邱国轩团8月中旬被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击败以后,退至平江的渣津、长寿街一带活动,收缴了一些枪支,逐步扩充了势力。余洒度后来的报告写道:邱国轩部“原有枪二百余,后与第八军及平江清乡队战,收编该两部枪数百余,实力大充”^②。事实上,到底有多少人枪,余洒度也不很清楚。由于邱部反动本质所决定,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无恶不作,到处遭到老百姓厌恶和反对,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邱国轩收到余洒度的信后,立即由一个副团长出面接洽,表示愿意接受收编。邱国轩为了表示诚意,还坐着轿子专门去拜访余洒度。经过往返磋商,邱国轩部被编入第一师。因为原来已经空着第二团的位置,所以将邱国轩部列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二团,邱仍任团长。起义前,安源部队已有第二团,于是将邱团列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

到9月9日起义开始时,在修水的部队有警卫团近2000人,平江农军近500人,鄂南农军100余人,在铜鼓的浏阳农军

^①谭希林(1908—1970),湖南长沙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连连长。后历任工农红军随营学校校长、参谋长、代军长、游击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3页。

近 1000 人。两地合编成的两个团共 3000 余人^①，有步枪 1300 余支、机关枪 2 挺。另新收编的邱国轩部有数百人枪。

①上海《新闻报》1927 年 9 月 14 日报道：共产党军队“铜鼓、修水与湘境平浏一带溃兵，计众三千余人，因窜湘西不能，亟欲收编，故仍屯留两省边境无何积极动作”。《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 1244 页。

第五章 安源会议

1927年8月9日,未赶上南昌武装起义部队的浏阳农军从奉新到达高安。他们和平江农军一样,奉命从本县出发后,一直未能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取得联系,不知下一步如何行动。这时平江农军派人来告诉他们,平江农军已和警卫团相约赴修水休整,希望他们也向那边靠拢。于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召开相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决定部队开赴浏阳的邻县——赣西的铜鼓休整待命,他自己则带人去安源找湖南省委,报告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军这三支队伍开赴修水、铜鼓的情况,请求指示。

潘心元等人到安源后,湖南省委得知安源市委转达的潘心元报告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一次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最后确定将暴动区域缩小到湘中,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分别负责指挥部队军事行动和地方民众暴动;并派毛泽东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当师长,负责组织前敌委员会和军队。会议还决定在岳州和安源各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岳州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湘北暴动,并与鄂南联系;安源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安源、醴陵、浏阳、平江等地民众暴动,配合军队行动。

会后,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到安源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途经株洲时,毛泽东下车找到中共株洲区委负责人,并对株洲暴动作了布置。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与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将驻修水、安源、铜鼓的革命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3个团,并确定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的计划以及暴动日期。

一、潘心元到安源报告军队情形,湖南省委布置秋收暴动

1927年7月中旬,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率浏阳工农义勇队从湖南平江赶赴南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8月9日,这支部队从奉新到达高安时,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远离南昌沿闽赣边南下,无法追上。这样,浏阳工农义勇队便离开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大家对部队今后的去向和如何开展斗争等许多问题拿不定主意,都感到非常苦闷和焦虑。就在此时,平江农军派人赶来告知:他们与警卫团已相约去修水休整待命,希望浏阳农军也能向修水方向靠拢。于是,潘心元利用在高安休整的机会,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议,讨论部队的去向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苏先俊、徐麒、彭商仁、张启龙等十余人。张启龙回忆说:

在讨论到部队去向时,有的主张回到浏阳道吾山,认为那里地势险恶,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有的认为那里靠近长沙,不好活动,不如到大围山,那里山大,可以连通平江、铜鼓、浏阳几个县,党和群众基础也很好,而且离山不远就是达浒的黎家大屋(也叫城墙屋),这是一座有三百六十间房子的地主庄园,可没有[收]他们的被子供部队过冬用。潘心元说,我们不要会打仗,只要会转圈圈,就不但可以保存部队,还可以壮大这支队伍。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思想统一不起来。在行动问题上当然也讨论不出结果。当讨论到部队本身领导问题时,大

家对苏先俊的意见很大，指出他有军阀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不尊重党，不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同余贲民争做团长和自封团长等问题都提出来了。潘心元同志对他的批评最尖锐。苏先俊不接受，结果两人大闹起来，几乎动了枪；苏先俊用不干来要挟大家。大家又针对他这一错误，批评了他一顿。最后潘心元同志提出去找湖南省委请示，得到到会同志们同意，随即派李信、邓华松两同志跟他同去。^①

潘心元等人知道安源革命势力比较强大，且有火车直达湖南省委机关驻地长沙。于是，他们打算通过安源党组织寻找湖南省委。部队从高安到达上高后，他们便化装离开部队，租了三乘轿子上路了。刚走不远，便遭到被南昌起义部队打散的国民党散兵拦路抢劫。潘心元乘机将身上带的50块钱偷偷交给轿夫保存，才未被抢走。靠这些钱，他们步行三四天，大约在8月20日之前到达安源。潘心元考虑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早已暴露，在长沙不能公开露面，便把湖南省委在长沙的两个联络点的详细地址和联系人的姓名告诉李信^②和邓华松，要他们去找湖南省委，他自己则暂时留在安源。

当时安源的工会组织还公开存在。潘心元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蔡以忱是湖北黄陂人，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常委、湖北省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等职。八七会议前夕，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派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到湖南工作。蔡以忱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请求由中央调到湖南的干部之一。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罗章龙回忆：蔡以忱当时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懂得一些军事，所

^①《秋收起义前后三团活动片断》，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潘心元》，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页。

^②李信（1907—1985），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一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以要他去。他去湖南是有决心的,所以家眷都带去了。他的妻子姓丰,是党员,也同我熟悉。就这样,我同蔡以忱等在六七月间先后到了湖南。我留在长沙,蔡以忱带着家眷到安源,担任党的安源市委书记^①。

潘心元向蔡以忱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到安源寻找湖南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来意,并报告了浏阳、平江农军在赴南昌追赶八一起义部队途中巧遇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等情形。蔡以忱根据潘心元所谈的情况,立即给湖南省委写了一个军事报告,并派市委委员宁迪卿^②将报告送到湖南省委。

潘心元 1929 年 7 月 2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记载了他到安源寻找湖南省委的情形:

平江军队与浏阳分开以后,走到武宁县城遇到余洒度之警卫团,适从十一军跑了出来,与贺、聂[叶]失去了联络,找不到出路,于是与平江义勇队合在一起,决由修水同回平江;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到了瑞州,听说贺、聂[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宁汉已发生冲突,湖南空虚,因此便想乘机割据平、浏一带。到上高后,军队向铜鼓开动,我便到安源去找省委关系,中途被土匪将行装、路费劫去,弄了三、四天才到安源。当时安源的工会还公开存在,矿警队虽改为六军警卫团,但是其中尚有很多我们的同志负责及当兵。到后便找了安源市委,报告我的来

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 1062 页。

②宁迪卿(1892—1951),湖南湘潭人,萍乡煤矿工人。1921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中共安源地委书记。1925 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7 年 6 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8 年,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1930 年底,在汉口被捕叛变。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归案,1951 年被枪毙。

意,后由市委派宁迪卿同志向省委报告我们的情形。^①

当时湖南省委正在为秋收暴动筹备兵力而着急。湖南省委认为,“农民暴动的起来,至少(要)有一千支枪”^②。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时,即带有中央的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③。但是,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早已绕闽赣边南下,一时很难联系上。后来湖南省委又想从程潜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调陈烈、李隆光两个团来湘做暴动的发火药。到8月23日,中央告知:这两个团不能为我们所用。8月30日,正在为找不到兵力而犯愁的毛泽东得到宁迪卿送来的安源市委军事报告,喜出望外。他和省委书记彭公达认为,组织军队的条件已经具备,即于当日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事宜。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彭公达、罗章龙、谢觉哉、易礼容、宁迪卿、陈新宪等十余人。会议通过研讨后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根据湖南实际,缩小暴动区域。毛泽东在会上坚决不同意中央主张的湖南全省同时暴动的计划,主张执行缩小暴动区域的原计划。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易礼容、夏明翰等多数人的支持,最后除彭公达一人仍“主张湖南全省暴动”以外,其余与会者都“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④。

第二,会议决定将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各路革命武装合编为一个师,由毛泽东任师长,到平、浏农军中组织军队,并组织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以各路军事负责人为委员。

第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各暴动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8—119页。

②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4页。

③潘心元:《湖南各县的综合性报告》(1929年7月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5页。引文中提到的“贺、聂”是指贺龙、叶挺,“聂”系“叶”之误。

④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7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0—101页。

地区党的负责人为委员。另外,决定在岳州、安源各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派省委常委何资深“到岳州指挥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①。

安源行动委员会则负责领导安源、醴陵、浏阳、平江等地民众暴动。另派夏明翰、李六如领导平江秋收暴动。

第四,会议决定将上述秋收起义计划立即书面报告中央,并派省委书记彭公达亲自到中央口头报告计划。

会后,省委书记彭公达赴汉口向中央报告请示,毛泽东赴安源组织军队和前委,布置和指挥暴动,何资深、夏明翰、李六如等分赴岳州、平江、醴陵等地发动起义。

二、毛泽东布置株洲暴动

1927年8月30日湖南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作好去安源的准备。他先将妻子杨开慧送回老家——距长沙城区100余华里的清泰乡板仓,并要她照顾好母亲的母亲,管好3个孩子,尽量做好党的工作。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8月31日晚,毛泽东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去安源。他离开长沙时身体不太好,并随身携带了3000元活动经费,兼之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安全起见,省委决定派毛泽民护送。当时在湖南帮助省委工作的中共五届中央委员罗章龙1985年1月回忆:

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八月炎夏。他身体不太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的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个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②

到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的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也与毛泽东等随

^①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0—101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43页。

行。毛泽东离开长沙时天色已晚，湖南省委特派几名武装便衣护送他上火车。据时任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秘书长的吴化之回忆：

1927年8月底的一天，我和易礼容几个保护的人带了武器，送毛主席上火车到安源去。当时火车从东站开出，开到东站外面的扬旗下面慢慢的停下来了，主席就上了车。这时天已黑，大约是晚上九点左右。^①

火车经过数小时运行，抵达株洲车站。毛泽东下车后，很快便找到了中共株洲区委工运委员兼宣传委员朱少连，并要他将株洲区委书记陈永清找来商谈工作。朱少连是毛泽东在安源的老相识，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萍乡煤矿株洲转运局局长。所以，毛泽东与他一见面便开门见山。



株洲车站

^①吴化之回忆(1975年6月19日)，记录存安源纪念馆。吴化之是湖北汉川人，生于1901年。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安源工作，曾任安源路矿工人学校第一校教员、工人俱乐部代理文书股长等职。同年8月，代表安源团组织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惨案后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任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秋收起义时，任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没过多久,朱少连领着陈永清来了,并提来一篮饭菜,几个人边吃边谈。

陈永清也是韶山人,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他俩一见面,毛泽东就向他了解株洲党组织的情况。陈永清告诉他,马日事变后,东一区(即株洲)农村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了保存力量,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南县、华容一带,没有暴露身份的部分党员还隐蔽在乡下,最近在八叠、白关、河西等地恢复了几个支部。城区党组织还保存完好,有火车站、餐宿处、炭厂、转运局等7个支部,30多名党员。

朱少连向毛泽东介绍了城区工人纠察队和株洲团防局及铁路要害部位等情况。株洲的工人纠察队原有100多人,攻打易家湾撤退后,工人都回各自岗位,只要有人发动,随时都可以组织起来。马日事变以后,株洲团防局势力增强,现有人枪60余,局长冯福林十分反动。铁路的要害部位主要是白石港铁桥。此桥一断,粤汉铁路就无法通行。

毛泽东听了陈永清、朱少连的汇报后,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精神,分析了全国和湖南当时的形势。他说到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派他回湖南,同湖南省委一道发动全省秋收暴动。省委研究认为,根据目前湖南的情况,要发动全省暴动,不论是党的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有困难。因此,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株洲)、宁乡、岳州、平江、浏阳、安源、醴陵等湘中诸县暴动,一齐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

毛泽东接着说明,株洲党组织建立较早,工农运动的开展在全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有斗争经验,有群众基础;这里又是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安源、醴陵发起暴动会攻长沙,必经株洲。因此,一定要尽快恢复发展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暴动。株洲的任务是:第一,攻打团防局,夺取枪支弹药;第二,占领火

车站,组织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扩大政治影响;第三,炸毁白石港铁桥,破坏株洲至易家湾、株洲至白关铺的铁路,防止敌军利用铁路调兵增援;第四,配合安源、醴陵暴动队伍会攻长沙。从现在起,积极准备抓紧工作。至于具体暴动时间,听候省委的命令。

陈永清、朱少连对毛泽东所谈株洲暴动计划完全赞同并表示坚决照办,只是这里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希望能调一名有军事才能的干部来组织暴动。毛泽东问宁迪卿,安源有谁能胜任这一工作?宁迪卿推荐萍乡煤矿修理下厂党支部书记涂正楚,并说涂正楚是萍矿修理下厂工人,参加过大大罢工,又任过青年团安源地委农工部长和宣传部长,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委、团湘区委员会委员,有组织指挥才能,完全可以胜任。朱少连对涂正楚当然很了解。毛泽东当即表示,到安源后与安源市委商量,尽快将涂正楚调来,让他担任株洲区委军事委员。

这次商谈达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起身与陈永清、朱少连告别,准备去乘火车。朱少连从衣箱里拿出两套铁路工人服装和草帽,让毛泽东化装,他自己则先去车站打探一下情况。毛泽东换过服装,戴上草帽,在陈永清的引导下,穿过黑暗的道路来到餐宿处,由朱少连送上火车,前往安源。

三、毛泽东主持召开安源会议

9月1日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即在张家湾主持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布置。当时在矿警队当兵、参加了会议保卫工作的安源老工人邓文龙回忆说:

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有几天矿警队内的气氛很紧张,岗哨由一人增加到两人,而且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担任第九班班长,刘先胜担任连长。我曾经问一个姓陈的共产党员:这几天为什么都是派我们组织内的

人站岗？老陈对我说：湖南来了一个头目，叫毛委员，在张家湾召开重大秘密会议，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会议，我们等候这次会议的命令，绝不能泄密^①。



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安源会议旧址(张家湾)

会议在安源新街尾靠近农村的张家湾一所僻静的房子里举行。这所房子坐东朝西，左右两栋相连接：左边为砖木结构的四栋三间二层楼房，右边为七间平房。这里原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办工人学校第一校的校舍。当时住有外地来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战士。参加会议的有在安源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和安源行动委员会委员，安源和附近一些重要干部列席了会议。他们是：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宁迪卿、杨骏^②，中共浏

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 1053 页。

②杨骏(1905—1957)，1922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1926 年 5 月奉派到安源，任中共安源市委宣传部长、国民党安源市党部常务委员。1927 年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谋长。同年 12 月参加长沙灰日暴动。1928 年 4 月在长沙东乡被捕叛变后，任长沙铲共法院特务队、湖南省清乡督办署侦缉队队员。1950 年在茶陵被县公安局逮捕，1957 年被处死刑。

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元，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中共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副书记罗启厚^①和负责军事工作的县委常委周不论^②，护送毛泽东到安源的毛泽民等。会议的参加者潘心元 1929 年 7 月 2 日追述秋收暴动的史实时写道：1927 年“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元、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③。这就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史上著名的安源会议。



安源会议会议室内景

- ①罗启厚(1892—1931)，湖南醴陵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任醴陵全县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村农联合会”负责人。同年7月北伐军到醴陵后，曾任西一区农协委员长和中共区委书记。1927—1928年，参与领导醴陵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1931年10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不久在醴陵西乡被敌追捕时中弹负伤，在押往县城途中牺牲。
- ②周不论(1903—1930)，原名周正林，又名宗玉，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6年5月，随叶挺独立团作战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排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醴陵任县委委员兼南四区区委书记，参与领导醴陵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并创建醴陵南四区苏维埃政府。1928年4月在南京被捕。1930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 ③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7页。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他着重阐明了八七会议确定的新方针——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介绍了他自己回湘和湖南省委改组的情形以及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聂’是‘叶’之误,贺、叶指贺龙、叶挺——引者注)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元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江)、浏(阳)、醴(陵)、安(源)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①

毛泽东报告之后,与会者报告了各地军事情形和工农暴动的准备情况。潘心元报告了浏、平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以及三支部队相约开赴修水、铜鼓休整待命的情形;王新亚报告了安福、莲花、萍乡农军与袁文才、王佐所部宁冈农军以及贺敏学、贺子珍所部永新农军联合行动的经过,还谈到了安福、莲花、永新、宁冈等县经济、政治状况;蔡以忱等报告了安源工人暴动的准备和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军队情况;邓乾元报告了醴陵工农武装力量情况。

接着,会议就军事问题和工农暴动的布置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主要结论是:

第一,确定了部队的建制和名称:将驻修水、铜鼓的浏阳、平江两县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驻安源的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五县的农军,合编为1个师,下辖3个团。根据中共中央当年8月23日复湖南省委信中关于

^①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5—726页。

“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将这个师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驻修水、铜鼓的部队为第一团和第二团（后分别改为第一团和第三团），安源的部队为第三团（后改称第二团），由毛泽东任师长，王新亚等分别担任各团团长。同时确定了工农革命军军旗式样。军旗为大红色长方形，旗面左上角镶有一颗白色五角星，星上饰有镰刀、斧头图案，旗杆为白色，并竖标部队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团×营×连。

第二，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和团以上军事负责人为委员。湖南省委常委会议8月30日决定毛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①时，对各地军事情况尚不十分明了，无法确定前委委员名单，只是确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并授权毛泽东组织前敌委员会。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时，浏阳、安福农军及安源革命武装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安源，潘心元则受平、浏农军及警卫团委托来安源寻找党组织，并且暴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急需研究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既是迫切需要，又已具备条件。安源行动委员会也是8月30日在湖南省委常委会上决定成立的。它的具体成立时间和组成人员未见任何历史记载。彭公达报告提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9月5日分别向湖南省委发信报告安源会议情形，表明省委前委和安源行动委员会均已于9月5日前在安源成立。安源行动委员会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负责指挥地方暴动、配合军队作战的机构，其成员是由安源、醴陵、浏阳、平江等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

第三，确定了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计划——军队行动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县城，分三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

^①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1页。

区,然后再进攻萍乡和醴陵县城,对长沙取包围形势;攻打醴陵县城时,由醴陵县委发动醴陵农民暴动相配合,株洲区委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人后方;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平江农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两路合攻长沙。在这三路中,又以第三路,即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和卢德铭警卫团为主力军,因为这一路军事势力较为雄厚,地势较险,浏阳又紧靠长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第四,会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①

第五,确定了暴动日期: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三路一齐发动,18日进攻长沙,并要求长沙的暴动与攻城的军队相互配合。

安源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首先,安源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帮助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建立叶挺独立团,到发展工农群众武装,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直到1927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③,才使党进入彻底认识军队重要性的极端重要时期。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

①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7页。

②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③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南昌起义仍旧是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发动和组织的，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党的八七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但是这次会议主要是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②。8月18日，湖南省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湖南秋收暴动问题，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精辟发言。在讨论秋收暴动以什么名义发动时，会议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臭了，变成了军阀压迫民众的工具。“因此，湖南对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③，会议并且决定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同时并举，以期创造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些都集中地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武装斗争问题认识可能达到的高度。安源会议历史功绩之一，就在于以上述新的认识具体指导了党和群众的实践，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新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由近代产业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组成的，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群众性武装暴动中诞生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独占领导权，并且第一次公开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尽管这些特征当时还不尽完善，但这支队伍已具备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殊形式的革命军队的一切要素。它不但从实际行动上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而且预示了中国革命军队发展的方向，应当说，这是伟大战略转变中的一个最初

①《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58页。

②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③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8日），见《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5页。

信息。正如1940年5月5日《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七期一篇题为《“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部队就是由萍乡的矿工、劳动农民和革命士兵所组成起来的。这支人民的伟大劲旅，至今都是劳动大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忠实靠山”。安源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组织军队在认识上的飞跃，在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其次，安源会议开始把武装斗争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发动了工人运动，接着把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开展了武装斗争。但是，这三者的结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只是作为一种自发因素出现的，相互结合还是很松散的，常常表现出相互脱节的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三者结合的形式，并且寻找这种形式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北伐战争中，就是由于没有注意这种结合，“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①。这样，探索工人运动与其他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三者结合的形式问题，便提到了历史的议程上来了。安源会议可说是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最初尝试。八七会议第一次表明了党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意向。湖南省委会议研究了秋收暴动的军事、农民土地等问题，强调必须把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安源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开始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从而孕育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胚胎。会议主要研究军事和农民暴动问题，十分明确地把军事问题和农民问题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从而在实践上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带有很多的不自觉成分，但是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规定的，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可贵成果。

^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再次，安源会议是实现由进攻城市转入农村退却的战略转变中的重要环节。安源会议的部署，总体来看，同样是把注意力放在攻取城市(长沙)，但由于能够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会议在整体部署上萌发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思想，这就是：一方面在会攻长沙的问题上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把萍乡和安源作为战略“退路”。毛泽东在9月5日给湖南省委信中指出：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行动，决不可轻举妄动^①。会议在讨论萍乡、安源一路进军路线时，指出：暴动实现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②。这说明当时已经考虑到长沙是敌人统治势力较强的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支持，要夺取胜利是不容易的，必须作好各方面准备，尤其是退却方面的准备。这一决定，对于后来在暴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停止进攻长沙，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那么，当时为什么确定萍乡和安源作为“退路”呢？安源地处广大农村包围之中，罗霄山脉北段，不接近大中城市，产业工人众多且集中，1904年长沙起义和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安源就是重要据点。经过6年多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革命势力的基础更加雄厚。安源会议所说的“退路”，在本质上就是准备避开敌人统治势力强大的城市，向经过革命斗争洗礼的农村退却。后来部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行动的。安源会议为秋收起义部队文家市会师后沿着湘赣边界农村退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它是工农武装转移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重要环节。

安源会议这种思想的确定和产生与毛泽东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早在1927年6月中旬，他在接待到武汉的湖南干部时就指出：要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斗争，武

^①彭公达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3页。

^②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7页。

装保卫革命。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工农武装应“上山”。安源会议制定的战略计划,是毛泽东上述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最后,安源会议也是毛泽东本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从党的创立时期起,毛泽东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农民运动,当然也注意了武装斗争问题,但他从未直接组织和领导军队。他成为革命军队的统帅是从安源会议开始的。从此以后,他一直是在农村率领军队战斗,直至全国解放。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民众运动的领袖到革命军队的统帅,从在城市从事民众运动到上山进行武装斗争,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安源会议正是毛泽东后一转变的实际开端。

安源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王新亚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和王佐等在永新、宁冈一带共同战斗以及井冈山的各方面情形,对毛泽东决定带兵上井冈山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是毛泽东本人讲到的。1932年10月,毛泽东受到“左”倾机会主义排斥,在瑞金东华山养病。当时被错误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郭化若^①经常去看望他。有一天,毛泽东和他夫人贺子珍与郭化若有如下一段对话:

“你知道老毛秋收起义失败后,为什么上井冈山吗?”贺子珍问郭化若。

“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好呗。”郭化若回答。

“他是湖南人,怎么知道这里的条件好?”郭化若摇摇头。

“还是听她讲吧。”毛泽东指了指贺子珍。

“这是王新亚的功劳。他是我们永新人^②,当年带了安福的农

^①郭化若(1904—1995),福建福州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郭化若此处记忆有误。王新亚是湖南浏阳人。

民自卫军去湖南浏阳一带活动,与老毛会合了。他向老毛介绍了我们永新、安福一带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形,讲了袁文才、王佐拉起了队伍,也讲了罗霄山脉的地形情况。后来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与安源的矿工组织起义,参加老毛的队伍,成立第二团,结果失败,王新亚牺牲了。”

“秋收起义失败后,我收拢余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往何处去。”毛泽东插话说,“我想到王新亚的话很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奔井冈山来了。第一次与袁文才、王佐会面时就见到了子珍。我当时还以为她是袁文才的女儿。袁文才说她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看她好年轻,很佩服。”^①

王新亚带队伍离开永新到安源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安源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离开安源去铜鼓,王新亚则带领第二团打仗,在浏阳失散,从此两人再未见面。两人只在安源相见接触,最多不过四五天时间。所以,他向毛泽东介绍永新贺敏学、井冈山袁文才等人以及井冈山的情况,只能是安源会议期间的事。而这件事给毛泽东的印象和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秋收起义受挫后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即往何处去的问题时,首先就想到了“王新亚的话”。上井冈山以后,又向贺子珍说到这件事。对这件事,贺子珍的印象也很深刻,过了5年,又特意把这件事告诉郭化若。

^①樊昊:《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第六章

完成军队的组建,发布军事命令和起义命令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与安源行动委员会立即分别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结论,约定暴动日期;同时,按照会议决定,分头组织民众暴动和军事行动。对于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军师长毛泽东来说,这时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及其所辖3个团组建起来。9月5日,在毛泽东指导下,驻安源的各路武装队伍合编成了这个师的第三团。与此同时,毛泽东向驻修水、铜鼓的各路部队发出通告和军事命令,通告安源会议决定,命令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限时进攻长沙。安源会议已经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各部合编为第一、二两个团^①,但改编涉及队伍的调配和指挥人员的安排,只有待毛泽东到铜鼓以后才能实行。由于这两个团尚未组建好,便连带着前委和师部指挥机构也不能配齐:前委只有毛泽东和王新亚两人,师部仅有师长毛泽东一人。所以,毛泽东将通告和命令发出后,立即与潘心元一起去铜鼓,以便尽快完成军队的组建工作。正如毛泽东自己后来讲到的,他当时“奔赴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

^①哪个为第一团,哪个为第二团,迄今未见史料记载。

装之间”，即从安源去铜鼓，是“正在组织军队”^①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去铜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安源会议认为铜鼓逼近长沙，地势较为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于是决定把余洒度所部警卫团从修水调到铜鼓，同浏阳农军合在一起，作为进攻长沙的三路兵力中的主力军^②。毛泽东去铜鼓是要直接指挥整个秋收起义部队的这支主力军。不料在赴铜鼓途中，他和潘心元一起被反动派的民团抓住，幸亏机智脱险，才在军事行动前夕赶到部队，终于完成了军队的组建工作。

当毛泽东等从安源去铜鼓的时候，湖南省委接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的信，立即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各项重要决定，确定暴动日期，并于9月8日晚发布起义命令。至此，起义准备工作完成。

一、安源率先组建一个团，首举工农革命军旗帜

安源会议一结束，中共安源市委和安源行动委员会便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加紧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积极准备暴动工作。

这时，在萍乡煤矿矿警队任大队长的共产党员陈鹏企图投敌叛变。他串通与他同乡（湘乡人）的7名担任连长和排长的党员，密谋将矿警队拉往九江投靠程潜的部队。程潜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九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秋收起义前不久，他派一个名叫张品俊的人到安源收编矿警队，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陈鹏一心想升官发财，竟然同意收编，暗中邀约他的几个同乡连长排长，欲将队伍带往武汉转九江，投靠程潜部队，“说那里好，有新枪、新装备，又有饷发。这里共产党多，搞不得等等”^③。陈鹏等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6页。

②潘心元1929年7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1页。

③访问金洪喜记录（1972年1月3日），藏安源纪念馆。金洪喜是安源工人，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战士。

人的所作所为不仅直接危害到安源革命武装力量的生存，而且对整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威胁极大。于是，市委迅速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叛徒。

为了保证这一行动的顺利进行，在矿警队担任第五连连长的共产党员杨士杰奉命作了周密部署。当时在矿警队任班长的原醴陵工人纠察队队员易汉钦 1970 年 8 月回忆说：

(1927 年)8 月，全队(指矿警队——引者注)进行了改编，陈鹏任营长，杨士杰任第五连连长。陈鹏是湘乡人，所以大多数的连、排长都是由湘乡人来担任。一天晚上，杨士杰召集我们连的非湘乡人班、排长开会，让我们带好队伍，不准士兵外出，特别是湘乡人不准外出。他对我们说陈鹏准备叛变，要我们当天晚上处决他，要我去执行任务。我说：“我是新兵，没有经验，怕完不成任务。”杨士杰便带了几个人亲自去执行，布置我守住矿警一队的后门，不准任何人从后门出去。^①

9 月 4 日深夜，万籁俱寂。程昌仁^②、杨士杰等共产党员按照市委决定，手持驳壳枪，埋伏在陈鹏住宅的窗下。透过窗户，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陈鹏正在慌慌张张地收拾文件，整理行装。他已察觉到外边风声很紧，准备马上离开安源。

按照事先的约定，“狙击手在午夜十二时偷袭，从窗口对准陈鹏连打三枪，结果了这个叛徒。狙击手们又转到山上的三大队，惩处王雁。另一批狙击手也在同一时间里，在二大队击毙了其他叛徒们”^③。

杨士杰的妻子谢清英回忆，处决叛徒时，毛泽民正在安源。毛泽民 1922 年到 1925 年在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作，曾任兑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 164 页。

②程昌仁(1899—1927)，江西萍乡人。萍乡煤矿工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萍乡煤矿修理工人总代表、萍矿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九连连长等职。秋收起义部队攻打萍乡时，因积劳成疾，不治身亡。

③刘先胜：《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 128 页。

换股经理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杨士杰的妻子谢清英是朱少连的姨妹。他们和毛泽东、毛泽民都很熟悉。毛泽民这次护送哥哥到安源，就是住在杨士杰家，还同杨士杰睡一铺，所以他也过问了除叛徒的事。谢清英回忆说：

农历八月的一天，毛泽民同志到我家住，同杨士杰睡在一张床上，我与母亲住。晚上听见毛泽民对杨士杰说：“陈鹏（矿警队负责人）不肯去攻打萍乡，准备叛变，怎么办？”杨士杰说：“要想办法除掉他。”毛泽民说：“你今晚就去吗？”杨士杰立即带弟弟杨和生等人去执行。出门时约12点，到第二天三、四点才回来。我看见杨士杰衣服上尽是血，非常害怕。杨士杰说：“不要怕，我们不处决他们，他们就会杀我们的同志。”^①

到9月5日凌晨3时，陈鹏、王雁、向先发、钟义、傅子元等8名叛徒全部被处决，安源市委当即集合矿警队全体官兵，宣布他们的罪行，稳住了部队。

为了迷惑敌人，中共安源市委以曾任矿警队另一大队队长胡希圣^②的名义，向程潜和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发电报，谎称陈鹏系因压迫士兵为匪而被士兵枪杀。电报说：“九江程总指挥、南昌朱主席、长沙周主席钧鉴：属团二营营长陈鹏，压迫士兵，勾结暴徒，密图抢劫安源，登山作匪。事泄，士兵不服，于今早三时，群起反抗，致遭枪毙。职已极力镇压，业经恢复原状，安源安靖如常，谨此特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警卫团胡希圣叩。微印。”^③

处决这8名叛徒后，当天即宣布将驻安源的各路工农军和矿警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由原赣西农民

①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45页。

②胡希圣，又名胡承焯，1926年9月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派到安源，任萍乡煤矿矿警队大队长，秋收起义前夕离开安源。

③原载1927年9月14日上海《新闻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244页。引文末尾的“微”是5日的电报代日韵目。

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任团长，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在军内做党的领导工作^①，率先举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控制整个矿山。当时尚在安源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后来追述这一事件的经过时写道：

在未暴动前，安源已有五百左右徒手工人群众的组织，王新亚同志从永新带来农民自卫队一百左右枪支，安源矿警队有枪支约五百，但矿警队内面还有几个反动军官必须解决。我们力量大概如此。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由王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杀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如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②

这样，安源的起义部队便成了湘赣边界乃至全国最早使用工农革命军这一名称，首先举起工农革命军旗帜的军队。

安源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时候，并不知道驻修水、铜鼓的部队已经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及其下辖第一、第三两团的情况，因此，按照安源会议决定，将安源的部队称为第一师第三团。毛泽东到铜鼓以后，得知驻修、铜的部队改编的情况，才决定将安源部队由第三团改称第二团。

这个团是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矿警队以及萍乡、安福、莲花、醴陵、衡山五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共计 2000 余人，拥有千余支步枪和数挺机关枪。安源路矿工人踊跃参加，成为第二团的主力。中共中央特派员任弼时稍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安源“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炸弹队、梭镖队、看护

①时任安源市委委员的杨骏回忆说，蔡以忱是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的“政委”，但当时没有“政委”一职，只有党代表。蔡是否是党代表无史料记载。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报告称该团内设有“前敌军委”，似是由蔡以忱、王新亚等人组成。

②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见《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7页。按：这段文字中所载驻安源工农武装情况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又，“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亦有误；时间应是阴历十日（阳历9月5日）早上，这里所说“暴动”仅指枪毙反动官长，并非开始秋收暴动。

宣传等队内均系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①。400多名青年团员一致参加暴动。有些党员因未得到党组织通知而没能参加，“在暴动后怨恨，说没有告诉他暴动的消息”^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有大批农民、革命兵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是这个团的一个特点。

这个团采用三三建制，共有3个营、9个连、27个排。第一、二、三连为第一营，营长张友林；第四、五、六连为第二营，营长吴杰，第七、八、九连为第三营，营长王亚明。此外，团直属部队有机枪连、炸弹队(又叫爆破队)、看护队、宣传队、侦察队、武装特务班等。炸弹队由井下爆破工人组成，看护队、宣传队主要由工人家属中的青年妇女组成。团部设有军需处、军械处等机构。

部队整编后，团、营、连和团直属队均授予红色军旗，旗上缀有镰刀、铁锤和五角星图案，书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某团某营某连字样。全体官兵均系红色识别带于脖颈，并佩戴印有部队番号和本人的姓名、职务的布质胸章，并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修理厂工人架起二三十座炉子，日夜赶制梭镖马刀。井下工人用矿上的炸药雷管制造被戏称为“洋葛古”的土手榴弹。全团上下，摩拳擦掌，迎接即将到来的暴动。

二、毛泽东在安源发布军事命令，赴铜鼓组建军队途中遇险

毛泽东的通告和军事命令约9月5日在安源发出，9月7日送达铜鼓县城。苏先俊接到通告和命令后，立即转告在修水的余洒度等人。余洒度9月8日即接到苏先俊转来的通告和命令。在这之前，他们对部队的行动方向已经讨论了多次，因为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一直难有定论。余洒度的报告写道，他们8月下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后，“在未得团体（指党组

^①任弼时报告(1927年10月4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32页。

^②中共安源市委1928年6月工作报告，《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61页。

织——引者注)消息以前,我们决定在少数时日内,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不久得通城刘xx同学转来消息云:鄂中有所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①。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湖南领导秋收暴动,而平、浏农军本属湖南省委领导,并且苏先俊、余洒度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和声望,所以,苏先俊转告毛泽东的通告和命令时,特意向余洒度指出,安源会议的决定,是党的决定,不可拒绝执行。余洒度报告写道:“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及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意即党的决议——引者注),未便拒绝等语。”^②这样,修、铜两部都对毛泽东的通告和命令表示完全接受,并开始行动。但部队具体如何改编,还有待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亲临指示。

根据安源会议决定,铜鼓的部队“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渡之一团为主力”,在秋收起义的“这三路中,又以浏阳(指从铜鼓运动到浏阳的部队——引者注)为主力军”^③。由于铜鼓地处修水、安源中间,西与浏阳相邻,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是幕阜山脉南北走向的接合部和湘东赣西的天然走廊。“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④所以毛泽东计划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设在铜鼓,以便于指挥部队作战。

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指导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①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3页。

②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3页。

③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7、159页。

④《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一师第三团后,即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一道,由毛泽民、刘建中^①、周克明^②、易子义^③等人护送,去铜鼓贯彻安源会议精神,完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驻修、铜其他部队的组建,并指挥部队作战。

毛泽民是湖南省委专程派来护送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的。

刘建中和周克明是奉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派遣,专程从铜鼓赶到安源侦察敌情的。浏阳农军党支部组织委员张启龙回忆说:他俩“在安源化装成肩挑小贩,住在饭店里,不时到街上侦察敌情。有一天,他们到工人俱乐部去看报,恰好潘心元同志也来了。潘心元向刘建中、周克明使了个眼色,随即出来。刘建中和周克明跟着他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潘心元忙问他们是几时来的,是什么任务,现在部队在什么地方等等。刘建中把他带来的任务和部队当时驻地,以及平江工农义勇军等情况,都详细告诉了潘心元同志。潘心元高兴地说:‘毛委员代表党中央已经来到这里部署秋收起义,正急于找你们的队伍。你们来得正好,真是好极了。’”^④于是,党组织决定由刘建中、周克明护送毛泽东去铜鼓。

易子义是安源工人。因为毛泽东、潘心元从安源去铜鼓是化装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带有矿上的证件,所以护送的人必须对矿上的情况比较熟悉,故派易子义等人前往护送。易子义等人的公开身份是跟随安源煤矿采购员搬运货物的工人。

一路上,刘建中、周克明依然化装成肩担小贩,挑着担子走

①刘建中(1902—1935),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任浏阳县永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芦溪战斗后因病回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在肃反中被错杀。

②周克明系湖南浏阳人,曾在萍乡煤矿做工,时为浏阳农军战士。

③易子义(?—1968),湖南醴陵人,萍乡煤矿工人。1922年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年团安源地委委员。1925年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下半年在长沙善化县开展农民运动,任县农协委员长。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后,逃往安源。1928年自首变节。

④张启龙:《秋收起义前后三团活动片断》,《潘心元》第167页。

在前面引路。毛泽东、潘心元则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一副富商模样，跟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走在最后的是毛泽民、易子义等人。为了避免失去联络，刘建中和周克明每走一段路便回头看一下，见毛、潘走过来了，才继续前进。就这样跋山涉水走了两天，毛泽东、潘心元在浏阳张家坊境内遇上了敌人。

张家坊是浏阳县最东边的一个小市镇，位于两座大山之间，是从浏阳去铜鼓的必经之地。毛泽东、潘心元穿过张家坊盘山而行，在七溪坳与十余名挨户团的团丁遭遇。因为相貌和口音不同而引起团丁的怀疑，团丁要他们到附近张家坊镇上的团防局“说清楚”。潘心元急忙迎上前去，说明他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此行是去万载买夏布，并故意把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有些银元往坡下滚，他与毛泽东分头去拾，趁机跑开。潘心元为了掩护毛泽东脱险，故意往大路上跑，结果被团丁捉住。毛泽东当时往崎岖的山道上跑，刚跑几步，就被两旁茂密的荆棘缠住而被捕。

毛泽民、易子义等人见毛泽东被捕，急忙赶上前来说，并出示证件证明毛、潘确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而他们自己则是矿上派来搬运货物的工人。但是，这伙团丁蛮横无理，不但不听劝说，反而将毛泽民、易子义等人也抓起来，全部押往浏阳县团防局。直到秋收起义部队攻克浏阳县城后，毛泽民、易子义等人才获救。

刘建中、周克明过了七溪坳以后，不见毛泽东和潘心元来，便假装在那里休息，等了很久仍不见来，估计出了问题，心情很紧张，一时不知所措，赶紧跑到铜鼓县城肖家祠浏阳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团部。张启龙回忆说：

大家见他俩神色慌张，焦虑地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同志们知道路上发生的问题后，大吃一惊。大家同声叫道：“毛委员是代表中央来领导我们举行秋收起义的，如果有个差错那还了得！”一个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急做一团，有的在屋里踱来踱去，有的摸着头皮，有的

搓着手掌，紧张得简直气都快透不过来了。有人提出，光紧张不成，还要赶紧研究营救办法。有的说可能是走错了路，有的说可能毛委员发现形势有变化，又回安源去了。但大多数同志都忧虑路上出了危险。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议论到深夜，也议论不出个道道来，直急得食不甘味，睡不成眠，坐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徐麒、彭商仁、刘建中、周克明、慕容楚强和我等几个人又在肖家祠堂二层楼上继续对毛委员和潘心元同志的去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确定派慕容楚强顺着来路往高安方向寻找，如得到确实消息，就马上回来，否则就往安源去找党组织报告。同时还向铜鼓县城周围派了几路人去寻找。留下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掌握情况，以便随时采取措施。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刻，忽然门卫送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毛泽东”三个字，当时大家那种欢欣若狂的情景，实在难用言语文字形容，个个都三步并做两步跑下楼去欢迎敬爱的毛委员。毛委员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和大家点头致意。大家簇拥着毛委员，高高兴兴地走上二楼。因为光顾了高兴，竟忘了请毛委员坐，就向毛委员述说昨天刘建中、周克明同志回来报告不见毛委员和潘心元来的经过，和大家得知后急于想方设法找寻的焦急心情。当毛委员知道我们已派几路人去寻找他们时，眼望着刘建中、周克明两同志，微笑着说：“看，我们不是在这里见面了嘛！如果潘心元同志也能在此同我们一起见面，那有多好。”接着毛委员还风趣地谈了他在脱险后的情况。^①

至于当年被捕后是如何脱险的，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作了详细的叙述。他说：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

^①《潘心元》第167、168页。

之间的時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里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儘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地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達到農民武裝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兩個銅板了。^①

1927年9月8日，毛澤東安全抵達瀏陽工農義勇隊第四團隊團部——銅鼓縣城的肖家祠^②。

三、完成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9月8日毛澤東到銅鼓，聽了瀏陽農軍負責人蘇先俊等人的匯報後，才知道修水、銅鼓的4支隊伍已經被改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下轄第一、三兩個團（當時並不知道余灑度已經

^①吳黎平：《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

^②據《蘇先俊報告》載，駐紮在銅鼓的瀏陽農軍9月7日接到安源關於進攻長沙的通告。這個通告是劉建中、周克明傳送的。另據張啟龍回憶，劉建中、周克明抵銅鼓之次日，毛澤東便來到了肖家祠。

收编邱国轩部为第二团),并配备了师、团干部。安源会议计划调警卫团来铜鼓,与浏阳农军一道作为主力。但当毛泽东赶到铜鼓时,秋收起义已迫在眉睫,如果仍然按照安源会议的决定,要警卫团从修水向铜鼓方向运动,时间上来不及,这就使得铜鼓的部队无法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在铜鼓设立师部的计划就此落空。于是,毛泽东经与苏先俊等商议后,将安源会议决定加以变通:将驻修、铜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师部领导成员不变,仍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职务,而以前委书记身份指挥部队,团长和正、副师长为前委委员;修水、铜鼓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后仍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个团的领导成员亦仍旧;将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称为第二团。毛泽东后来在谈到秋收起义部队组建的结果时说:

(1927年)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

军队建制重新确立后,毛泽东即刻到第三团第五连驻地蓝家祠看望战士,逐个询问战士的姓名及生活情况。当得知有的战士患疟疾时,他拍着战士的肩膀,亲切地说:要赶紧医治,身子要紧;并叮嘱连队干部要多多关心战士。毛泽东还检查了战士们的枪支,拉开枪栓,看看擦了油没有,是否有毛病。战士们开头有些拘谨,但看到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气氛立即活跃起来,纷

^①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51—52页。

纷围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讲述坚持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等革命道理。战士们听了个个热血沸腾,无不欢欣鼓舞。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部旧址铜鼓县城肖家祠

9月10日正是中秋节,当地农民给部队送来了猪肉,担来了老酒,让自己的子弟兵“打牙祭”。当晚,皓月当空。铜鼓县城肖家祠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毛泽东和全体指战员一道进行了中秋聚餐。聚餐之前,三团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分析了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论述了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立即举行起义。毛泽东还宣布了秋收起义的军事组织系统和行动计划:前敌委员会为秋收起义部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由毛泽东任书记,余洒度、余贲民、王新亚、苏先俊等为委员^①;浏阳工农义勇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苏先俊任团长,潘心元任党代表(由于潘未到职,由徐麒^②代理),下辖3个营,第一营营长张

①卢德铭9月10日在修水的渣津回到部队后任总指挥,参加前敌委员会,为委员。

②徐麒(1903—1927),湖南浏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在家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浏阳县委青年部长。1927年4月,任浏阳工农义勇队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代理党代表。9月14日,在东门战斗中牺牲。

子清，第二营营长汤采芝，第三营营长伍中豪。全团 1000 余人。该团的行动计划是：攻取浏阳，直逼长沙。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大家情绪激昂，摩拳擦掌，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驻扎在修水的革命武装负责人余洒度 9 月 8 日接到铜鼓苏先俊转来的前敌委员会通知，告知湖南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决定调各处军队进攻长沙，参加起义的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建制和第一、三团番号及领导成员均不变，安源的部队已改为第二团，并要他立即“率部由平江进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①。当时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担任军需处长的陈树华 1982 年 12 月写的回忆录记载：

毛泽东到铜鼓后，派一个人送信来。那人做小商打扮，背着一捆草纸，是湘赣边土产的竹浆草纸，用来做爆竹烧纸钱用的，从中取出一张来，用当时通信用的隐显法浸出来的字迹，叫我们参加秋收暴动，他们第三团由浏阳攻长沙，要师部及第一团由长寿街攻平江，截断武昌至长沙的铁路，会攻长沙。字句已记不清了，但那张纸的轮廓，今天似乎还呈现在我的眼前，字数顶多有三、四行，差不多有一寸见方的字体。那种草纸横宽约五至六十公分，直长约四十公分。^②

接到草纸写的密信后，余洒度一面布置研究部队改编及其作战计划，一面命令赶制工农革命军军旗。

根据苏先俊转来的前敌委员会通告精神，余洒度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及其所属第一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及其所属第一团。“部队的编制是三三制，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师直属机关有特务连，还有副官处、参谋处、军要处、军械处、

^①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2页。

^②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7—158页。

医务处等几大处。”^①鉴于安源的工农武装已由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余洒度与师部及第一团的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二团（即邱国轩团）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工作全部完成。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修水商会

部队改编工作完成后，师部对一、四团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具体部署：由第一团团长沙文璋率第一团一、二营，第四团团长沙国轩率第四团，经长寿街向平江县城进攻，直扑粤汉铁路，切断长岳交通，配合铜鼓、安源的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

苏先俊派人送来的密信中提到“这次秋收起义一定要鲜明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②。于是，余洒度命令师部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赶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根据安源会议设定，工农革命军军旗为五角星中间加镰刀、

^①赖毅：《秋收起义在修水》，《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7页。

^②肖士太：《第一面军旗诞生记》，1997年9月出版的《京九文化报》（纪念秋收起义七十周年专号），第8版。

斧头图案。五角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陈树华等人接受任务后连夜动手制作。何长工首先画了镰刀斧头。陈树华则挥笔画五角星，可是画来画去总画不端正。何长工便找来五根等长的篾片，摆成一个规则的五角星，再用笔描画下来。杨立三用黄色蜡光纸把五角星剪下，又用黑色蜡光纸把镰刀、斧头图案剪下，然后铺开一张大红纸，把五角星贴在大红纸的中央，又将镰刀、斧头图案叠放在五角星的正中，右侧是一张白纸条，作为旗杆的涵管。图案全部摆好后，杨立三便提笔在涵管上写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几个大字。整个军旗图案简洁明快，主题鲜明突出。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

师长余洒度看了军旗图案非常满意，当即命令尽快组织人员赶制军旗，以保证起义时连以上单位都能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山城修水顿时热闹起来了。几十名裁缝师傅和当地临时组织的一些妇女，剪的剪，缝的缝，都在赶制军旗、识别带、臂章。经过昼夜加班加点，赶制了一批军旗和一些识别带、臂章等。当时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当班长的赖毅回忆说：“起义前夕，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诞生了……师部根据上级

指示,设计制作了军旗,师、团、营、连都有,只是大小有别,中间是一个黄五角星,五角星上是黑色镰刀斧头,旗杆旁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营×连’字样。每面旗子上还有一个油布套子。起义战士每人发了一条红布做的识别带。”^①

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制好后,并未公开打出。为了便于在当地收税,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仍然打着“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旗号,并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直到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开至离平江县城50华里处的马坳,才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号。当时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书记处任书记的谭政1976年11月10日回忆说:

队伍那一天起义出发记不太清楚,只记得部队开赴平江长寿街作战的那一天,是在渣津还是马坳一个有鹅卵石的干河坝里集合,由当时第一团团长钟文璋讲话,口号是打到长沙去。这时部队打起了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战士们带了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臂章。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组织下,一支以共产党的旗帜号召、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

四、湖南省委发布起义命令

9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安源会议的经过和结论,约定暴动日期。安源行动委员会当日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与毛泽东的信一起送往省委。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1927年10月8日在《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中写道:9月5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委有封同样的信),约定十一日安源

^①原件存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①。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报告安源会议经过和结论的信当日送达湖南省委，恰好省委书记彭公达也在这天从汉口回到长沙。彭公达是为着向中共中央报告暴动计划而于9月1日到达汉口的。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了湖南秋收暴动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对湖南省委制定的暴动纲领和缩小暴动区域的计划以及注重军事的做法继续表示不满和反对。中央9月5日写信给湖南省委，仍坚持要湖南实行全省暴动，不满湖南省委抛弃了湘南暴动计划，同时还批评湖南省委忽视了农民暴动的准备而偏重于军事。中央还规定“两湖的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日”^②。此外，中央再次指责湖南省委有关秋收起义纲领中关于不再打国民党旗子而要打共产党旗子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正确主张。总而言之，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指出的：“（湖南）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③对于湖南省委组织一个师的军队进攻长沙，中央是支持的，并曾根据湖南省委的请求，通过江西省委命令驻永新、修水、铜鼓的农军参加秋收暴动^④。彭公达9月5日回到长沙，接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的信后，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决议精神，审议安源会议结论，讨论暴动日期。由于暴动时间已迫近，而党的精力和经济力量有限，湖南省委来不及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全省范围的暴动，会议批准了安源会议的结论，并做了若干补充和修改：关于军队的名称和建制，决定将安源会议所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除已定的3个团之外，决定在株洲

①《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7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9月12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2页。

③《毛泽东一九三六同斯诺的谈话》，第52页。

④据中共江西省委1927年9月11日致中央信所说，此项命令未能在起义之前送达水、修、铜农军。《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7—18页。

组建1个团,列入第一师建制,命名为第四团,以朱少连为团长。关于发动的日期,决定9月9日起破坏铁路,截断敌人交通;同意安源11日发动,即安源决定组建的第一师3个团均于11日开始向各自原定目标进攻,但进攻长沙的日期由18日提前到16日。此外,省委决定组建6个直辖团、1个直辖特务营,分别在各县和长沙市内执行暴动任务。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并于9月8日晚上发布起义的命令。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安源去铜鼓,因而省委给朱少连的起义命令来不及由毛泽东转达,只能由省委直接下达。命令全文如下:

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

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

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沙朱少连^①

直辖第一团团长沙李子骥

直辖第二团团长沙滕代远

直辖第三团团长沙王扬烈

直辖第四团团长沙郭咏泉

直辖第五团团长沙谢南岭

直辖第六团团长沙袁健

直辖特务营营长沙潘福岩

湘北特派员何资深

长沙各区委

^①这个命令在9月11日以前尚未送达修水和铜鼓,驻修、铜的部队并不知道省委已决定在株洲组建一个第四团,所以把邱国轩团由第二团改称第四团。

安源行委

岳阳行委

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宁乡、衡阳各县委,株洲部委,各县县委,各特支及各同志。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

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一九二七年·九·八晚^①

省委和省行动委员会这一命令所反映的最后确定的暴动计划,后来未能完全实现:部队的名称仍是安源会议所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省委所定第一师第四团和各直属团、营未组成;实现暴动的只有安源、铜鼓、修水这3个军队的集结点和爆发点以及这3处军队战斗经过的萍乡、醴陵、湘潭(主要是东乡株洲一带)、浏阳、平江这5个县和长沙、湘阴2县,还有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这样,在8月初即开始酝酿的湖南秋收暴动,从最初想以湘南暴动为先锋、鼓动全省暴动变为计划组织湘中暴动,而计划付诸实施的结果却变成了湘赣边界的暴动。

^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28—629页。

第七章

起义开始，截断敌人交通，各地民众暴动

1927年9月9日，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命令所定“自长至岳至株铁路九日破坏”，省委行动委员会派出的破坏队分赴粤汉铁路的长岳、长株路段，破坏铁路和电讯，截断敌人交通。以此为标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省委命令“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工农革命军所辖3个团按照毛泽东从安源发出的进军命令，分别于10日晚和11日在安源、修水、铜鼓发动。

省委命令各县“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各县民众暴动实际发动的时间依次是：醴陵县10日晚集合队伍，11日凌晨发动，12日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攻克县城；长沙县郊区和乡村11日发动；湘潭县东一区和株洲火车站12日发动；浏阳县本应11日发动，与工农革命军相配合攻打县城，因第三团在东门市受挫而未成，民众暴动延至14日才发动；湘潭县东四区延至9月中旬才发动；长沙城内计划与进攻长沙的工农革命军相配合于16日发动，因省委接到毛泽东自上坪发来的放弃攻取长沙的信而于15日取消。计划内应暴动的岳州、宁乡未能发动。

起义开始的时候，起义者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据报载，当

时不仅马日事变之后的全国白色恐怖丝毫未减，而且朱培德于8月间从南昌派出两个团开往修水、铜鼓，从吉安调两个团开往萍乡；湖南省代主席周斓^①则任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为铁路警备司令和长沙卫戍司令，派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沙谭崇和第四集团军独立团团长罗定各1团，与朱培德的4个团相配合，企图堵截和围歼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起义爆发后，除上述两个团之外，周斓又命令第一师第二团团副阮某、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某团团长魏镇藩等各领所部出动镇压起义。背叛工农革命军的邱国轩团于11日袭击余洒度所部第一团后，即于9月16日受湘军暂编第七师收编，继续参与镇压起义。湖南方面除以上6个团出兵外，在全省各地出动残酷杀戮起义者的有：平浏清乡司令闫仲儒、长沙清乡大队（报载该大队有枪200余支）以及各县数不清的团防局、挨户团之类的地主武装。武汉卫戍司令、唐生智部下第八军军长李品仙派出两个团往鄂南，约湖南方面派兵赴湘北，一起镇压鄂南湘北的工农暴动，江西的朱培德从南昌加派两个团往湘赣边界与湖南反动军队相配合。驻九江的程潜部派一个叫张品俊的人到安源，将矿警队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拟于9月7日与程潜部下1个营一起，取道醴陵赴鄂参与镇压起义。总计，鄂赣两省军阀不少于6个团出兵配合湘军镇压湖南秋收暴动。

面对强大敌人的血腥镇压，起义者毫不畏惧，毅然发起进攻。但是，由于环境过于恶劣，且起义的准备十分匆忙而很不充分，破坏敌人交通未能取得预定的效果。各县民众暴动没有完全按计划实行，只有醴陵、长沙近郊和长沙乡村的暴动比较好。从总体上看，民众暴动成效甚少。

一、破坏铁路和电讯，切断敌人交通

为了顺利地夺取省城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粤汉、株萍铁

^①此时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唐生智，但唐一直带兵在外，其省政府主席一职先由张翼鹏代理，马日事变后由周斓代理。周是唐生智的老部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路的工人罢工,并破坏铁路和电讯,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之不能运兵镇压革命。这项工作本应由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①领导,但易礼容同毛泽东一样,早已被湖南当局视为“著名暴徒首领”,并为人们熟知,在街市完全不能露面,实际负责的是罗章龙。罗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他虽然是湖南浏阳人,并且原是新民学会会员,但过去一直在北方铁路总工会做领导工作,后又在中共中央做秘书兼会计,马日事变后才应毛泽东邀请回湖南帮助省委工作。他能出外活动,但对湖南的工作终究不如易礼容熟悉。由于这些原因,破坏交通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局限。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省行动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破坏铁路委员会,由罗章龙负责“组织若干队派往长岳、株萍两路分别进行破坏铁道、桥梁、水塔、电线等工作”^②。

破坏铁路所用的炸药,主要是从安源搞来的。罗章龙回忆说:“(1927年)8月间沈家大屋会议后,我专程到安源搞炸药。当时,安源是湖南省委活动区域内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交通方便,经常有人到长沙找省委联系工作。朱少连当时在安源工作,他常到株洲、长沙活动。我在安源找到了朱少连,他帮助我搞到了一些炸药,制造了一些土手榴弹,运到长沙。后来我们用这些炸药在几个地方破坏铁路,取得了部分成功,使敌人的交通受到很大影响。”^③

①易礼容(1898—1997),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并创办长沙文化书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0月至1923年初,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农民部长、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1928年脱离共产党。1934年加入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②《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4页。

③《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063页。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曾出席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党团书记。1931年1月,因从事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大学任教。1979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破坏铁路交通从9日开始，直到14日结束。据敌报披露，粤汉铁路由南至北，从易家湾、大托铺、长沙车站附近的捞刀河、猴子石、汨罗与桃林之间，直至湘鄂边境的赵李桥、羊楼司，长达二三百公里的铁路上，破坏达三四十处。在捞刀河、赵李桥、羊楼司三处破坏得比较成功，造成铁路中断较久，缴到了枪和军款等等。株萍铁路大约是为了便于安源起义军向长沙进攻，最初几天未破坏，到13日以后才开始破坏。

破坏铁路的具体情形如下：

9月9日，按照破坏铁路委员会的统一部署，长沙60余名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之间的铁路线。他们撬道钉，抬铁轨，拆枕木，一个晚上就把长岳、长株铁路弄了几个大口子。由此开始至14日，破坏铁路的工作接连不断地进行。据报载，粤汉铁路二三百公里的路段，六天之内有三四十处铁道和电线遭到破坏。起义者在捞刀河、赵李桥和羊楼司拦截火车，造成翻车，并捉拿站长，缴获枪支和军款，造成交通和通讯中断，使当局陷入混乱、恐慌之中。株萍铁路首先虽未被破坏，但沿途通讯于10日起大多被截断。

9月10日中午12时，长沙至武昌的客车开出，“行至距长沙十五里之捞刀河地方，即已遇险。因此地路轨螺旋已被农民拆去，故车头甫过，车厢翻倒四口，计稽查箱、客箱各一口，煤车二口。一时哭声震天，惊惶万状。事后经路局北站就近派队驰救，将车头开至霞凝站，未翻之车，一律开回长沙，退回车费，然已压死稽查兵一人，伤旅客五人，损失行李货物，尚无确数，湘鄂车即从此停驶”^①。

10日，湘北鄂南农军持两支驳壳枪和大批梭镖，捣毁赵李桥、羊楼司两个车站，捉拿两名站长，缴款七万元，缴获粤汉路护路队十余支枪。

^①《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1927年9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19—220页。

与此同时，株萍铁路“破坏工作及罢工均在积极进行”^①。株萍铁路是粤汉铁路支线，由株洲直通安源。“10号晚沿途电线，即被割断数处，电报不通。十一号早，大托铺与易家湾间之轨道，亦被拆毁，车遂不通。”^②

当时各车站相继向当局报告：

大托铺车站报告：据一二〇号道棚报告，易家湾站与大托铺站间二五九英里之处电杆，昨晚已被锯断一根，连倒三根，又将铁轨之螺旋及道钉数口取去。

易家湾车站报告：据株醴刘监工报称，昨晚二五七英里（处）不知何人将铁路拆毁，电杆砍断数根。现在铁路业已修复，但至此时电线尚未修通，八次列车无实信。

长沙车站报告：近日以来，职段电线数处被人毁坏，如昨晚东站距大托铺电线割断数处，正在派工修理，尚未竣工。西大站与易（家湾）站及易（家湾）与株（洲）站间之电线，先后又被人拆毁……株萍路虽未受劫车之害，但因电报不通，不知株洲以上沿途情形何似，故直至今日尚未敢通车。^③

数日之间，敌人交通中断，电报不通，消息不灵，陷入极其慌乱之中。湘鄂工农群众破坏铁路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当即命令长武、株萍铁路警备司令张国威派兵镇压长沙至株洲一段工农革命群众，并担任护路任务；命令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独立团团团长罗定派兵镇压株洲至老关一段工农革命群众，并担任护路任务。

周斓还与湖北省军政当局相勾结，对粤汉铁路湘鄂边境的工农革命群众采取联合行动。他一面命令张国威派1团兵力直

①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5页。

②《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1927年9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21、222页。

③《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载1927年9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22页。

扑羊楼司，一面致电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军事厅长叶琪、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要求他们派兵“清剿”武汉至羊楼司一带的工农革命群众。叶琪、李品仙接电后，均回电表示立即出兵。叶琪复电称：“蒲咸土匪与暴徒勾结，乘机乱动，破坏铁路电报，已由此间派队剿办。”^①李品仙复电称：“贺（龙）逆残部溃窜蒲咸间，拆毁电线，佳^②在贺胜桥劫车，车遂折回，此间已派兵分途兜剿，不日即可望恢复交通，望转告剑欧^③，对岳防注意为盼云。现在湘鄂两省正在会剿期间，被毁路轨，尚未完全修复，故直至今日，尚未通车，但决不长此停驶，一、二日必可恢复原状。”^④

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破坏和铁路工人罢工的领导，于9月11日在长沙新河召开了粤汉铁路党、团联席会议，中共中央专门派往湖南指导铁路破坏工作的特派员林育南和党、团组织负责人共十余人参加。林育南9月22日报告称：会议听取了近三天来破坏铁路情况的汇报，讨论了铁路工人罢工问题。针对工人群众中存在的畏缩犹豫情绪，经再三解释，会议“始决定积极宣传准备，同时进行破坏铁路，暗杀工贼，造成恐怖等办法”。会后，党、团组织“拟行动计划、宣传大纲、罢工宣言及口号等，粤汉方面同志不能切实在群众中宣传号召，亦不能用油印印出分散各同志以资宣传，可知宣传工作非常缺乏”。9月11日晚，“即派人去做破坏工作，但并未做到。次日破坏铁路车头及桥梁事，亦未见多大实效，前所破坏之路轨，当即修好试行通车。虽我们决定宣传阻止工人修路，因不能积极执行之故，不生效力，暗杀工贼事亦无人去干”^⑤。

9月13日，破坏铁路的工作继续进行。株萍铁路沿线的工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21页。

②“佳”为9日的电报代日韵目。

③张国威，字剑欧。1927年8月任长沙卫戍司令兼铁道警备司令。

④《共产党徒破坏湘鄂株萍铁路交通经过》，1927年9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21、222页。

⑤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5、56页。

农革命群众烧毁白关铺至株洲之间一座5米长的桥梁，造成株萍铁路交通中断。是日下午3时，工农群众又炸毁了长沙至大托铺之间、靳江河对岸猴子石附近一座铁桥，造成粤汉铁路交通中断。

9月“十二、十三等日，湘政府一面严厉镇压及戒备长沙，一面极力修复电线路轨，通行军车（长株、长岳两路军车均通行），遣兵调将，进攻醴陵、安源及浏阳、平江方面之农军”^①。省委行动委员会“决定宣传并阻止工人不去修路，同志们慑于严重之压迫，不能努力切实执行，亦未做到。全体罢工之事更不能行”^②。尽管工农群众的一系列暴动造成了粤汉、株萍铁路交通中断，对阻止敌人利用铁路运兵镇压工农革命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敌人的重兵保护下，被破坏的铁路、电线很快得到修复。彭公达报告记载：“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继续破坏（铁路）的工作，用炸药炸桥，执行三次均无效。至十五日长岳路通车……”^③又据1927年9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14号湘鄂车已开试行车一次，由长沙直达岳州，今日（15日）长岳段，即开行客车，岳州至武昌一段，因蒲咸一带共党军尚未肃清，通车有待时间，株萍车亦于14号开试行车x次，由长沙直达醴陵，今日长醴段开始售票。”^④

实际上，破坏铁路的工作没有达到原先计划的“尽量破坏，达到长期不能通行的目的”^⑤。林育南9月22日报告说：“此时湘政府已知道我们暴动的计划，极力镇压防备，连日破获机关，枪毙同志，我们的行动极其困难。”^⑥9月14日，行动委员会获悉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停止了破坏铁路的工作。专

①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5、56页。

②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7页。

③《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9页。

④《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16页。

⑤《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9页。

⑥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5页。

程赴长沙来领导铁路破坏和铁路工人罢工的中央特派员林育南亦于9月16日离开长沙。6天以后，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此次赴湘的经过。报告在谈到此次破坏铁路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此次的失败是因为：一、负责人指挥此次暴动不坚决不敏捷，有观望期待的心理；二、党的组织及机关不合于紧急斗争的需要（如彼此不接头、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等）；三、对群众的宣传太缺乏；四、军事的准备太薄弱（如器械的缺乏、破坏工作不好、武装人员缺少等）。”^①

二、长沙城区及其近郊民众暴动

长沙是湖南省委确定的湘中暴动区域的中心。9月5日，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从安源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求长沙的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相互配合，不要轻举妄动。省委接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的来信后，为了配合工农革命军的行动，对长沙及湘中各县的暴动作了如下部署：严令各县农民于9月11日以前发动，各县能集中20支枪者即组织游击营；令湘潭、长沙各地游击营围剿各镇乡团防枪支，鼓动农民暴动，并尽力援助株洲，扰乱敌人后方，围剿长醴间之敌，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各路部队及湘中各县起义农民队伍进至距长沙六七十里的地方时，即在长沙市内发动起义，响应工农革命军及长沙附近各县起义农民对长沙的会攻，里应外合夺取省城长沙。

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湖南反动当局对共产党领导的秋收暴动早有察觉。他们将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调回湖南，任命该师师长张国威为长沙警备司令兼长武、株萍铁路警备司令，加强了对长沙及铁路交通的安全控制。自8月下旬开始，他们对长沙实行长时间的戒严，组织城乡挨户团，多次实行全城挨户清查。旅馆更是反动派经常突然搜查之所，邮件非经检查不准投送。在反动派种种严密反共措施之下，党的地下机关屡遭破

^①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7、58页。

坏。特别是8月底,长沙警备司令部在大官园安乐旅馆搜出6本共产党员名册,并按名册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57名,使党准备参加长沙暴动的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尽管敌人对共产党的活动严加防范和严密搜查,但共产党在长沙的秘密革命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为了配合工农革命军进攻长沙,长沙城内共产党员先后在湖南黑铝炼厂、湖南造币厂(即铜钱局)、湖南第一纱厂(即裕湘纱厂)、湖南电灯公司、长沙泥木工会等地组织近千工人,并配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准备在工农革命军临近长沙时实行武装暴动。当时在长沙城内领导暴动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罗章龙回忆:“我们留在长沙后方的任务,是我们的部队打萍、浏、平、醴后,围攻长沙时,来个城市暴动,里应外合,占领长沙。有一次,在长沙不远的地方,有一辆敌人的兵车要开动,我们为了配合前方作战,派了一个小队去破坏路基。兵车开过来时,还炸了一颗炸弹,搞得敌人很紧张,车子几个钟头没有开出去。还有一次是长沙反动派在教育会坪召开了一次大会,发传单,写标语,大骂共产党。我们去了几个人,当他们开会时,有一个同志拿一条毛巾提了一个手榴弹,往主席台上一扔,虽然没有打响,但把他们都吓散了。”^①

当时长沙城内,敌人势力非常强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暴动队伍却十分弱小。据任弼时报告记载:“长沙城内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支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格,四郊农民又未发动,城内我们只有千余炸弹(因三分之二已用去炸铁路),且只半数能用(其他因使用不便,现正改造),另盒子炮二十支,能起来参加暴动的群众连同志共计只有千人左右。”^②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城内暴动,只能是以卵击石。毛泽东离开长沙之前,已与罗章龙有约定,即只有在工农革命军逼近长沙城时,长沙城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43页。

②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82页。

内暴动才能开始。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前方、后方的作战部署。他对我说：把浏阳打下来，就向长沙进军，部队打到离长沙只有四十里的黄花时，我就派人送信给你们；再往前打，就是离长沙十多里的东屯渡。这时，你们就动员近郊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居民暴动响应。”^①根据这一部署，行动委员会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收集整编长沙附近零散武装，拟在省城组建工人一团，近郊组建农民两团，并确定了直辖各团的团长：直辖第一团团团长李子骥（湖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直辖第二团团团长滕代远（长沙郊区农协委员长）；直辖第三团团团长王扬烈（黄埔学生、长岳宣传队书记）；直辖第四团团团长郭咏泉（湘潭工农武装负责人）；直辖第五团团团长谢南岭（宁乡工农武装负责人）；直辖特务营营长潘福岩（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后来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湖南省行动委员会在长沙和近郊组建直辖各团的计划落空，加上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的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亦未能逼近省城，因此，长沙城内的暴动最终未能发动。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总结长沙暴动的经验教训时认为，“长沙的暴动十三日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十三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起了绝大的恐慌。浏、平亦在发展很广大的争斗中。长沙此时起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②。其实，彭公达的看法未必正确。在敌强我弱、无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仓促发动暴动，显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其结果仅仅是“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这样做只能是得不偿失。

相比之下，长沙近郊的农民暴动却组织得比较好。“此次长沙的暴动开始，近郊农民被鼓动能来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长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43页。

^②《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1页。

沙暴动这是一支主力军。”^①

遵照湖南省委、省行动委员会9月8日晚发布的起义命令，“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十一日暴[发]动，分河西、河东两方面进行”。彭公达报告写道：“关于河东方面由长沙县委书记殷xx同志指挥。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土豪劣绅二、三人。但杀土豪劣绅平分地主土地的革命等事，殷同志不敢坚决的执行。河西方面为长(沙)县(委)农民部长余xx同志领导。解散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长沙河东、河西两方面共解散了七个团防局，但是农民并没有起来，其原因并不是农民不需要革命、不要土地，实际是领导的人没有决心，没有坚决的在党的政策之下拼命去干。结果只做得片面的解散团防局的军事行动，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即消灭了。”^②

在长沙城外附近的万寿、九峰、尊阳、麓山等乡镇，各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27年9月25日上海《申报》报道：“长沙城外附近各乡暴徒，连日亦蜂起滋事，响应共军。如万寿乡黄花市，则有暴徒四五百人，在金鼎山盘踞，有枪数十支，余系梭镖，扯起农军旗帜，大肆劫掠。距城五里九峰镇的地方，亦有暴徒百余人，枪数十支，于十五日晚出没于浏阳门外，大有乘机扑城之势。尊阳乡花古园亦有暴徒二三百人啸聚，集中开会，倡言共产。麓山镇则啸聚更多，计有七八百人，有枪二三百支，在附近各地勒捐索饷，收没团枪，势甚猖獗。”^③

9月16日，九峰农军攻打九峰区团防局时，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镇压，十余名农军当场被打死，另两名农民被捕后就地枪杀，农军队伍被打散。“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争斗的勇

①《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1页。

②《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0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94页。

气几乎消灭，号称近郊农民领袖的滕××同志，在农民中亦拒绝其居住，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①

在长沙城内，“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被消灭，因反动政府严厉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大部分工人领袖，均在要捕之列，工人运动亦因之受了许多挫折，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②。特别是湖南省委军事部机要员陈采夫叛变，充当敌人奸细，致使“所有机关负责人及暴动计划全被敌人知道”^③。敌人发觉共产党准备在中秋节实行长沙暴动的计划后，采取了特别戒严措施，到处追捕起义领导人和革命分子。在长沙组织和实施起义的人员被迫四处逃散。湖南省委、工委、农委、军委负责人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行动不一致，活动非常困难。中秋节前夕，由共产党掌握、驻扎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国民党某军第二师教导团补充第三营被敌人解散，该营连长、共产党员苏毅被捕，营长被迫逃走。长沙暴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9月13日以后，萍乡、醴陵、浏阳、平江迭传不利消息。从修水出发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11日在平江金坪遭叛变的邱国轩团袭击。从铜鼓出发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亦于14日在浏阳的东门市受挫。从安源出发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占领醴陵县城后，遇张国威率众来攻，只好在14日夜退出醴陵，经老关转攻浏阳。加上长沙近郊的农民暴动已经溃散，长沙暴动已不可能。14日，毛泽东率在东门市受挫的第三团到达上坪时，得知第一团亦遭重大损失，而第二团音信不通，于是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写信通知省委，停止长沙暴动。15日，湖南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停止了原计划于16日举行的长沙暴动，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牺牲和消耗。

①《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1页。引文内“滕××”指滕代远。

②《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1页。

③林育南报告(1927年9月22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7页。

湖南省委停止9月16日长沙暴动的决策是正确的。正如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所指出的：“到十六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的恐慌已经很少了，并且反动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的，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省委因此将其停止了。”^①

三、醴陵暴动

安源会议确定醴陵暴动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相互配合，作为进攻长沙的第一路。醴陵暴动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发动最广泛、最成功的一个县。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邓乾元、孙筱山、易足三、潘疆爪等人。

邓乾元是湖南叙浦人，生于1904年。1924年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以后，他曾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长、湘赣特委书记、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红五军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红八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红十六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9月因肃反扩大化在瑞金被错杀。他是于当年8月起义前夕才从湘西的汉寿县委书记任上调到醴陵任县委书记的。人疏地生，对他领导暴动非常不利，但有孙筱山、易足三、潘疆爪参与领导，所以醴陵暴动十分成功。

孙筱山、易足三、潘疆爪都是醴陵很有名望的工农运动领袖，后来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孙筱山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891年。当过李立三、李味农的老师，在当地颇有影响。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醴陵地委委员、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他曾陪同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了他。长沙马日事变后工农武装攻打长沙，他是萍、醴农军的领导人之一。1928年

^①《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21页。

4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醴陵状元洲。

易足三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899年。1923年在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派从安源回到醴陵工作，建立了醴陵县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共支部。同年10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随北伐军回醴陵，任县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是湖南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马日事变后，参与领导醴陵工农武装攻打长沙。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孙筱山

潘疆爪是湖南醴陵人，生于1894年。原是醴陵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1927年3月当选为醴陵县长。长沙马日事变后，参与领导醴陵工农武装攻打长沙。7月，面对大革命失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醴陵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



潘疆爪

醴陵的秋收暴动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9月初，邓乾元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安源会议后，连夜赶回醴陵，传达会议精神，部署了五项工作任务：一、迅速扩大党组织，凡有条件的地方应立即建立或恢复区委；二、尽快建立革命武装，搜集并夺取武器；三、侦察敌情，掌握县城和各区清乡队、挨户团的兵力情况；四、挑选100名不怕牺牲的青壮年组织敢死队，作为攻城内应的主力；五、确定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作为暴动中镇压的对象。

安源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给全体党员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项暴动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首先，抓紧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醴陵暴动前，全县共15个

区,有13个区恢复了区委,恢复和新建近百个支部,新发展党员600余名,加上原有的500名,醴陵党员共计1100余名。为了加强领导,对部分区委书记做了调整。

其次,搜集了一批武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共收集步枪30余支,机枪一挺,手枪7支,“洋葛古”炸弹300枚(由安源支援),梭镖700余支。

其三,摸清了敌情。县城及郊区驻扎反动武装1000余人枪。其中挨户团200人,120支步枪只有80支能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1个营分驻县城2个连、阳三石1个连、老关1个排;第八军一师张毅中营700余人分驻城东崇德堂与城郊。这些部队互不统属,难于统一指挥。

其四,组建了一批暴动队。近百个暴动队分布在全县东、西、南、北4个区,共2000余人。另外,还挑选了80名精兵强将组成敢死队,并有30名敢死队员潜入县城活动。

9月9日上午,邓乾元接到省委、省行动委员会的命令,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方案:一是迅速通知各区委按照省委、省行动委员会的命令,务必在9月10日(中秋节)夜集中暴动队伍,听候命令,9月11日凌晨暴动,开展“一夜光”行动,捕杀当地主要清乡反共头目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二是由易足三、孙筱山负责组织城区敢死队与城郊暴动队,迎接从安源出发前来攻打醴陵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三是由潘疆爪负责指挥密捕清乡司令彭承美押解至泗汾。会后各司其职,立即行动。

暴动之前,醴陵县委早已与潜伏在张国威部队的一名共产党员取得联系,让他以回乡探亲为名,接近彭承美,常邀彭打牌。9月9日夜,这位秘密共产党员和往常一样,邀彭去西门泗洲寺其姘妇家打牌,并有意让彭赢了不少钱,然后提议去淶江餐馆吃夜宵。彭满口答应,搂着姘妇前往。刚到淶江桥头,就被埋伏在那里的敢死队抓获,用毛巾堵住嘴巴,准备押往泗汾公

审后处决。彭拼死赖着不走，敢死队便将这个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清乡司令”用绳索勒死，陈尸于淶江桥上，从而拉开了醴陵秋收暴动的序幕。

9月11日晚，醴陵县委、各区委组织农民，在东、西、南、北四乡全面开展“一夜光”行动，镇压土豪劣绅与清乡反共的反动分子。北二区的唐步周父子和刘先岩父子，南三区的丁燕池、刘余生，三星里的易萃轩等反动豪绅均被镇压。据邓乾元1927年9月《对于醴陵暴动经过的报告》记载：“乡村暴动实在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四乡同时发动。西乡焚烧豪绅房屋一栋，杀豪绅二名，挨户团局主任闻风先遁（挨户团局主任私人家有枪十余支）。农民集三十人围攻三小时未下，一农友奋勇刀砍敌门，首先被户内伏敌枪杀，于是农民稍退却，而荣某乘机遁去。南乡烧豪绅房屋二栋，杀土豪三名、劣绅二名、罗团连长一名。罗团第二天（安源军进城那天），派军队围攻农民，农民与之战半日一晚，以未得县方救援，终败窜北。二团焚屋一栋，杀一名。东二区（老关附近）一带围罗定驻军一排。”^①

9月12日下午3时，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乘火车抵达醴陵阳三石，与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由易足三等组织的醴陵农民暴动队会合。第二团团团长王新亚根据易足三提供的情报，迅速部署攻打县城。

攻城战斗打响后，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醴陵县区工人支部书记王鹿鸣等替工农革命军带路，潜入城内的敢死队冲进监狱，救出了300多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醴陵县城攻克后，四乡暴动农民纷纷涌入城内，分享革命胜利的喜悦。中共醴陵县委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共同组建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并恢复了工会、农会、商会等革命群众团体。

^①《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90页。

四、湘潭暴动

湘潭暴动先后在该县境内的两个地方举行：一是湘潭县东一区和株洲火车站一起暴动；一是湘潭县东四区淦田等地的暴动。

安源会议将这里的暴动与醴陵暴动相联系，作为进攻长沙的第一路。株洲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朱少连、陈永清、涂正楚等人。朱少连是湖南衡阳人、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路局主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三大和五大代表、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驻湘委员。秋收起义时，任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株洲暴动领导人朱少连

陈永清是湖南湘潭人。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湘潭县委委员兼第一区（即株洲）委员会书记、第一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涂正楚是湖南长沙人。1922年在长沙一家兵工厂做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萍乡煤矿修理厂做工。曾任青年团安源地委农工部长、宣传部长，出席过青年团三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11月，任青年团湘区委员会委员、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到株洲时，根据陈永清的请求，安源市委派涂正楚到株洲参与领导暴动。当时他是萍矿总工会执行委员、国民党安源市党部委员。

湘潭县株洲区（即东一区）是湘东水陆交通枢纽。株萍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江航运线在这里交汇。毛泽东对这个地区在秋收暴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他9月初从长沙赴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时，特意在株洲下火车布置株洲暴动。之后，中共株洲区委负责

人陈永清、朱少连连夜召集区委委员蒋长卿、株洲农民运动特派员袁德生等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商定秘密恢复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并分头找支部负责人布置任务。涂正楚9月3日携带一批“洋葛古”（土手榴弹）来到株洲，向陈永清、朱少连传达了安源会议与株洲暴动有关的决定：“要株洲区委在株洲鼓动株洲工农扰乱敌后方，又合醴陵农民暴动”^①，向长沙取包围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涂正楚担任株洲区委军事委员，负责指挥株洲暴动的军事行动。

9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株洲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以朱少连为团长。9月8日晚，朱少连在李家祠召开工人骨干和农民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区委关于举行株洲暴动的决定。他说，安源、醴陵等地的工农群众马上就要举行秋收暴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切断株萍铁路，阻止长沙守敌增援，占领火车站，与安源、醴陵工农武装会合，进攻长沙。接着，他对株洲暴动作了部署。

9月11日，夜幕降临后，按照事先的分工，涂正楚、袁德生率领白关、残梅和八叠200余名农军以及朱少连率领的近百名运煤工人陆续埋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株洲团防局后面的山里；陈永清、蒋长卿率领炭厂、餐宿处的200余名工人与宣传队隐蔽在餐宿处附近，负责破坏铁路的工人也各就各位。

12日凌晨2时，团防局传来剧烈的爆炸声。株洲暴动开始了！数百名工人、农民手持洋镐、梭镖、扁担，高呼革命口号，冲向团防局。局长冯福林在睡梦中被爆炸声和呐喊声惊醒，因为不知外面虚实，他急忙吹哨集合队伍，乘坐渡船向湘江对岸逃遁。工农群众冲进团防局，缴获12支步枪、20把刺刀。与此同时，陈永清、蒋长卿组织工人迅速占领火车站，发动宣传队在堤升街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在火车站召开有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

^①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1页。

会,宣布武装起义。天亮之后,攻打团防局的工农武装齐集火车站,欢庆暴动胜利。时任株洲区委书记的陈永清 1982 年 11 月 14 日在回忆株洲暴动的情形时说:“打团防局那晚,我们没有把它消灭,只把它打跑了,过了河,到了河西。打完团防局回来,便占领了株洲车站。当时株洲并不大,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镇子。我们打团防局……只有涂正楚有一支左轮手枪,其余都是梭镖。占领车站后,朱少连的女儿和一些青年团员在转运站搞了一些标语贴起来了,还在车站开了会,宣布占领了车站。”谈到破坏铁路的情况时,陈永清说:“株洲附近的白石港有一座铁路桥,有个餐宿处供铁路工人住宿,那里有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我们决定把铁路桥炸断,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执行。党支部开会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破坏,要根据上级的指示办事;一种意见认为不能炸断桥梁,铁桥炸坏了,工人要失业。由于意见没统一,炸桥计划没有实现。”^①

由于餐宿处负责炸白石港桥的任务没有完成,大托铺一带被破坏的铁路很快由铁路警备司令部副官何骏带领军警及时修复。国民党湖南省代主席周斓获悉株洲等地发生工农武装暴动,急调张国威部谭崇酃团的 1 个营,乘火车赶到株洲镇压。株洲工农群众武器装备较差,且孤立无援,无力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被迫分散转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未能建团。12 日傍晚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部分战士从醴陵赶到株洲附近时,株洲暴动已经失败。

除株洲暴动外,湘潭县只有淦田发动了暴动。淦田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罗学瓚^②、肖晃等人。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147 页。

②罗学瓚(1894—1930),湖南湘潭人,早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并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25 年冬,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1927 年 8 月,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1929 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同年 4 月 30 日在杭州被敌逮捕。1930 年 8 月 27 日壮烈牺牲。

1927年8月，秋收起义前不久，湖南省委调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到湘潭县委任书记，发动和领导湘潭秋收暴动，以策应会攻长沙的行动。罗学瓚等到湘潭后，首先成立了中共湘潭县委，罗学瓚任书记，肖晃等为委员。县委成立后，即派肖晃往东四区淦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肖晃到东四区后，即与区农会委员长肖光海、副委员长傅岳祥等研究了秋收起义问题，制定了起义行动计划。随后，他们分



中共湘潭县委书记罗学瓚

头发动群众，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有数十人参加的农民自卫军。9月中旬，东四区开始暴动。在肖晃、肖光海等率领下，湘潭农民自卫军联合衡山农民武装，先后3次攻打王十万和坪上文家祠堂两个团防局，毙伤敌军数名，缴枪50余支，农民自卫军发展到100多人枪。接着，肖光海率部与郭葆荪领导的一支农民武装会合，准备集中力量攻打龙凤团防局。不料，前往团防局的一名侦察员被敌察觉抓住，将其剖腹挖心。肖光海等闻讯，满腔怒火，率领队伍冲进龙凤团防局，捣毁团防局炮台，团兵溃逃。不久，起义军遭敌重兵“围剿”，伤亡较大，被迫分散转入隐蔽斗争。

五、平江、浏阳暴动

平江县位于长沙市东北方向。在安源会议确定的暴动计划中，平江暴动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相互配合，是进攻长沙的第一路。由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起义一开始便受挫，该县计划9月11日的暴动没有成功，暴动推迟至9月20日举行。

1927年9月，中共平江县委为策应合攻长沙，组织农民武装，在县城和部分乡镇举行秋收暴动。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

领导者是夏明翰、李六如、毛简青、罗纳川。

夏明翰是湖南衡阳人，生于1900年。1921年8月入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中共长沙地区执委书记、共青团湖南区执委委员、全国农协秘书长、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平(江)浏(阳)特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等职。1928年3月18日，因叛徒告密在汉口被捕，2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就地杀害。

李六如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887年。1921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部党务处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参与领导平江秋收暴动。后奉派往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执委会工作。1930年夏回国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常委兼秘书长、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副行长等职。1937年10月到延安后，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中央财经部副部长。1945年以后，任热河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毛简青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891年。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在国民党广西宣传养成所任教。1927年3月，在长沙国民党省委党校任政治教官。同年4月，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领导当地秋收暴动。1928年6月，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调上海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调湘鄂西苏区工作，不久被“左”倾错误迫害致死。

罗纳川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899年。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受中共湖南区委派遣，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赴浏阳开展农民运动，先后任浏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浏阳县委委员兼农民部长。1927年2月，与潘心元一道组建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同年5月马日事变后，率浏阳农军参加攻打长沙的战斗。8月秘密返回平江，先后任中共

平江县委宣传部长兼东乡特委书记、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主任。9月，领导平江献钟农民暴动。1928年2月，参与组建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浏(阳)游击总队，并任总队党代表。3月，任平江“三月扑城”总指挥，指挥全县数万武装攻打平江县城。不久，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同年4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6月1日英勇就义。

1927年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派夏明翰和李六如到平江发动和领导秋收暴动。当时正在汉口养病的李六如接到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密信，要他速回湖南接受任务。李六如即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的公开身份，从武汉赶到长沙，偕同省委特派员夏明翰立即赶回家乡平江献钟，按照省委的暴动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夏明翰、李六如在献钟秘密召开县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听取了县委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改组了平江县委，毛简青任书记，负责组织平江暴动。会议决定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发动工农群众，举行武装暴动。

9月初，夏明翰、李六如获悉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即将进攻平江，便派毛简青“一面派人分途赴各乡组织，并通告当时政治情形及我们的计划”^①；一面亲自赶赴离修水50华里处一个叫马坳的地方，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余贲民处接洽”^②。当得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将于9月11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时，他“早夜赶回，通告各处动作，如破坏电线、杀土豪劣绅，城内响应”^③等。后因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遭叛军邱国轩团伏击，平江的农民暴动被迫取消。

9月中旬，平江县委再次策动平江农民暴动，并成立了平江县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将全县分为5个乡，各乡

①平江报告(1927年9、10月间)，《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48页。

②平江报告(1927年9、10月间)，《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48页。

③平江报告(1927年9、10月间)，《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48页。

设立特委和暴动委员会。暴动委员会下设敢死队、烧杀队、搬运队。中共平江县委 1927 年 10 月向湖南省委汇报当地农军的武器装备情形时称：“据各乡报告总计有梭镖一千一百零□杆、快枪十二支、手枪一支、驳壳枪一支，外加城内手(榴)弹十余。”^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平江县委决定于 9 月 20 日举行秋收暴动，计划暴动队伍分 3 路同时行动，以县城善慧寺的钟声为信号，里应外合，一举攻克县城。

20 日下午，献钟、思村等地农民武装率先暴动，处决了 3 名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晚，在毛简青、罗纳川的指挥下，献钟、思村、安定等乡镇农民群众 1000 余人云集城郊，等待攻城信号。由于负责敲钟发信号的人被敌巡逻哨兵抓走，直到天将破晓，钟声仍然未响，各路暴动队伍只得自行撤退。原来守城的敌军早有准备，他们发现农军撤离，当即开枪射击。农军未经训练，不听指挥，听到枪声只顾各自逃命，已潜入县城东门李家巷的一支队伍不畏强敌，勇猛地攻入县杂税局，杀死了杂税局长。负责烧毁国民党平江县清乡司令部的工人邱康林向清乡司令部大院投了一枚手榴弹后才撤退。9 月 21 日，夏明翰、李六如、罗纳川率农民暴动队 400 余人，攻打献钟镇警察所，击毙警察头目 1 人，俘获 7 人。接着，暴动队伍又冲进杂税所，抓捕杂税所所长和经理多人，缴获 3 支步枪和一批银元。22 日，秋收暴动委员会在献钟镇的河滩上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分子，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抓获的警察、所长等反动分子全部处决。随后，暴动队袭击泰安挨户团，处死挨户团主任刘洞王等一批反动分子，缴枪 20 余支。

平江暴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当地的反革命气焰，为以后平江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浏阳县位于长沙市以东 120 公里处。浏阳暴动是安源会议

^①平江报告(1927 年 9、10 月间)，《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 149 页。

决定3路进攻长沙的第三路，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军。计划第三路工农革命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①。当时，由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已经带领农民自卫军离开浏阳，党在县内的骨干力量不强，所以没有能够及时组织力量与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相配合，只是到9月14日才在北乡组织了一次暴动。

9月14日，浏阳北乡沙市数百农民举行暴动。他们手持60余支枪和梭镖、大刀等武器，捣毁沙市团防局，并经丝竹冲向长沙高桥、学士桥方向进攻。浏阳西乡普迹农民七八百人，仅持两三支枪，其余都是梭镖，围攻并捣毁普迹挨户团，占领团防局，于14日前后攻入长沙县春华山地区。长沙县东乡各地地主豪绅极度恐慌，纷纷要求县署派兵堵击。

由于长沙地区的敌人加强了防范，沙市、普迹两地农民暴动队伍在中途遭到敌军镇压，队伍被打散。浏阳暴动最终失败。

六、岳州暴动

岳州即现岳阳，位于湖北与湖南交界处的湘北境内。“两湖农民秋收暴动，岳州是一个最重要的地域，两湖的连锁。”^②因此，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选派省委常委委员何資深^③作为湘北特派员，专程赴岳州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湘北暴动，并与鄂南暴动相联系。

何資深接受任务后，9月1日从长沙出发，2日抵达岳州，4、5两日即召集岳州县委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①潘心元：《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727页。

②何資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9页。

③何資深，又名何之瑜，毕业于北京大学。192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28年6月，作为湖南党组织代表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参加托陈取消派。抗日战争时期，受北大同学会委托，在四川江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1948年编辑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与会者听了传达“如梦初醒”，“据岳州负责同志说，已有月余没有接到湘省委的消息，现在不知到底作什么才好”^①。岳州县委负责同志向何资深汇报了岳州近期的情况。

岳州的革命势力较弱。在马日事变前，有共产党员 700 余名；马日事变后，只有 70 余名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除铁路 20 余名党员工作比较积极外，其余者都比较松散。岳州县委机构不健全，工作无计划，各种活动均未开展。“岳州的民众团体，在马日事变前就不甚好，马日事变之后更是糟透了。”^②岳州没有现成的革命武装。大革命时期县农民协会曾有的几支枪，也不知藏于何处。

岳州的反动势力较强。挨户团有三四百支枪，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9月初，挨户团大部分开往洪山乡“剿匪”，城里只留 20 余人和二三支枪。“岳州县政府与挨户团不大相容，挨户团捉暴徒就要杀，县政府主张是罚款监禁，甚至得几个贿赂就可以放出来。”“岳州驻军为八军一师二团一营，是张国威部，多半新补充之兵，没有多大的战斗力。”^③

根据上述情况，何资深向岳州县委提出了 7 条意见，并在会上获得通过。这 7 条意见主要包括：立即改组县委，吸收工农同志到县委机关；立即恢复工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并从县到乡建立相应秘密机关；建立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岳州暴动；鼓动农民暴动，杀土豪劣绅，破坏铁路电线，夺取挨户团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号召岳州车站工人立即罢工，组织铁路临时管理委员会，夺取敌人枪支，占领县城；鼓动城市中的苦力工人在街上暴动，杀反动军警官佐，放火焚烧反动派的房屋；请求省委拨给 400 元活动经费并选派 25 名农运干部等。

①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2、60页。

②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1页。

③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6、67页。

经过几天的活动，到9月10日下午，岳州暴动的准备工作仍无大的进展。县委机关除少数负责同志比较坚定外，其余的均畏缩，到了下暴动令时，多数不见面或借故出走。埋藏的枪支也未能找到，无武装响应暴动。铁路工人始终没有罢工。近郊农民等待观望，多数畏缩不前。粤汉铁路沿线的农民本可以起来，但省委没有按照岳州县委的请求，派25名农运干部来发动和组织农民，所以这一带农民亦未起来。城市苦力工人的组织工作亦未开始，甚至要组织一支20人的特务队都很困难。

尽管暴动的主观方面准备不足，但客观形势却对暴动十分有利。岳州县城只有张国威的第二团一营三四百人；挨户团去洪山“剿匪”尚未归来；市面异常恐慌，都以为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大部分商店未开门；敌军晚间不敢放哨，惧怕工人农民抢夺其枪支，县政府公安局不敢捕人等。这都是鄂南暴动成功和从修水出发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即将进攻平江、逼近岳州使然。

何资深认为，这“一切均是利于暴动的环境，只要我们稍有民众的组织或军事的实力，便不成问题的可以取得岳州”^①。因此，岳州行动委员会决定9月10日晚实施暴动，并作出如下决定：

(一)城内四处放爆竹以恐吓敌人。(二)城内苦力工人拦塞街道捉杀反动军警长官及夺取枪枝。(三)近郊农民起来整个的向城市进攻。(四)铁路工人起来毁坏车站捉杀车长，向敌人进攻，夺取武装。(五)派特务队一至城岭机破坏小铁桥，一至南津港破坏桥梁。(六)印发告兵士、工人、农民、市民、贫民等传单，至多不过二百字，意义明显而重煽动，不必同一个格式，内容也可以各个不同。(七)张贴标语，所有标语除中央规定之标语外，又定了切合岳州客观情形的标语，以最能引起群众的同情为好。(八)用中国革命委员会

^①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6页。

岳阳分会、党的岳阳县执行委员会以及岳阳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一切革命团体发表宣言和一切暴动动员命令以及张贴标语。(九)十日晚一切齐动起来。^①

9月10日,岳州暴动开始,岳州行委指挥特务队烧毁了南津港铁桥的7根枕木,带去破坏铁路的炸药未能生效。宣传队在县城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事先“决定在四城放火,没有起来,城市苦力工人、车站铁路工人以及近郊农民也没有起来,只是些同志在南津港烧了枕木七根而已。所谓十日晚间的暴动就是如此”^②。

岳州行委以为9月11日白天国民党反动派将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大清查、大搜捕。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县政府公安局、挨户团及驻军并未捕人,城区也未戒严。于是,岳州行委决定9月11日晚再次实施暴动,并号召农民起来抗租分田地,杀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反动派;铁路工人起来杀站长,自己管理路政;贫苦农民起来杀军警长官,打樵运局分盐等。

然而,9月11日晚的暴动“与十日晚间的没有两样。近郊农民没有起来,地主要他们的租谷还是照例送交,那有什么抗的勇气,铁路工人罢工始终不成,苦力贫民更是怕军警威风,哪有打樵运局分盐吃的雄心,更糟的就是特务队的组织终不能成为暴动的发号”^③。

9月12日白天,岳州的客观情形与11日白天一样,共产党的活动仍然可以在县城公开进行。因此,行动委员会决定12日晚实施第三次暴动,并部署在城区纵火、阻塞道路、抢夺挨户团枪枝、向敌营开枪等。行动委员会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加紧暴动准备,积极投入暴动。

9月12日下午,岳州形势发生剧变。驻常德的国民党军熊

①何資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6、67页。

②何資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6、67页。

③何資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69页。

震部一团兵力开至岳州，对城区实行戒严。岳州挨户团也从洪山开回县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岳州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和宣传部被敌人破坏，9名行动委员会负责人被捕。负责策动和指挥岳州暴动的湖南省委湘北特派员何资深被迫撤离。第三次岳州暴动再次流产。

岳州暴动屡遭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一、岳州过去工作无基础；二、岳州工作同志太少，一般同志甚为畏缩；三、暴动工作开始太迟，群众甚至党的同志不知道暴动的意义，而存军事暴动的用心。因此岳州暴动没有起来，并不是群众不是暴动的，也不是主持者无决心，而是接近群众的直接指挥者无办法，甚至没有人的原因。”^①

长沙及其周围各县的共产党组织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了上述暴动，有的县还举行了针对长沙的进军行动，例如，湘阴县部分地区农军向长沙进发到达了捞刀河。各地民众暴动给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了严厉打击和严重威胁，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秋收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各暴动地区队伍之间缺乏横向联系，呈孤立状态，起义地区的农民没有普遍发动，暴动准备仓促，队伍未经训练，稍受敌人压迫即自行溃散，所以这些暴动未能形成对长沙的军事包围态势。

^①何资深报告(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70页。

第八章 工农革命军向平、浏直进

按照安源会议的决定,工农革命军3个团分3路合攻长沙,驻修水的警卫团应调到铜鼓县城,与浏阳农军一起充当3路军队中的主力军。可是,当毛泽东到达铜鼓,完成军队的组建工作时,约定的军事发动时间已到,警卫团已经在修水发动,正向平江进发,来不及赶到铜鼓。这样,安源会议所制定的作战方案就未能完全实现,各路部队仍在起义前各自的驻地发动。工农革命军发动的时间,省委的起义命令规定是“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①。即命令所称“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应率领他在安源组建的军队,于11日开始向既定军事目标实施攻击。按照省委命令和安源会议决定,在修水县城的第一团应于11日攻打平江县城;在安源的第二团应于11日攻打萍乡县城,然后攻占醴陵县城和湘潭县东部的株洲镇;在铜鼓的第三团应于11日攻打浏阳县城;三路得手后,会师长沙,夺取省城。上述命令和决定执行的结果是:第一、三两团在分头开往平、浏县城途中受挫即后撤;第一团还没有遇到敌军就在金坪遭叛变的邱国轩团袭击,整理队伍后即奉毛泽东命令随第三团后撤;第三团

^①《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5页。

先后于11日和12日胜利攻占浏阳县境东部之白沙、东门市两镇,14日在东门市与敌战数小时后受挫,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取长沙的计划,传令第一团随第三团撤退。只有第二团连续攻打了3座县城:10日晚在安源发动,11日凌晨和12日两次攻打萍乡县城未克,12日和16日先后胜利攻占醴陵、浏阳两县城,但17日在浏阳城被敌包围袭击,损伤惨重,只得撤退。之后,3个团往浏阳县境东部的文家市会合。

一、师部和第一团向平江进发,在金坪遭叛军袭击

9月8日,在修水县城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接到第三团团长沙先俊从铜鼓转来毛泽东发自安源的通告和进军命令,即与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沙文璋等开会议,遵照毛泽东所发通告,决定自即日起,将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钟文璋所部第一团仍为第一团。由于安源的第三团已改称第二团,新收编的邱国轩团由第二团改称第四团。根据前敌委员会决定,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师部为师部,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沙,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余洒度、余贲民、钟文璋等均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关于作战部署,当即决定,师部和第一团分两批开拔,钟文璋率第一团第二、三两营先行,师部和第一团第一营及师直属各处各队随后;以第一团第二、三两营及新收编之邱国轩团为主力,按照苏先俊来信的约定,绕道平江县境东部的长寿街,攻取平江县城,直扑汨罗,控制粤汉铁路,截断敌人交通,与安源、铜鼓两路工农革命军相配合,攻取长沙。

9月9日上午,钟文璋率领第二、三两个营从修水县城出发,当天到达修水县境西部重镇渣津,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几个当地的土豪劣绅。第二天,钟文璋率部向渣津以西进发,以期与驻在那里的邱国轩团会合。这天早上,师部及师直属

各处各队和第一营从修水县城出发，向渣津开进，上午在途中遇到从南昌回来复命的宛希先。原来，山口会议改编后，为了以合法地位掩护这个师的存在并获得合法的给养，师部秘书宛希先奉命携带全师官兵花名册和经费预算书去南昌找朱培德，要求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收编。当时，朱培德已去南京，暂代朱管事的第三军军长王均以朱不在南昌为由相推诿，经往返交涉，王才答应收编，派副官处长为代表随宛希先来修水点编。这样，宛希先往返差不多半个月才回部队复命。此时，起义已经开始。余洒度便要宛希先告诉王均的代表：现在我们的部队已经有新的任务，我们只好各奔前程。然后请这位代表随队到渣津住了一宿，让他回南昌复命。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团部驻地龙门厂张家祠堂

当日，师部和直属各队及第一营到达渣津宿营。部队在渣津过了中秋节。当天晚上，久别的团长卢德铭孤身一人回到了部队。卢德铭和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一行三人8月11日或12日在奉新离开部队后，并没有按夏曦来信所说直接去广东找南昌起义部队，而是去了武汉。他们是想先向中共中央报告，再定去向。如果中央要他们照夏曦的意见办，就从武汉去广东，否

则仍回自己的部队，所以，行前交代余洒度把部队带到修水休整，以便从武汉返回部队。到武汉以后，没有找到中央，却见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向警予把他们的情况报告省委后，代表省委同他们谈话，传达了八七会议决定和中央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告诉他们：湖北省委坚决否定夏曦要他们离开警卫团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指示他们立即回到自己的部队，以警卫团为基础，把湖南、湖北的武装农民集合起来，进行训练；建立一个指挥部，以卢德铭为总指挥，领导秋收暴动。省委并拨给他们3000元现金，派六七个干部和他们一道工作。就这样，他们离开武汉，长途跋涉向修水奔来。此时，鄂南秋收暴动也于9月9日开始，鄂南7县共有10余万农民参加这次暴动。卢德铭等回修水正通过鄂南秋收暴动的中心地带。在崇阳大沙坪遇上地主武装民团阻挠搜查，走在最前面的辛焕文与敌周旋，不幸牺牲，走在中间的韩浚被捕，从此脱离警卫团。卢德铭走在最后幸得脱险，由当地农民掩护和护送，长途奔波，终于在渣津回到了部队。按照湖北省委的指示和决定，卢德铭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并按湖南省委的有关规定，参加前敌委员会，为委员。

9月10日早上，师部和第一营到达渣津之前，钟文璋带领第二营和第三营离开渣津，向西进发，按既定部署去与邱国轩部会合。行前，钟文璋要军需处长陈毅安把县城挑来的装好银元的十几担子弹箱继续让人挑着随他前进。本来，离修水县城的时候，参谋处长陈树华已经提醒他，不要把这么多现洋挑到前头去，但好大喜功的钟文璋不听，还洋洋得意地说，挑着这些子弹箱跟部队走威武一点。陈树华进一步挑明：“邱国轩是走投无路才归附的，彼此不了解，你应小心观察。”钟文璋还是听不进，自负地说：“知道！知道！”他认为邱国轩已经无路可走，决不敢有二心。其实，这几天，邱国轩已在暗中与国民党的第八军联络，图谋危害余洒度所部。正如陈树华所料，邱国轩不仅是走投无路才归

附,而且是因为警卫团和平江农军联手在修水县城打惨了他,杀了他一个营长悬头示众,心怀极大仇恨,乘余洒度想收编他的部队以扩大实力之机,假意归附以伺机向余部下手。他在余洒度部队内部布插了内线,随时了解余部的动态,第一团用子弹箱装银元,他也很快就知道了。

9月10日上午,钟文璋率领部队离开渣津不远,就与邱国轩团会合,两支部队一起行军,走了三四十华里,到一个叫司门口的地方宿营。邱国轩看到钟文璋的部队果然挑了十几担装满银元的子弹箱子,还有大量军服和其他军需品,暗自高兴,连夜设计动手。晚上安营以后,邱国轩团戒备森严,而第一团的警戒却毫无战时气氛。钟文璋到邱国轩宿营地来来往往,毫无戒备,也毫无觉察。第二天一早,两个团一起开拔,邱团在前,钟文璋部队在后。快到离长寿街约15华里的金坪镇时,邱国轩向钟文璋谎称前面有敌情,钟文璋听后竟不假思索地说:“让我来!”随即将大小行李、全部辎重,包括十几担银元安排在后方的村落,要邱国轩团部署在两翼,自己带着第二、三两个营走中间,吩咐部队“上刺刀,不准装子弹,向前冲!”钟文璋亲自带领两个营向邱国轩所指有敌情的地方边喊边冲,邱国轩却指挥他的部队从后面两翼袭击钟文璋部队,顿时枪声大作。冲在最前面的钟文璋所部第三营听到枪声,以为前面有敌军,立即向前冲过一条河,占领了对岸的山头,才发现前面并没有敌军,枪声来自后面。返回来,才知道是邱国轩团袭击第二营,于是与邱团激战。当时,师部和第一营在离金坪30多华里的龙门厂,无法接应。这次失事,第二营伤亡惨重,全被冲散,第三营损失也不少,营长金文生失踪,第九连连长黄瓚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杨立三回忆说,他刚调到师部任副官才3天,他所在的第三营1个连只剩下30多人。留在村庄的10多担银元和辎重及大小行李全被邱国轩掳去。钟文璋见状,自知责任重大,号啕大哭,说对不起师长,剃头化装逃跑,不知所终。

事变后,师部带领直属各队和第一营火速赶到金坪,但为时已晚,只得立即设法收集被打散的部队,开到长寿街大道以南山区一座叫杨梅尖的村庄。清点人数,损失 200 多人枪。整理队伍,全团 3 个营只剩下两个营。当地农民与余贲民和他率领的农军早就熟悉,欢迎部队如家人,竭尽全力给予帮助。部队稍事整理,即进行战术演练,准备攻打长寿街。但一两天后即得知有敌军从背后插来,卢德铭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寿街,带队伍连夜爬山越岭,退向平浏边界。陈树华回忆到当时的情形时说:收集部队后,“把师部移到龙门厂以南约十公里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约有几十亩耕地的场坝,名字似乎叫杨梅尖。估计是在黄金洞附近,副师长余贲民很熟悉”,很快就把部队招集到那个地方,第二天即在那里进行攻打长寿街的演习。“当我们去场坝演习时,有一位战士向我检举一个很标致的小伙子说:‘他是坏人!’恰好卢德铭来了,就把那人带到房子里审讯,从他身上搜出邱国轩的名片,原来他是邱国轩派来勾引我们战士的。我和陈浩带部队模拟演习完毕后,进房子去找水喝。只见卢德铭对那人说:‘好!你既然思想动摇,那就请值价一点。’随即令警卫员把那个人(原来是个指导员)抓去,牵到没十丈远的地方枪毙了。枪声响后,我刚出门口,只见卢德铭吹口哨:‘全部集合马上出发!’我为之一惊,不知什么缘故,便问:‘不是准备得好好的攻长寿街吗?’他轻轻地对我耳边说:‘敌人已插到我们后面来了!’”^①后来,获悉敌部队已插到我们的后方,攻打长寿街对部队非常不利,总指挥卢德铭当机立断,率部队向平浏边界靠拢^②。

金坪事件,对整个起义队伍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起义的 3 路军事行动,只有从修水县城出发的这一路,还没有遇到敌军、没有与敌军交手就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失败,不是败于与敌军作战,而是败于起义队伍内部叛军的袭击。这件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160 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159—60 页。

事,暴露出师部和第一团指挥者的致命弱点——骄兵观念。

前已说到,师部和第一团的主体是原警卫团,而警卫团是从被誉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抽出1个营扩编而成的,各级指挥员中有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生,武器装备也不错。杨立三回忆说:他所在的第三营,从武汉出发时,“尚未全部武装起来,每连只有二十三支用作新兵操练的不大好的步枪”^①。但到达修水时,装备便齐全了。赖毅回忆说:“驻扎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武器装备是齐全的,战士使用的全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各营、连还配备有轻重机枪。”^②但是,这个团也有明显的劣势,一是组建的时间短,还没有完全形成集团战斗力;二是3个营有两个营基本上是由新兵(陆继续招募的工人农民、各地工会、农会和党的干部以及团校学生等)组成,政治上是优秀的,但军事素质还远不能适应战争。赖毅回忆说:“在修水我记得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因为部队包括武汉警卫团和各县工农义勇军军事素质较差。”^③在这种情况下,余洒度等人为了保存部队,服从江西省委的决定,放下身段,去求朱培德以江西省防军名义改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把“铁军”荣誉和黄埔名牌这种优势变成了自己的包袱,看不到自己部队的弱点,而且把所有敌军都不放在眼下。正如陈树华后来回忆所说:“按我们当时的看法,在湘赣边境地区,根本没有足够与我们为敌的力量,唐生智的主力还在东征前线,湖南内部是空虚的,会攻长沙,如探囊取物。”^④其实,当时湖南并不是空虚,至少有5个团的部分兵力,鄂赣两省也已出动五六个团。对唐生智、朱培德的部队尚且如此轻视,对像邱国轩这样的旧军阀部队的残部更是不看在眼里。而且,警卫团8月间到修水时,和平江农民联手一击,邱国轩团就大败而逃,邱团的实力简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1页。

②《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7页。

③《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6页。

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9页。

直不值一提。明知邱团迹近土匪,且对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心怀仇恨急欲报复,本不应收编,却轻信邱团假装诚意,予以收编。张宗逊回忆说,卢德铭回部队后,批评了这件事。卢说邱国轩部“是一支土匪队伍,不应该收编他”^①。问题还在于收编以后,让这个团驻在原地,不加改编,原封不动,由他们自由行动,毫不提防。这些正是骄兵观念的表现。更加荒唐的是,钟文璋与邱团一起行军宿营,自己部队的内情早已在邱团的掌握之中。他却在有人提醒之后,仍然对邱团毫不疑心,更不戒备,认为邱团已无路可走而不敢有二心,以致自动掉进邱国轩设计的陷阱而完全没有知觉。当邱国轩谎报敌情时,他竟然要自己的部队“上刺刀,不准装子弹”朝邱国轩设好的布袋猛冲。骄兵观念已达到如此愚蠢的程度,还能有救?由这种骄傲自大已达极点的人指挥部队去攻浏阳、攻长沙,岂非开玩笑!

金坪事件之后,余洒度似乎还没有警醒过来。部队从杨梅尖开出来以后,他看到长寿街有敌军不利于攻打,便想绕过长寿街带队伍去打浏阳县城。幸亏这时毛泽东来信要第一团跟在第三团后面撤退,而当时一则由于老上级卢德铭在边,二则在党组织面前终究不敢妄为,虽然是“不得已”,但终究服从了毛泽东的命令,率队跟着第三团后撤,才保住了这支部队。关于这一情节,余洒度自己稍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第一团整理后,即绕道进攻浏阳,方至其界,闻三团不利,决心援助该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度因情况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②

二、第二团连攻三座县城,在浏阳损伤惨重

在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按照省委的起义

^①张宗逊:《回忆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1983年10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1页。

^②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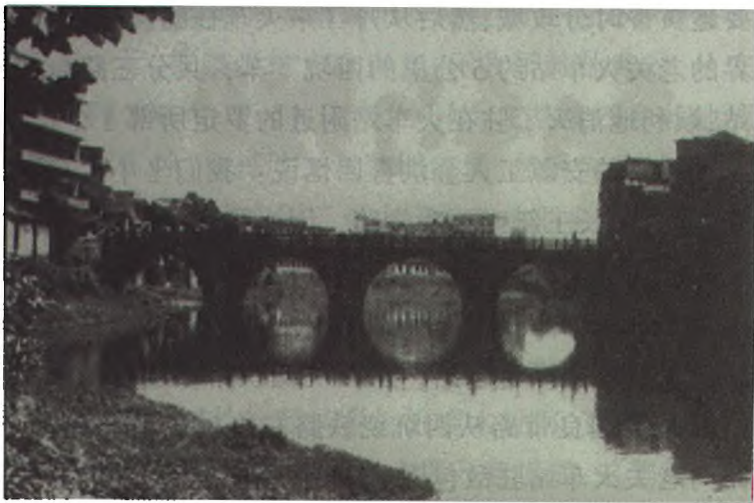
命令,10日晚上在安源张公祠前集合队伍,11日凌晨向萍乡县城发起攻击。



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出发地安源张公祠

萍乡县城距安源仅6公里,扼湘东赣西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城内只有守敌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第三营长江保定的1个营,但要攻克并非易事。因为四周都是城墙,有5道城门,北、东、南三门均被萍水环绕,各有桥通城外,只有大西门和小西门是陆路出入。第二团计划是先派爆破队潜入城内,与攻城部队里应外合。9月10日晚上,由60多名井下爆破工人组成爆破队,分成两路,一路在天黑前从南门和东门潜入城内,一路埋伏在东门外小山上,伺机攻城。时任爆破队副队长的王耀南回忆说:“这天正值中秋节,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正式宣布起义,晚上受领了攻打萍乡的命令,我们二团爆破队三个小分队,分成两路,三小队由杨明同志带领,经三合桥绕到萍乡城西南面。一、二小队由我带领,经花冲、古庙,于次日拂晓前进到萍乡城东的小山上。我们原来计划,如果城门关着,就用炸药包炸开城门;如果城门已开,就混进城内,用‘洋薑古’同敌人斗,并守候好城门,等大部队进城,全力歼灭敌人。我们一、二两个小队,隐蔽进到城东的小山上,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突然城楼上响起了炮声,原来杨明同志带领的一小队已经

混进城内。但敌人早有防范,并增加了兵力,敌人用枪猛打,爆破队抵挡不住,攻城的主力部队又未赶上来,结果只好退出来。由于过早暴露了攻城的意图,我们一、二小队也失去了偷袭的机会。”^①9月11日凌晨,第二团团团长王新亚率领部队及临时用



萍乡县城东门桥

梭镖、大刀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共 2000 多人,从安源出发分两路到达萍乡城外围山地,天明发起攻击。由于爆破队过早暴露,敌军加强了防守,起义军无法进城。战士们只好用自制的松树炮轰击城墙,顿时烟雾冲天,但城墙无一处倒塌。王新亚见状,一面命令炮手向敌人轰炸,一面组织战士竖起云梯爬城墙。几次都被敌人火力挡住。此时部队伤亡很大,但起义军官兵仍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第二团五连连长杨士杰受重伤,鲜血直流,也不下火线。战至傍晚,部队仍未攻进城去,只好退回安源。次日早晨,再次攻城。王新亚指挥部队分别在几处同时发起数次攻击,都未奏效。经查明,原来敌方在头天从宜春调来兵力增援,导致攻城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 139 页。王耀南(1911—1984),江西萍乡人,秋收起义以后,任红军工兵连长、工兵营长。参加长征后任师工兵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工兵主任、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的难度大增。直至中午,战斗仍处于胶着状态。因怕粘在萍乡,耽误16日合攻长沙的计划,王新亚当即召开战地会议,决定放弃攻取萍乡城,一部分返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醴陵县城。在撤离之前,起义军首先用土炮和炸药猛烈轰击一阵,使敌人误认为部队要趁黄昏时分攻城;然后从丹江乘火车往醴陵进发。在离萍醴边界的老关火车站约5公里的西坑下车,兵分三路包围老关火车站,顺利地消灭了驻在火车站附近的罗定所部1个排。参加攻打老关战斗的安源工人金洪喜回忆说:“我们坐小火车离开萍乡攻打老关,团长王新亚要我带路。因为我是老关人,车开到西坑就天亮了,我们在西坑下车,有的拿枪,有的拿梭镖,下车后三路包围火车站。”^①团长王新亚率中路主力从西坑沿铁路进攻老关车站,左翼由金洪喜带路,从西坑绕铁路左边的村庄到火车站,右翼是晏国良带路从西坑绕铁路右边村庄到老关火车站。当三路向老关火车站驻敌包围时,敌军企图登云盘岭逃跑。第二团战士以火力猛攻,打死敌军1人,消灭敌人1个排,缴枪10余支,获得进军途中第一个胜利。



老关车站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30、157页。

9月12日下午3时,第二团1000多人乘火车直奔醴陵。醴陵县城三面临河,一面靠山。城内及附近的阳三石驻有守敌第八军第一师两个连和罗定所部独立团1个连2个排,加上团防局120人枪,共有守城敌军700人左右。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到达醴陵之前,大革命时期和秋暴前夕陆续回乡的安源路矿工人与当地农民一起,搜集步枪600多支,还收了其他武器,从安源调来土手榴弹300个,于11日晚上开始,在县境四乡各地同时动手捕杀土豪劣绅,攻打地主武装团防局,然后向县城进发,配合第二团作战。第二团在阳三石火车站与他们会合后,王新亚立即部署攻打醴陵县城。第二团兵分三路。第三营为右路主力,攻打东门。由一些战士在水下推着木船前进,船内隐藏着士兵,敌人见空船漂泊,未加注意,待船靠岸,起义军出其不意地攻打岸边守敌。此时,在城外的起义军趁机涉水过河,直插东门,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于是起义军立即分头展开巷道战,追剿敌人。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一边在油桶里放鞭炮,迷惑敌人,一边掷自制的土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左冲右突。中路由王新亚指挥,从淶江大桥攻城。首先只作佯攻,待涉水过河的突击队冲上对岸桥头后,再命令战士集中火力猛烈打击。桥头的敌人被前后夹攻,便往城内败退。起义军大部队蜂拥过桥,直插城中心,乘胜追击敌军。敌人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最后退到一个外国教堂附近的窄道里,全部被工农革命军缴械。这时左路部队与头天晚上潜入城里的安源工人和醴陵农军一起,摧毁了敌人设在营盘岭上的机枪阵地,顺利控制了醴陵城制高点。这样,起义军在当地农军的配合下,仅用2个小时,便顺利攻占了醴陵县城,俘敌百余人,缴枪七八十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革命群众300多人。当天傍晚,起义军在县城文庙前坪举行军民庆功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的政策,号召商家继续开业,平买平卖,不许抬高物价。次日成立了秋收起义建立的唯一县级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也相继恢复。随即

以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了布告，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地主土地。县总工会恢复了各级各行业工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县农协通令恢复了各级农民协会。起义军打开东门和谢家巷等几处盐仓、粮仓，把食盐、粮食等分给贫苦群众。醴陵街上热气腾腾，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县革命委员会还制定了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等行动大纲，并派出 10 个宣传队，赴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和政策。



醴陵县城

醴陵县城被起义军攻占后，敌军纷纷向株洲方向败退，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战士乘胜追击，直达株洲。在此之前，朱少连、涂正楚、陈永清等率领株洲的路矿工人和附近的农民于 9 月 11 日深夜开始行动，12 日凌晨攻占株洲火车站。次日，闻敌军重兵从长沙扑来，株洲工农武装因人少武器差，只得分散转移，待第二团一部分战士 12 日傍晚到达株洲附近时，株洲暴动队伍已经溃散。第二团领导人闻此情形，急派人到株洲，将队伍接回醴陵。

湖南省政府得知安源起义军行动后，一面电请江西省政府派兵向萍乡进击，一面调兵向株洲、醴陵方向扑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第二团领导人王新亚、蔡以忱等决定避敌锐气，主动撤出醴陵县城，并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为北上攻取

浏阳,以便得到浏阳农民的帮助,并与第一、第三团会合。



浏阳县城

浏阳位于湖南省东面,距省会长沙仅 120 公里,是湖南省毗邻萍乡县北部上栗市的一个大县。浏阳河绕城而过,成为天然的护城河。9 月 14 日凌晨,第二团撤出醴陵县城,返回老关,除小部分回安源加强后方防守外,其余七八百人在王新亚率领下,从老关北上攻取浏阳县城。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涉浏阳河攻打东门,另一路绕道攻击西门。起义军在当地熟悉地形的农民引导下,很快赶到西门。当时,浏阳守敌大部分开往县境东乡和达浒一线,迎击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城内仅有团防队和法警,人枪不足一百,战斗力很弱。敌人认为浏阳西面是长沙,靠得住,只注意东、南、北 3 个方向,而未对西门加强防守。起义军顺利从西门攻入县城,攻击东门的起义军不久也攻进城内。16 日上午 10 时许,两路汇合,一举攻下浏阳县城,打开监狱,救出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 200 余人。同毛泽东一道从安源去铜鼓途中被捕关押在县城狱中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也获救。他出狱后急忙上街找第二团团团长王新亚,却意外地遇到了同样刚刚出狱,已经见到过王新亚的慕容楚强。

慕容楚强是潘心元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并且一直在潘领导下工作,任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省党部驻浏农运特派员,两人

关系十分亲密,此时意外相见,自然都非常高兴,互道别后情形时,慕容楚强将这次来浏阳的缘由告诉潘。他这时是第三团团部经济主任、交际副官^①。起义前夕,第三团见毛泽东迟迟没有如约到达铜鼓,便派慕容楚强去安源向毛泽东报告第三团情形,并与第二团联络,然后转赴浏阳城布置内应,以配合第三团攻城。到安源后,才知道毛泽东已去铜鼓,第二团已顺利打下醴陵城。于是,安源市委写了一封信,让慕容楚强在第三团打到浏阳后交给毛泽东。不料慕容楚强在途中被人认出,团防局把他抓进监牢,幸亏第二团打进城来才获救。他出狱后,立即设法找到了王新亚,告知路上听说的第三团在东门市失利的情况,随后便上街找党组织联系工作,不想在这里见到潘心元。于是他领着潘去找王新亚。

这时,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得知浏阳失守,十分震惊,急令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所部加派1个营速往浏阳,从正面向浏阳进攻,又命在醴陵的独立团团团长罗定及三十五军教导团团团长王东源所部第三大队向浏阳左翼开进,第八军一师一团周倬营协同平浏清乡司令阎仲儒之一部由右翼袭来。这时,王新亚等因连克三城而产生了轻敌思想,“有些干部也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是我们的了。’因此也不管部队,满街乱逛,战士也乱跑起来,弄得城里四处是兵,浏阳城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些人就想办法弄酒弄菜”^②。王新亚疏于设防,放松警戒,既不派人及时与第一、三团取得联系,又不在四乡发动群众,并拒绝潘心元等人将主力部队撤出县城开往东乡歼敌的正确意见。慕容楚强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他领着潘心元见到王新亚,“潘心元向他详细讲述了三团受挫的情况,并说部队已向铜(鼓)万(载)方向退去。当时,我和

^①慕容楚强后来任过红军支队政委、团政委、师政委等职。在长征途中患病致终身耳聋,1938年从延安回湖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副省级待遇。1986年以92岁高龄逝世。

^②刘先胜:《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021页。

潘心元认为二团孤军守城很危险，建议黄昏后撤向文家市，向铜、万边界靠近，同一、三团取得联络。但王新亚不置可否，只说多派人向各方面侦察敌情”。这天黄昏和第二天早上，潘心元和慕容楚强等又两次找王新亚，建议把部队撤到文家市，但王新亚都不听，最后似乎还讨厌他们太啰唆了，连话都不愿搭。潘心元等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慕容楚强回忆说：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也想去县农协看看，刚走到北正街，城的东、南、北三面忽然响起枪声。糟糕！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强忍着浑身的伤痛，飞快地向团部跑去。正巧碰到一连从北街跑来，连长看见我就问：“敌人从哪里来的？”我说：“跟我来！”我带着一连跑到天后宫的后山上一看，敌人漫山遍野地向天后宫山坡拥来了！我对一连长说：“坚持打下去，掩护部队撤退！”我转身又跑到团部，这时看到王团长带着特务连站在衙门前草坪上，吓得脸色苍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王团长，赶快命令部队一面抵抗，一面向西门撤退。你带特务连从西门冲出去。”

我跟随特务连顺利冲出西门后，见城里还有许多部队没撤出来，就对王团长说：“快派一个排抢占山头，掩护城里的部队撤退。”而王兴亚却惊惶失措地只顾拉着我问：“往哪里走？往哪里走？”北门的战斗异常激烈，一连还在那儿阻击敌人，他也不管了，带着特务连，一气跑到衙祭山，深夜又到达枫林，王兴亚这时已经失魂落魄了，什么话也不说，悲观到了极点。^①

这时候，部队无人指挥，陷入混乱之中。第二团第八连连长刘先胜回忆说：

十七日下午三四点钟，有个浏阳农民自卫军的同志对我说：“城外不远发现了反革命部队。”我说：“快报告团

^①慕容楚强：《在秋收起义的日子里》，《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05页。

部去！”他说：“报告过了，团长不相信。”我想不对，赶快跑到营部，还是找不到营部人。再准备到团部去，正在街上走着，四面八方响起枪声。我转身赶回连里集合部队，部队也一时收不齐，敌人已经冲到面前，而且越来越多。我带着二十几个人向东门外冲，在东门口又和敌人遭遇。我们以炸药包开路，突出了东门，接着又在街上对战了一阵冲出了街头。这时对面高山的敌人还在沿着沙滩扑来，越打越近，我连派出在这山上的哨兵，大概早已被敌人杀害了。我们猛冲过了河，沿山脚就向东插，在我们后面又冲出来一些人……

冲出敌人包围以后，天已大黑。我一看，人员伤亡大半，只剩下几个人了。^①

队伍被打散以后，潘心元和慕容楚强帮助王新亚收拢了130多个人，128支枪。潘和慕容对王新亚说：“这次虽失败，但还有这么多人和枪，还是个不小的力量，何况还有一、三团呢！”王新亚听了这些话，勉强振作精神，商量部队的行动。于是，带着部队顺利地到了文家市，当天到达文家市东三十五里的岩前宿营。潘心元、慕容楚强和王新亚以及连、排干部开了一次会，决定部队按原先的计划行动，由慕容楚强当向导，抄近路，争取在短时间内同第一、三团会合。王新亚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王新亚借口说去洗澡，带着连排长和特务长逃跑了。

第二团在浏阳被敌包围突袭，死伤惨重，大部分被打散。9月14日退出醴陵城转攻浏阳的有七八百人。17日死伤约200人，被俘100余人，陆续去文家市会师的100至200人，其余大部分陆续回到安源和醴陵。彭公达1927年10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载：第二团“十五日夺浏阳城，十七日失败。工农军有七百上

^①刘先胜：《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第1065页。刘先胜（1910—1977）湖南湘潭人，安源工人。秋收起义以后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政委、新四军师参谋长、解放军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苏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下,此次损失约有百余。仅留王新亚部二百余支,往铜鼓集合”^①。所说“往铜鼓集合”,事实上是往浏阳城之东南靠近铜鼓边境的文家市。任弼时奉命到湖南巡视后,1927年9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写道:“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十五号占浏城,十六号晚被敌包围,冲锋出城,是役失去枪杆三百余,捉去农军百一十余人,余众向东南退走,一部分已散。”^②向东南退走,即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一带退走;散掉的,大多数陆续回安源和醴陵,其中回到醴陵的共产党员即有1300余人^③。还有一部分在萍醴边界山区打游击。

以安源工人为主体的第二团,是3个团当中战斗声势最大和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战绩最好的团。它连续攻打3座县城,占领其中两座,并且一度建立了起义中唯一的一个县级政权。对于安源工人在起义中的作用,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④但是,3个团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也是第二团。一支二千二三百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约200人。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士兵作战不勇敢,也不是敌军力量过于强大,而是主要指挥员王新亚失职。应当说,起义开始最初几次战斗,指挥基本上是得当的。两次攻打萍乡城未奏效,即转攻醴陵。攻占醴陵城以后,得知敌军从长沙向株洲方向逼近,即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转攻浏阳城,以便与第一、三两团取得联系,这些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占领浏阳城以后,对形势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03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83页。

③邓乾元1927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秋收起义后“由安源败回同志一千三百余人”。

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93页。

④中共中央1927年12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57页。

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顺利攻下浏阳城,是因为城中空虚,却以为是自己能战的结果,由此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无所作为,既不防范敌军来攻,又不积极发动四乡群众,却只一心一意筹款。这样,也使士兵处于盲目乐观之中,不知危险将至,满街逛游。王新亚对潘心元、慕容楚强等所提撤离县城的建议一再拒绝,而遭敌包围突袭时又转为悲观胆怯逃避,最后竟一走了之。

三、第三团向浏阳进发,两战皆捷,在东门市受挫

按照省委的起义命令和安源会议决定,驻铜鼓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本应9月9日出发,11日到达浏阳城下发动攻击。由于毛泽东从安源赴铜鼓途中遇险,9月8日才到铜鼓,第一师的组建工作至10日才完成,第三团实际出发的时间因而延至11日。

9月10日,第三团全体官兵在铜鼓县城欢度中秋节,毛泽东在全团排以上干部的中秋宴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安源会议有关秋收暴动的决定,宣布驻铜鼓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11日清晨,部队在县城桥头大沙洲集合,接受毛泽东检阅,然后向进攻浏阳城必经的白沙镇和东门市进发。

白沙是浏阳县境东部的一个镇,驻有敌谭崇酃团第一营的1个连,还有当地的挨户团。敌军兵力不多,但地形对敌有利,易守难攻。敌军第一营的主力驻在白沙以西约15华里的东门市,营长叫周倬。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对付敌军1个营,本不成问题,但工农革命军这时存在非常不利的情况,就是“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疟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①。疟疾是一种传染病,每次发病之初寒战不止,俗称“打摆子”。这种病多为每隔一天发作一次,也有每隔两天发作一次的。发病时首先

^①潘心元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2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23页。

是恶寒,剧烈寒战,可达两小时之久,然后是高烧、头痛,昏迷可达4至8小时,最后是大汗淋漓而止。发病的时候,别说作战,走路都很困难,有的只能躺在路边草丛中呻吟昏睡,得有人照料。不发病的时候,身体也虚弱无力。这不仅使部队战斗力大减,而且行军亦很缓慢。但是,起义的英雄们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到白沙便旗开得胜。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攻克的白沙镇政府驻地刘家祠

从铜鼓县城到白沙镇有一天的路程。11日早上出发,下午4时许到达白沙附近的豪溪,立即部署战斗,分3路向白沙镇守敌发起攻击。参加过白沙战斗的李才福回忆说:“民国十六年古历八月十六日,部队就从铜鼓出发攻打盘踞在白沙的敌军(一个营),刘家神驻扎了一个连,排哨放在樟树凹,茶子坳也有几个哨兵,龙颈上扎了一个连,连部扎在水王庙,龙颈上有个排哨。坳上楚王庙也有一个连,营部也在那里。”^①摸清了敌人情况后,部队

^①李才福回忆,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分左中右3路进攻：右路由李春初带路走北山过河，经长山排、黄山岩更上、张天海螺到牛屎段。左路由刘友德带队从水坳里，经山洒边山横过到泉坑。中路火线由苏先俊团长指挥走豪溪到白沙的大路。

第三团按计划将敌包围，与敌军接火。全体指战员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战斗约1小时，即攻克白沙镇，首战告捷。这一仗打死敌军周倬营连长1人、挨户团兵2人，伤敌军10余人，余敌向东门市逃窜。毛泽东高兴地赞扬指战员作战勇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当地群众见自己的队伍回来了，非常高兴，党的组织发动群众送粮送物援助部队，并有10名青年农民参加革命军。当晚，部队在白沙宿营。

12日上午，第三团在白沙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从铜鼓县城押解过来的大恶霸帅尚奎和反革命分子李和国、李立兴等。会后，部队即向东门市进发。在离白沙镇不远处即与敌军接火，打死敌排长1人，敌军慌乱溃退。第三团乘胜追击，当日下午攻克距白沙15华里的东门市。敌周倬营向东门市以西约15华里之达浒逃窜。部队进驻东门市后，打开团防局的牢房，救出革命者罗福阶、罗其南等数十人。第二天，即9月13日，部队开展了革命宣传，四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秋收暴动和土地革命，当场处决了反动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宴初。人民群众备受鼓舞，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并在四处设立茶水、稀饭站。有主动帮助侦探敌情的，有向部队控诉反动派残酷罪行的，有报名参军的。东门白沙河新兵招募站，入伍新兵达40余人。

14日早饭后，团部还在开会讨论进攻达浒的方案，突然接到紧急情报：败退到达浒的敌军周倬营，与刚调来增援的罗定团的营长张南轩率领1个营，由熟悉当地道路地形的民团带路，分两路奔袭而来，一路还在攀登羊古脑制高点，一路企图夺取马鞍山制高点。第三团事先竟未在这两山的制高点放哨。苏先俊得

报,急忙派各营占领阵地,准备战斗,但此时第三团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且敌军兵力已经增加1倍,而第三团由于很多官兵生病,兵力对比也处于劣势。这时,第二营迅速进入阵地,猛烈射击,阻止攀登马鞍山之敌,掩护官兵撤退。第一营和第三营则在羊古脑两侧并力反攻,以期夺取羊古脑高地,消灭敌军设在羊古脑山上的机枪阵地。第一营营长汤采芝亲率队伍,数次向羊古脑冲锋,腹部不幸中弹,肠子流出,他毅然解下绑腿,自己匆忙包扎,不顾生死,继续指挥作战,终因伤势过重,在阵地上壮烈牺牲。此时,不少战士正疟疾发作,行走困难,有的掩身于茅草之中,有的跟随部队撤退途中落伍。敌兵到处搜索,见到第三团的这些病人即残酷杀害。正在发烧掩身在草丛中的战士王隆祖眼见患病战友惨遭敌兵残杀,无比愤怒,挣扎着奋力举枪打死两个敌兵,迅即把枪栓卸掉,扔入茅草之中。敌兵冲上,逼他交出枪栓。王隆祖说:“你还要枪栓,我不是病了走不动,你们一个都不要想活。枪栓没有!要杀就杀!共产党员是宁死不投降的!”王隆祖就这样惨死在敌兵的刺刀之下。东门战斗,持续约6个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数以百计,连敌报都称“洵少见之恶战”^①。上海《申报》1927年9月26日报道:“周(倬)营与苏(先俊)部大战于东门市,激战一日夜。共军屡次冲锋,极为凶猛,双方死亡甚众。”^②有的报纸报道说:“双方死伤七、八百人之多。”这显然有夸张,却可见这次战斗之惨烈。据亲历者事后回忆,第三团在这次战斗中牺牲100余人,因病失散者为数不少。14日下午,毛泽东决定分3路从马鞍山撤向上坪方向。

第三团是起义部队的3个团当中战斗最为艰苦的一个团。由于三分之二的官长和三分之一的士兵患疟疾,在白沙镇与敌军1个营对阵时,敌我力量对比已经是相等。白沙之战获胜,有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3日报道,见《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33页。

^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96页。

两个原因：一是主动作战，二是官兵作战勇敢。在东门市遭敌袭击时，敌军增加了1个营，共2个营，其实力已经超过了第三团的3个营。由于苏先俊疏于防范，事先未能在两个山头设哨，第三团既成被动作战，又处于极其不利境地，因而造成严重伤亡。幸得全团官兵奋勇作战，又尽快设法撤退，才得以保全主力。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3个团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不畏生死，英勇奋斗，在中国人民军队诞生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作战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是党刚开始创建军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战争时毫无经验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客观地说，安源会议作出的兵分3路进攻长沙的军事部署，基本上还是照搬北伐战争的老一套打法：一是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二是分兵出击，而不是集中兵力攻击。这都是缺乏经验的表现。好在有毛泽东这样精明务实的领导者掌舵。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和抓住问题的实质，果断地放弃攻打中心城市，把兵力集中起来，避开强敌，向敌势薄弱的山区退却，使这支刚刚产生的嫩芽般幼小的军队得以保存，并日益壮大和发展起来。

第九章 会师文家市

由于形势过于恶劣，民众暴动和军事行动于9月9日和11日分头在各地发动以后不久，起义即由进攻转为退却。9月1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上坪会议，是这一转折的标志。

第三团9月14日在东门市受挫后，向东北撤退约20华里，到达靠铜鼓县边界的上坪。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退往萍（乡）安（源）再说。会后毛泽东率部进入铜鼓县境，命第一团从速跟第三团撤退。两个团一先一后经过铜鼓县内的排埠，17日在浏阳县境的孙家墩会合。在这里，除王新亚外，前敌委员会全体委员第一次会面。当天，前委举行了一次简短的碰头会，决定经萍乡退往湘南。随后，两个团于19日先后到达文家市。第二团亦于18、19日两天分两批到达文家市。1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先退到萍乡安源，然后退往湘南。20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召开了1500余人的会师部队的动员大会，毛泽东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使起义部队的干部战士从受挫折的低落悲观的情绪阴影中解脱出来了，革命情绪顿时高涨。21日，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向萍乡方向探索前进。至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完全改变，由向城

市进攻改为向农村山区进军，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兵，“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①。

一、上坪会议，各路部队到达文家市

从9月14日上午开始，第三团在东门市附近的马鞍山与敌八军周倬营和罗定团之张南轩营鏖战数个小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地形不利，最后不支而退。在向上坪撤退途中，毛泽东收到第一团联络人员送来的报告，了解到第一团及其在金坪遭叛变的邱团袭击的具体情形。至此，他对3个团才算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对第一、三两团的实战能力作出了初步判断，因而对起义的后续行动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新的想法。

在安源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对起义队伍的接触，仅限于驻安源的第二团。驻修、铜各路武装队伍的情况，只是在安源会议上听了潘心元的介绍。潘心元是浏阳农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浏阳农军曾和平江农军奉命合编为1个团，所以他对这两支队伍情况的介绍当然比较翔实，但对毛泽东来说，这时对平、浏农军只是间接的了解。至于原警卫团的情况，潘心元只是在高安听到平江农军联络人员的简略介绍，而平江农军与警卫团的接触也仅限于在武宁的一两天，对警卫团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潘心元向安源会议报告时，还误以为余洒度所部警卫团是“适从十一军跑了出来”^②。其实，警卫团从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原叶挺独立团）分出1个营来单独组建成1个团以后，与第十一军已经完全没有关系，而是隶属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潘心元不了解这些情况，只知道警卫团与叶挺独立团有些关系，是党领导的一支正规军队。毛泽东原来认为，暴动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必须有一两个团的正规军队做暴动的主力 and 发火药，才可以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从安源会议上了解到的

^①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3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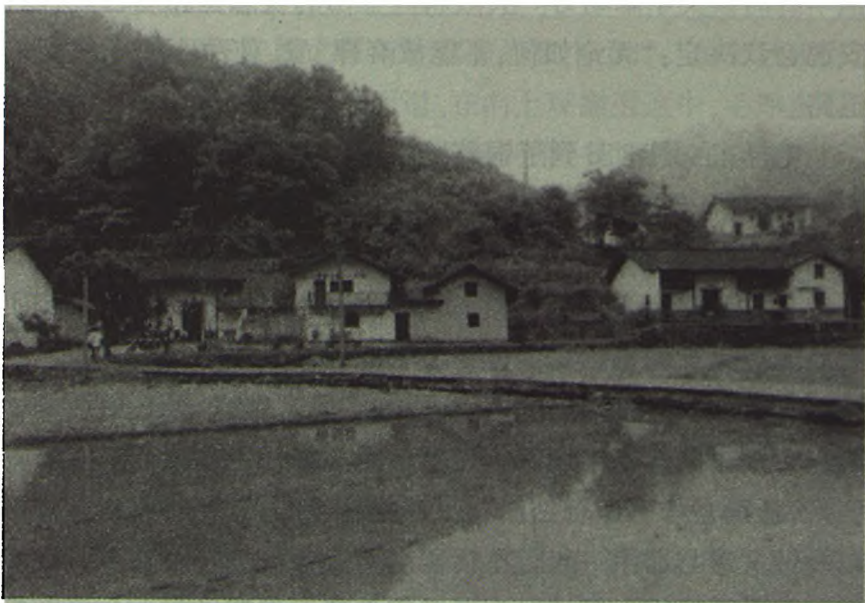
^②潘心元1929年7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8页。

情况，使他感到攻取长沙没有胜利的把握，必须要有后撤的准备，而后撤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安源，一来安源革命势力比较雄厚，二来安源本身是个山区，与萍乡、莲花、安福边界山区直接相连，还可直通王新亚在会上介绍过的宁冈、井冈山。退到安源，与他早些时候关于暴动万一失败就应上山的设想正相吻合。所以，安源会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

毛泽东9月8日到了铜鼓以后，对第一、三两团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知道余洒度等人收编了邱国轩团。但这种了解终究还是表面的。至9月14日，第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严重挫折，而且很多官兵患疟疾，行军打仗都很困难。14日下午接到第一团联络人员送来的信以后，进一步了解到警卫团是6月下旬才组建的，3个营中有两个营基本上是由新兵组成的，严格地说整个团与正规军队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此时，卢德铭回部队才三四天，还没有与毛泽东见面。他从余洒度等人轻率收编邱国轩团以及钟文璋与邱团一起行军宿营毫不戒备，视作战为儿戏，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等情况中已经感觉到，不能指望由余洒度等人指挥部队攻取长沙。此时，他虽然对第二团作战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第一、三两个团的情况已经显示，攻打长沙不仅绝无希望取胜，而且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于是果断决定后撤。

9月14日傍晚，部队到达浏阳县境东部的白沙乡上坪宿营。这是一个人烟稀少、坐落在一个山坡上的小村庄。在这里，毛泽东幸遇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陈锡虞。陈锡虞的家就在上坪，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是毛泽东的好朋友。他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担任白沙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又是白沙乡肃反委员会主任（当时肃清反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土豪劣绅）。看到老同学毛泽东带着部队来到家乡，他感到特别亲切和高兴，安排毛泽东住在自己家的书屋里，待毛泽东开完第三团干部会后，陪毛泽东叙谈了一通宵。对于这件事，陈锡虞的妻子汤冬英在

1951年以后(即1978年)仍记忆犹新,她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在他们家住了一晚,部队是下午到上坪的,有一千人左右,一来就到了他们家,门口、大门、小路、山头都站了几重岗哨。当天晚上就在他家开了一个会^①。



上坪会议会址(徐盛文摄)

当天晚上,在陈锡虞家召开了第三团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连以上干部10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第三团党支部组织委员张启龙1975年6月回忆说:“东门战斗后,部队撤到浏阳平江与江西交界处,我们在山上一个不大的房子里开了会,是毛主席主持的,彭商仁和我都参加了,苏先俊也参加了,主席决定转移到江西方向,并要去通知其他团,毛主席在我们三团与一团有通讯联系,所以这时知道平江那里吃了亏……就是在这山上派人去一团联系的,通

^①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1978年12月1日访问汤冬英记录。按:第三团离开上坪时,陈锡虞曾想参加工农革命军,跟毛泽东一起走,但当地党组织不让他离开,只好作罢。1930年,陈锡虞在上坪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牺牲。

知他们跟着来……”^①“决定一、三团迅速到文家市会师。”^②“上坪会议,我参加了,有十来个人开会,大概是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③。开会的房子很小,毛主席主持了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就认为长沙已打不下了,决定不打长沙了……会议开完后,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给一团,是要通讯员送去的……要一团快些来,首先余洒度是不愿来的,后来来了。关于第一团在长寿街进军中失利的情况,是我们第三团向上坪撤退的途中,毛泽东同志接到他们的报告才知道的。”^④在这次会后,毛泽东和陈锡虞在陈家的书房里作彻夜之谈,又独自反复思索,一夜未睡。第三团第三营党代表王俊民回忆说:部队“撤到上坪,这一夜毛主席冒(冇)睡。毛主席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决定,两个团由原地走小路,限期会师。”^⑤赵自生回忆:“去上坪是毛主席决定的。(会师)也是在上坪会议决定的。”^⑥

这次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后作出决定:一、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并建议省委停止16日的长沙暴动;二、先退萍乡再说。同时决定在浏阳城与第二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三、决定三团首先退往铜鼓的排埠,造成退往江西的假象,以迷惑敌人,然后突然复入浏阳境内,令第一团限期到排埠会合。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报告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并要求省委相应地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同时致信余洒度,即通知第一团迅速向第三团跟进。上坪会议为前敌委员会在文家

①《张启龙同志回忆秋收起义》,1975年6月16日访问记录。张启龙(1900—1987),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1927年春任浏阳县委宣传部长,9月参加秋收起义,时任三团党组织组织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副书记等职。1987年6月病逝于上海。

②《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00页。

③应为连以上干部会议,因为营以上干部不可能有十余人。

④《访张启龙同志记录》(1979年1月2日),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⑤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1968年10月17日访问王俊民记录。

⑥《访赵自生记录》,1978年12月11日,邓新如等访问。



上坪会议会场内景(徐盛文摄)

市作出转兵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9月15日,第三团由上坪出发,边走边等,沿着大围山,经松树坳、皮舍、界岭、雷公关、上庄界、山桶湾,于当日傍晚进入江西铜鼓的排埠镇宿营。16日突然转向浏阳境内,经铁树坳进入双坑。在这里击败了号称“西乡农军”的张梅村地主武装,后又行进至上洪、张家坊一带。17日经田心、火厂,抵蒋埠江豆田,到达孙家墩宿营。9月18日,在孙家墩休息了一天,同时也为了等待第一团的到来。三团还在这里开展了打土豪等活动,将浏阳横山大恶霸欧阳八枪毙在丁字桥下,当地群众拍手称快。在从上坪经排埠到孙家墩途中,毛泽东多次写信要师部和第一团迅速向第三团靠拢。

第一团在平江金坪失利后,师长余洒度仍主张反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不同意余的意见,为保存有生力量,他毅然率领部队后撤,向第三团靠拢。陈树华回忆说:卢德铭带领部队急忙从杨梅尖撤出后,“大家默默无言地跟着他走,一直上山,摸黑路,第二天才在路上遇着毛泽东派人送来的条子,叫我们部队跟着他

的第三团后面往南走。以后经常接到他留下的条子说：‘你们为什么走得那么慢？快跟上来！’在到达排埠以前还接到一个条子说：‘排埠的团防很厉害，千万要小心！’”^①一篇署名铁心的历史资料载：余师长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长毛令。”^②卢德铭等阅信后，与余洒度一起指挥部队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9月16日午后赶到铜鼓县境西部之排埠。毛泽东和第三团因等候多时，不见第一团来，已于当天中午开走。于是，他们马不停蹄，继续追赶，17日上午在赴浏阳县境东部的孙家墩途中赶上了第三团。毛泽东和前委委员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是起义后第一次集齐（仅王新亚未到）。这时，得知第二团17日上午在浏阳城被打散的消息。前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部队的现状和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会议就上坪会议的决定交换了意见，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初步确定放弃攻打长沙，先退往萍乡、安源，再退往湘南，在退往萍乡、安源之前，先到文家市集中。

苏先俊1927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写道：“一、三团败后，入驻浏阳之安源部队乃孤立无援，四面受敌，十七日为敌袭击，竟致溃不成军，是日前敌委员会会议决退往湘南。”^③

之后，部队分两路向南进发，师部仍与第一团同行，向浏阳县城方向绕道从西边前进，于19日下午到达文家市。前委书记毛泽东仍和第三团同行。第三团在向浏阳文家市进军途中，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部队经过浏阳中庄时，有两名伤员走不动了，留在那里养伤。反动挨户团企图杀害他们，当地妇女陈楚兰、吴小兰冒着生命危险，把两名伤员及时地转移到杉树坳，使他们脱离了危险。沿途还不断有农民参加革命军队。工农

^{①②}分别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0、212页。

^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78页。该书所载苏先俊报告成文日期9月17日应是阳历，阳历为10月13日。

革命军行进沿途的革命群众自动地送水送茶。浏阳东门越级冲贫苦农民卢真听说秋收起义部队来了,喜出望外,想到部队为穷人打仗十分辛苦,就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米全部煮成稀饭,用水缸装着抬到路边,一碗碗地送到路过队伍的干部战士面前。起义军官兵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婉言谢绝,卢真含着热泪说:你们为我们工农舍命作战,连口稀饭也不喝,我心里难受啊!部队无法只好将稀饭分着喝了^①。接着又反复讲明工农革命军的严格纪律,硬是把钱让卢真收下后,才告别继续行军。19日早饭后,第三团在第一团到达之前抵达文家市,驻扎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储才小学。

由于第一、三团按照前委意图,事先造成了退往江西铜鼓的假象,尔后,突然折回文家市,盘踞在此地的挨户团没有得到工农武装到达的任何信息,所以当首先到达文家市的第三团进入市镇时,挨户团慌作一团,团总孙发颂吓得连马都顾不上骑就慌忙逃走。团丁数十人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工农革命军首先闯进团防局,砸烂了团防局的监牢,将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群众解救出来。挨户团本要杀害农会负责人陈盛南,一时未捉到他,却要杀其哥哥陈盛龙顶命,并已确定9月19日问斩。19日这天,团丁正在磨刀霍霍,陈盛龙的妻子已万分悲痛地将“饯行酒”送到了监牢,一边流泪,一边愤怒地大骂团总无故残害百姓。正在这个时候,工农革命军冲进监狱,打开了牢门,把他从死亡边缘夺了回来。他夫妇及全家人对工农革命军感激涕零!当地革命群众对工农革命军亦万分感激与热烈拥护。

第二团在浏阳被打散后,有的在醴陵、萍乡等农村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有的返回安源、萍乡、安福、莲花等地;有的则在浏阳周围一带活动,试图找到第一、三团。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1927年9月的工作报告载:第二团在浏阳被打散后,“由安源败回同

^①这口盛粥的缸,现陈列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志有一千三百余人”^①。时任第三团团部经济主任的慕容楚强回忆说：

第二团在浏阳县城被打散以后，情况紧急，他跟随特务连顺利冲出西门后，王新亚这时已经失魂落魄了，什么话也不说，悲观到了极点。我和老潘（心元）请特务连连长检查一下人数，这时还有 130 多人，128 支枪。我对王新亚说：“这次虽然失败，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和枪，还是个不小的力量，何况还有一、三团呢！”王新亚听了这些话，勉强振作了精神，商量部队的行动。深夜，部队向文家市前进……当天到达文家市东 35 公里（应是 15 公里——引者注）的岩前宿营。在这里，我们和王新亚以及连、排干部开了一次会。决定部队按原先的计划行动，由我当向导，抄近路，争取在短时间内同一、三团会合。王新亚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王新亚借口说到蔺家洗澡，带着连排长和特务连长逃跑了。^②其余散落的士兵在浏阳文家市一带游移。

第一团与第三团到文家市以后，派人去找第二团的官兵。张启龙回忆说：第三团曾到枫林、岩前一带找二团。“我们以后听说有支部队在岩前一带，派人去找没有找到。”^③第二团最先到达文家市的是爆破队。他们是按照前委指示，由正、副队长率领整建制的队（连），扛着军旗直接赶到文家市会师的，他们还先于其他部队于 9 月 18 日到达文家市。

当年任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爆破队副队长的王耀南回忆说：

1927 年 9 月 8 日，杨明^④同志突然通知我们几个搞爆破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93 页。

②慕容楚强：《在秋收起义的日子里》，《秋收起义在江西》第 205—206 页。

③张启龙 1977 年 10 月 25 日回忆，《秋收起义在江西》第 200 页。

④杨明，安源煤矿工人，中共党员。秋收起义时任第二团爆破队队长。1930 年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战斗中牺牲。

的工人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附近集中。原来我们参加筹集炸药火具的二十几个爆破工和矿上其他有专业特长的年轻工人近60人，正式编为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我们来到张公祠老火车站集中后，二团团团长王新亚站在一个坡地上，宣布正式组成爆破队。他说：“前不久，毛委员来到了我们安源。他告诉我们，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叛变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我们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镇压下去。我们要拿起武器，同他们斗争。从今天开始，我们安源路矿的爆破队员们，要由分散活动变为集中执行任务。现在我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正式成立，由杨明同志任队长，王耀南同志任副队长。”接着，他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授给了杨明同志。^①

王耀南还回忆说：

9月11日，二团攻萍城未遂，王新亚团长要我们爆破队把所带的炸药火具和“洋葛古”统统交给攻城部队，然后迅速赶回安源造“洋葛古”。

当时安源工人已经起义，路矿已掌握在自己（中共）手中，造“洋葛古”找材料比起义前方便多了……可以大张旗鼓地在露天造起“洋晶古”来。十二日晨……团部派来一个交通员，通知我们到修水去找师部。当天晚上，我们爆破队乘黑夜冒雨出发，次日下午进到萍乡西面的老关附近。在老关休息了一晚后，次日又继续前进。我们沿东峰界、黄茅、双康、石鼓山，于15日到达高排，并在高排休息了一天。十六日下午，爆破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叫我们不要去修水，改到湖南浏阳附近的文家市集中。这

^①王耀南：《坎坷的路》，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样,我们又连续行军两天,于18日晚上抵达浏阳文家市。^①

爆破队到达文家市后,宿住文家市里仁学校。9月19日,在浏阳被打散突围后,在浏阳的枫林和岩前一带活动,寻找第一、三团的第二团官兵也闻讯赶到文家市会师。岩前距文家市只有15公里,所以能很快赶到。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吴杰、第六连连长熊坤山均率领部分士兵到文家市集中,共有60多人,宿住在文家市镇的一家中药店里。王耀南回忆说:“在文家市,我看到了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带了五六十人在那里(指会师会场),因为我们都是安源来的,见了面都很高兴……其中二营六连连长熊坤山带领六、七个人也在。熊坤山,我原来就认识,他胸前挂着两支驳壳枪,个子很高大,还有一个小战士叫李文成……总之,二团是参加了文家市会师。二营有五六十人,还有我们爆破队六十多人,加在一起还有一百二十多人呢!”^②时为第二团战士的王庆生回忆:“我们从城里(浏阳县城)向外冲,过吊桥时,因敌人火力很猛,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冲出来后,一连只剩三十多人了。其它连队也都在冲出后到文家市去会师。”^③时任师部军需处长的范树德回忆说,在文家市“看到了有安源来的手持十字镐和铲子的工兵队(即煤矿工人)约六七十人”^④。当时第一团的战士黄永胜回忆说:“前来会师的队伍中,我们发现了分别不久的安源煤矿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的起义农民合编成的工农武装,他们是在进攻浏阳城失败后来到这里的。”^⑤第二团先后到达文家市会师的人数至少有120余人。

1927年9月18、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先后到达浏阳文家市会师。肖克、何长工主编的《秋收起

①1968年11月访问王耀南记录,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②1968年11月访问王耀南记录,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③《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59页。

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5页。

⑤《红旗飘飘》第13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义》一书写道：“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于九月十九日在湖南省浏阳文家市胜利会师。”^①

二、前委会议决定转兵

文家市是浏阳县境东部的一个小市镇，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人口不过数百，但地理位置重要，远近闻名。这里处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是浏阳县和江西的万载、宜春、萍乡三县之间的交通要冲，自然也就成为兵家在这一地带过往和作战必经之地。由于这些原因，这里的经济、文化向来都比较活跃。在这么一个小镇，竟然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建造起一个文华书院，随后又相继建起文昌阁、武帝庙、魁星楼等。醉心于古代文化又热衷于向社会学习的青年毛泽东，听家在文家市的同学陈绍休^②谈到文家市的种种趣事，便于1917年利用学校假期，来到文家市游览考察。他住在文家市铁炉冲陈绍休家，游览文化古迹，了解风土人情，与农民广交朋友。每天晚上都有不少农友来陈绍休家与毛泽东攀谈。毛泽东并和农友一起挑水浇菜，并种了好几棵板栗树。他在文家市留住几天的情景，铭记在当地农民的心中，同时也深印在毛泽东本人心中。这次在孙家墩决定率领部队来文家市，与他对文家市的了解不无关系。

文家市和浏阳全县各地一样，在大革命高潮中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这个地区召开过有5万农民参加的反蒋大会，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游行示威。6月28日，这里成立了第四十九区自治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大地主彭老五，枪毙了大恶霸肖绍卿。在此前后，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准备丈田分田。这些斗争，在当地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团的官兵多是浏阳本地人，对这些情

^①肖克、何长工：《秋收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②陈绍休，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毛泽东和他是湖南一师同学，和他有生死之交，关系密切。1920年，陈绍休与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不幸在法国病逝。

况当然都清楚。文家市被选为起义部队集合地,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表明,这个选择是对的。部队到达文家市,立即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帮助。街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工农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商店迅即开门营业,群众热情为部队送柴草、烧开水、舂米,帮助部队放哨,安置伤病员,到处一片沸腾的革命景象。起义部队则帮助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当天下午,召集了有500人参加的大会,清算大土豪彭伯堂的罪行。会后,没收彭家的粮食和其他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工农革命军官兵并把分给那些无儿女的老人的东西送上门去,群众个个喜笑颜开。

文家市之所以成为起义部队会师的地方,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既便于部队集中,又便于向萍乡进发。这里离孙家墩只有30多公里,第一、三团从孙家墩出发,用不着一天即可到达。离浏阳城只有50公里,失散在浏阳城附近的第二团官兵也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事实上18、19日两天都有第二团的一些官兵到过文家市。而文家市到萍乡县城只有70公里,从文家市向南走20多公里,就是萍北边界。

各路起义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后,驻扎在后街的里仁学校。这个学校就是由前面所说清代陆续建起的文华书院和书院的西、东两侧的武帝庙、文昌阁和魁星楼等建筑物组合成的,1909年改称里仁学校。在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

这所学校坐南朝北,进深76.7米,东西向最宽处达70余米,院内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建造的标语巷、照壁过亭、大门、中厅、大成殿、状元桥、成德堂等居中建筑群,现在仍保存完好。加上西斋、武帝庙、文昌阁、新斋、操场等,总占地面积6400余平方米。1961年已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革命时期,该校成为文家市革命活动中心,以校长陈世乔担任书记的中共文家市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设在这里。里仁学校很多师生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坚定地跟共产党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走向社

会,投身革命。工农革命军到达文家市,里仁学校校舍便成了部队驻扎宿营的地点。毛泽东住在学校前栋的新斋,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独立小院,院里共有4个房间,余洒度、余贲民、杨立都住在这里。卢德铭人住在离新斋不远的成德堂,何长工和卢住在一起。苏先俊住在门楼边的房间里。毛泽东等师部领导住房都很简陋,床都是用门板搭的。第二团爆破队均住在里仁学校的大成殿、西斋等楼房里,第三团住在紧挨着里仁学校里头的储才小学,当时是里仁学校的初小部,其他干部和士兵都是打地铺睡觉,走廊过道等空地上都住满了人。

起义部队进驻后,学校门口的上方挂着一面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大门口两旁有两名卫兵站岗,显示出工农革命军的军威。

各路起义部队当时面临着军队的进军方向的大问题亟待解决。毛泽东在部队宿营安排就绪之后的当晚,不顾长途跋涉和战斗的劳累,先抓紧时间向军队干部和当地党组织了解情况,然后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据杨立三回忆:“毛泽东同志很快就来到了师部,与师首长们谈话到深夜。我早就替他准备好了住的地方,以万分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到房屋里去。睡觉的地方,仅仅是一张门板。当时,他穿着老蓝布农民衣服,赤脚草鞋,脚趾已溃烂。我说我



毛泽东在文家市的住处



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会议旧址

早就知道他,在报上看过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问他的脚是怎么溃烂的。他告诉我,脚是从长沙来时爬山烂了的,并带惊奇的口吻说,‘你看到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吗?’我说:‘看到的,你那篇报告,对我们在湖南做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恼气的要命。’他笑了。”^①

9月19日晚上,在里仁学校后栋教室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教室虽然设施简陋,仅有三行旧课桌,但显得还宽敞。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委员卢德铭、余洒度、苏先俊、余贲民、宛希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的是当时摆在部队面前急需回答的问题:是继续进攻还是后撤?如果后撤应当撤向何方?

关于继续进攻还是后撤的问题,事实上已有结论。9月14日下午,3个团有两个团受挫折、1个团音信未通的情况,就已经说明,必须后撤,再进必定全军覆没。上坪会议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后撤的决定,这个决定并由17日前委的第一次会议认可。但是,余洒度仍不顾眼前的事实,在这次前委扩大会上,还主张进攻。他认为这时攻取浏阳城仍有胜利的把握,部队应当攻取浏阳城,然后进攻长沙。余洒度这一错误主张遭到与会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否决了他的提议,坚持上坪会议和孙家墩会议的决定——退往萍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和结论,余洒度本人1927年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写得很清楚:“十九日抵文家乡(即文家市——引者注),距浏阳城九十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当时取浏阳有把握)。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即向萍乡退却。”^②

会议否决余洒度关于攻取浏阳和长沙的提议之后,集中讨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2—193页。

^②《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4页。

论的问题是退向何处,其结论是“应退萍乡”。

首先,当时面对的事实是:西面、北面、东面都有强敌,只有向南撤退,才有生路。西面,湖南的敌军多数已经调集到湘东、湘中一带。在长沙,有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等数千兵力防守。在湘东的浏醴边境,有罗定的独立团和地方武装共 1000 余人。在浏阳县境有张国威所部谭崇赞的第一团周倬营、罗定团的张南轩营。在平江、浏阳,还有平浏清乡司令部的闫仲儒所部数百人。第三十五军教导团王东原部正从长沙开往浏阳增援。并且,湖南的团防局、挨户团之类的地主武装,从县到乡,遍及全省,密如蛛网。这几路敌人的正规部队兵力即不下 1 万人,拿工农革命军的不足两千人去碰这上万人的敌军,其结果可想而知。北面,和湖南一样,都是唐生智的军队。当时鄂南、鄂北秋收暴动正在进行,分散了敌军的力量,但是湖北敌军的力量比湖南更强。在粤汉铁路长武段一线,咸宁、汀泗桥等处以及崇阳、通城等地,镇压鄂南秋收起义的敌军即有五六个团:包括李品仙派出的 2 个团,第十三军 2 个独立团,第十三军的第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 3 个团。这些敌军都已经注意到湖南秋收暴动队伍在湖北、修水、铜鼓等地的活动,李品仙曾致电周斓,要求湖南派 1 个团到湖北与他的军队相配合,镇压湘北、鄂南的秋收暴动。因此,向北走,也只有死路一条。东面,赣军朱培德已从南昌派 2 个团到修水、铜鼓,又从驻吉安第八师调 2 个团到萍乡,防堵湖南秋收起义部队。更何况,在赣北、九江、南昌一线更有重兵把守。东面同样不能去。这样一来,只有向南撤退。起义军此时向南撤,不必经过修水、铜鼓,因而不会与驻修、铜的赣军冲突。只有在萍乡可能遭遇赣军。不过,同湘军相比,赣军更易对付。其原因在于湘军是在湖南本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来和当地地主豪绅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军队的头目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对湖南农军一贯刻骨仇恨,对农军的镇压和摧残最凶狠。而赣军是客军,它原是由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才进驻江西的,和江西地方封建势

力、土豪劣绅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并且，赣军的战斗力不如湘军。起义军利用赣西边界的山地，有可能避开赣军的防堵。

其实，南下经过萍乡、安源，还可以收集第二团被打散的官兵，并汇合安源工人的力量，然后向南部山区发展。9月初安源会议把萍乡、安源确定为起义部队的“退路”，其原因就在于安源矿山与萍乡南部的莲花、安福等地山区直接相连，起义军的活动空间很广阔。

第三，安源会议和文家市前委会议都把萍乡、安源作为“退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道莲花、安福、永新、宁冈一带有农民武装，可以和这些农民武装取得联络，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共江西省委9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写道：“莲永及修铜两部分农军，此间均已派人前往指导，调往醴陵、茶（陵）一带帮助湘之秋暴问题，自属可能而且必要，不过须俟前次所派去之人回来报告后，才能调动也（因此间现在亦不知农军之行止也）！”^①江西省委9月26日致中央信提到，此前已派人往修、铜与平浏农军联络，也就是指导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那时候，江西省委派兵联络的人很自然会将莲花、永新一带可能有农军的情况告知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更重要的是，王新亚在安源会议上已经亲口将永新宁冈农军的情况以及井冈山的地理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说，万一起义失败，可以到那边去找他的“老庚”（指袁文才、王佐）。所以，毛泽东后来在瑞金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秋收起义失败后，我收拢部队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往何处去，我想到王新亚的话很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奔井冈山来了。”^②毛泽东在文家市前委会上和第二天的全体官兵会师大会上并没有明说把部队带往井冈山，但这种想法对于他决定带领起义部队经过萍乡往南撤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7—18页。

^②樊昊：《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第199页。

最后,17日,孙家墩前委会议议决退往湘南,并且前委中有好几位有过去湘南的想法,也是起义部队决定经过萍乡向南撤退的一个原因。早在1927年8月初,毛泽东就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拟定一个《湘南工作计划》,准备在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组织1个师,建立湘南革命政府,以促成湖南全省秋收暴动。后来情况发生变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8月间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到达修铜后,余洒度、苏先俊等在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之前,多次议论过“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后因“未得中央命令”,不敢妄动,“暂缓南迁”^①。

退往湘南,同退向萍乡、安源再南下,行军方向和路线是一致的,与毛泽东心中所想去井冈山也不矛盾。所以,9月17日前委在孙家墩开会,有人提议退往湘南,即获会议通过。部队到达井冈山以后,确曾往湘南试探,终因以上所说湖南敌军力量过于强大而未去成。但在孙家墩和文家市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时,退往湘南不失为一种选择。

就这样,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直到深夜才作出决定:明天出发,退往萍乡、安源,再往湘南。

三、会师大会,退往湘南

9月20日清晨,天气晴朗。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15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前面的操场,举行会师大会。大会由总指挥卢德铭主持,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场非常热闹,当地300名群众在旁观看,聆听毛泽东演说。学校的许多学生和附近的儿童爬到操场的围墙上看热闹,听毛泽东讲话。当时在里仁学校高小部读书的胡耀邦和他的姨表哥杨勇也和同学们一起爬到围墙上观看听讲。胡耀邦当时12岁,是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长。后来是解放军上将的杨勇当时14岁,已

^①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3页。

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里仁学校童子军队长。他们两人的父兄都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校长是当地党支部书记，老师也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和教育，而且早已敬仰毛泽东。看到



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

工农革命军的集合，听了毛泽东的演说，深受鼓舞，终身不忘^①。

这次会师大会和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所有官兵来说，更是终生难忘的事。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第一团战士黄永胜回忆说：

大约是在东门战斗的第三天，我们到了文家市。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部队忽然奉命在一块空地上集合。这时已过中秋，初升的艳阳照得人们暖洋洋的。但是坐在地上的士兵们却是一个个无精打采的，眉头紧锁，心头像笼罩着一朵阴云。今后可怎么办呢？这是当时大家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疙瘩……看到这么多部队在这里集合，大家便都感到有点讶异，纷纷地小声议论开了，“喂！今天好像又有什么事情了！”“是呀！是不是又要编队（整编）了？”“也可能又要打仗了吧？”正当大家纷纷议论的当儿，一位负责干部开始整理队伍，把来集合的所有部队整理成一个听讲话的队形。队伍整理好了以后，他便大声地对我们讲

^①据《浏阳英雄儿女传》之胡耀邦传、杨勇传。

道：“士兵弟兄们(那时都是这样称呼的)！等一会儿毛委员要向我们讲话，大家要注意听……”他的话一讲完，刚平静下来的队伍便又沸腾起来。我们这些新兵，只知道军队里有师长、团长、营长……至于“委员”是个什么官？毛委员又是什么人？可就没人了解了。大家你问我，我问你，谁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结果却是越问越不得要领。有人说：“反正是个大官儿就是了！”这时，只见远处一个身材魁梧，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几位部队首长的陪同下，迈着稳重有力的步伐向着我们走来。他身穿一件旧蓝布衫，脚穿草鞋，脸色晒得通红，头发长长的，大概已有好久没有理发了，一望而知道是经过长途辛勤(苦)跋涉的。我们心里想大概这就是要给我们讲话的毛委员了。当他走近部队时……他回礼后便伸出两手向大家摆了几下，满脸笑容地对我们说：“弟兄们请坐下吧！”……接着他就开始对我们讲话了。他首先讲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什么要打仗和为谁打仗，他讲到了蒋介石如何背叛革命，正在大肆屠杀革命的工农群众。他情绪激昂地号召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我们必须坚决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只要有了革命武装，就什么都好办了。但是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毛委员讲到这里，特别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我们打了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胜仗别得意，打了败仗也别泄气，何况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得到了湘、鄂、赣和全国各地工农群众的拥护，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畏难的呢！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有些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也算不了什

么,他们早晚会后悔的,部队里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有句俗话说:“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一关挺过去,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毛委员的话讲得非常浅显易懂,简直就像和我们谈家常,可是这里面却包含着多少丰富而深刻的革命真理啊!在他讲话的时候,集合场上静悄悄的,几千只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谆谆教导,部队就像久旱之后滋雨的禾苗,又恢复了生机……他的讲话刚一结束,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士兵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欢乐和激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士兵们私下又议论起来,都说:“毛委员真不简单!我们的心他全知道,他的话句句都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最后,大家都满怀信心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干!跟着毛委员干,怕什么!”^①

范树德在1988年的回忆中讲到:“文家市里仁学校东边有个操场,部队奉命在此集合,听说毛委员要向大家讲话。毛泽东同志是‘农运大王’,早已闻名全国,有很高的威望,他一到文家市就传开了。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几千只眼睛的视线集中在里仁学校的侧门。一会儿,卢总指挥领着几个人从这门出来了,其中一个蓄长发,着中山装,穿草鞋的高个子,神采奕奕,站在卢德铭侧边。卢指挥官向大家介绍,这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现在请他给我们讲话。毛泽东同志向大家点头示意,用双手按了几按,说:‘请大家坐下!’然后向大家说,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没有枪杆子,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革命受点挫折不要紧,失败为成功之母,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总有一天会胜利的。只

^①《红旗飘飘》第13期第5—6页。黄永胜(1910—1983),湖北咸宁人。1927年12月加入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为第一团第九连战士。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等职。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8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3年4月病逝。

要大家团结紧，团结就有力量，一双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长沙打不了，我们不去了，要到边远的农村，去找一个落脚点，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长，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很深的。”^①

陈士榘^②回忆说：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一千五百多名红军战士和三百多名当地干部、群众翘首以待，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毛委员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微笑着挥动双手请大家坐下，他说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很快！多快呢？就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矛盾很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代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同大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没解决，中国是一束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便会燃烧起来，中国革命是前仆后继的，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的革命困难很多，但不是孤立的，它有国际共产主义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国内各族人民的支持，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只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光明就在前头！操场上，人们情绪激昂，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人心头就像点燃了一把火。^③

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35页。

②陈士榘(1909—1995)，湖北荆门人。秋收起义时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兵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

③见陈士榘1987年5月为纪念秋收起义60周年而撰写的回忆文章——《血染的井冈山道路》。

肖克、何长工在回忆文章中记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之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最后,毛泽东同志着重地指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是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①

毛泽东在文家市会师大会上的讲话,感人肺腑,给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情况是严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热情地指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大家该怎么办,给干部战士加油鼓劲;用通俗易懂的道理阐明了进军的方向,要放弃攻打长沙城的计划,退到农村去巩固发展革命的力量。毛泽东的讲话像一盏明灯,照得大家心里亮堂堂、暖洋

^①肖克、何长工:《秋收起义》第41—42页。

洋,革命信心倍增,革命精神大振,革命情绪高涨。毛泽东的讲话,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更加深刻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文家市会师转兵,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战略的伟大转折和新的起点。

工农革命军会师大会和毛泽东的讲话,使在场的当地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不少青年纷纷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部队离开时,群众主动帮助抬伤员、带路。贫农张祖典自愿给部队带路,并帮助挑担数十里,经多方劝阻才回家。部队的同志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他家里很穷苦,连一床被子也没有,于是送给了他一床新棉絮,使他很受感动,一直珍藏着它。直到1977年浏阳建立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时,他才把这一床当做珍珠宝贝一样,收藏了50余年之久的棉絮献给了纪念馆。该馆陈列室至今还陈列着这一体现工农革命军与百姓深情厚谊的珍贵文物。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文家市革命群众亲切告别,怀着坚定的信念,高举着革命的红旗,离开了文家市,开始了先向萍乡、再向湘南转移、最后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伟大进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第十章 退往萍乡,进军井冈山

秋收起义部队9月21日离开文家市,本拟经过萍乡县城及其东南6公里处的安源,往湘南行进。不料9月22日到达萍乡县城以北40多公里处的集镇上栗市时,探知县城有敌军据守,决定避开敌军,直插县城东部的集镇芦溪(距县城30余公里),以期翻山向莲花前进。25日,在芦溪遭敌袭击,损失惨重,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士气大挫。于是急行军,一路翻山越岭到了莲花县(现属萍乡市)的高滩村和甘家村。9月26日,部队胜利地攻占了莲花县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经过一路调查研究,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确定设法在井冈山地区安家落脚。从此,转入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一、向萍乡进发,在芦溪失利

9月21日,部队从文家市开始向萍乡进发,经严塘、孤岭、余坊、樟树下到达萍乡县境内北部的小镇桐木宿营。第二团团部派了一些同志到附近做宣传工作,宣传秋收起义的意义,贴了许多标语。第二团战士彭昌萍留在他的家乡桐木开展革命工

作。彭昌萍是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随部队攻打萍乡、醴陵、浏阳，后在浏阳遭到敌军的反攻。他在激战中冲出了包围，从浏阳一直跑到了文家市，参加了会师。他留在家乡后很快在桐木组织起了一支队伍，开展游击斗争。当时由彭昌萍介绍加入共产党的曾慎万回忆说，彭昌萍“留下在当地发展秘密组织，我、陈风祥、彭升年、赖立亮、彭升星都是他发展入党的，于1928年2月间在大塘边蛇山岭上宣的誓。以后彭昌萍同志一直在宜(春)萍(乡)边境坚持游击战，任第七大队队长。缴流江黄家祠地主武装的十五支枪是彭昌萍亲自率领100多人去的，后在永新牺牲了”^①。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时，探知萍乡县城方向有敌人重兵把守，不能通过。余洒度报告说：这时“闻萍乡有敌军，不能通过，改道芦溪。”^②芦溪是萍乡县城东30多公里的一个镇子。芦溪以南翻过一座大山就是莲花县。改道芦溪实际上是避开萍乡、安源的敌军直接朝井冈山、湘南方向前进。于是部队决定沿萍乡、宜春两县边界南下向芦溪方向进发。在向芦溪行军途中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吴德祥回忆说：

部队从桐木出发，经圳口、枣木桥，中午到了小洞，下午两点到了快荣(属江西宜春县——引者注)，我们就在路边休息。负责宣传的同志把老百姓召集到土豪黄金源家门口的坪里开会。因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又怕土豪，所以只来了几十个人。针对这一情况，搞宣传的同志对群众讲：我们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土豪劣绅是喝我们的血的，他们剥削我们，压迫我们。我们应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让老百姓去抄黄金源的家，但只有少数人去了。我们调来搬运队，从土豪家里抄出大量钱、粮、布匹和衣服。我们把一些布和衣物留下给

①访问曾慎万、彭祖明回忆记录(1970年5月18日)，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②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12页。

老百姓。大约过了一小时后，我们又出发了。^①

9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经暗田到达小枧宿营。吴德祥回忆说：“经暗田到达小枧，这时天已快黑了，我们约七八十人住进了沈家祠，其余部队在小枧街和附近。我记得沈家祠是在小枧街头路边，旁边住了一户人家。我们用自备的炊具在那家的灶上做饭。吃过饭后，连长跟我们谈话，要我们去当兵，我们都同意了，登记后把我编入炊事班，李子秋和温隆彬编在另一班，并给每个人发了符号和系在脖子上的红带子，还发了一吊钱，这钱比我们六个纸工的工钱还要多。”^②24日吃过早饭后，部队出发，经羊子山、楼下、泉江，傍晚到达芦溪。部队沿途纪律严明，宿营大多数住在祠堂、庙宇里，一般不占用老百姓住房，如遇特别需要，经房东同意后，也只住在厅堂或空屋里。临走时，将房子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许多老百姓帮助部队挑东西、抬伤病员，部队都一一付给工钱。这些都给驻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文家市到芦溪的路程不远，走了4天，这是因为一则避免与敌军遭遇，走了不少弯路；再则部队中许多人患疟疾，行军极为困难。按照计划是在芦溪街宿营，因为一路上没有发现敌情，且在街上宿营方便，所以部队一到芦溪即在街上四处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宣传工农革命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等革命道理。深受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芦溪工农群众纷纷为工农革命军烧水送粮，并送来一只大肥猪，慰劳部队官兵。

遵照指挥部命令，黄昏前，所有官兵均安顿好，并布置了警戒，一些连队开始做饭。突然接到转移命令。原来部队侦察获悉：“从江西袁州（即宜春——引者注）经芦溪至萍乡的大道上，陆陆续续有敌向萍乡前进，三三五五数目不详。”^③为了部队的安全，

①访问吴德祥记录（1970年5月），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68页。

②访问吴德祥记录（1970年5月），原件存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69页。按：吴德祥等三人在芦溪战斗中被打散，两人回家，一人下落不明。

③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1页。

毛泽东断然命令部队立即转移,并命令途中不准点火。当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起义部队遵照命令,连夜向芦溪南端的大山区方向转移。从芦溪街上到西部的大山脚下有十余华里的路程,中间都是水田,田埂小路狭窄,加上天黑,部队直到深夜12点才陆续到达目的地,在靠山的羸场、林家祠、狮子岩、李家屋场、高楼、更田、欧阳宗祠、王家坊、象形里、沈家祠一带宿营。部队驻地立即生火做饭,有的连队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吃完饭。由于连日激战和长途跋涉,工农革命军官兵疲惫不堪,刚躺下便呼呼大睡。工农革命军宿营芦溪的当天晚上,在萍乡和宜春通往芦溪的路上,有两支部队正向芦溪方向蠕动。原来是国民党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保安团得知工农革命军驻扎芦溪,正悄悄地向芦溪进发,企图一举歼灭秋收起义部队。

25日拂晓,工农革命军指挥部发出开拔的号令,刚入睡数小时的部队官兵又出发了。行军次序为:毛泽东、卢德铭率第一团一营走前头,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率第一团二营及第二团余部,挑着大小行李走中间,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率第三团为后卫,经山口岩进九洲,向莲花方向前进。



芦溪山口岩战斗旧址

山口岩是进入大安里山区的咽喉要道，中间是水深湍急的袁河，两侧是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第一团一营从山口岩进山后，该团二营和第二团战士挑着行李，稀稀拉拉地成纵队前进，队伍拉得很长，将第三团甩到了后面。因为天黑路窄，第三团渐渐迷路了。一团用号音与之联络，第三团虽也答号，可就是找不到前进的道路，向导只知去杨村，但相反的方向也有一个杨村，于是第三团竟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等发现走错了方向时，已经有人向他们开枪了。时任工农革命军师部参谋长的陈树华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部队）走了约十里来路便听见后面枪声越来越响……（余洒度）便要我返回去查情况。我往回走了约二三里地，在一个急弯的地方遇上三团参谋黄坚。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有几个农民在山上打枪，不碍事。”我再问他：“第三团作何处理？”他说：“不理他，他们照样前进。”按原则说，如果少数人滋扰，不要自我惊慌也是对的。但我要他同我再回去看看，到底如何。他说：“我刚刚从那里来，说没有事就没有事，还不相信我吗？我不去。”我说：“那我一个人去。”他又坚决挡我不要去，并说：“还是早让师长放心为好，转回去吧！”^①

不一会儿，后面的枪声越响越密，只见第三团的人争先恐后向莲花方向逃去。团长苏先俊也来到了师指挥部。原来在约半小时前，担任后卫的第三团官兵沿袁河东南侧直上，经山口岩时，江保定特务营赶到，突然向第三团开火。第三团由于事先侦察不力，以为只是小股国民党团防武装，未能组织猛烈的火力反击。10多分钟后，自宜春方向赶到芦溪的国民党江西第四保安团从西北方向直扑山口岩的白泥山，配合江保定营追击第三团。第三团被敌军追得慌不择路，行李又

^①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61、162页。

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走不动。除了伍中豪带了1营人从左侧登山追上本队，其余被打得溃不成军。等到苏先俊孤人独马赶来时，敌军已追到了，两军交锋甚烈。当国民党军队向上冲锋而起义军反击时，苏先俊却误以为向上冲的是自己的部队，大呼：“师长，停止！那是第三团的兵，统统打死了！”待到真的吹号停止时，国民党军队从右翼方面爬到了山腰，左翼方面也直冲到离师部不足两百米的地方，想再恢复抵抗时，第二营已从山上排山倒海般溃败。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总指挥卢德铭挺身而出，亲自率1连兵力返回山口岩，夺下白泥山头，英勇地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撤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当工农革命军大队人马安全进山后，卢德铭即率掩护部队撤出战斗，经山口岩南侧的黄泥壁转移。从白泥山到黄泥壁中间有段开阔地，当掩护部队还在开阔地行走时，敌人已经占领了白泥山制高点，向掩护部队疯狂扫射。卢德铭骑着高头大马，目标太大，不幸中弹倒地，壮烈牺牲。当工农革命军战士撤到黄泥壁与敌对峙时，敌人亦不敢贸然追击。部队在芦溪战斗中，“损失步枪200余，死伤同志数十，卢德铭亦失踪”^①。对于芦溪一战的惨重损失和卢德铭的牺牲，毛泽东非常痛惜。38年后他重上井冈山，在茨坪同江西省委负责人交谈时，感慨地说：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②

^①苏先俊报告(1927年10月11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第638页。

^②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3页。



卢德铭烈士纪念碑

芦溪一战，幸亏卢德铭卓越指挥和战士们奋勇抗击，得以粉碎敌人要在芦溪消灭工农革命军的企图，保存了有生力量。

部队撤出战斗后，分两路向大安里进发，到达九洲的白马庙会合后，继续分两路：一路沿大路至九洲、坑口到达张家坊的江口村李家祠；另一路从白马庙侧面上山，经天王庄、水菟冲、报恩台、草子坳到达朱家陂。在到李家祠的路上两支部队会合一起，中午到达张家坊，在那里吃午饭。饭后，部队不敢停留，继续前进，冒雨经瞿田、上杂、龙上、劣马山，直往莲花县的高洲乡进发。

二、攻取莲花县城

秋收起义部队在芦溪遭到敌军的袭击，伤亡极其惨重。部队一路艰辛，加快了行军的步伐，向莲花方向撤退。

莲花县在萍乡县南面，东北与安福县接壤，南为永新县，西靠湖南攸县、茶陵，全县四面环山。对起义军来说，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党组织的基础，是建立根据地的比较好的地方，后来这里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余洒度、苏先俊率第三团几十名官兵甩掉敌人，首先进入莲

花；在芦溪战斗中被打散的由第三团第三营营长伍中豪率领的第三团余部亦同时赶到。他们与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第一营前卫部队在谷口会合。毛泽东一路收集被打散的士兵，艰难地集合部队，翻山越岭，于9月26日进入莲花县高洲乡。当晚，部队在高洲的高滩村和坊楼的甘家村宿营。毛泽东立即派员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顾劳累，在甘家村的甘松恩家里会见当地共产党员甘明山等，听取了他们关于大革命失败前后莲花情况的介绍，了解到几天前（9月18日）当地党组织领导农民武装攻打县城的情形。

原来在9月间，莲花县反动地主武装保安大队李成荫勾结永新靖卫团李亦然部进攻上西的莲花农民自卫军，并在九都大肆烧杀，烧毁民房100余栋，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0余名，并断绝了上西的交通，禁止上西人进城买盐。凡此种种，激起了群众极大愤慨，纷纷向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要求打回县城去，消灭地主武装，活捉李成荫。9月15日，朱亦岳、陈竞进^①等人在九都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党员有陈美、陈大仁、贺国庆、陈全标等20余人。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认为莲花县大革命失败，主要是因为敌强我弱，工会、农会没有注意整顿和巩固，革命武装少，战斗力不强。会议制定了攻打县城的计划，初步决定9月18日攻城。

9月18日傍晚，奉命进城探听消息的两名党员从县城回到九都，向党组织汇报了侦察结果：原来永新靖卫团李亦然部早已撤回永新，莲花县城只有李成荫的保安大队10余条枪。于是，党组织决定，当夜行动，由陈竞进、贺卓群、陈美、陈大仁、陈全标等人带领农民自卫军和群众七八百人，分西、北两路攻打县城。出发前召开了动员大会。陈竞进在会上讲话，说明这次攻城的目的，是消灭保安队，活捉李成荫。晚上10时许，前锋达到县城北门，贺国庆带几个人从琴亭桥爬城墙进去，然后打开城门，队伍蜂拥而进，高声呐喊，惊动了敌人。顿时枪声四起。原来当夜正好有1

^①陈竞进（1898—1933），又名陈兆林，江西莲花人，中共党员。1928年组建和领导莲花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后改为红色独立团，任团长。1933年被错杀于永新。

营国民党军队路过莲花，在县城宿营。李成荫听到喊杀声，当即向国民党军队求援。国民党军营长王某当即指挥士兵向农军射击。陈竞进指挥农军冲出县城，但为时已晚，敌人已将城门关闭，分路包抄过来。自卫军拼命与敌人拼杀，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农军死伤惨重，60余人牺牲，70多人被捕。次日，又有64人被敌人押赴刑场枪杀，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农民自卫军队长贺卓权被杀害后，还被敌人在北门悬头示众。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知道城内只有一些保安队守卫，战斗力不强，当即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作出了战斗部署。

26日清晨，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向莲花县城进发。手持梭镖、镰刀、锄头的1000多名农民跟随起义部队，由当地共产党员刘青元带路，取道田东富冲，走谷西坡转入渐潭。毛泽东派人秘密到县城侦察，证实守敌不多，于是兵分三路进攻县城。敌军不敢应战，弃城而逃。起义部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占领了莲花县城，冲进县公署，活捉国民党莲花县党部负责人刘启沛和县保安队长贺国安等人，并打开监狱，救出7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粮仓和当铺，把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这是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会师以后打的第一个胜仗，攻克第一个县城，起义部队全体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这时，毛泽东抓住时机，发动群众踊跃参军，扩充队伍。就在民众纷纷报名参军的时候，余洒渡出于“老同学”的关系，擅自将被捉的莲花县保安队长贺国安放走了。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当晚，余洒渡通知在县公署开会，毛泽东因见部队处境危险而不同意在此开会，两人发生争执。陈树华回忆说：“晚饭后，余洒渡通知开会。我记得在县政府一间长方形的小房间内，我到时只有三两个带部队的人在。一会毛委员来了，他一坐下来就说：‘你现在开什么会？我们几千人的性命还处在危险的地位，你开会管什么用！’余洒渡反唇相讥说：‘呀！原来你是怕死呀！’余拍拍胸口继

续说：‘我担保！要是你死了，我把命赔给你！’彼此拍桌子说了些气话，会未开成，不欢而散。”^①此时士兵已经精疲力竭，但毛泽东坚决要求将队伍带往安全地带宿营。余洒度不敢有违，只得带领部队重新上路。当夜星月无光，部队摸索前进，走了约 10 华里，东方开始发白才在一个村庄宿营。

莲花农军 9 月 18 日攻城失败后，撤往攸县石桥和莲花上西山区一带的莲花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②、陈竞进、刘仁堪、李伟^③等人得知秋收起义部队攻克莲花县城，立刻连夜下山，赶到县城。27 日清晨 3 点，毛泽东在宾兴馆上厅会见了刘仁堪及李伟（朱亦岳带领的另一路人员因路上受阻，未能及时进城）。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了解当地党的组织、工农运动及武装斗争的情形，指示莲花党组织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重视武装力量的发展，依靠群众，坚持斗争。



莲花宾兴馆会议旧址

- ①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 164—165 页。
- ②朱亦岳（1892—1931），字首云，江西莲花人。大革命期间曾任国民党莲花县党部执委、中共莲花县特支委员会书记，后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等。1931 年因病在泰和县逝世。
- ③李伟（？—1929），江西莲花人。曾任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 年在莲花苏区肃反中被错杀。

由于长途行军作战，饥饿、疲劳、疾病接踵而至，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特别是芦溪战斗失利后，部队中弥漫一股消沉情绪，少数人不辞而别。毛泽东本拟在莲花作短暂停留，部队进行休整。正在这时，第三团在铜鼓时派往南昌与中共江西省委联络的宋任穷带来江西省委一封信，并转达江西省委口信：“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宋任穷回忆说：

（部队在铜鼓时）我在团部的秘书处做文书工作，团长是苏先俊，党代表是潘心源，参谋长是罗纳川。部队在铜鼓住了一段时间，江西省委来了一个交通员，要我们派一个人到南昌同江西省委联系。我们那个团的党委（也是浏阳县委），便派我同交通员一起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行动。当时，我只有18岁，这是我第一次出省到大城市去。

……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这个人以后成了托派，同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我拿了密信，伪装夹在许多纸内，便赶回铜鼓县城。当走到离铜鼓还有几十里路时，听说部队已不在铜鼓了。于是我按临行时团党委交代的，如部队不在铜鼓，可向莲花厅一带去找。我便按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我走到陈家坊（可能是莲花县境），找到了团部。这时，团的领导同志将我离开部队10多天的情况告诉了我……于是，晚上我便亲自将

信交给了毛委员。^①

宋任穷带来的信息，和王新亚在安源会议上所讲宁冈的情况完全吻合，促使毛泽东决心尽快到达宁冈。于是，他立即改变主意，决定不在莲花休整，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刘仁堪^②、朱义祖^③随军带路，向永新进发。27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离开莲花县城，经扬枫、彭塘山、竹湖、船形坳来到了“脚踏莲花的土，烧着茶陵的柴，喝了永新的水”的桥头村，在那里吃午饭。毛泽东在刘仁堪陪同下察看军事地图，并向当地居民了解进军井冈山的路线，然后率部开始向永新三湾进发。

三、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部队从莲花出发，经过桥头、永新的文竹、九陂，于9月29日到达三湾。

三湾位于江西永新、莲花、宁冈和湖南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北麓。经过长途跋涉和几次艰苦的作战，这时的起义部队不过千人，大部分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刻骨仇恨，在艰苦的斗争面前能经受考验。但由于疲劳、疾病以及沿途的蚊叮虫咬的威胁，又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部队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一些人对革命的前途感到悲观动摇，一些军官存在着随意打骂士兵等军阀主义作风，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逃跑和不辞而别现象时有发生，部队的战斗力有所削弱。赖毅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已成定局，纷纷

①宋任穷：《回忆井冈山的斗争的一些往事》（1974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191—192页。

②刘仁堪（1895—1929），江西莲花人，中共党员。曾任莲花县农协委员、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③朱义祖（1900—1931），字甘芳，江西莲花人。1926年与朱绳武等8人创建了中共莲花小组，1927年随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龙市军官教导队学习，1928年任莲花县委员、组织部长。1931年在苏区肃反中被错杀。



三湾枫树坪

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带上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①特别是在部队中的各级组织没有普遍建立，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在艰苦的战斗中很难做到对士兵的全面管理。如果不改变部队的这种状况，部队的未来难以预料。就在部队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其居住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余洒渡、苏先俊、余贲民、张子清、宛希先、熊寿祺、陈浩等。会上，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和组织状况，特别指出部队存在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当前的组织形式已很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的主张。在前委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176页。

东的提议。从9月29日至10月3日，部队在三湾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编。整编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前委会议后，毛泽东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作了重要讲话。关于这次讲话的情况和内容，谭政在《三湾改编》一文中作了生动具体的叙述。他说：

到了三湾的第二天……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出来讲话。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蓄着有两三寸长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衣服，脚上打着一双绑带，套上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跑到部队面前，顿时会场沉寂的空气，突然呈现热烈的气氛。大家高兴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人可以当敌人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①

毛泽东的生动讲话扭转了部队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大家认识到只要坚持斗争，革命的力量一定会壮大的。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增强了对革命的信念。毛泽东亲自到连、排、班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跟战士讲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使干部士兵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为三湾改编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组织上的整顿。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部队的缩编。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后，名为1个师，实际不足千人，如果仍维持原来庞大松散的架子，显然不能适应艰苦行军和频繁战斗的需要，也不便对部队进行机动灵活的指挥。于是，决定把1个师缩编为1个团，下设2个营7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把

^①谭政：《三湾改编前后》，原载195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见该书第141页）时略有修改。

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战斗员和伤病员分开，使部队更精干，增强战斗力。对于动摇不定的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愿走者发给路费，开证明允许离队，希望他们到地方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共700余人，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李建启。最高领导机关仍是秋收起义中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经过这样的整顿，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了，但却精悍得多了；编制虽缩小了，但战斗力大大增强了，为后来上井冈山进行武装割据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组织整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并在这些军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以北伐时期党所掌握的部分革命武装为骨干发动起来的，但这些军队都是以团为单位建立共产党支部，而在战斗基层单位连队则没有党的组织，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失败，秋收起义部队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中党组织的力量和党的领导太薄弱。毛泽东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在三湾改编中，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组织设置了党代表，以党代表充任本级党组织的书记，军队的最高领导是党的前敌委员会。

这次改编，通过组织整顿，撤换了不称职的指挥员，其中主要的是余洒度和苏先俊两人。余、苏二人既缺乏指挥才能，又骄横跋扈，不爱护部队，不听从党的指挥，军阀作风严重。他们在起义的战斗过程中指挥失误已经造成损失，不把他们从指挥位置撤下来，势必会继续造成损失。撤换了这一批人后，毛泽东改组了前敌委员会，书记仍由毛泽东担任，增补了宛希先、熊寿祺等人为前委委员。党的前敌委员会既领导军队，也领导地方，是当

时党政军最高的权力机构。

部队通过改编,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量显著增强。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对确保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①

第三是政治上的整顿,即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前,部队存在着许多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作风,如官长打骂士兵,官兵待遇不平等。这种不正常的官兵关系,严重地影响了士兵的积极性。

为了建立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民主改革。罗荣桓在回忆到这个问题时说:

为了扫除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风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实行民主政策。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①

这种让士兵群众在政治上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的改革，就使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都得到了保障。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

在三湾改编中，部队里不但实行政治民主，而且实行经济的民主，旧式军队不仅政治上压迫士兵，而且在经济上克扣士兵。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扫除了这种旧军队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连队的正副采买负责经济管理，每月公布和清查账目，分伙食尾子。这样做不仅克服了过去官兵生活中待遇悬殊和干部特殊化，而且真正做到了官兵生活待遇平等，缩小了官兵之间的距离，建立了亲密的官兵关系。士兵委员会组织由民主选举产生，连部召开士兵大会，选举5至7人组成士兵执行委员会，推举主席1人。营级士兵委员会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推举1个代表组成，推举11人至13人组成营部干部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推举1人为主席，团级、军级的士兵委员会分别按全团在全军人数的不同比例选举产生士兵执行委员会。连、营无常设机关，军团常设机关均在政治部内办公。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队伍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做群众工作，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

三湾改编，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一个转折点，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这段路（指从莲花到三湾——引者注）走了两三天，才到达三湾。在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军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②

在三湾，毛泽东已经着手落脚井冈山的准备工作。在文家市收拢部队的时候，毛泽东想到王新亚在安源告诉他必要时可以去井冈山找袁文才、王佐的那些话有道理。在莲花，接到宋任穷带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信，讲到宁冈有党的武装队伍。一路走

^①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转引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119页。

^②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87页。

来,边走边了解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到井冈山找落脚的地方;而要落脚井冈山,做好争取和团结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是一个关键。于是,他在三湾便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一封信,由此开始取得联系。时任三湾村党支部书记的李立回忆说: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我们三湾,住在谢生和杂货铺。当时,我是在三湾村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到宁冈茅坪袁文才那里去。毛泽东同志已了解到这支队伍。我接到由李德胜转交给我的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回到家里与父亲李长寿商量,叫我叔叔和我一道送到宁冈去。袁文才接到信很高兴,给了我一块银洋。随后,袁派了军事参谋陈慕平与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道,跟我们来三湾与毛泽东同志接头。^①

10月2日,毛泽东在三湾会见了龙超清、陈慕平等人。“他们将宁冈的详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时毛泽东就对井冈山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②,对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袁文才

王佐

袁文才又名选三,江西宁冈茅坪马源坑村人,生于1898年10月,出身中农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勤劳的农民,因世代无读书人,受人欺压,发誓要袁文才读书。袁文才由小学上至中学,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回家。后因带头闹粮,与当地豪绅结下冤仇。地主豪绅勾结北洋军阀,派1连军队洗劫了袁家,袁母被活

^{①②}《访问李立同志谈话记录》(1983年10月),转引自龙正才《关于何时何地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242、243页。

活打死。为了给母亲报仇，袁文才于1927年加入胡亚标的绿林马刀队，被迫当土匪。王佐，生于1898年，家境贫寒没有读书，后学裁缝谋生。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拉起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井冈山大小五井过着绿林生涯。袁、王两人患难与共，又因同年出生，结为“老庚”。两人在山上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四出“吊羊”，成为当地的两条绿林好汉。

第一次大革命兴起之后，宁冈县新城塘南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龙超清受党派遣，于1925年7月从南昌回到宁冈领导革命，上山说服袁、王率部队下山。同年10月，袁、王接受宁冈县政府招安，进驻县城。1926年9月，当北伐军向赣西进军逼近宁冈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文才率部举行武装起义，驱逐北洋军阀派的县知事沈清源出境，成立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掌握宁冈县政权。1926年底，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大部分垮台，地方武装枪支大多数被地主豪绅缴去，只剩下袁文才、王佐各60支枪在井冈山附近。1927年7月，袁、王会同赣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新亚，带领安福农军围攻永新县城，袁、王部队率先进城，解救了永新县党和农会组织的负责干部及党员贺敏学等80多人出狱。事后，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均随袁、王撤到宁冈茅坪附近，在象山庵、步云山一带藏匿。

以上情况表明，工农革命军完全有可能与袁、王合作。于是毛泽东在三湾决定团结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三湾时增补为前敌委员会委员的熊寿祺回忆说：“我记得，毛主席在三湾的时候，提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问题……毛主席指出，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肯定要失败。”“毛主席还讲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毛主席又讲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把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

会被敌人打垮。”^①

10月3日,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浩浩荡荡向宁冈进发。

四、古城会议,茅坪安营

工农革命军10月3日从三湾出发,经过熊谷坳、石口,当天到达离三湾30华里的宁冈古城。古城是宁冈县的老县城。宁冈县原称永宁县,县城设在升乡,后来县城迁往新城,原来的县城升乡即被称为古城^②。秋收起义部队10月3日到达古城,当天晚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古城会议。这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地说:“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山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当他乘坐的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的时候,他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前委委员余洒渡、余贲民、陈浩、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以及部队营以上干部,还有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谢汉昌、肖子南,共40余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和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问题。龙超清在会上介绍了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分析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与可能性。经过讨论,与会人员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井冈山

^①转引自龙正才:《关于何时何地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241—242页。

^②1913年永宁县改称宁冈县,县城仍在新城。新中国成立后,才将县城搬到龙市。

^③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91页。

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讨论到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领导的农民武装的问题时，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通过讨论，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对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何长工回忆说：

会议讨论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这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大山上，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豪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却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①

古城会议后，为了做好团结袁文才、王佐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袁文才将会见地安排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住着十几户客籍山民。10月6日，袁文才在大户林凤和家，一面杀猪迎候毛泽东，一面在林家祠堂暗地里埋伏了20多个人，以防不测。他见毛泽东没有带兵来，只有几个随从，便撤去埋伏，开始和毛泽东亲切会谈。席间，毛泽东说明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表明工农革命

^①《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古城会议旧址

军决心在宁冈落脚安家,建立根据地,并热情赞扬袁文才的革命斗争精神,提出赠送 100 条枪给袁文才,鼓励他们扩大队伍。袁文才深为感动,表示一定尽力解决工农革命军的吃粮和伤病员的安置问题,并立即送给工农革命军 800 块银洋。以此为开端,袁文才、王佐迅速与工农革命接近。稍后,两人的队伍都加入了工农革命军。

从古城会议到大仓会见,毛泽东以他的睿智和真诚,逐渐赢得了袁文才的信任和帮助,工农革命军开始在茅坪安营扎寨。10月1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进行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从此,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结束语

古今中外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及其辩护士们总是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国民党反动派同样把秋收起义视为少数人活动的结果,共产党和毛泽东被他们诬蔑为“匪”,正是从秋收起义那时候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在否定毛泽东的时候,竟把领导秋收起义视为毛泽东个人的罪状。他们的谬论是:毛泽东破坏了陈独秀的选择和道路,发动秋收起义,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历史已经无情地驳斥了这种种谎言和谬论。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包括20多起秋收起义在内的几百起武装起义,绝不是少数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残酷地镇压人民反帝反军阀革命而激起的强烈反抗;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条件下空前激烈和尖锐化的结果。这些起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奋斗精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强大而凶残的国内外敌人面前的大无畏气概。正如毛泽东所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

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几百次武装起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领导的,因而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特点和优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当时发生的全国三大起义中,论规模和当时对国内外的影响,不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它在八七会议后三个月湘鄂赣粤四省发生的20多起秋收起义中,和在此前后一年间全国各地发生的270多起武装起义中,规模和当时的影响也不是很大^②。然而,若论对中国革命的独特历史性贡献和深远影响,如本书导言所述,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由任何人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起义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决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里最为成功,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这里也就显得最为出色。

一、特定条件下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 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结果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生在湘鄂赣粤四省的结合部。湘鄂赣粤四省地处中南,鸦片战争以来,便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复杂而尖锐的典型地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舞台。抗英的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萍浏醴起义、广东多次起义到武昌起义等等,都发生在这一地区。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②据《中国革命武装起义全录》记载,鄂南秋收起义有7个县10余万人参加,坚持40多天,杀土豪劣绅七八百人。鄂北秋收起义有三四万人参加。秋收起义以外的其他武装起义,参加人数在10万以上的有3起,10万以下2万以上的有11起,2万以下1万以上的有10起。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地区更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国共合作成立于广东。国共合作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以这四省最为成功。国共合作的革命战争首先在广东取得成功，北伐战争以大战湘粤大道到攻取长沙、武汉和南昌最为辉煌。北伐军在这里大显军威，叶挺独立团和第四军也正是在这里荣获“铁军”称号。同样，北伐军在这里获得民众最广泛最有力的支援，才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一地区工农民众的英勇参战助战，在国民革命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大革命时期全国工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湘鄂赣粤四省是当时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省份。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湖南，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武汉。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土地革命，是由湖南农民首先强烈地提出来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及其助手和后备军——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实力最雄厚的地区也正是湘鄂赣粤四省。对大革命的胜利起决定作用在这四省，对大革命失败起最后的决定性作用的也在这四省。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一伙的屠刀下，上海和广州街头血流成河；在湘鄂赣粤四省，特别是在两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洒遍了城市和广大农村，被惨杀的人数之多和流血之惨烈，比上海、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湘鄂赣粤四省便成了秋收暴动主要发生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样独特的环境和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结果。

从秋收起义的历史准备来看，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土地革命，其主要的组织形式——军队，主要的斗争形式——战争，革命的统一战线和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建设，等等，都以湘鄂赣粤四省为主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正是大革命高潮在这四省为秋收起义和以南昌起义为开端的红军战争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准备好了经过一次革命的民众。从对秋收起义的直接准备来说，起义中的正规军队——卢德铭所部警卫

团,它的前身叶挺独立团组建于广东,它发展扩大为一个师又三个团,主要是在湘粤大道、湘赣边界和武汉。警卫团的组建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张云逸、卢德铭等集体努力的结果,而它的兵员则主要来自湘鄂赣三省。平、浏农军和集结在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来自湘鄂赣三省各县,这些工农武装都是各县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平、浏农军和警卫团奉命去南昌参加起义,在江西境内往返,得到江西各地群众的帮助,到达修水、铜鼓后,得到修、铜两县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支援和拥护,修、铜两县并有不少群众参军。中共湖北省委接待赴武汉向中央请示的卢德铭等,指示他们回湘赣边参加起义,并给予经费和人员的帮助。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灰色掩护合法存在。起义爆发后,军队发动作战,铁路工人和各县民众参加暴动。起义军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沿途各县党组织和民众给予帮助等等。从历史的准备到开始酝酿和组织,从起义爆发和到达井冈山落脚,在所有这些方面和环节上付出了努力的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都对起义作出了贡献。这次起义,是湘鄂赣粤四省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集体奋斗的伟大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里程碑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能够对中国革命作出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里最为成功和出色。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从创建党的时候起,毛泽东成

^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就创造了许多特别出奇的成就。毛泽东 1926 年 9 月写的一篇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的一段话，通俗地表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结合是怎样实现的。他写道：

（我们的同志）要立刻下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寒冷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需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①

这段话，事实上是毛泽东自己自 1921 年秋天起先后开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时工作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所说“向党里要到命令”的“党”，是指国民党，但实际上也是指共产党。这段话说的是从事农民运动的党员，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向党要到命令”）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痛苦和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与各界民众一起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相互结合，是由调查研究、思想教育、组织起来、开展斗争这样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的。调查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调查现状和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研究其本质，形成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理论。这个环节，毛泽东后来归结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又说过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党的少数知识分子创造理论的过程，也就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形成的思

^①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 年 9 月 1 日）。按：《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编辑的一套丛刊。

想理论，由党组织把它灌输到群众的实际运动中去。灌输的过程，首先是进行思想教育，即由党的组织向群众宣传少数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理论，造成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毛泽东后来把这个环节称为“中心环节”^①。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工作，把上述思想统一用组织的物质统一巩固起来，少数先进分子形成和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和地方建立政权、组织军队等等。接着是领导群众开展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把党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的物质统一变成改造社会的物质活动。开展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出发点和归宿，又是这种结合的强大杠杆；通过斗争，壮大党的组织，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党的少数知识分子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新条件下的思想理论，再灌输到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思想教育、组织起来、开展斗争，这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四个基本环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全部过程。在这种结合中，思想理论逐渐丰富，组织和斗争也逐步发展。党的创立，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北伐战争，无一不是由于这种结合的成功。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②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两者结合得不好，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

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这一方针，是在大革命失败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这种结合的新阶段的标志和开始。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土地革命是挽救革命和深入发展革命的

①《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②《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唯一出路,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由革命政权来执行,政权必须靠枪杆子来建设和保卫,而土地革命、建设政权、武装斗争,都必须由共产党自己独立地领导。这些,对于共产党来说,都是过去没有遇到的具体革命实践。八七会议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互结合得好的表现。关键正在于所有的革命实践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概念化的。执行每一项具体实践任务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层次的具体实践,一直具体到让起义的参加者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例如,八七会议方针确定土地革命这项具体革命实践之后,中央只规定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究竟怎样没收和分配土地,由谁来没收和分配等等,中央只字未提。到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如果不解决这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革命实践任务,土地革命便没法进行,实行起来必然会混乱、错误、失败。其他几项具体实践,建设政权、武装斗争、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也都是如此。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一个又一个层次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具体地、一节一节地、一点一滴地把革命引向胜利。他在执行每一项具体革命实践任务的时候,都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工作方针。这当中有三个要点:一是要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二是抓住实质,三是要敢于坚持和尊重实际。例如,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国民党在群众中已经臭了,得出国民党的旗子不能再打了,再打必定再失败的结论。这是当前的事实,是历史的经验。毛泽东早年就说过:“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理论上说得好,事实上做不到的”,他都不赞同,因为“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①。国民党已经在群众中臭了,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是当前的,是任何人都消灭不了的。可是,当时党中央却不顾这个事实,硬要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子。毛泽东吸取过去

^①《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1920年)、第三集(1921年)毛泽东1920年、1921年给蔡和森等的信。

“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①这个沉痛教训,在关系到革命成功的大问题上,一再重申自己的主张,最后毅然丢掉国民党的旗子,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同样,在要不要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问题上,能不能单纯依靠农民暴动的问题上,是要民选政府还是要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是不顾条件一味要求全省同时暴动还是集中力量、缩小暴动区域等等问题上,毛泽东都坚持尊重“当前的”“不能消灭的”铁一般的事实,抓住问题的实质,坚持自己的主张,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同样,思想教育、组织工作和领导斗争每一个环节,都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使之卓有成效。这三个环节的工作,都不能由个人去做,必须由党的组织去做。例如,思想教育,在地方是由各县各级党组织进行,军队是由军队中的党组织进行。为此,必须改进党的建设。在军队中,为了使思想教育、组织工作更加有效,保证战争的胜利,决定把支部建在连上。关于组织工作,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暴动的指挥机关不是如中央指示的设一个,而是设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两个。军队的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在三湾改编时将一个师缩为一个团,撤换了不适宜指挥军队的原有指挥人员等等。在领导斗争这个环节上,审时度势,及时停止长沙暴动,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在部队受挫以后,余洒度仍然主张攻取浏阳和长沙。余洒度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懂军事。毛泽东这时还不懂军事。但是,部队已经无力进攻长沙,这是事实,而“事实是当前的”,任何人都“不能消灭的”,任何不懂军事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否定了余洒度的主张,果断地决定撤向山区。这同样表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毛泽东这种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勇于坚持实事求是、多谋善断的风格,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出色和成功。

^①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57页。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问题”。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不断克服相互脱节倾向而相互结合是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发展的根本规律,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根本路线。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之处,它的独特本质,它的根本动力,就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互结合。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互结合起来”^①。他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阐发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互结合这一根本原理时指出:“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以后,才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历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②列宁阐发的这一根本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形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从秋收起义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寻找中国革命制胜道路的阶段。这个结合,当时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过程中,都在进行,但只有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这种结合才最早获得最大成功;这次起义,成了这种结合的新的里程碑。

三、无产阶级坚持自觉创造精神的楷模,

开辟中国革命制胜道路的先锋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贯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首创精神。这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一特点和优点,集中地表现在开辟中国革命制胜道路这一历史任务上。

自觉性和创造性,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特征。剥削阶级统治的更替,有现成的经验可以承袭。他们也不要求革命的所

①《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②《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208—209页。

有参与者都明白革命的目的和做法，甚至往往打出另一种旗号吸引群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恰恰相反，不能承袭统治阶级的经验，组织工人，发动农民等等，一切都要靠自己创造；并且，无产阶级革命是空前的自觉的革命，它要求每个参加者都不断提高自觉性，克服自发性。所以，它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说：“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①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以地点和时间转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仅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就是自己创造的经验也要以地点和时间转移来运用，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必须进行自觉的创造。墨守成规，照抄照搬，都不能算是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组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等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创造。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有时候结合得好，有时候结合得不好，因而有些创造成功，有些创造不成功甚至失败。

从秋收起义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入了新阶段，无产阶级的自觉创造也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自觉的新创造集中到一点，就是开辟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秋收起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从起义的领导者到一般的参加者，也许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进行的是开辟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必由之路，但是，他们进行各项革命的具体实践，都是自觉的，也都是首创的。这些革命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从未面对的新实践，这些新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成为起义者们自觉创造的崭新成果，也就是本书导言所说这次起义对中国革命的独特历史性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贡献。当时面对的具体实践的中心内容便是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怎样进行,没收谁的土地不没收谁的土地,怎样没收和分配土地,由谁主持没收和分配土地;土地革命要由革命政权去执行,那么,这个政权是民选政府,还是斗争中形成的苏维埃政权,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打国民党旗帜还是打共产党旗帜;政权要靠枪杆子去夺取和拥卫,那么,军队怎样组织,军队的战略方向去占领中心城市,建立城市政权还是到农村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军队是在暴动中产生,那么暴动由谁来指挥,是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还是调一两个团做暴动的发火药,是全省同时暴动还是根据各方面力量的计算缩小暴动区集中在一个区域暴动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这些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在起义的酝酿、策划、准备过程中,已经形成起义的纲领、政策和计划。起义的发生发展本身,只是实行纲领、政策和计划的起始,即组织军队,发动起义;而起义的纲领、政策和计划全部付诸实施,特别是进行政权建设,实行土地革命等项具体实践,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才实行的。自觉地实行这一系列具体实践的综合及其不断发展,便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随之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革命制胜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是开辟这条道路的实际开始。邓小平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①

四、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生发展过程的另一个特点和优点,是起义者充分显示出为民族的复兴和阶级的解放而团结一致、艰

^①《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苦奋斗的精神。这同样是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独特本质和当时面临的空前艰巨的任务决定的。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它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以它可以和必须首先把本阶级牢固地团结起来。同时,只有它能代表全体劳动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可以和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实现人类历史赋予它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以来领导的所有的斗争,都表现了这种为民族复兴和阶级解放而团结奋斗的精神。共产党一开始教导工农群众的,就是四个字:团结,奋斗,或者说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等伟大斗争,都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伟大精神。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农民运动的兴起和高涨,工人、农民踊跃参加革命军,英勇参战助战,表现了工人、农民和革命军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伟大威力。正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空前伟大胜利。

但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毛泽东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大革命失败后,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无数革命先烈雪“终天之恨”的空前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这时候,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凶残、更狡猾,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已经遭到惨重损失。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有一个军、两个师又三个团共两万三千多人的正规军队参加的南昌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正规军队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该团另外两个营基本上由新兵组成),加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装队伍的人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数不及南昌起义部队的五分之一。武器缺乏(五千多人只有两千多支枪),毫无经济来源,并有一个团三分之二的官长和三分之一的士兵患疟疾。这样一支队伍,要抗击强大无比的敌人,还要担负探索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其艰难困苦状况可想而知。然而,起义者并没有在这些困难面前退缩,更没有被大革命期间和大革命失败后众多流血牺牲吓倒。为着替千千万万先烈报仇雪恨,为着打倒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着民族的复兴和阶级的解放,他们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不怕艰险,义无反顾地进行战斗。起义部队刚刚来自四面八方,参加暴动的民众更是分散在城乡各地,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省委一声令下,他们即一致起来暴动。毛泽东当时还不懂军事,为了维护起义队伍的团结,他主动将湖南省委任命给自己的师长职务让给余洒度。在作战、行军、宿营中,为了部队的安全,他多次批评余洒度等人的错误主张,但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耐心指挥支持余洒度等人的工作。总指挥卢德铭一贯爱护部下,在任警卫团团长时,与士兵同艰苦共患难,对士兵说:“你们的生命,就是团长的生命;团长的生命,也就是你们的生命!”在芦溪战斗中,他亲自率队登山阻击敌军,掩护部队。一般官兵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战友和部队的事,屡见不鲜。第三团战士王祖隆病倒在路边草丛中,当他看到敌军搜寻残杀同样病倒在地的战友时,便愤然艰难地举枪向敌人射击,最后被敌人的刺刀乱刺而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汤采芝战斗中受重伤,肠子流出腹外,自己用绑腿稍事包扎后继续指挥战斗,壮烈牺牲。英雄们不是用誓言而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实现起义队伍团结奋斗的顽强意志。正是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团结奋斗精神,使中国人民从艰难困苦中走上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发生的数以百计的武装起义和由这些起义而产生的革命根据地,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由此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则是这一伟大

奠基工程的先导和砥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造的业绩，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它创造的精神财富，将由起义英雄们的后来者世代继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它同样不是少数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同样需要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发挥高度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同样需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发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

秋收起义的伟大业绩和伟大精神永放光芒！

援引书目

说明：书目以本书援引的先后为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著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未收入。

1.《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2.《中国革命武装起义全录》，张东辉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

3.《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4.《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5.《蒋介石全传》，张宪文、方庆秋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

6.《中国大革命史纲》，王宗华、马菊英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7.《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档案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8.《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1985年内部版。

9.《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李海文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11.《株洲人民革命斗争史略》,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1年内部版。

12.《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邓启沛、刘善文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4.《八七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5.《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6.《毛泽东生平研究史》,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7.《回忆与研究》,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8.《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

19.《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0.《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员会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22.《前奏·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

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

23.《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2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2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合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26.《近代湖南社会变迁》，刘泱泱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陈真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

28.《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合编，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

29.《共产主义小组》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30.《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0 年 6 月)，邓中夏著，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31.《湖南工运史料汇编》第二卷，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档案馆编，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

32.《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3.《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34.《周士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合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35.《绥西行漫记》，宁谟·韦尔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版。

36.《罗荣桓传》，黄瑶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37.《坎坷的路》，王耀南著，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38.《潘心元》，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39.《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40.《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樊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41.《红旗飘飘》第 13 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42.《莲花革命回忆录》，中共莲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 年内部版。

后 记

本书在中共萍乡市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编撰委员会领导下,由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组织的写作班子编著。

中共萍乡市委书记谢亦森为本书作序,编撰委员会主任和各副主任审阅了相关内容,并对编写工作给予了极大关心。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公室、萍乡市史志办公室、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湘赣革命纪念馆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唐振南、中共浏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副研究员唐伯藩和修水县文化局局长、原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馆长徐盛文等专家、学者为本书写作在史料方面提供了帮助,谨此志谢。

本书写作班子由萍乡市党史学会会长、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桂香,市党史学会副会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彭云秋,市党史学会秘书长、中共萍乡市委党校党史副教授黄爱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文博馆员周小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退休干部、文博副研究馆员刘善文5人组成,刘善文、杨桂香、黄爱国为主编。

2006年春开始本书的策划和征集、考核相关史料等工作,同年8月主编拟出大纲和写作计划,开始写作。写作人员的分工是:刘善文 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束语;杨桂香 第四章、第九章;黄爱国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彭云秋 第八章;周小建 第十章。全部书稿经主编审阅修订,主编所写书稿,相互审阅修订,导言和结束语并经过讨论订定。由刘善文统编全书文稿。参加本书编务的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黄洋、杜志兰、漆明和萍乡市史志办文中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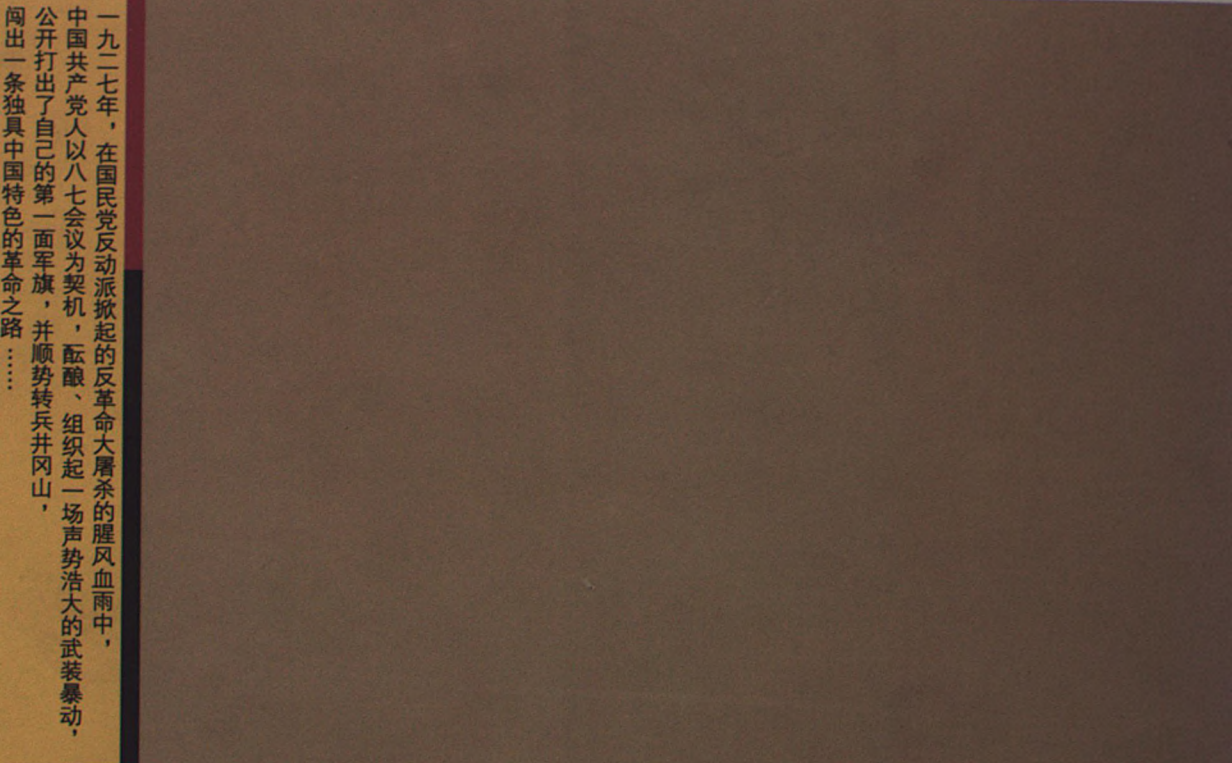
本书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秋收起义做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而准确的叙述。作者虽然为此作了努力,但因学识、写作能力和占有史料所限,在史实叙述的详略和史料的运用方面,感到有所不足;在史实判断的正误轻重方面,则难免不当不周,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7年7月1日

■井冈山斗争史话 ■南昌起义史话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

责任编辑 / 陈世象 封面设计 / 揭同元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革命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
中国共产党人以八七会议为契机，酝酿、组织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
公开打出了自己的第一面军旗，并顺势转兵井冈山，
闯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

ISBN 978-7-210-03668-5



9 787210 036685 >

定价：25.00 元